FW 大众财智书系

货币战争

CURRENCY WAR

HOW FORGED MONEY IS THE NEW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此处有大量书籍免费下载！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水隐醉月



金融骗子 纳粹党徒 政界精英 粉墨登场

伪币瘟疫 谍战风云 金融丑闻 史海钩沉

[美] 约翰·K. 库勒 著

陈远明 陈曦琳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HOW FORCED MONEY IS THE NEW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货币战争

（引进版）

［美］约翰·K.库勒 著

陈远明 陈曦琳 译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此处有大量书籍免费下载！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水隐醉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货币战争/(美)库勒著;陈远明,陈曦琳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7
ISBN 978-7-5339-2857-5

Ⅰ.货… Ⅱ.①库…②陈…③陈… Ⅲ.货币—经济史—世界 Ⅳ.F82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0344 号

CURRENCY WARS BY JOHN COOLEY
Copyright: © 2008 BY JOHN COOLEY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K by Constable, an imprint of Constable & Robinson Lt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ONSTABLE & ROBINSON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09-2 号

货币战争(引进版)

著　　者: [美]约翰·K.库勒
译　　者: 陈远明　陈曦琳
责任编辑: 朱怡瓴
装帧设计: 吴　瑕
出　　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 www.zjwycbs.cn)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兴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2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6000
书　　号: ISBN 978-7-5339-2857-5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导 言

2007年3月的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斯蒂芬·鲁佐维茨基的《伪币制造者》首度公映，观众们得以见识了二战中阿道夫·希特勒的经济战大行动，这一隐秘的题材此前仅仅在小说中有所表现。片名《伪币制造者》或许未能点出影片所描绘的史上最大规模的伪币行动涉及之广和野心之甚。

希特勒于1942年至1945年间伪造英镑和美元，为的是要侵蚀乃至摧毁敌对的同盟国的货币，进而破坏其为战争所做的努力。这场纳粹最庞大的秘密行动在位于柏林近郊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18号和19号营房展开。（澳大利亚导演鲁佐维茨基在德国巴伯斯贝格的拍摄基地相当忠实地再现了上述环境。）行动征召了上百名犹太裔绘图、制版、印刷高手和纸张、油墨专家，如此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泄密，并由一小批可靠的纳粹党卫队官员实行严密监视。他们当中有少数曾经以非法伪造纸币为业。被党卫队从萨克森豪森、奥斯威辛和其他几座死亡集中营的普通囚徒中拣选和集中起来充当伪币制造者后，他们获得了特供的饮食、固定的工时和休息活动时间。（为使影片贴近史实，鲁佐维茨基甚至复制了他们用过的乒乓球台，尽管两位九旬高龄的幸存者并不赞成此举。）造不出足够数量品质精良的伪币意味着死——犹太技术奴工就在这样的律令底下工作着。

本书探索了这一秘密行动和现代史上其他类似行动的深远影响。作为规模最大、最为人所知的一次，就参与制造甚或支配了20世纪政治气候的货币侵犯事件而言，它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战争中，包括在和平时期，通过伪造敌方货币暗中削弱其经济、社会和执政当局的尝试，从古至

今层出不穷，在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城邦就已屡见不鲜。

《货币战争》考察了譬如欧洲首批殖民者中的一些人如何在新大陆蒙骗淳朴的印第安人，以当地人用作货币的贝壳和玻璃珠的“伪币”骗走他们的食物乃至各种金银财物；也展示了最早的美元即“大陆币”被大量伪造时，揭竿而起的北美殖民地支持革命的商人和专业人员阶层中为何发生了普遍的贫困和破产现象，以及乔治·华盛顿将军的起义力量为何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18世纪80年代法国（刚刚赢得独立战争的美国人的最佳盟友）爆发革命时，英国支持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君主政权。英王乔治三世的手下乐于见到法国流亡者尝试起了英国对付美国人时用过的伎俩：王党势力伪造了数量惊人的法国大革命纸币“指券”。在19世纪的欧洲，拿破仑及其对手在各自的战争中也都制造过伪币。

美国的通货混乱在1861年至1865年内战前的几十年里持续肆虐。数千家州立银行和私人银行甚至个人发行了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缭乱的纸币硬币，与西部的开发和扩张相伴随，深化了废奴州和蓄奴州之间不断加剧的矛盾。1861年南北之间残酷的大战启动后，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颁令创建美国南部邦联美元。伪币制造者自然闻风而动。北部联盟的信使、间谍和士兵将仿冒的南部邦联美元币向南一直传播到了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和新奥尔良州。由此而来的信用危机让这种本已立足不稳的货币进一步被削弱，依赖奴隶和植棉的南方经济也大受牵连。到1863年，尽管南部邦联一开始在战场上捷报频传，却渐渐在超级通货膨胀的威力下丧失了生机。罗伯特·E.李将军在军事上失利之外，杰斐逊·戴维斯总统也承认政治失败，南部随着民生恶化和经济崩溃而斗志不再，这一点最终如流行歌曲中唱的那样：“放倒了老迪克西[1]。”

1863年，林肯总统创建全国发行的新美元，即“绿背”，结束了战前的通货混乱。1865年就在他被暗杀的当天，林肯还签署了建立美国特情局以保护绿背币免遭伪造的法令。特情局后来也被授予了保护总统免遭暗杀

[1] 《迪克西》是1859年问世的一首歌颂南方的美国流行歌曲，“迪克西”因此被用来指代南部各州。——译者注

这项极富挑战性也并不总能圆满完成的使命。

本书讲述了英国的地下工作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怎样秘密伪造德国的帝国马克并将其输入欧洲大陆以打击德皇威廉二世。该行动的有关细节仍被官方严加保密，它其实是战败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遭遇超通货膨胀的一大起因。1923年超通胀处于顶点时,1万亿魏玛共和国马克还不值1美元。需要满满一手推车钞票才能买到一条面包，而买黄油或香肠——如果还能找到这些食物的话——要的还远远不止一车钱。

根据一战结束时订立的停战协定，法国和比利时占领军逼迫战败的德国和奥匈帝国满足其报复性的赔偿要求。德国鲁尔的大批工业无以为继,就连铁轨和电话线杆也被没收。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贫困群众不断罢工和消极抵抗的同时,冯·泽克特将军统帅的国防军下属的情报部门就在魏玛共和国指挥着一项秘密行动：伪造法国法郎和比利时法郎以支付共和国从前的敌国强索的赔款并乘机破坏它们的经济。反伪币行动间接促成了国际刑警组织的诞生，它就是今日总部位于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的前身。打击欧洲的伪币瘟疫很快成了国际刑警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

20世纪20年代，雷厉风行的货币改革和由美国银行家们在希尔玛·沙赫特博士的帮助下构思的《道威斯计划》将德国逐渐从超通胀、失业和深度贫困中拯救了出来。沙赫特是一位德国银行家，曾经为威廉二世效力,在1914年至1918年德国占领比利时期间负责监督伪造比利时货币。沙赫特收回了累积如山的马克纸币和几乎成了废物的硬币。不过,就业困难和贫富差距拉大的阴影挥之不去，回归较稳定阶段的德国还是没能阻止希特勒在1933年当选首相,进而掌握政权。

本书的主题之一是20世纪盛行的包括货币的操纵与伪造在内的经济战与政治上极权主义的上升之间的关联。这在贝尼托·墨索里尼统治的法西斯意大利表现得很清楚。面对黑手党的伪币活动,"领袖"重拳出击,阻止意大利里拉贬值。20世纪30年代的独裁者们明白,维护国家的货币体系是至关重要的。

20世纪欧洲最大的金融丑闻背后的真实故事，连畅销悬念小说家埃里克·安布勒都感到艳羡。"真希望这个真实的故事是我的笔下之作。"他

写道。自1924年起，葡萄牙制假高手阿图尔·阿尔维斯·雷斯成功地伪造了葡萄牙埃斯库多币。此事以地震般的强度撼动了葡萄牙，也让伦敦市长、沃特洛公司董事长威廉·沃特洛先生身败名裂。沃特洛是一家富于声望的印钞公司，1914年至1918年间曾协助英国军情六处对付德国。伪币阴谋促使葡萄牙帝国的经济，连同帝国与过去的摇钱树——非洲殖民地安哥拉的关系都毁于一旦。更关键的是，阿尔维斯·雷斯的非法勾当导致了欧洲法西斯独裁者中掌权时间最长的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于1932年的上台。

20世纪20年代列宁去世后，苏联统治者斯大林委派苏联驻纽约的贸易组织AMTORG承担双重任务：尽可能多地窃取美国经济和工业机密，同时尽可能廉价地收购苏联经济存续所需的物资。斯大林还命令格鲁乌(总参谋部情报部)实施伪币计划以贬损美元的价值。格鲁乌操纵柏林的一家私人银行制造和散布近乎无懈可击的面值100美元的伪币。美国正值“喧嚣的20年代”，苏联人甚至试图将阿诺德·罗斯坦这样的黑帮大佬拉入行动。该计划以失败告终，未能削弱美元或颠覆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到1931年，未来得及脱逃的相关特工均被联邦监狱收押。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不主张宣扬此事和其他苏联在美国的地下活动，为的是保持苏美关系持续升温的势头，促成国会同意与莫斯科建立完全外交关系(提案于1934年获得通过)。

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史上最大的伪币行动，也就是鲁佐维茨基在《伪币制造者》一片中描绘的纳粹伯恩哈德行动，虽然其规模巨大，并由专家操刀，也没能获得全面的成功。起到关键作用的与其说是同盟国方面的应对措施，不如说是希特勒的经济副手的决定，后者害怕德国对占领国的控制因此受到影响，更担心会造成瑞士、瑞典等中立国货币体系的动荡。尽管战后英格兰银行召回和替换了大部分流通的英镑纸币，但是伯恩哈德行动对英国和其他同盟国成员的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从未被充分地评估过。

从二战噩梦中醒来的欧洲在废墟中奄奄一息，同盟国致力于在所占领的德国和奥地利重估和稳定当地货币，并防止它们遭受伪币冲击。1948年，成功着陆的德国马克成为西德恢复元气并欣欣向荣的一大柱石。

美国在二战期间为摧毁日本经济取得的经验，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又有了用武之地。在越南、老挝等地，中央情报局和美军心理战部门印制当地钞票的伪币，并常常辅以可单独撕下的宣传单，来损害敌人的经济。中情局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比索也采取过类似做法，尤其是在1961年中情局的外国雇佣兵试图入侵猪湾的前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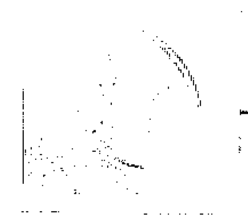
2002年欧元投入使用以来，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一直在为保护欧元的信誉免受任何威胁而努力。欧洲央行、国际刑警组织和欧洲刑警组织保卫欧元，与美国财政部和特情局在保持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美元的信誉的战斗中用的是同一级保密级别。

当今，从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工场流出的欧元和美元伪币与日俱增。超级美元泛滥一时带来的最重大的后续效应是，美国财政部对美钞样式进行了大量改革。在维持全球范围内对美元信心的政策的要求下，旧版钞票——包括遭到大肆伪造的“1991系列美联储100美元币”——始终未从市场抽回。不过财政部从1995年开始对50美元币和100美元币的安全性作了大幅提高。20美元币和10美元币也已被重新设计过。财政部向欧洲印钞技术看齐，开始使用彩色油墨，令伪造者尤其是成千上万依赖彩色复印机和激光印刷机的散户们头痛不已。布什政府于2004年将原来受财政部管辖的特情局转移到了国土安全部的管辖下。在进行中的对抗美元伪币的战斗中，财政部的情报专家和货币专家继续在强化和设计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

我已尽一切努力核实了本书涉及的信息，除了通过公开资料，还包括可能的私人和政府方面的渠道。我的某些研究也许不免构成了石油工人所说的“干洞”。无论如何，资料的选择乃至由此造成的任何错误，责任均在我一人。

约翰·K.库勒

2007年11月　雅典



目录

第一章
“皇家魅力”和“烟龙”

赚钱，赚钱，可能的话，老老实实地赚钱，如果不可能，那就不择手段地去赚吧！

——贺拉斯(公元前65—公元前8)，《书信集》

2005年8月22日，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及几个州的执法官员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皇家魅力”和“烟龙”行动被公之于众。据他们披露，“皇家魅力”是一次干净利落的诱捕行动：当时有100多位客人——他们中的多数是外国人，也有几个旅居海外的美国疑犯——应邀去“皇家魅力”号游艇参加一次婚礼，游艇就停靠在新泽西州度假胜地大西洋城的港口。所谓的新郎与新娘实际上是美国联邦密探，他们早已打入了一个犯罪集体，这个犯罪集团走私伪造美元、非法制造贩卖假的“纽宝”、“万宝路”香烟以及毒品。这艘船上的货物中夹有面值440万元的超级伪币。

“烟龙”行动针对的是运抵西海岸的同类货物及伪币，所针对的罪犯其实与“皇家魅力”中的罪犯是同伙，具体细节没怎么向外界透露。不过很显然，此次行动的成功是反伪币工作人员通过在美国及海外各地长期细致的侦探工作换来的成果。8月20日到21日的那个周末，有59个人在美国及加拿大的11个城市遭到逮捕。其中有8个人还穿得衣冠楚楚，他们带着结婚贺礼，正准备去大西洋城参加所谓的游艇庆典。

这之后，又有87名亚裔人士及美国公民被指控走私伪币、毒品及假烟进入美国。联邦调查局还缴获了面值70万美元的假美国邮票、总案值4200万美元的假手表等假货以及价值几十万美元的摇头丸、冰毒、伟哥。

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就已获悉美元高仿伪币的存在,其油墨和各种防伪标志几可乱真。华盛顿封锁了伪造美元的消息,以避免打击公众对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美元的信心。不过,美国联邦特工及相关协作部门为此发起了对外称为"皇家魅力"和"烟龙"的行动。联邦特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起获了数百万计的美元伪币。

在美国,数量如此之众的超级伪币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加拿大流入了大量的100和50美元面额的美钞。这些钱首先被送到多伦多和其他地方的赌场清洗,随后现身于美国拉斯维加斯、纽约以至迈阿密的各处赌场。

1989年之后,大量的超级伪币开始涌入欧洲并最终流到美国。这些伪币来自中东地区,并使克林顿政府出现了一次重大危机,不过政府的遮掩工作做得比较好,这次危机并未广为公众所知。在2003年3月美英联军入侵伊拉克前后,伊拉克及其周边地区也出现了大量制造伪币的现象。美国于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的理由是反对乔治·W.布什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家发展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实却证明这个理由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想象中的事物。这个理由背后有一个藏得很好的深层动机,那就是遏制伪币。

同恐怖组织及犯罪集团的关联

20世纪最后几十年,西方及以色列情报组织陆续发现,区域内及全球性恐怖主义活动同政府及犯罪集团实施的伪造货币活动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两者之间往往是通力合作的关系。

"皇家魅力"和"烟龙"行动中落网的多名疑犯很可能属于一个全球性集团,不过这一点并没有在公开场合得到过证实。该集团在捷克、德国、波兰及白俄罗斯均有联络点。据说,该集团通过莫斯科的各处联络点组织起了众多犯罪团伙。

美方在起诉书中回顾了超级伪币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在全球经济体中崭露头角的历史。美国财政部重新设计了百元面值纸钞,针对造假者采用了新的防伪标志。与此相应,90年代晚期又出现了改进过的新版

超级伪币。起诉书称，在 1997 年 12 月至 2000 年 7 月间，被查获的犯罪团伙销售超级伪币并安排超级伪币的购买、运输及转卖事宜，所涉金额高达 100 万美元。据说，为了对来源保密，疑犯说这些伪币来自俄罗斯。

据 2002 年庭审时的英国地方法官约翰·卡维尔说，当时被他宣判入狱的三位被告操作的这些超级伪币“质量超乎寻常，连银行都上了当”。《爱尔兰日报》曾发表过一篇未经证实的报道：该犯罪团伙 1989 年首次弄到了 100 万美元的伪币。这些伪币被送至“东欧一处度假胜地”。为了不引人怀疑，犯罪分子将伪币交到“以已婚人士和以退休人员为主的人”手中，后来又把它转移到了爱尔兰。

2004 年 6 月，BBC《全景》节目播出了一部名为“超级伪币”的片子，其中宣称：

> 警方的调查让一个国际伪币卡特尔浮出了水面。调查显示，操纵这一切的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犯罪团伙，他们从莫斯科弄来超级伪币，将之走私到都柏林。这些伪币随后又从爱尔兰流入伯明翰（英国），散布到当地的黑社会当中。到最后，大多数伪币又会被一个男人大批买走。

美方起诉书中点名指出了伯明翰的 4 名罪犯的姓名。2002 年，伍斯特皇家法庭判处其中一人 9 年监禁，并没收其 78.9 万英镑的财产。该罪犯就没收财产的判决提起上诉，伦敦地方法院听说他在超级伪币交易中获利超过 100 万英镑，便驳回了他的上诉请求。另一罪犯供认自己参与了分发伪币，随即被判处 6 年监禁。

一份英国报纸的分析报道进一步指出了俄罗斯同此事的关联：20 世纪 80 年代，伪币制造者们移居到了东欧。不过，苏联解体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及特勤局在俄罗斯建立了基地，旨在对抗俄罗斯黑手党的跨国犯罪，这些人因此又转移到他处。该报道的后文是：

> 加入犯罪集团的原克格勃特工接管了此类行动，利用他们在欧洲及其他国家的网络来散布伪币……

“万能美元”地位不再稳固?

印制伪币的行为对于美元作为全球最稳定、最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产生了怎样的威胁呢?数代以来,全世界的经济学家、执法者,尤其是银行界人士、商人和投资者一直受着这样一个问题的困扰:伪币对富国的政治及经济稳定究竟会有怎样的影响?

任何一个同笔者一样多年工作在海外的美国人都会有历史及精神层面的顾虑。在20世纪,绝大多数美国人——当然还有许多在两次大战中劫后余生的欧洲人——坚定不移地相信没有什么东西能比美元更为稳固。著名作家T.S.艾略特、欧内斯特·海明威、格特鲁德·斯坦都是美国侨民,20世纪20至30年代在巴黎、伦敦俭朴度日,此外还有数千名作家、艺术家、学者、商人、记者也选择了生活在海外。他们从祖国收到工资、养老金等一笔笔美元,以此来支付自己的房租、日常饮食以及欧洲街头咖啡馆每一次聚会的开销。

二战期间,纳粹大肆印制伪币,撼动了英镑原有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确立了美元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二战的最后几年中,西方经济分析家认为,两次大战期间主要流通货币地位的弱化是世界经济危机的主要诱因。他们的论点是,货币必须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这样人人都可以从蓬勃兴起的战后贸易中获利。

历史学家托尼·朱特认为,英国经济学大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最主要的发动者及推行者。凯恩斯(他在1920年提出过这样的警告:“破坏通货是撼动现有社会根基最难以察觉却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主张,两次大战之间的全球金融体系亟待改进。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放弃了金本位制,凯恩斯认为,新体系应当比金本位制宽松,导致通货紧缩的可能性更小。不过他又补充说:新体系应当比浮动汇率货币体系更可靠、更持久。

为实现这些目标,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成立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者的运作资金来自美国。该组织首届执委会成员国也就是

未来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巨头”: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中国。世贸组织的前身也在此次会议中产生。托尼·朱特指出,所有这一切促成了“史无前例的对外国干扰的高度认可”。

要使稳定的美元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很重要的一点是确定其他货币同美元之间的兑换比率。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和西方其他中央银行要保证货币的平价汇率。黄金的固定价格是每盎司35美元。只有新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更改各国货币的平价，而且前提是货币体系出现了严重失衡。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用于战后欧洲重建,欧洲大陆由此得以复兴,固定汇率也进一步得到稳固,随之而来的是全球性的经济繁荣。尽管也有阶段性的波动,这样的繁荣总体来说还是持续了将近30年。

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元同其他货币的汇率开始浮动。理查德·尼克松总统采取果断措施有效终结了固定汇率制度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如今,在金融市场上,人们可以像买卖其他商品一样买卖货币。

2004年,美国财政部首次公开表示了对国际伪造活动的深切忧虑。此时,美元对新出现的欧元、日元、瑞士法郎及其他货币正在贬值。美国的种种做法——政府的高额借款、消费者的疯狂消费及低存款、巨额的经常性项目赤字——导致或者说加剧了全球的资金紧张。

2004年12月2日,《经济学人》周刊撰文指出,美国的经常性项目赤字“数额巨大。若在以往,这样的赤字足以令任何一个国家破产”。显然,美元难逃持续贬值的厄运。美国财政部印制的美元现钞——以及全世界造假者大规模复制的钞票——开始呈指数增长。要购入美元以维持本国货币汇率的时候,其他地方的中央银行便会印制更多的本国货币。股价、房价由此抬升,导致了这部分资产的价格泡沫。

黑石集团主席、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商务部长、共和党人彼得·G.彼得森在著作《财源耗尽》中提请人们注意一个极大的危险:

> 印钞票……历来是政府的最后一个招数。从18世纪90年代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到20世纪20年代的魏玛德国（本书后文中将会探讨这些案例）,面临胁迫的政府为了达到收支平衡,其手段便是急速

扩大支付能力，使之超过其已有债务……通货膨胀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社会诚信的破坏以及经济的崩溃。

从历史上看，意欲破坏敌对国经济的政府常常采用伪造对方货币的方式。在通货膨胀,尤其是极度通货膨胀时期,伪造货币的活动便会甚嚣尘上,美国和法国的大革命时期、美国内战时期以及希特勒崛起之前的魏玛德国时期便是如此。

当然,伪币只是经济不稳定的其中一个原因,或者说是潜在原因。彼得森在书中讲述了美国在布什统治时期沦为全球最大债务国的过程,而该国一度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2001 年布什上台时,美国的 10 年财政预算还是收支平衡的,据官方预估还会有 6.6 万亿的盈余。但是,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股市大泡沫、"9·11"后遗症、布什针对富有阶层的减税政策以及同阿富汗和伊朗的战争等因素将这些盈余蚕食殆尽。2006 年底,美国国债已经达到甚至还可能超过了国会制定的 11.6 万亿美元的合法上限。此外,由于超过 5000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以及过低的储蓄率,美国经济每运转一天,就需要从中国等现金丰富的国家吸纳大约 2 万亿美元的贷款,美国人则需承担巨额利息。

彼得森的总结一语中的:"如今美国的两项赤字都已极其庞大，而我们的存款率又如此之低,全球的投资者因此很有可能不再信任美元,这是切切实实存在的一个风险。"据他说,像巴菲特这样的亿万富豪都已经开始购买外汇了。在瑞士达沃斯的年度世界经济论坛以及其他类似场合中,别的一些世界经济巨头也已经开始公开质疑，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还能维持多久,日益没落的美元是否会导致美国经济彻底崩溃,进而拖垮全球经济。

本书还将进一步探讨美元的稳定性问题。不过,我们必须先看一看,作为一种时或伴有严重犯罪行为的政府间秘密战争，货币造伪是如何快速进入超级伪币时代的。此外，由于欧元可能会成为下一任世界储备货币,我们也将探讨针对欧元的造伪情况。

第二章
中东的伪币

货币的命运现在是，将来也会是一个国家的命运。

——弗兰兹·皮克，奥地利经济学家

1990年11月，我和我的希腊妻子瓦尼亚乘飞机去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那时我们已经在沉闷阴暗的伦敦住了10年，一上飞机就备感愉悦轻松。我们住在尼科西亚的一个宾馆，窗外是艳阳天和棕榈树。当时我们还没怎么意识到，自二战期间阿道夫·希特勒秘密制造各国伪币以破坏英国、美国及其他敌对国的经济以来，最具野心的一次秘密金融战争马上就要拉开帷幕。近乎完美的百元伪币，也就是所谓的超级伪币，早已在远东粉墨登场，如今就要进军欧洲和美国了。

1979年之后，美国一直同伊朗交恶。美国在中东最主要的盟友伊朗国王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下台后，阿亚图拉·霍梅尼及其继承人在伊朗掌握政权，随后便发生了人质事件。在吉米·卡特总统任期内的1979年11月，美国使馆人员被扣在德黑兰充当人质，直到1981年罗纳德·里根总统就职典礼后半个小时，他们才重获自由。1980年至1988年间发生了为害甚剧的两伊战争，美国向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提供了经济、军事以及军情援助，进一步加剧了华盛顿同德黑兰之间的猜忌和互不信任。

1985年夏，正是里根总统执政的中期，美联储主席保罗·瓦尔克批准增加美国国内的货币供应量。增加的这部分美元多数流向了金融市场，股价因此飙升，华尔街也出现了一轮大反弹。金融投资者赚了个盆满钵满，

"真正的"经济——生产和消费——却停滞不前。20世纪20年代末的情况与此非常相似,紧随其后的便是1929年的大崩盘及接踵而来的大萧条。

1987年仲夏——也许是巧合,超级伪币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远东各地陆续出现——美联储采取了跟1929年大崩盘前那个夏天相同的举措。1987年11月,资深财经作者威廉·格雷德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三篇系列文章,其中指出:"过去2年中,它(美联储)往私有经济中注入了过多的流动性,如今又开始逐步往回收。"其结果就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势有所减缓,股市却仍然保持增长的势头。为了重建债券市场的信心,美联储紧缩信贷、提高贴现率,用意便是打压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同时又不致产生恐慌——又是1929年策略的重复。不过,最终的结果也跟1929年相似。

尽管1987年10月的股市崩盘远远不及1929年的那一次惨重,不过光是10月19日一个交易日的损失也已高达5000万美元。这次风波很快波及全球市场,亚洲、欧洲股市的损失数以万亿计。这之后,为了缓解冲击,美联储在艾伦·格林斯潘的统领之下作出了回应:往美国银行系统投放几十亿元新印制的美钞,同时降低利率。美国及世界股市在随后几个月内得到复苏。美元汇率波动很正常,自1971年尼克松总统果断中止固定汇率制后便一直如此。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流通、集聚的美元数额自此也是节节攀升,并在21世纪初突破了万亿元大关。

为了让阿富汗摆脱苏联的控制,美国及中情局的穆斯林雇佣军发起了一场傀儡战争。到20世纪80年代末,认为这场战争必胜的那种爱国热情逐渐淡化。80年代原本相对繁荣的经济逐步走向衰退,部分原因就在于1991年为了将萨达姆·侯赛因驱逐出科威特而发起的那场战争。对于那些希望看到美国倒霉的人来说,如今的美国经济就成了刀俎间的鱼肉。他们认为,美元的不稳定必定会导致并加剧经济动荡。他们及盟友则可以借此购买武器、募集发展资金、必要的时候在特定区域招募合意的恐怖分子,从而扩张自身的势力。

到了90年代中期,世界各地的银行家、执法者和情报部门都意识到了伪币,尤其是超级伪币的威胁。各方对于世界范围内流通的美元伪币数额的预计从1亿到100亿元不等,确切的数据却没有人——包括美国特勤局、各情报机关甚至美国财政部的情报部——真正知晓。

西方世界的超级伪币

1995年的某一个工作日，伦敦托马斯·库克银行出纳员史蒂文·布莱恩仔细审视着当天柜台上收进来的一张百元美钞。油墨、纸张、美国铸印局超高压凹版印刷设备印制的浮雕效果，一切似乎都无懈可击。然而，布莱恩还是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于是拿出一副高倍透镜，打算好好研究一番。

透过清晰的玻璃镜面，布莱恩看出了问题所在："仔细看'美利坚合众国'这几个字当中的那个T字母，"此后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他对着镜头举起那张纸币，对记者说道，"就是单词UNITED中的那个T字母，横线的右半边墨色特别浓。"横线的右半边跟竖线是分开的，只不过需要一个高倍放大镜才能看得出来。布莱恩还注意到："而且，单词OF中的那个O字母顶部是平的，这种伪币因此得了个'平顶O'的绰号。"

在远东首次发现超级伪币之后，美国财政部官员便协助托马斯·库克等多家银行开展了识别假美钞的培训课程。库克银行出纳员布莱恩在那张近乎完美的百元美钞上发现的漏洞，其实早在1983年便在新加坡被识别出来了，随后又于1988年在菲律宾再次被人发现。同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现的众多伪币一样，银行业及政府部门内部人员所称的"新加坡超级伪币"是有史以来效果最好的美元伪币之一。

1988年，这种伪币在菲律宾再次现身，1989年前后在即将解体的苏联及后苏联时期的新俄罗斯更是大量出现。这些后来者较之从前有了一些变化，跟断T和平顶O版本比起来，识别它们的难度更大。

伦敦托马斯·库克银行首次发现伪币后，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几乎是波澜不惊。然而，中东以及相邻的塞浦路斯的银行家们却在1990年底敏锐地察觉到了威胁。在英国，伪币已经非常普遍，假英镑以及质量中低档的假美元尤其如此。在90年代中期的伦敦，一张10英镑的真币可以换到一张50英镑的伪币，5英镑真币则能买到20英镑的伪币。城南一家夜总会的侍者——写作相关报道的记者管他叫"凯文"——跟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发现20、50英镑的伪币在夜总会里是可以流通的。虽然这些伪币

的质量跟二战时期纳粹大量生产的那批假钱不可同日而语，骗过那些粗心的人也绰绰有余了。在夜总会里，人们可以用这样的伪币从凯文手里买他倒卖的摇头丸、可卡因及其他毒品，或者当零钱找给客人。这样的伪币也许是有人用办公室或家中的彩色复印机印出来的，也可能是某家平版印刷公司的一位夜班工人偷偷印来挣外快的。这些纸币近乎完美：其色彩能骗过所有非专业人士的眼睛，甚至连纸张——这是辨别伪币最为复杂、关键的一步——给人的感觉也同真钞无异。在美洲及其他大洲，数以千计现在业余、未来可能升级为专业的造伪者正通过同样的方法在"造钱"领域大显身手。

20 世纪 90 年代，业余造伪在西方非常普遍，中东精心策划的大规模美元造伪却绝非业余水准。美国国会部分议员及工作人员很快发出了不着边际的评论，指责所谓的"美元伪造同盟，其目的可能是加强当地经济，同时削弱美国的力量"。引号中的文字引自美国新闻署 1992 年发布的一则新闻。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几份主流报纸针对此种说法尽职尽责地在内页刊登了一些相关评论，国家广播公司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也做了报道。除此之外，国会提出的这一议题在当年那个湿热的夏天里再没有引来别的媒体关注。

在 1992 年 7 月 1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议员比尔·麦克科勒姆发言说："事情的真相就是，中东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造假运动，其目的在于缓解自身的财政困难，发起针对西方的金融战争。"

这让美国财政部及克林顿政府的其他官员感觉到了不安。在内部会议及私下交流中，他们都表示了疑惑：在公开场合如此郑重其事地发出声讨，效果难道不是适得其反吗？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内部已经存在许多争议，内容涉及冻结的银行账户、因伊朗人质危机导致的贸易禁运而未能履行的已付款军方给养订单，以及美伊双方正在海牙等地商讨的其他敏感问题。在当地政府愤怒地对这一指控予以驳斥之后，此类争议又加上了新的内容。在美国以外，店铺、餐馆，特别是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都拒绝接收美元——尤其是百元美钞，有时候也包括 50 元面值的美钞。有传言称，这些伪币常常连美联储的检验员都分辨不出来。

在一份国会的恐怖战争及非常规战争特别工作组提交的报告中，多

数的信息来自美国、英国和以色列的情报人员。他们的报告显示,伊朗跟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政府打了8年仗,又经受了美国的贸易禁运,美元储备一直处于严重不足的状态。如今,这个伊斯兰政府急需美元现金来补充其武器、军火及药品储备。

而伊朗官方出版物声称,这些伪币是美国情报部门印制并散布到伊朗的。

国会银行委员会主席、议员亨利·冈萨雷斯及其他持怀疑态度的人士事后质疑:特别工作组的这些结果是否仅仅是基于推测。报告中的绝大多数数据都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工作组高级研究员尤素福·博丹斯基,此人号称在以色列人头非常熟。1994年7月13日,国会针对美元的新设计方案举行了一次听证会,一开始的议题就是备受争议的百元美钞。麦克科勒姆就那些为他的指控提供了有力证据的发现发表了评论,在1992年报告的基础上,他补充道:

> 高仿伪币的传播正在不断地加剧。种种迹象表明,这个问题还会日益严重,散布者会采取新的方法和新的路径来走私伪币。中东是高仿伪币的主要来源,多数伪币都在这个地区印制并由此散发至西方国家,数量也在持续增长,国际犯罪集团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真正的美钞出自美国财政部铸印局,该局前局长鲍勃·卢瓦尔说,超级伪币

> 其实算得上是我们的百元美钞一个近乎完美的样本……包括美联储的工作人员在内,每一个见过超级伪币的人都说它接近完美,完美得可以通过联邦储备银行验钞机的检验。

长期以来,铸印局一直在研究造伪活动,以及如何通过重新设计美元来对抗造伪。

鉴证部门的质疑

超级伪币从1995年开始逐渐引起公众关注,最终使得美国广播公司以及其他一些媒体产生了一探究竟的兴趣。当时,笔者和妻子正住在归属希腊统治的塞浦路斯南部，这里是整个塞浦路斯岛上最为富庶的区域。1974年7月土耳其入侵之后,塞浦路斯就被一分为二,南部归希腊裔塞浦路斯人,北部三分之一的岛屿则是土耳其占领军、大陆移民及外来劳工的天下。印制伪币这样的高级别犯罪行为会对希腊裔塞浦路斯人中那些富有的商人及银行带来很大的危害，希腊裔塞浦路斯警方因此在这方面保持着高度警惕,行事也是卓有成效的。

安德里亚·尼古莱德斯督察是塞浦路斯总警署鉴证实验室主任。1995年12月,凭借自己在华盛顿特区特勤局接受过的全面培训,他对造伪者实施了紧密的跟踪。在尼科西亚他那间凌乱的办公室里,借助显微镜、电脑以及一摞一摞的纸质文献,他给笔者上了一堂鉴别美元伪币的速成课。

尼古莱德斯告诉笔者:“你要找出纸钞印制上的区别。拿一张可疑的钱跟真钱做对比,就可以判定这张可疑的钱采用的是胶印法、凹版印刷还是其他工艺。”他向笔者展示了1992年至1993年间在塞浦路斯发现的一些伪币样本。正如伦敦托马斯·库克银行的史蒂文·布莱恩所指出的那样,其中一张伪币上“美利坚合众国”字样中的O字母有一点点偏高,跟钱币上部的边线稍微重叠,于是就给削平了。有些伪币上的O字母还透出些许橙色油墨的印迹。还有,在纸币的背面,也就是颜色比较暗淡的那一面,边上一圈的旋涡形图案的左上部不是闭合的。这位督察说:“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多数伪币,上面都有大约30处的瑕疵,不过很多瑕疵都非常细微,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出来。”他还说,没有哪种验钞设备是全能的。即便用上了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最新科技，人们有时候也会把一张真钱误判为伪币,可能是因为这张钱脏了、破了或者其他的后天缺陷。没有准确率百分之百的科学验钞方法。

塞浦路斯怎么会成为东方那些造假者及洗钱者进入西方的门户呢?通过跟尼古莱德斯和塞浦路斯一些银行家、商人的交流,再加上一些媒体

报道的帮助,答案终于慢慢浮出了水面。

1991年底,一位来自中东的神职人员从贝鲁特飞抵腊那喀机场。这位神职人员乘出租车去了利马索尔——塞浦路斯岛上最大也是最商业化的海港——的一家宾馆下榻。第二天早上,他来到当地一家银行,想要破开两张百元美钞。银行出纳员在反伪币培训班上接受过美国财政部工作人员的培训,认出这两张钱是高仿伪币,于是报了警。警察拘捕了这名神职人员,搜查了他在宾馆的房间,起获一个装有面值3.5万美元超级伪币的手提箱——跟同期在远东、俄罗斯乃至纽约落网的那些走私者所携带的数额相比,这个数目可谓微不足道。

这名神职人员在塞浦路斯的一家法院接受了审讯,法官以散布伪币罪判了他好几年的徒刑。6个月之后,塞浦路斯总统却悄无声息地释放了这名神职人员。有人对那位宣布判决的法官施加了各种压力,包括死亡威胁,同时也曾向塞浦路斯司法部施压。

尼古莱德斯督察还告诉笔者:

> 此次事件之后,又陆续出现了很多的走私者。1992年之前,多数走私者都是阿拉伯人。此后便是各个国籍的人都有,尤以俄罗斯人为多。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在25年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见识过的伪币形形色色。你们所说的超级伪币不可能是小打小闹的犯罪团伙弄出来的,必须有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还得有最尖端的印刷、复制以及散布伪币的装备。它们肯定是有组织的。

《读者文摘》、《纽约客》以及以色列《国土》杂志等出版物的新闻从业者正在逐步证实,美国国会调查人员以及塞浦路斯警方的怀疑应该是确有其事。对美元的大规模造假有两个彼此息息相关的目标。其一是重创全世界最受重用的货币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西方经济。这一目标在目前看来离成功还遥遥无期,而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及希腊城邦以来的历史已经见证了无数次此类尝试的失败,但这两点事实都没有让那些造伪者望而却步。第二个目标缘起于古老的人性贪婪,那就是尽可能多地牟取利益。在克林顿的两届任期以及乔治·W.布什随后的两届任期内,国际犯罪

集团正是为这两个目标服务的。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苏联解体的余波中，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苏联公民成百上千地涌入塞浦路斯、伦敦、巴黎、苏黎世以及西方的其他金融中心。他们随身携带的手提箱和帆布大行李包中塞满了美元，其中很多都是伪币。起初，他们会把这些钱全部换成金子和珠宝，然后回到莫斯科、基辅或者耶烈万，在那里卖掉战利品，赚取丰厚的利润，接着再回到那些金融中心去购入更多的货物。后来，他们便利用塞浦路斯、瑞士、奥地利等地自由的金融制度，自己成立银行来进行大规模的洗钱活动。他们购入商铺、住房及其他房产，偶尔也会以黑社会的方式相互残杀。在塞浦路斯，有些人移居到了土耳其占领的北部。在那里，毒品走私、伪造货币、买卖东方妇女等非法活动都很赚钱。

乔治·瓦西利乌于 1988 年至 1993 年担任塞浦路斯共和国主席，卸任后又干回了商人的老本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1995 年，他向笔者证实，在他的任期内有大量伪币涌入塞浦路斯（"毫无疑问，很多伪币又从这里涌向了西方"）。没错，为了对抗伪币，他跟美国财政部及特勤局开展了通力合作，不过他认为，要说中东及世界贸易经受了严重创伤还是有些言过其实了。

跟美国克林顿政府的主管部门以及其他国家面临这一问题的高级别政治家一样，瓦西利乌也不愿意对流通伪币的数额、伪币的出处及目的发表任何结论性或预测性言论。这个问题要留给美国特勤局一小部分过度操劳的人员，加上部分中情局官员及其手下。他们先是奔波于中东，随后到远东，努力招募更多的情报人员，尽可能搜集到美元伪币的所有样本。他们跟踪到的有效线索——还有很多是假线索——多数都指向了中东的印制及散布伪币活动。这些线索反过来又指向了那里的凹版印刷企业，以及向日本、泰国、菲律宾、印尼运送美元伪币的渠道。那些质量相对较差的伪币则产自俄罗斯、乌克兰、波兰以及萨达姆·侯赛因统治时期的伊拉克。伊拉克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它在 1990 年 8 月入侵了科威特，而以美国为首的各国军队又通过大规模的"沙漠风暴"军事行动在 1991 年冬驱逐并摧毁了萨达姆的军队。

超级伪币购置武器

中东一些造假者的合作者是有组织的黑手党组织或者中东以外一些黑手党性质的团体。一直以来,意大利的四大黑手党组织都参与其中,如今仍然如此。科萨·诺斯特拉集团便是其中之一,他们的老巢一直在西西里的巴勒莫。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该集团一直是美国知名度最高、地位也最为稳固的黑社会组织。第二大组织是发家于意大利坎帕尼亚区的克莫拉集团。此外就是称霸南部省份卡拉布里亚的勇敢者集团。相较于前三者,第四个组织联合圣玫瑰园算是后起之秀,主要在罗马和意大利南部活动。

为了制造假美元,后来又加上欧元,这些集团同俄罗斯及其他东欧组织的联系日趋紧密。他们的触角还伸向了中亚及中东,并不断设法购入核材料及核武器——乌萨马·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当然也在其列。除了伪币以外,意大利黑手党还向他们提供假货,从假劳力士表到冒牌服装应有尽有。在实际的交易当中,武器、军用电子装备、铀(其中有些是武器级别的超浓缩铀,是从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哈萨克斯坦军队储备中偷来的)都被用来交换伪币和假货。在相关的情报文件公开之前,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知事情的真相。

美国对超级伪币的调查

1992年春的一次行动揭开了一系列调查的序幕,这也许是针对超级伪币现象最有说服力也最为公开化的一次调查。两名出生于黎巴嫩的毒品走私犯——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安多佛市的吉布兰·汉纳和来自加拿大渥太华的彼得·卡塔尔——被美国海关抓获,当时他们正从黎巴嫩贝卡河谷往波士顿运送3吨多的印度大麻。审讯他们的是波士顿联邦检察官保罗·克里。他们表示愿意协助开展海外的超级伪币调查,因此没有被定罪,并躲过了3年的监禁。汉纳提议让自己的弟弟前往黎巴嫩,得到了克里的同意。

几天后，汉纳的弟弟返回波士顿洛根机场。他给克里带了5张纸币。很快，特勤局便认定这些都是超级伪币。他们告诉克里，此类伪币大约从1990年开始流通，此前2年中印制的伪币面值达到了20亿至30亿美元。这批伪币用凹版印刷机印制，高压雕版印刷使得钞票具有浮雕效果。而且，这批伪币的纸张也是美国财政部印钞用纸的特别复制品。自1879年以来，财政部的印钞纸都由马萨诸塞州达尔顿的克兰公司独家供应，其中有75%的棉和25%的亚麻，并嵌入了红色和蓝色的纤维。随后，有3位银行家看了这些超级伪币，结论是这种纸张看起来、摸起来都跟真的一样。他们认为，这就是克兰公司生产的真的印钞纸。

这几张百元伪币的序列号是连续的，背面的黑色油墨跟真钞无异，具有氧化铁的磁性属性。这类伪币所有的制造工艺都无比准确精密，因此能够成功骗过美联储的验钞机。此外，伪币印制过程中所用金属版的质量似乎也在不断提高。

1991年，经过长期不懈的调查，纽约长岛《新闻日报》驻华盛顿记者科纳特·罗伊斯绕过官方的否认以及美国财政部种种显然“出于编造”的故事，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1990年7月6日，铸印局盘点时发现少了一片用于印刷三十二连体百元美钞的正面印版。对于此事的解释，政府说辞的有些版本说这是因为“计数时的小差错”，要么就是这片印版“被混在垃圾当中带出去了”。虽然没有证据，这位记者还是猜测，这片失踪的印版被人秘密带到了国外——也许是通过外交邮袋——的非法印钞中心。

保罗·克里的黎巴嫩线人提供的情报显示，伪币在欧洲、远东、中东、苏联都有流通。其实，美国特勤局以及财政部高官早已知晓此事，只是不愿意将其公之于众而已。财政部官方数字显示，1995年3月，世界范围内大约有面值360831314979(将近3610亿)美元的伪币在流通。财政部一位女发言人称，通常的预测是，其中三分之二在美国以外流通。所有伪币中有2150亿是百元美钞。这些数字显然还没有包括人们手头以及国外银行现金账户中的伪币。

美联储面向公众的传单和小册子通常都会指出，美元在全世界是很受欢迎的。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元信誉一直在急剧下滑，大量百元及50元面值的美钞——尤其是造伪者最青睐的1991年版百元美

钞——遭到拒收的事实便是证明。在贝鲁特、安曼、开罗的酒店和餐馆,笔者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警示牌:拒收老版美钞,也就是印制于1992年及1996年两次反伪币改版之前的美钞。

来到欧洲以后,不明就里的美国游客——包括许多国会议员以及至少一位参议员(佛蒙特州的帕特里克·里希)——往往大惊失色地发现自己的百元美钞竟然遭到了拒收的待遇。爱尔兰旅游局就建议,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从美国前来的美国游客尽量携带其他面值的美钞入境。1991年,到了塞浦路斯之后,笔者拿去兑换或存入银行的每一张百元美钞都得经过验钞机的检验,然后复印,而笔者还得在复印件上写上自己的身份证件号码或者是护照号码。

以色列的调查

在尼科西亚的时候,笔者还和塞浦路斯总警署反欺诈作伪分队的队长乔治·萨卡瓦斯谈过。萨卡瓦斯是尼古莱德斯督察的上司,也接受过美方情报人员的培训,并曾造访美国财政部及铸印局。他的联络人罗纳尔德·鲁萨尼阿当时是在罗马的美国使馆的美国财政部代表,负责地中海东部及中东地区的相关事务。鉴于超级伪币在塞浦路斯岛上愈演愈烈,萨卡瓦斯强烈建议美国特勤局在塞浦路斯开设一个相关的分支机构。很快,他的建议便成为现实。他说,总部位于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已在塞浦路斯设立警署,正在全力追查伪币。他坚信华盛顿的铸印局遗失的那片三十二连体印版肯定是被人偷了,建议以色列执法部门密切关注这一事件,并希望华盛顿能够在以色列安排常驻人员。

事实上,以色列是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国家之一。1992年2月27日,国家广播公司播出了资深评论员弗瑞德·弗朗西斯的一则报道,其中包括对以色列高级鉴证警官阿姆农·沙尔迪埃尔的采访。报道援引美国特勤局的相关文献,称超级伪币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切实隐患”。以色列警方声明,部分超级伪币来自黎巴嫩的贝卡河谷。他们还说:

> 假的伊拉克第纳尔币曾在巴格达泛滥成灾。大面值的第纳尔无

法继续流通……很多人都怀疑,如今类似情况又出现了。以色列专家认为,假的百元美钞出自高科技印刷企业……而获得这样的纸张也是难上加难的。

几周后,1992年6月初,美国特勤局的两名高官访问了以色列。美国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去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接上了他们,之后直奔耶路撒冷的以色列警察总部。在那里,他们会见了刑事鉴定部文献实验室的鉴证研究员。寒暄几句之后,美国客人提醒以色列人二战期间纳粹的造伪行动

目的很明确,那就是颠覆英国的经济……我们有理由相信,如今又有人在制造同样的骗局,只不过目标换成了美国。正有人有计划、有步骤地印制并散布了质量空前的高仿百元伪币,主要用于毒品交易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恐怖活动。

接下来的几天里,美方同以方研究了警署实验室那些没收来的伪币,将其特征一一作了对比。一处明显的纰漏便是DOLLAR一词中的O字母,这个纰漏此前已被塞浦路斯的尼古莱德斯督察识破。此次会面几个月之后,耶路撒冷警察总部收到了来自美国特勤局的消息:

我们对字母O的发现已经泄露……造假者已在最新一批伪币中予以纠正。目前我们只有3处标记可供判断。随信附上一张新的伪币样本。

阿维·阿布拉菲亚警司是警察总部文献实验室主任,萨德克·格拉迪埃是里昂国际刑警组织防伪部门的负责人,他们都证实了情报泄露的事情。阿布拉菲亚承认,这次情报泄露严重影响了整个调查。格拉迪埃对此的回应是:"这是调查此次高层次造假行动中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我们还没有找到情报泄露的原因。"

格拉迪埃告诉以色列人,国际刑警组织的做法是不讨论伪币源自何处,因为他们不愿将矛头指向任何国家。瑞士中央银行则拒绝对相关调查

做出任何回应。约瑟夫·巴登斯基是麦克科勒姆议员领导的那个调查组的成员，他向以色列《国土》杂志透露，美国财政部及特勤局曾向调查组施压，让他们不要将伪币源自何处公之于众。巴登斯基说：

> 华盛顿盛传这样一种说法：特勤局和财政部还没有公布的打算，因为一旦承认有数量如此之众的伪币正在流通，对于美元已然动荡飘摇的国际地位不啻是雪上加霜。

美国财政部否认了这些说法之后，巴登斯基又通过《国土》杂志进行了反驳："我们百分之百地确信"这些伪币源自中东。他进而表示：

> 造伪国此举的主要目的是平衡自身的预算，而不是针对美国。他们对美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而在他们看来，这么做完全合乎常理。我们可以对自己写下的这些东西承担全部责任。根据我们现有的资料，总统或者某位重要官员完全可以向公众宣布，造伪国对美国实施了经济恐怖行动。我们报告中的材料仅仅是冰山一角而已……

《国土》杂志的文章援引美国国会对于造伪国经济困境的分析报告。根据这些报告可以推断，造伪国是在1989年做出了印制伪币的决定的。当时该地区负有340亿美元的外债，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国外的借款为"国民战略"方案提供了资金，该方案内容包括从国外购置核工程所需原件、常规军队的升级换代及现代化，以及援助一些海外组织。根据相关分析，用于这些项目的拨款估计可达100亿美元。硬通货大量消耗，无论是以石油为主的合法出口，还是来自世界金融市场的贷款，都不足以填补这个亏空。因此，美国方面以及随声附和的以色列分析人士得出了一个结论：已有人开始印制三种等级的伪币，其中最高那一等便是超级伪币。

西方情报部门认为，中东某对外情报机构曾派出高级特工前往西欧，购置秘密造伪活动所需的机器及设备。1995年，笔者开始就一位前特工的声明展开调查。该特工称，早在1983年，当时非常强大的某苏维埃集团国家情报安全机构就居间促成甚至亲自参与了相关谈判，帮助造伪国以每

台 1500 万美元的价格购置了该国生产的凹版印刷机。当时的该苏维埃集团国家急需美元。

接下来,我们应该来看看,这些秘密交易究竟有着怎样的背景。为了各自不同的打算,几乎所有的当事人似乎都在极力掩盖其中的细节。这些当事人包括:前联邦德国(即东西德统一前的联邦德国)的波恩政府,柏林的新德国联邦政府,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的华盛顿政府,也许还有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联邦政府。事实真相有待读者和未来的史学家去进行发掘。

第三章
东方造假西方帮

格雷沙姆法则适用于任何领域……正如劣币可以驱逐良币一样，劣政也可以驱逐良政。

——奥尔德斯·赫胥黎，1933年

1992年美国国会的伪币报告几乎没有引起美国公众以及全世界的任何关注，而报告中隐含的伊拉克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被人忽略了。1992年，美国人已经不再把萨达姆·侯赛因当成共同反对伊朗的盟友，而美国最重要的中东盟友以色列正在密谋暗杀萨达姆（中情局以及伊拉克的反对派也有此打算，但是没有能够付诸实施）。尽管如此，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在美国人眼里仍然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出口市场，对高科技产品来说尤其如此。不管怎样，这份报告的公开版本隐晦地说到了巴格达可疑的秘密行动，但却没有提及这位伊拉克的统治者。本书后文将会详述这个问题。

国会恐怖战争及非常规战争特别工作组的报告称，超级伪币已然

成为一些中东国家源源不断获得军用核原料及核设备、军事科技以及各类武器系统的最主要工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苏联及东欧海运至中东的军备物资是以西欧/中欧为中转站的，那些地方的有组织犯罪活动为支付事宜提供了方便。

该报告称，那些参与了犯罪活动的国家“按折扣价向意大利黑手党提

供假美元和毒品,以此换取核物资"。1992年,美国情报部门还并没有完全掌握秘密核交易活动。报告还称:

> 意大利黑手党卖掉毒品,并通过遍布全球的网络进行洗钱——俄罗斯黑社会也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随后又将部分收益作为买家支付的货款转移至各个金融中心。

购入物资主要的储藏地点是克罗地亚,1992年,该国正在塞尔维亚同南斯拉夫联邦各国之间的战争当中泥足深陷。以克罗地亚为起点,"意大利黑手党将货物通过海路运往中东"。在俄罗斯及苏联各国进行的洗钱活动就包括来自中东的百元伪币。"在莫斯科以及苏联各国,这种伪币的数量急剧增长"。据初步估算,到1992年底,在中亚地区"流通的外国货币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伪币。

报告称意大利黑手党在欧洲,主要是德国及摩纳哥(蒙特卡洛)的赌场里洗黑钱,并未提及其他地方。报告随后说:

> 大量的百元伪币夹杂在赌博收益和存款当中,流到了那些来自第三世界以及"灰色产业"的大赌徒手里。黑手党很了解,这些个人和团体会竭尽所能地掩饰自己的财富以及赌博行为,因此当他们发现假钱时一般都不会声张。

1998年,笔者在开罗了解到,美国一家大型连锁酒店开罗分店的赌场也是一个类似的超级伪币洗钱场所。

阿亚图拉·霍梅尼及其亲信和继任者发起了破坏美元的货币战争,他们通过怎样的方式获得了这场战争的主要武器呢?这个过程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印钞机生产商发家史的一部分内容。这位企业家就是意大利的瓜尔蒂埃罗·吉奥里,他的主要业务基地在日内瓦湖畔的瑞士洛桑。

德国作家克劳斯·班德在《赚钱者——纸币的秘密世界》一书中讲述了吉奥里家族早年的奋斗史,讲述他们如何变成了对中东、欧盟的通货、

经济及前途具有重要影响的一股力量。瓜尔蒂埃罗·吉奥里的祖父蒂诺·寇恩于1876年在米兰创办了一家安全印刷厂,生意做得非常成功。1939年,工厂接到了第一张印刷纸币的订单,买主是西班牙元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这位将军在1936年至1939年间的西班牙内战中取得胜利,随后便成为西班牙的统治者,直至1975年去世为止。

战争初期,佛朗哥率领来自北非的摩洛哥替补军发起叛乱,目的是要推翻当时的西班牙共和政权。当时,他向内战中成为他最佳盟友的希特勒德国订购新的"国家"纸币。历史悠久、信誉可靠的莱比锡捷德公司收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张订单:在1939年之前为佛朗哥印制面值3亿的比塞塔纸币。当时的德国即将发动新的世界大战,佛朗哥及其财务顾问也许认为依赖这样的供应商不是谨慎之举,于是转而找到了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为新的西班牙法西斯政权订购比塞塔纸币。这个美差就此落在了瓜尔蒂埃罗·寇恩的头上,时年26岁的寇恩还没有改名为吉奥里。瓜尔蒂埃罗安排人员在米兰生产这些纸币,用的是法国塞尔日波公司生产的机器。

瓜尔蒂埃罗的家族是意大利的犹太人,从感情上说对法西斯持有坚定的反对立场。大战爆发以后,瓜尔蒂埃罗的家人逃往瑞士,他本人则留在了意大利,只是将自己的姓从寇恩改为吉奥里。他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机智过着半地下的生活,并且在德国占领军的眼皮下保住了那些机器和印刷厂。

根据班德的描述,在二战即将结束时,纸币印刷是控制在几家私人印刷厂手中的。其中较大的几家是:英国的安全印刷公司托马斯·德纳罗公司、沃特洛公司和威尔金森公司;美国的银行纸币国内公司;英美合资的银行纸币公司。20世纪20至30年代,沃特洛公司遭受了一次几乎致命的打击,有人举报了公司的一位合伙人,说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替葡萄牙一位造伪大师印制了面值以百万计的葡萄牙埃斯库多币,用的正是里斯本葡萄牙中央银行用以印制真钞的那些印刷机和纸张。

吉奥里同塞尔日波公司合力推出了纸币印刷的一大创举。他们摒弃了以往的平版印刷等印刷方法,开发出高科技的多色印刷机,能够一次印出多种色彩。许多没有印钞设备的政府都会购买这种机器。吉奥里将这些原属塞尔日波公司的专利应用到凹版印刷当中。1947年,在意大利北部的

亚历山德里亚，吉奥里带领一支意大利专业团队打造出第一台多色钢板凹版印刷机，并将它命名为“舵手”。这时候，又有一位统治者成了吉奥里事业发展的福星。在阿根廷铁腕人物胡安·庇隆的帮助下，吉奥里的父亲将“舵手”卖给了人称“钱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国家印刷局。巴西、智利、哥伦比亚以及其他几个拉美国家的政府也购买了吉奥里同塞尔日波公司合作开发的技术。

班德对欧洲的情况也做了详细说明：捷德公司当时用的还是其常务董事齐格弗里德·奥托购自瑞典国营雕刻印制局的铜版安全印制系统，奥托迫切地想要将其升级换代。奥托帮吉奥里同德国维尔茨堡的高宝公司搭上了线，该公司被班德称为“全世界最古老的印刷机生产公司”，于1817年在伦敦正式成立，在成功承接德高望重的《泰晤士报》的印刷业务之后声名日隆。在高宝的帮助下，吉奥里进一步完善了单张给纸、彩色凹版印刷系统的技术和装备。与此同时，他还购入了高宝的一些股份。他将总公司设在洛桑某高级商业区的一栋大厦内。

这栋大厦也是锡克拜公司的办公地点，该公司是生产安全油墨的，一直以来在纸币印刷界享有卓著声誉。锡克拜同吉奥里的公司有着长期的合作历史，到如今依然如此。瓜尔蒂埃罗·吉奥里的父亲里诺·吉奥里从意大利移居瑞士的时候，同行的还有他的表兄阿尔伯特·亚蒙。锡克拜就是亚蒙的公司，最初是生产食品着色剂的，到了瑞士之后开始涉足高科技专业领域。

吉奥里还在洛桑郊区设立了一些机构，用于研发及向潜在客户展示产品。到20世纪50年代末，吉奥里-高宝联合公司推出了单张给纸的多色钢板印刷设备。这套设备能产生80吨的压力，将凹印在钢板上的油墨转移到纸张上，产生可触摸的浮雕效果，这种效果是凹版印刷纸币的一个关键特征。荷兰恩斯赫德印钞厂、慕尼黑捷德公司率先购置了两套吉奥里的印钞设备。下一位客户是维也纳的奥地利国家银行，吉奥里跟维也纳附近的机械建模公司达成协定，让他们来生产设备。

20世纪70年代是吉奥里向中东国家销售凹版印刷机的时期。在此期间，他的公司又研发出了性能更好的新型印刷机。这种设备被称为“超级”系列，因为它可以在特别大的纸张上印制包括纸币在内的各类产品。在跟

中东国家做生意期间，英国印钞业巨头托马斯·德纳罗公司买下了吉奥里-高宝公司，将其更名为德纳罗-吉奥里公司。2001年，高宝又买下了公司的绝对控股权，该公司的正式名称从此变成了高宝-吉奥里公司。新型吉奥里印钞机可以同时印刷纸币的正反两面，能够满足各政府央行提出的任何颜色要求。到2004年，高宝-吉奥里公司的"超级同步"胶印机（印制许多安全文件时也要用到胶印机）可以印出10种颜色，在世界上尚属首例。

从70年代到90年代末，吉奥里战胜了竞争对手美国银行纸币公司，也战胜了国会"买国货"法令招致的重重困难，将全套凹版印刷设备（有可能多达80台机器）卖给了美国铸印局，并被美国财政部认定为"独家供应商"。

到了这个时候，全世界最重要的储备货币成了吉奥里印刷机的产品，全世界最挑剔的造假者于是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想办法达到同样高水平的效果，要么就去弄来一些同样的机器。

从伊朗国王到霍梅尼

20世纪70年代初期及中期，推翻伊朗国王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统治的革命阴云尚未来临。当时他的确跟他的美国崇拜者所说的一样，可称是"诸事顺意"。不断增长的石油收入为这个国家带来了数以亿计的美元。在阿以危机及1973年战争之后，借由巴列维国王及利比亚领袖穆阿迈尔·卡扎菲等人的大力推动，世界原油价格几乎翻了三番，伊朗的经济状况也就更加美妙。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王决定将自己美国亲密盟友的身份利用到极致。

几十年来，伊朗的里亚尔纸币都是由英国的托马斯·德纳罗公司印制的。有些高级顾问向国王进言，数代以来，在伊朗人心目当中，英国就算不是一个正面的敌人，至少也是争抢中东统治权的一个竞争对手，伊朗的纸币最好不要委托这样一个国家来生产，应当改由德黑兰的中央银行印制。因此，1975年，在尼克松任期最后几个月里的某个时间，伊朗派特使前往美国，想让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给自己帮个意义重大的忙。

尼克松及福特时期的国务卿基辛格是伊朗国王的坚定支持者。国王

于1979年被迫下台,流亡海外,又应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之邀前往埃及,并于1980年在埃及去世。在此期间,基辛格都一直在尽己所能地为国王提供保护。因此,伊朗提出的帮助其央行培训里亚尔纸币生产人员的要求不可能遭到任何反对,培训内容包括纸币印制以及安全措施。与此同时,美国也乐于促成伊朗从瑞士购入华盛顿用的那种凹版印刷机以及铸印局在得克萨斯州沃斯堡的其他设备。

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选了几位高级工程师和技术员去美国接受了为期几个月的培训。几位技术人员实地勘察并详细研究了世界最受欢迎的货币的生产全过程。在很多时候,中情局同伊朗国王的关系比美国国务院还要近。1973年,大概就是通过中情局庞大的德黑兰分站,伊朗从德纳罗-吉奥里公司购入了两台凹版八色印刷机。这两台机器将通过轮船送到伊朗央行。回到伊朗的时候,去美国受训的那些雕版、印刷和工程专家对这种机器的操作已经非常熟悉了。

据克劳斯·班德所说,这两台机器的交付使用却比计划推迟了"十多年"。国王被推翻、霍梅尼及其追随者掌握政权时,运到德黑兰的那个装货箱甚至还没有被打开,接收这两台机器的工厂还在建设过程中,而原来那份购货合同中的一些条款也尚未得到履行。新的伊朗革命政权成了吉奥里最大客户华盛顿的对头,吉奥里只得暂时中止了合同,转而跟另一个商业伙伴泰国谈起了合作。他将本应供给德黑兰工厂的最后那批设备以及人员培训都转给了泰国政府印刷局的技术总监。班德写道:"技术总监对他们的设备很是满意,于是又在1987年(向吉奥里)订购了两条超级印刷机生产线。"

民主德国国安部的角色

民主德国究竟在伊朗获得造伪能力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人们对此至今仍然存有很多疑问。不过,即便到了本书的付印阶段,笔者一个关键线人本身的可靠性仍然有待商榷。真正的内情只有少数几个人知晓,如今仍是保守得很好的高度机密。官方曾对柏林国安部档案进行过一次研究,却没有发现任何与伪币印制或是印刷机、其他印刷设备以及技术人

员从民主德国转向伊朗的相关信息。不过,笔者的德国朋友及同事都推测,1990 年曾有许多档案被秘密运出东柏林,卖给了美国中情局,而仍然留在德国的档案也已经经过“净化”或是“洗刷”,有关这个问题的信息已被清除。众所周知,大量的其他材料的确已被清出档案,其中包括有损于前联邦德国人士及其他政治家的一些报告。从这样的历史背景来看,民主德国和伊朗之间的交易虽然未经证实,但却很可能确有其事。

1983 年,萨达姆·侯赛因的部队入侵伊朗的第三年,霍梅尼的手下和伊朗革命卫队已经占据了几个月的上风。他们在陆上、海上及波斯湾上空都击退了伊拉克的进攻,尽管当时萨达姆得到了英国、法国和苏联政府的援助。

此外,伊拉克还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间接援助:贷款、各种形式的金融借贷、卖到伊拉克的“两用”飞机。所谓的“两用”飞机本来说是用于伊拉克的民航事业,不过那些波音 727 运输机、奥古斯塔-贝尔直升机及其他一些飞机最后都成了萨达姆的军用物资。对于美国国内及跨国大石油公司来说,伊拉克巨大的石油储备意味着切实或潜在的利益,他们积极游说西方国家给予伊拉克更多的军事援助——举例来说,法国就“租”了 12 艘“超级军旗”战斗轰炸机给伊拉克,让后者用来轰炸伊朗在波斯湾的油轮及固定采油设施。华盛顿的立法者跟他们的伦敦和巴黎同行一样,认为伊拉克是对抗伊朗什叶派激进政权的一个堡垒,此前该政权已经向科威特、黎巴嫩等国发起过挑衅。

尽管军队及平民都因战争之害而困苦不堪,伊朗还是生产并向全世界销售了大量的石油,以此换得了稳定好用的美元。

德黑兰很看好同民主德国的贸易合作前景,此前伊朗国王已经与其开始了石油及其他商品的贸易。进入 1983 年,有苏联撑腰的东柏林的老板们发现自己极度缺乏硬通货,同时又需要尽可能多地买入中东的石油。与此同时,由于之前的耽搁,伊朗购置的吉奥里印刷机多半无法按期开动,因此伊朗应该是非常迫切地需要加强其印刷能力。

笔者的一个消息提供者——他是前柏林国安局官员,从未提供过可证实自己说法的文献(不过他向我保证,他的这些消息都是花了大价钱从苏联“朋友”那里弄来的,也许是前克格勃,也许是前格鲁乌)——说,双方

都同意签订一个秘密协议。

莱比锡的国有大型机械厂波吕格拉夫公司生产质量上乘的印刷机，用于印制民主德国的安全文件、国安部的伪造护照、身份证之类的东西，很可能还印制过联邦德国马克、美元以及其他外币。这种机器是可以出口的。1983年冬或者是次年早春，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莫森·雷扎伊访问东柏林，与国安部高官及非军方的贸易官员见了面。

革命卫队是实际的采购方，国安部代表波吕格拉夫公司向其出售了莱比锡工厂制造的两台凹版印刷机，每台价格1500万美元，还有印制美元的高级防伪纸张和印刷版。此外，伊朗人还借用了好几位波吕格拉夫公司及国安部的技术专家。至少有两位国安部伪造单据研习班的前官员去了中东，凭借他们的高超技术印制了大量伪币。这两台印刷机在极其机密的情况下海运至德黑兰，运输过程中还有许多精心安排的安全措施。到德黑兰之后，机器被安装在名义上归伊朗中央银行管辖的一处军事设施之内，处于重兵把守之下。

这个故事中那些费解以及含糊之处很快便水落石出了。听完故事之后，笔者马上给原民主德国间谍首脑马库斯·沃尔夫打了两次电话。(沃尔夫是克格勃的明星学员，在约翰·勒·卡雷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系列心理惊悚小说中，民主德国间谍机构的老大是“卡尔拉”，总是残忍地对付那位非正统派英雄、英国间谍斯迈里。人们一般认为，沃尔夫便是这位卡尔拉的原型。)沃尔夫称自己并不知情，为自己撇清了干系，不过还是为笔者指出了国安部中谁可能会负责处理这一交易。他告诉笔者，如果这样的交易确实存在的话，关键的中间人就应该是通常被叫做“亚历克斯”或“沙尔克”的亚历山大·沙尔克-格洛德科夫斯基博士。

沃尔夫的自传《无脸的男人》非常有看头，融合了回忆、自我辩白和对事业大获成功的扬扬自得。书中虽然没有提及可能存在的波吕格拉夫公司交易事件，却大书特书他对极具才能的沙尔克的赞赏。他将沙尔克描述为“民主德国的金融巫师”、“敛财专家”、“一个大块头，有着圆厚的下巴、水桶一样的胸、低沉浑厚的嗓音”。沙尔克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资本市场、银行和金融家都了如指掌，在欧洲以外包括中东在内的其他地方也有很好的人脉。1966年，沃尔夫的副手、前国安部东柏林大分局局长汉斯·弗

拉克将军将沙尔克引荐给了沃尔夫。沙尔克被任命为商业协作工作组组长，这个组织的德文首字母缩写(多少也带有揶揄之意)是“KoKo”[①]。商业协作工作组对外出口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在两伊战争中，他们先是向伊拉克供应物资，到了 1982 年，又开始通过一个名为国际测量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的空壳公司向伊朗输出军用物资。

在《无脸的男人》一书中，沃尔夫不小心泄露了自己其实了解国安部伪币行动的事实。他在书中提到了沙尔克炮制的多家空壳公司，描述它们如何向民主德国日益空虚的国库源源不断地补充硬通货，“我们国安部的核心财政预算都用在了一些技术活儿上——伪造护照、专门的照相实验室的日常运转，如此等等”。沃尔夫说，到了 1983 年，沙尔克职能的重要性日益凸现，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和国安局大头目埃里希·米尔克交给他一项任务，从联邦德国银行拉一笔 10 亿德国马克的贷款，以挽救濒临破产的民主德国。

已公布的所有信息在有一点上都是一致的：民主德国国安部的造伪车间就在东柏林市中心附近，位于紧邻霍恩施豪森监狱、原属国安部的一栋戒备森严的建筑之中。

向笔者描述了进行波吕格拉夫公司印刷机交易的那位前国安部官员，对马库斯·沃尔夫撇清自己、扯出沙尔克的行径很是不齿。他坚称沃尔夫在撒谎，说他极其擅长撇清自己在超级伪币行动之类的微妙事件中的干系。他还坚持说，从此次交易的“商业”层面来说，唯一有责任的是一个叫穆罕默德·侯赛因·阿里莫拉蒂恩的商人，这个人拥有双重国籍，经常往返于德国和祖国伊朗之间。

不管生产伪币的印刷机来自吉奥里公司、波吕格拉夫公司或是什么别的公司，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美国及加拿大流通的超级伪币肯定是存在的，美国特勤局和联邦调查局对这个结论都没有什么怀疑。美国及国外的银行又开始留意到，效果最逼真的那些超级伪币用的是克兰公司生产的真美元所用纸张。克兰公司是这个行业实际上的垄断者，他们用一台法国专利机器在纸张中加入比例保密的亚麻和长绒棉。到那时为止，伪币所用

① 意为可可芋头。——译者注

的真纸张都是原先的1美元纸币。乔治·华盛顿头像以及其他绿色、黑色油墨都被漂白了，空白的纸张随后被印上本杰明·富兰克林头像以及百元纸币上的其他所有要素。

对部分这些“真”纸张最说得通的解释是，造伪者设法弄到了克兰公司所产纸张的绝密配方。

纽约的执法人员已经发现了中东散布超级伪币的证据。中东某国某政治组织的办事处设在纽约派克大街830号。1993年，该办事处被关闭。办事处共有大约80名工作人员，美国人、外国人都有。

1996年夏天，爆料铸印局丢失三十二连体百元美钞印版的《新闻日报》记者科纳特·罗伊斯采访了迈阿密一家中等规模银行的经理。这位经理要求不要公布他本人及银行的名字。他告诉罗伊斯，最近有14张超级伪币进入了他们的银行，已经送交美联储迈阿密分部。几天后，联邦调查局的两位工作人员带着那14张伪币来拜访他，伪币已经经过德国制造的最新设备检测。他们告诉他：“这些伪币真是太逼真了，唯一的纰漏就是这条小小的线条。你必须用放大镜才看得出来。”他们让经理看纸币背面左边的一个小纰漏：绿底子上层叠的白色旋涡状线条底下掩盖着一条细微的曲线。他们后来的话让经理大惊失色：“我们确信，他们(造伪者)这么做是为了让自己能分清自己制造的钱跟真钱。”这话意味着造伪行动的幕后主谋——“某个不明身份的政府”——手头有大量的真钱和假钱。

美联储迈阿密分部没有因为这些伪币而指责这家银行。罗伊斯的报道称，1991年至1995年，美联储注销了面值1000万美元的超级伪币。罗伊斯补充道：“但是，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超级伪币正在流通，也没人知道它们在市面上所有伪币中占据多大的比重。”1990年至1992年间，超级伪币开始泛滥全球，美国财政部当时的官方数据显示，每年查获的伪币数量平均为3000万美元。到了1993年，这个数字急剧攀升至1.207亿，1994年则是1.377亿。加拿大的数字与此不相上下。

华盛顿的对策

美国司法部及财政部高层认为，证明超级伪币来源的证据并不充分，

不足以公开对其发出控告。不过，愤怒的国会议员和一些社论主笔都提到了ABC新闻网等媒体公布的航空及卫星图片，拍到的就是中情局指出的超级印刷机所在地。他们甚至呼吁，美国应该考虑去炸掉那些印刷机。然而，这些都只是有待证实的猜想。

克林顿总统曾经向中东地区发出过友好却郑重的警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也有可能，他还发出过高度机密但却更为强悍的警告。得到公开的只有其中部分警告。1994年1月16日，克林顿在日内瓦会见了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10月又在大马士革与其会面，请求叙利亚在禁止毒品及超级伪币交易上施以援手。后来，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又重申了克林顿总统的请求。克里斯托弗曾多次参与处理大马士革及德黑兰的重大微妙事件，其中包括1979年至1981年德黑兰扣押美国使馆人质事件。

1994年10月27日，克林顿主持了约旦国王侯赛因同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历史性和平条约的签订仪式，之后又到大马士革做了短暂停留。他直截了当地请阿萨德不要让叙利亚卷入伪币事件，还恳请叙利亚在有关黎巴嫩贝卡河谷毒枭的问题上采取更为有力的举措。出席了此次及后续会面的一位高级外交官透露，阿萨德向客人保证他会尽力而为。阿萨德确实言出必行。大多数嚣张的造伪活动以及多起毒品交易(尽管针对后者的只是临时举措)都被叙利亚军方镇压。据笔者所知，因为美国媒体对叙利亚印象不佳，已故阿萨德总统当时的这一举措在美国并未得到大张旗鼓的宣扬。

伊朗央行定期发布声明，否认德黑兰在从事印制伪币活动，不过都没有得到世界媒体的太多关注。这些声明一部分是由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布的，还有一次是由印尼雅加达的伊朗使馆发布的。1995年4月1日的新加坡《海峡时报》引用了《读者文摘》3月刊上一篇指控伊朗的文章，其后该报刊登了一封伊朗使馆来信，称这种指控是"美国中情局、以色列摩萨德及其他西方情报网络提供的一些毫无根据的虚假信息，是旨在败坏伊朗国际形象的一系列阴谋活动的组成部分"。

我们不知道，除了公开发表否认声明外，伊朗总统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在内部还采取了怎样的措施来回应这种压力。1996年，在伪币

的威胁之下,美国财政部对美元的设计及防伪特征进行了自192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改动,从百元及50元面值开始,又在世纪之交修改了20元、10元及5元面值纸币。此后,应该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及其他亚洲及东欧的黑手党组织在伪币活动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在对美元设计进行修改的那几年,有关伊朗是伪币源头的情报及推测几乎降到了零。不过,还是有零星报道称,伊朗仍然有人在进行美元造假。比如,2002年初,阿塞拜疆共和国(1991年独立)——统治者同西方公司紧密合作开采境内石油——的一份报纸就抱怨,来自伊朗的假美元严重损害了阿塞拜疆经济,导致当地货币对美元的汇率降低。

根据BBC监听部对这篇文章的摘要,阿塞拜疆反有组织犯罪活动国家委员会提出警告,伊朗生产的假美元"不同于车臣和俄罗斯印制的版本,跟真美元一模一样",现有的验钞设备无法识别。假的百元美钞从伊朗"通过阿伊边境的列里克和亚尔迪木里"走私进入阿塞拜疆。摘要还援引了俄罗斯部分高级执法官员及俄罗斯央行行长的话:

> 走私者通过马匹或步行运送少量的伪币。而且,阿塞拜疆还不是伪币的最终目的地。(伪币)甚至进入了俄罗斯,俄罗斯媒体经常说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是美元伪币的主要出处……专家认为,(阿塞拜疆)经济也许确实遭受了打击,因为市场上存在大量的假美元,大量的马纳特(阿塞拜疆货币)将会退出流通领域……今后,这也许会对马纳特对美元的汇率产生严重的影响,确切地说,就是导致马纳特贬值。此外,假美元在市场上流通导致的恐惧心理也许会极大地挫伤当地人对于美元的信任。鉴于阿塞拜疆绝大多数的金融及贸易活动都是以美元结算的,美元的信用危机将会导致市场的混乱以及购销活动的暂时冻结。

本书后文还将用更多的笔墨叙述伪币对中东及亚洲的影响。在这里,我们不妨迅速地回顾一下伪币的历史。伪币缘起于货币本身,两者的发展是并行的。下一章,我们将回顾伪币的历史,其中所涉的有些地区在前文已有论及:古代波斯(伊朗)、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以及希腊城邦。

第四章
古老的伪币术

伪造货币这一受利益驱动的骗术史前便已有之。

——圣·克莱尔·麦凯威,《纽约客》,1949 年

2006 年 9 月底,保加利亚索菲亚通讯社发布了一则简短的新闻,某位叫乔治·伊万诺夫的先生和他的儿子赫里斯托·伊万诺夫——他们来自一个地图上根本找不着的小村庄约阿其姆·吉福——遭到了政府的起诉,原因是"非法占有、制造假欧元硬币所用的机器、设备及材料"。从他们那里没收到的材料包括"用于伪造两欧元硬币(当时可兑换 2 美元 60 美分)的 8200 个金属皮带轮、铸模以及一台多功能车床"。

繁荣的金融中心维也纳过去经常是极度通货膨胀的中心,也是最受青睐的伪币市场之一。据该市一本财经新闻杂志报道,此前数代的造伪者都把注意力转向了利润更高的纸币造伪,而如今"硬币造伪又重新流行起来了"。据奥地利造币厂厂长也特马尔·斯普兰兹估计,目前市场上流通的欧元硬币总值 1000 亿,其中伪币的面值可达 1000 万之巨。(为安全起见,他并未透露奥地利的相关数据,不过他承认,奥地利的数字要高于欧洲平均值。)跟真的早期金银币一样,这些伪币也很受钱币收藏家和业余硬币收集者的追捧。

细究一番货币的历史,你就会发现,硬币的地位从古至今都是非常相似的。公元前 17 世纪,在某些地区,块状或条状的铜、银和金子为同类贵重金属铸造或压制的硬币所取代。中国人发明了纸币。在那之前,这种硬币实际上就是那个时期唯一的货币形态。直至 21 世纪,在非洲、大洋洲、

亚洲、南美洲的部分社会里，物物交换与货币交易一直是同时存在的。

追根溯源的话，货币于公元前 3000 年首次出现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古代埃及，同时出现的还有宗教、农业系统化以及人类生存的其他一些重要要素。《汉谟拉比法典》上提到了"论重量支付"。《圣经·旧约》很可能与此法典产生于同一时期，其中有这样一段关于约瑟的文字：

> 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讲定二十舍客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创世记》37:28，1611 年钦定本）

17 世纪时的英语译者们误以为这段文字中提到的是银币，其实银币在当时根本就不存在。公元前 2000 年至公元前 1000 年，在古埃及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充作货币的金属都是条状的，并没有铸成硬币，因此其价值是用重量来衡量的。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巴比伦，通常是由国王本人来确定金属条的价值，有时候则是由神庙确定。

历史文献显示，皇室推出的硬币，造假者总是很快便能够伪造。在前金属时期或贵金属流通早期用于交易的那些货物，比如兽皮、食物，被一种原始的硬币所取代：铸造或压制成条状的金属币，仿制起来非常容易。大约在公元前 250 年，硬币开始流通，数量也更为充足，造假者先是把硬币边缘剪下——剩下的部分当然继续拿去买东西，然后把剪下的银、金、青铜或紫铜熔化，涂在他们伪造的铅币的外头。对于这种伎俩，今天那些伪造欧元等各类硬币的造假者自然是不会陌生的。

公元前 1000 年至 1 年，硬币造伪蓬勃发展，数额之巨堪与如今全球流通的伪币媲美。古代的政府，特别是古希腊城邦政府，担当起了检验伪币的职责，因为伪币通常是敌对或者竞争城邦为了削弱对手的货币而创造出来的杰作。公元前 375 年，雅典颁布一项法令，所有的硬币，无论可疑与否，都必须经过公共奴隶的检验。

已知最早的欧洲硬币材质是金银合金，可说是古代造伪者的福音。金银合金是浅黄色的，公元前 7 世纪，希腊城邦吕底亚就用这种合金来铸造硬币。大英博物馆藏有这种硬币，硬币的一面是铭文，另一面铸有狮子头

之类的图案。约公元前6世纪前,这类硬币传遍了整个爱琴海区域。铸币的金银合金中加入了微量的贱金属,通常是铅,这为造伪者打开了机会之门。在铅制内核表面涂上一层薄薄的金银合金,再印出狮子头或其他真币上的图案,这样做出来的大量伪币便可以蒙混过关了,造伪者由此牟取了丰厚的利润。

吕底亚最后一位国王克罗伊斯提炼合金,同时从臣民手中征收巨额贡税,从而积聚了传奇的财富。随后波斯人征服了他的王国。波斯人继续铸造波斯硬币和希腊硬币。当时的吕底亚人、雅典人及其他希腊人或许曾为来自波斯的这些可疑的国外货币而忧虑重重。

古希腊时期最为无耻的一次政治伪币事件是由萨摩斯岛(就在如今的土耳其海岸附近)僭主波利克拉特斯(公元前538—公元前522)发起的。约公元前530年,波利克拉特斯陷入了一场复杂的战争,对手是其他希腊城邦以及埃及和累范特[①]的统治者。一拨反对他的萨摩斯人倒戈投敌,得到了军事强大的斯巴达的援助。波利克拉特斯是一位了不起的金融天才,在敌人准备扬帆起程来进攻他时,指示萨摩斯的铸币厂特制了一批伪币,就是在铅核上涂了薄薄的一层金子。斯巴达人接受了这些伪币,就这样被敌人收买了。

公元前146年,经历了劳民伤财的漫长战争后,罗马打败了迦太基和马其顿,征服了迦太基希腊联盟及希腊城邦。罗马元老院命令穆米乌斯将军取消联盟,用寡头政府取代希腊各地的民主政府,由马其顿的罗马执政官统治希腊,由此结束了希腊及马其顿的独立地位。在公元前31年前,罗马金币、银币、铜币在罗马共和国境内逐渐流行开来。随后扩展至罗马帝国的疆域,直至527年。

博物馆及收藏家手中还有一些流传至今的古希腊硬币及后来的古罗马硬币,上面有众神、国王及皇帝的头像。此外还会有一些名人的头像,比如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他的头像出现在古希腊硬币中,在远至巴基斯坦、印度的硬币中也有,因为他的军队曾经征服这些地方,并建立了殖民

---

① 累范特是一个不精确的历史上的地理名称,它通常指中东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译者注

地。罗马帝国的硬币上则是各个执政官的肖像,从尤利乌斯·恺撒到君士坦丁大帝。

造假者先是在铅、铁内核外头涂贵金属,后来又学会了利用黏土铸出金属模,在硬币上铸压出各种图案。有些大规模造伪活动是为了牟利,有些情况下则是为了使敌对国或敌对地区的货币贬值。不过,尼禄皇帝(54—68年在位,生于37年)却使这种贬低币值的伎俩有了质的飞跃——他贬低的是罗马本国货币的币值。尼禄逐步地实施了对本国货币的伪造,所以我们可以称他是首批"国家造伪者"之一。

在哲学家塞内加和近卫军长官布鲁斯的引导下,尼禄上台之初还是颇有建树的。不过,从他的内心来看,今天我们不妨称他为一名拙劣的演员。他极度膨胀的自负毁掉了他跟亲近之人的关系。他疏远妻子屋大维娅,跟平民亚克特打得火热,随后又勾搭上了好友奥托的妻子波贝娅·萨宾娜。59年,尼禄谋杀了母亲阿格里庇娜。62年,尼禄统治的晚期,布鲁斯去世后,尼禄废黜、放逐了屋大维娅,并授意部下将她杀害,随后迎娶了萨宾娜。

他的人格缺陷在他对罗马经济的态度上也有所体现。根据某些记载,他先是罢免了奴隶出身的财务大臣帕拉斯,原因可能是帕拉斯斗胆反对尼禄逐步减少罗马硬币中银含量的政策。当时的罗马帝国已经进入通货膨胀时期。根据历史来看,从尼禄到20世纪20年代的魏玛德国,直至21世纪,伪币都是在高通货膨胀时期出现的。尼禄伪称此举是为了保住罗马的钱。他开始往罗马迪纳里厄斯银币中加入铜合金,称之为货币"改良"。不过,持币者手上的酸性物质对铜具有腐蚀性,残留在硬币上,致使其表面逐渐剥落,进一步减少了硬币中银的含量。

尼禄的继任者往银币、金币中加了越来越多的合金,曾经极其稳固、信誉良好的迪纳里厄斯银币的银含量到最后只剩了百分之一不到。到了罗马帝国晚期,早期铸造的贵金属含量更高的硬币受到追捧并为大家所收藏,其价值要高于后来铸造的同等面值的硬币。老硬币都进了大家的保险箱和橱柜,流通的硬币总量急剧下降,需要铸造更多的硬币来满足交易及日常流通所需——尤其是小面值的铜币。

有时候,官方会对造伪者采取极端严酷的惩罚:君士坦丁大帝曾下令

对几名造伪者实施火刑。不过,到了6世纪,随着罗马帝国及其经济的急剧衰退,对于非法造伪活动真正的惩罚越来越少。毕竟,皇帝们自己也有牵连。几可乱真的私铸硬币在没有任何审查的情况下广为流传,引发通货膨胀的同时也促进了日常贸易的极大发展。尤其是在那些边远行省,如西部的不列颠和东部的叙利亚及巴勒斯坦。不过,元老院首肯的政府掺假及民间的造伪行为导致罗马硬币不断贬值,罗马军事力量的削弱也就成了必然。

69年,罗马发起了一次“反恐战争”,这是帝国历史上代价最为昂贵的军事行动之一;2003年3月,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对伊拉克宣战,随后美军占领伊拉克,又是一次极具破坏性的、代价高昂的战事。英国小说家、历史学家罗伯特·哈里斯指出了这两次战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对伊战争导致美国国库亏空,伪币及货币贬值在这其中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推动作用。欧元崛起,美国欠了日本、沙特阿拉伯、中国(很可能是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等盟友高达2万亿美元的外债,威胁到了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不过在此时跟彼时之间自有其他的相似之处。

同2003年的美国一样,公元前68年的罗马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是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随后罗马遭到了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地中海海盗火烧奥斯底亚港口及海军基地,罗马海军几乎全军覆没。数代以来,这些海盗一直在地中海周边的陆地及海域烧杀掳掠。约公元前69年,海盗突袭了基克拉迪群岛的得洛斯岛——希腊众神的一处圣地,也是富裕的商业中心——掳走当地人充作奴隶。突袭得洛斯岛、毁灭罗马海军基地及港口之于当时的罗马独裁者庞培,相当于1941年12月的珍珠港事件之于美国。这些海盗跟崛起于1998年前后的基地组织相似,尽管是个松散组织,却“在那些曾经以为自己安全无忧的民众中”(哈里斯语)导致了极大的恐慌。

庞培决定利用这种恐慌一举歼灭海盗。要达到这个目的,他需要绝对的行政权力,这会同自豪的罗马公民的部分权利产生冲突。古希腊历史学家普卢塔克记录,庞培的一位保民官奥路斯·加比尼乌斯向元老院及罗马民众建议“授予庞培海军最高指挥权以及事实上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绝对的自由的权力”,简言之,就是独裁者的权力。为了实施他本人对海盗的

"反恐战争",庞培需要并接受了罗马国库的全部财富:1.44亿枚塞斯特斯币。这些硬币因尼禄自为滥觞的货币"改良"已经大幅贬值,因此其数量远远多于早期那些价值较高的货币应有的数量。

庞培利用这笔巨额财富建起了一支拥有500艘战舰的舰队及12万人的步兵和5000人的骑兵部队(同2006年出征伊拉克的美军阵容相比,规模稍逊)。哈里斯写道:"这是一支前所未有的庞大军队,关于开销的辩论,在元老院确实引起了骚动。"军备全部到位后,公元前76年,罗马军队在海上、陆上同时发起攻势,3个月后击溃了海盗。庞培率军一举征服了海盗的一处主要基地特里克岛,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他们以此为基地,在叙利亚建起了殖民地,在犹太人的犹大王国(即如今的西岸地区)安插了罗马移民。

"造伪者,死"

尼禄开始降低罗马铸币成色之后的那几十年间,罗马对于此类事件相当纵容。除此之外的其他时期,罗马对于造伪行为都会处以非常严苛的刑罚。罗马帝国初期,对那些从硬币上剪下贵金属的造伪者处以割耳刑罚,并剥夺其罗马公民身份,而在当时,公民身份本身便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后来又有了劓刑[①],到最后,这些人遭到的惩罚是阉割后扔出去喂饿狮。这类严苛刑罚更多地是应用于罗马穷人身上,而在富人和特权阶层里,官方禁绝的制造伪币行为却是一种日益流行的消遣或者说行当。在这种经济自由的氛围之下,尼禄的国家造伪行为实施起来几乎就没什么难度,并最终导致了罗马货币及经济在帝国最后几十年的彻底崩溃。

7世纪,伊斯兰教崛起,波斯人同阿拉伯人、罗马人同波斯人之间纷争不断,恢复货币诚信、抵制伪币由此日显重要。696年,波斯萨珊王朝晚期,阿拉伯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颁布了全面货币改革法令,由他的得力助手哈贾吉·本·尤素福总督负责实施,哈贾吉统领的是如今的伊朗和伊拉克地区,据说702年至703年他在瓦希特建起了阿拉伯世界第一家造币

① 劓刑,割掉鼻子的酷刑。——译者注

厂。哈里发任命的"穆哈塔斯波"——担任这一官职的人必须道德高尚、精通伊斯兰教法——负责检验度量衡、查验伪币。哈贾吉·本·尤素福开了一家铸币分厂，铸造波斯迪拉姆币，铸币工人双手刺上文身或打上烙印。他们也把这种方法用在了公共货币兑换商身上，这些人也要接受严密的监督，确保杜绝私铸伪币现象。造伪者被抓后，双手都会被斩掉。

在远东，有关货币的最早记录出自中国一位大臣之手，此人逝世于公元前645年，但他的一本著作却到公元前26年才为人所知，其中大致提到了货币的等级划分，珍珠、玉石是最高一级，黄金次之，最低级的是金属刀铲。随之出现的是方孔铜钱。到公元669年，唐朝统治下的中华帝国版图往南延伸到了今天的越南，往北穿越今蒙古直抵西伯利亚，往东涵盖了朝鲜半岛大部，西至今阿富汗，这些区域自然也就成了中国货币的流通范围。中国最早的钱币是由私人机构发行的，政府接管之后，部分私人发行的钱币依然流通，政府偶尔还会鼓励私人发行钱币。钱币发行机构雇用专职的铸币专家，让他们用铜、锡炼成的青铜来铸造铜钱。谁若胆敢在铜钱中掺入铁或铅，就要接受黥刑。7世纪，如果一人造伪，则其族人、邻里都会受到株连。

1275年至1292年，意大利探险家、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并在元世祖忽必烈的元朝政府中担任要职。正是在这位传奇皇帝的统治时期，中华帝国首次出现了纸币，汇票也随之出现。[①]当时发行的面值最高的纸币可折合10万盎司的银子。在多位效力于元朝的伊斯兰教经济学家的努力下，其面值提高至1000万盎司。不过，对于纸币的信任度总是不够稳定。此后，中国的经济多次遭受通货膨胀及伪币的打击，到1311年，户部停止印制纸币。早期的中国纸币上通常都有"伪造者处死"的警示(与殖民时期美国货币上的"伪造货币者必死"何其相似)。一直到19世纪，纸币才在中国重现，当时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中国饱受战乱之苦，经济上又面临着重重压力。

中世纪早期的欧洲，罗马币逐渐退出了舞台，北部兴起了物物交换和粗糙的紫铜币、青铜币，南部及东部则是为拜占庭的金币、银币所取代。

---

① 此论不确，宋代时中国已有纸币。——译者注

在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埃塞尔斯坦国王时期(924—940)，制造伪币者会遭受一种叫做“三重苦难”的酷刑，如被认定有罪，就要被处决。克努特国王(1014—1035)时期，制造伪币者被割掉双手。到了爱德华二世(1307—1327)时期，造伪者的日子尤其难过：梅森德姆修道院院长被马匹拖至刑场(不是分尸)处以绞刑，还有其他一些修士因为制造伪币而被处决。

多年后，到了亨利八世(1509—1547)时期，皇家铸币厂开始重蹈尼禄的覆辙。国王还颁发所谓的“专利特许证”给自己的宠臣，让他们去铸造货币。经济史学家很少会提及这一事件对当时英国商业蓬勃发展的影响。不过说它导致了通货膨胀那绝对是没错的。尽管可能会遭受可怕的刑罚，造伪者却依然以身试法，从古至今，造伪事业都是蓬勃发展、长盛不衰。

泰勒和美元：真币和伪币

如今这种金属币同纸币并存的状况始于15世纪晚期。当时的硬币上铸有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绘制的那些有财有势之人的头像，跟今天的硬币已经非常相像了。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掳掠了非洲、拉美土著宗教及世俗艺术中使用的大量黄金白银，欧洲的金银储备因之大幅增长。其结果就是，商品价格持续攀升，金币、银币、铜币有了新的命名体系，货币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使用。基于贸易及货币兑换的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形成。

欧洲的银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几家大银矿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位于中南欧蒂罗尔、产量巨大的斯华兹银矿为矿主西吉斯蒙德公爵赢得了“富人”的诨号，要知道他父亲当年可是被称为“穷鬼”的。大英博物馆出版的《钱》(*Money, A History*)一书中指出，萨克森诸位公爵拥有的银矿“使得矿主们可以在银餐桌上就餐”。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波希米亚圣约瑟夫河谷(今亚西莫夫)的银矿中心，这里有着惊人的矿藏。此地铸币厂铸造的硬币称作“Joachimsthaler Guldengroschen”，后来通称为“thaler”或“taler”，美元“dollar”一词即由此派生而来。

到16世纪，欧洲大陆出现了面值通常较前更高的新型金币，铸造这些金币所用黄金有些是在欧洲开采的，不过绝大多数都是由西班牙、葡萄

牙征服者及海盗从非洲及美洲掠夺而来。1501 年后,在加入汉萨同盟[1]的贸易城市,一家私人行会发行的金币、银币成了法定货币。这些硬币上印有"马克"字样,很可能就是后来德国马克的前身。16 世纪,马克从波罗的海周边的德国北部传播至瑞典、丹麦、荷尔斯泰因[2]以及如今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所在的诸多小国。芬兰后来也采用了马克,在被欧元取代之前,芬兰马克一直是芬兰的法定货币。1619 年,汉堡市议会及当地商人齐聚一堂,创立了第一家经营兑换业务的公共银行,名为汉堡银行。当时正值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时期,这个称号听起来堂皇得很,帝国由多个国家、公爵领地、伯爵领地组成,其范围不仅涵盖了欧洲主要的德语区,也包括一些非德语区。

到 16 世纪末,哈尔茨、埃尔茨山脉、提洛尔地区的银矿都已基本枯竭。1559 年,银价急剧飙升,乃至超越了皇家铸币厂发行的银币。精明的商人们便将泰勒银币、基尔德银币熔化,走私到国外,以市场价销售。旧币价格过高,对于各地铸币厂来说,开机就意味着赔钱。结果就导致了零钱急剧短缺,消费者、商人、货币兑换商、银行各方都很不方便。各家私人及公共铸币厂开始效仿尼禄及他的众多后来者,纷纷降低硬币中的贵金属含量。

劣币大量涌现,同良币进行交易——其实质便是洗钱。30 年战争(1618—1648)爆发,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卷入了这场战争。神圣罗马帝国及其忠诚国民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持战事,但造伪者及洗钱者的破坏活动已极大地削弱了帝国的经济,可以购买枪炮、弹药、食物及其他军需品的硬通货长期短缺。其实,早在 1603 年,位于雷根斯堡的帝国国会便已试图要处理这个问题,而且当时便已预见到造伪者会给已出现端倪的这场战争带来巨大的财务困难。国会召集了一次货币会议,试图解决这一状况。会后采取的一项措施是,鲁道夫二世——这位皇帝在天文学上的造诣要远远超出其治国的成就——颁布了一条法令:对制造伪币者处以火刑。尽管如此,官方降低硬币贵金属含量的行为似乎并未终止。银币中的银含量持续减少。到 1621 年 9 月,原先可以换得 1 枚泰勒银元的铜币已经可

① 汉萨同盟,中世纪德意志北部城市为保证其贸易利益而结成的商业同盟。——译者注

② 荷尔斯泰因,现位于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南半部。——译者注

以换得 8 枚泰勒银元。仅德累斯顿和安那伯格(位于萨克森)两地就铸造了面值 1250 万基尔德的伪币,成了极度通货膨胀强有力的推动者。

在把持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哈布斯堡帝国，一个货币投机财团从费迪南德二世(1619 年至 1637 年在位)手中买断了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 1 年的铸币权。投机商阿尔布雷希特·冯·瓦伦斯坦纠集同伙,皈依了天主教，并用他聚敛的贬值钱币买下了这场战争中被波希米亚没收的大量新教徒的资产。这是一个真实的 17 世纪的洗钱案例。

殖民时期的美国:贝壳串珠和八里亚尔币比索

詹森·古德温的著作《美元》(*Greenback*)生动、全面地讲述了美元的历史,其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人称斯里克伯爵的欧洲贵族控制了波希米亚圣约瑟夫河谷财源滚滚的银矿，并于 1519 年开始铸造泰勒银币。仅仅 9 年之后，不断扩张的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便接管了这一地区。很快,哈布斯堡皇家铸币厂便开始发行利克斯银元,这种银元在西班牙塞维利亚铸造,等值于 8 枚西班牙里亚尔币。西班牙、葡萄牙探险家及海盗对新大陆实施殖民、掠夺的过程中,这种银元被称做“西班牙元”。其复数形式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成了“八里亚尔币比索”。跟今天的美元一样,“八里亚尔币比索”是当时全世界的储备及贸易货币。国王王后们搜罗西班牙元充实他们的国库;海盗、土匪为了得到西班牙元烧杀掳掠。这其中也涌现出了大量胆大妄为的造假者,其中一些尤其专业。如今在中美洲至佛罗里达州一带海岸,众多的寻宝人潜入水下寻找西班牙元藏宝处,对他们来说,真币伪币都是宝。

英国、荷兰、法国、瑞典移民开始在大西洋海滨建立永久居住地时,南至卡罗来纳州的美洲原住民(或者叫“印第安人”,当年哥伦布和他那个年代的人以为自己的船到了印度，所以给新大陆的原住民起了这么一个名字)所用的货币都叫贝壳串珠,这个词在印第安阿尔贡金语中意为“白色珠子”,其实是黑色白色都有。白色贝壳串珠是用海螺壳做的,价值是帘蛤壳做的黑色串珠的一半。贝壳串珠呈圆柱形,直径约半英寸,长约四分之一英寸,经过精细的打磨,用动物筋串起来。移民和原住民都认可贝壳串

珠是一种钱币，用它进行交易。1649 年在马萨诸塞，一个货币单位相当于 240 串贝壳串珠，也相当于 5 个英国先令，后者在英属殖民地跟英镑、便士一样都是法定货币。弗吉尼亚人称贝壳串珠为罗诺克(最初的聚居区也以此命名，也就是如今的罗诺克城)。新阿姆斯特丹(1664 年英国人占领之后改名为纽约)人称其为西望德或西望。

殖民时期早期，真币、伪币都非常少，所以有差不多 10 年的时间，贝壳串珠就是主要的交易媒介。

从新教中分离出来的一支清教徒队伍从英国乘坐“五月花”号抵达新大陆，1620 年在马萨诸塞州科德角建立了普利茅斯殖民地。他们多数都是财产有限的平民，因此并没有从英国带来很多的银币、金币、铜币。不过，他们当中有些人却很擅长那门古老的技艺——也就是在自己拥有的硬币，比如西班牙元、英国沙弗林上剪一点或者削一点碎屑下来。在最早的两位总督约翰·卡弗和约翰·温斯罗普任职期间，清教徒们还不知道如何辨认印第安人在交易中提供的贝壳串珠是真是假，印第安人也辨别不出真币同伪币。双方都利用了对方的无知。殖民者先是在英格兰，后来在美洲，在地下工厂里用廉价的瓷片、骨头或者玻璃珠子生产假的贝壳串珠。他们拿这些假串珠换取他们急需的玉米和其他商品。

印第安人和殖民者在交易中都用上了假串珠。印第安人造假用的是数量比黑色蛤壳多得多、因此也廉价得多的蓝色蛤壳。现代银行的出纳员或是他的上司发现了伪币后，如果客人还在场，银行人员会拒收假钱并给予对方警告；如果客人已经离去，那么就报警(在美国，是向特勤局汇报)。早期殖民者设法把假串珠换给印第安人时，印第安人会看着串珠，接着往串珠上吐口唾沫再扔到地上，随后双臂交叉，大摇其头。殖民者也模仿对方往串珠上吐唾沫，然后用力地揉，让对方相信这是真的帘蛤壳，而不是那种常见的白色贝壳。有时候，印第安造伪者还会用野生越橘汁把白色贝壳染成蓝色。

跟古罗马相类似，美国早期殖民地通过的反造伪法令最初都比较温和，后来才有了比较严厉的刑罚，甚至是死刑。1647 年，“大英帝国罗德岛殖民地及普罗维登斯种植园(即后来的罗德岛州首府普罗维登斯)”常设选举法院宣布：

印第安人用号称是真的贝壳串珠来兑换货币或购买货物，一俟发现有假，当即充公。

据说，荷属新阿姆斯特丹的曼哈顿岛是荷兰探险家彼得·史戴文森花24“元”钱（极可能是西班牙元）从印第安人手中购得的。此地的假串珠极其盛行，1650年殖民议会通过一项法令，禁绝“邪恶的”造伪行为。因为缺乏相关史料，我们不得而知，随后各殖民地对造伪者采取了怎样的惩罚措施。不过，当时的资料显示，贝壳串珠被造伪行为弄得声誉不再，终至崩溃。

很快，金币、银币、铜币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在欧洲及其美洲移居地及殖民地，纸币时代正在悄然降临。下一章的话题就是：纸币的崛起会对大西洋两岸的历史产生怎样的影响。

第五章
本杰明·富兰克林 vs 乔治国王：美国开国时期的经济危机

无人能及的富兰克林！
藐视王权，
挪移闪电，
有几人能望你项背！
——菲利浦·弗瑞诺，《悼本杰明·富兰克林》，1790 年

1996 年之前及之后所有版本的百元美钞上印的都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头像，新版本上他的头像还更大更醒目。毕竟，当年正是富兰克林印制纸币，推动了北美殖民地纸币事业的发展，而且还发明了一种行之有效、非常艺术的纸币防伪方法。尤为重要的是，在 18 世纪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对美国独立战争的镇压行动宣告失败，法国大革命也由此揭开了序幕——中，富兰克林一直密切关注着整个事件中最为关键的经济因素，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这两次革命产生了当时世界霸主英国的两个最强大的对手及如今的盟友：法兰西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1729 年，富兰克林的费城印刷厂开始为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和特拉华殖民地政府印制纸钞。在此之前，马萨诸塞殖民地当局已经在西部率先发行了纸币。假硬币在殖民地如瘟疫般流传，其情景堪比如今进入新千年后新伪币的大肆蔓延。新英格兰伪造、裁剪硬币现象日益猖獗，马萨诸塞当局不得不于 1652 年规定，所有硬币必须在正反两面印上双环图形以及其他一些明显的标记。双环是为了防止硬币遭人裁剪。不过，1652 年新英格兰的硬币铸造水平实在是很业余，根本无法阻止造伪。百年之后，《波士顿

报讯》上一篇文章揭示,在纽约有人伪造了大量这种“松树英镑”,并以高价出售给了古董店。

组织及参与伪币制造的人越来越多,相应的刑罚也就日益严苛起来。1679年在马萨诸塞,法国人彼得·洛夫林因非法拥有造伪工具等罪名,被判处两小时枷刑、割掉双耳并处以500英镑的罚款。在当年,这是一笔巨款。诉讼费用也由他承担。

纸钞在西方的发展

除了西班牙八里亚尔币比索外,17世纪流通的货币还有在亚洲和中东通行的尼德兰共和国的交易货币,以及俄国、印度和中国等地的达克特金币、银币。奥地利泰勒是另一种有着良好声誉的银币,出现于18世纪中期。到了1780年,玛利亚·特丽莎[①]泰勒币已经传遍全球。时至今日,在中东,尤其是阿拉伯半岛和埃塞俄比亚,人们还在使用这些古老的银币。在摩洛哥居住期间,笔者就发现当地还有人在用玛利亚·特丽莎泰勒币。

欧洲的金币、银币随着殖民探险家和商人的足迹传遍了整个世界,在金币、银币式微之后,西方纸钞的始祖便粉墨登场了。到17世纪末,欧洲已经开始使用纸钞和汇票来偿付债务、兑现支票、进行贷款以及有息存款,同时也用它来做本票。1676年,英格兰出现了一本没有署名的小册子,指责金匠对贷款和汇票收取的利息过高。这本小册子明确指出了银行和纸币的根基所在:银行主及其发行的纸币必须得到公众的信任,纸币还必须有可靠的硬通货后盾(即真金白银)。

纸币逐步取代硬币成为主导货币的发展轨迹相当清晰:金币、银币用得少了之后,信用纸币便逐步取代了硬币,这种纸币就是向对方做出支付一定数量的黄金白银的承诺。个人或公司交给对方纸币或可让渡存款单,对方可以凭此从银行或公司手中得到黄金或白银。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然,银行或商人都考虑到,不是所有的信用纸币持有人都会马上来取现,因此他们发行信用纸币的面值可以多于他们在金库或保险箱中存放的黄

① 玛利亚·特丽莎是在1740年至1780年统治奥匈帝国和波希米亚的女王。——译者注

金白银的量，这个差额便可以拿来投资或是借利息。这种做法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如果拖欠借款现象过多，或者银行及商人发行了太多的信用纸币，其面值极大地超出了库存的贵金属的价值——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发布伪币的方式——那么银行和商人就可能会破产。1729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开始为动荡不安的北美殖民地印制纸钞，此前的几十年间，早期的一些纸币实验都是以破产乃至身败名裂告终的。

欧洲最早的自由流通纸币是由一位乔汉·帕姆斯特拉奇先生发行的。1656年，他在瑞典成立了一家私人银行，名为斯德哥尔摩银行。不过，这家银行一半的利润要上缴给瑞典王室，王室的财政大臣会监督其现金流状况。当时瑞典的主币是铜板，正在日渐贬值。在王室的许可下，帕姆斯特拉奇开始发行纸质"信用证"作为过渡的取代货币。不过，他放贷了太多的钱，发行了太多无法兑现的信用证。最后，皇家法庭对他处以死刑，后来又改为监禁。

此后大约50年，苏格兰的约翰·劳[①]先生进行了比帕姆斯特拉奇更为大刀阔斧的尝试。传记作家珍妮特·格里森写的《百万富翁》(*Millionaire*)一书的副标题形容约翰·劳是个苏格兰"花花公子、赌徒、决斗士，开创了现代金融体制"。约翰·劳出身于爱丁堡一个富有的金匠及银行主家庭，他饮酒无度、赌博、玩女人，把巨额遗产挥霍一空。1694年，他在一场决斗中杀死了情敌，因此被关进了苏格兰监狱的死牢，后来靠贿赂逃了出来，流亡至法国，那里便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在巴黎搭上了已婚富婆凯瑟琳·赛格纳，两人游遍了欧洲各处赌场。劳凭借自己超凡的数学才能想出一种方法，打败了多家赌场的庄家，为自己积聚了巨额的财富。事实上，"millionaire(百万富翁)"这个词就是针对劳专门发明出来的，当时他在法国凭借自己的敛财计划一夜暴富。

1705年，劳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敦促成立银行，发行以地产或其他资产作担保的纸币。英格兰国有土地管理局官僚威廉姆·波特作于1690年的文章《财富的关键》也许给了劳一些启迪。波特提倡大规模发行纸币要

① 约翰·劳(1671—1729)，英国银行家和经济学家，首创银行信用证，被认为是金融和纸币之父。——译者注

以国有土地为担保,而非黄金白银。据他推断,流通的货币数量越多,贸易及生产就能得到更大的发展。他并未论及货币造伪者在发展过程中会扮演何样的角色,不过他预测,不断增加的货币供应量会被上升的产量所抵消,产品的价格也会下降。这个理论同20世纪古怪的美国天才诗人艾兹拉·庞德的见解何其相似,他含混不清的"社会信贷说"理论提出,高利贷或者说是无节制的有息贷款终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房地产或其他有形资产为担保的无息贷款。经济史学家默里·罗斯巴德认为,因为这篇文章,波特堪称"英国首位通货膨胀论者"。波特并非有意欺世盗名,但是后世的经济学家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

美国的马萨诸塞殖民地和伦敦的英格兰银行分别于1690年和1694年开始发行纸币。不过,交际广阔的劳让自己的大规模印制纸币提议引起了政界的注意,尽管有波特的文章在先,不过在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劳的提议似乎是一个全新的观点。

17世纪时法英两国及其新大陆殖民地的困境,跟20、21世纪当代战争引发的金融困境非常相似。万帕诺亚格布罗是科德角地区最强大的印第安部落,殖民者给他们的首领起了个英国名字,叫菲利普国王。该部族意识到自身权力遭到威胁,便发起了大规模的菲利普国王战争,对手是从缅因至康涅狄格的新英格兰殖民者。1675年至1676年,大量的殖民者居住地及印第安人部落遭到毁灭,500名白人及无以计数的印第安人死去。菲利普国王阵亡,印第安人战败,不过卷入战争的殖民地也都几近破产。法国人同印第安人之间也是冲突不断,极大地损耗了法国殖民地的财力。不过,1690年马萨诸塞殖民地发行纸币的最主要诱因,是新英格兰及纽约针对法裔加拿大人发起的劳民伤财的远征。在当局远未做好准备之前,远征军便已大败而归,士兵们回返殖民地,要求发放军饷。获得这些急需现金的唯一途径就是增税——英国官方早已发现这是殖民地的祸乱根源。马萨诸塞当局印制了面值7000英镑的纸币。其他急需花钱的军事远征行动接踵而至:1702年,卡罗来纳殖民者在佛罗里达圣奥古斯塔发起了反对西班牙人的运动;1709年,对加拿大法国人发起的新战役迫使纽约和康涅狄格印制了纸币。宾夕法尼亚于1723年、马里兰于1734年、特拉华于1739年也分别发行了纸币。继它们之后的弗吉尼亚和佐治亚则是在1755

年和 1760 年。

再回头来看约翰·劳的金融冒险活动。劳的所作所为很好地证明了真正的造伪同官方批准的政府发行货币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1703 年，劳的谋杀罪已经过了追诉期，于是他回到了苏格兰。苏格兰议会拒绝了劳设立中央银行、发行"以国有土地为担保的"纸币的提议。劳举了繁荣的荷兰为例——当时的荷兰存在贸易顺差，有大量的金银储备充当荷兰纸币的后盾——试图说服严肃精明的苏格兰人，流通货币的增加会促进就业及生产——这也正是波特的主张——但是没有成功。他没有考虑到的是，荷兰的兴旺繁荣是建立在贸易顺差及货币稳定的基础之上，在这个国度，伪造纸币是一种严重的犯罪，造伪行为极其罕见，不致引发通货膨胀。

此后的一些法律纠纷迫使劳再次逃亡法国。1715 年，路易十四驾崩，劳终于有了机会宣扬他的纸币计划。在他的游说下，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任命他为皇家银行行长，皇家银行发行法国所有的纸质货币及票证。最初纸币可以用于纳税，还可以兑换白银。不过，硬通货担保制很快便被取消，这给了法国王室(还有劳)无限扩张债务的可能。到 1716 年，劳全面掌控了法国的货币体系及货币帝国。他受命掌管密西西比公司，这家公司的任务是开发法国在美洲的庞大领地路易斯安那。劳发行了大量纸币，其担保便是路易斯安那领地的扩充，当时该领地从墨西哥湾一直延伸至加拿大，面积比法国本土还要大。为了迎合数以百计心情热切的投机分子，政府发行债券的数量急剧增长，货币供给量也因此急速攀升。1717 年至 1720 年，期票、银行信用证、法国纸币的票面价值及价格在法国急剧攀升，创造出了经济学作家刘易斯·J. 沃克所描述的"如今被称为'密西西比泡沫'的大规模极度通货膨胀"。

这一泡沫以及法国的纸币财富梦最终破裂，欧洲和美国的硬通货论者欢欣鼓舞。破产并欠了一屁股债的劳逃离法国，游荡于欧洲各地。1729 年，他在那不勒斯逝世。在当地，他还试图游说政治家们让他担任中央银行行长。此后法国不再发行纸币。一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指券才得以发行，但却引发了极度的通货膨胀。其罪魁祸首其实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他为了支持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复辟，暗中伪造了大量的假指券。

爱尔兰实业家理查德·坎恩迪伦于1730年投身巴黎银行业，一度是劳的合作伙伴。不过，他却断言，劳的计划必将破产。据说在法国经济崩溃之后，他倒是聚敛了许多财富。坎恩迪伦的文章《贸易性质概论》在他死后的1755年出版，文中指出，人性的贪婪和恐惧是经济的推动力量，坎恩迪伦是最早提出这一论断的作者之一。

本杰明·弗兰克林的印刷厂及其客户

几乎所有的主流美国历史学家都认可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美利坚合众国开国元勋中的一位巨人。他也理所应当地成了全球知名的政治家、作家和科学家(在法国，他还是一位深得女士欢心的人)。富兰克林最初在英属殖民地从事记者和印刷工作，此后开始积极促成同法国的经济、军事结盟。在这一行动中，他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功臣。独立战争期间，富兰克林曾经效忠的君主英王乔治三世及其手下策划了伪币行动，导致北美殖民地陷入极度的经济困境，独立事业因此几乎毁于一旦。法国的及时介入，是革命得以取胜、北美殖民地得以独立的关键因素。

富兰克林出生于波士顿，少年时期便掌握了基本的印刷技能。1723年，17岁的富兰克林离家前往纽约，希望能在威廉姆·布拉福德手下找到工作，当时他以为布拉福德公司是新英格兰以外的殖民地唯一的一家印刷厂。布拉福德公司似乎不是很欢迎他，年轻的本杰明找上了它的竞争对手——费城的凯默印刷厂。富兰克林后来在自传中写道，他发现凯默

> 有点像个学究，好像只是个排字工，对于印刷一无所知。他……对世界非常无知，后来我还发现，他排的东西有很多错误。

当时的富兰克林非常需要工作，于是便把这些看法藏在心中，开始帮凯默印些小册子和其他无足轻重的东西。他那些毫无瑕疵的印刷品引来了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威廉姆·基思爵士的注意。1724年底，基思爵士派他去伦敦购买设备，并开拓文具店及书店的业务。在伦敦那繁忙的18个月中，富兰克林学到了图书贸易的知识。随后他回到费城，继续在凯默手下

做事，并掌握了许多新技能，包括木刻术和活字金属排版术。

同凯默吵了一架之后，富兰克林在费城建起了自己的印刷厂，买下了《宾夕法尼亚公报》，很快便成了一位著名的记者和小册子作者。他对于殖民地政治及经济现状做了些冷幽默式的独到评论，在钱财方面也做了一些部署，由是于1737年被任命为费城邮政局局长。1754年，他被选为全美邮政部副部长，随后出使英格兰。

在这20年中，富兰克林从事独立印刷工作，并且创作了《穷理查历书》(*Poor Richard's Almanack*)等名作，主要靠印刷图书、小册子以及其他能接到的活来维持生计。18世纪早期的美国，无论是英镑、西班牙元，还是其他各种形式的现钞都很少。富兰克林也为开展纸钞印制业务做了大量的功课。跟波特、劳及其他同时代的人一样，富兰克林也热烈赞成印制纸币以提高货币供应量。他成了一名纸币专家，他所设计的纸币为时至今日的数代美国货币确立了范本。

1729年，宾夕法尼亚首次发行纸币6年后，富兰克林发表了自己的宣言：《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他得到了为宾夕法尼亚、新泽西、特拉华政府印制纸币的合同。当时的每一张纸币都用手工标了号，并有一位以上州政府的官员的签字。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委托贷款处发行纸币，贷款处是类似地产银行的机构，用新纸币来发放抵押贷款。由此导致的货币供给量上升深得农民和小商贩之心。不过，富裕的商人及土地所有者(包括殖民地创始人威廉·佩恩的家族)对此都很不欢迎，极力想要限制纸币的流通。正如富兰克林在自传中所说："有钱人不喜欢纸币，因为人们对纸币的胃口会越来越大。"不过，富兰克林那篇《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在宾夕法尼亚州议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并得到了议员们的赞同。1729年至1747年期间，富兰克林印制了80万张纸币——是宾夕法尼亚州、特拉华州、新泽西州发行的四种纸币的总和，面值27.5万英镑，他从中赚取了大约1000英镑。

在此间及以后的岁月里，殖民地纸币造伪活动达到了高潮。跟富兰克林同时代的玛丽·巴特沃兹是北美最早的一批成功造伪团伙的头目。当时罗德岛州发行了以先令为名的纸质信用币。1716年，时年30岁的巴特沃兹夫人开始用她自己独有的方法来复制这种信用币。她的工具是一块滚

烫的烙铁和浆过的平纹细布，她用烙铁将真币上的图形转压到一张白纸上，白纸的纸质同罗德岛州银行纸币的纸质基本相同。在她的监督下，她那些颇有艺术造诣的同伙用羽毛笔将这些图形填满。随后这些伪币通过他们的网络散布出去，这个网络里还有一位信誉良好、绝不会招致怀疑的当地法官。

当时的文献虽然没有提及这个团伙伪造货币的具体数量，但却表明罗德岛州的经济由此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个团伙后来被冠以"厨房造伪者"的称号，他们作恶整整 7 年，行径都没有败露。1723 年，殖民地警察部队逮捕了巴特沃兹和她的 6 名同伙。警察在她家厨房里查获了大量伪币及造假工具，但是这帮家伙却得以逍遥法外，因为法庭因证据不足无法宣判他们有罪。巴特沃兹及其同伙最终都被无罪释放了，不过普罗维登斯当局对她实施了严密监控，这一举措显然颇有成效，这帮人此后便偃旗息鼓了。

富兰克林和朋友约瑟夫·布瑞特诺尔发明了一种相当艺术的独特防伪方法。在 18 世纪 20 年代，布瑞特诺尔经常利用树叶转印自然的图案。他和富兰克林从中得到启发，便在搜集来的树叶上涂上油墨，用一张对折的纸夹住，然后放入印刷机，将树叶压入熟石膏，再浇注金属，制出了树叶形状的印版。富兰克林利用这样的印版在纸币上印出树叶图形。最早的树叶印版用的是剑羽竹芋的叶子，1737 年出版的《穷理查历书》中有一篇文章讲到了这种植物的效用，插图便是用这个印版印刷的。印刷树叶图形的方法有效杜绝了殖民地的造伪现象，因此富兰克林及其继任者印刷的纸币绝大多数都采用了这一方法。直至 1776 年，给殖民地招来致命打击的大陆币开始发行。也正是在 1776 年，乔治国王的军队统帅们成功地伪造了大陆币，其目的便是为了重创各个背叛殖民地的经济以及乔治·华盛顿率领的革命军。

革命的坎坷历程

早在保罗·里维尔夜半策马向起义民兵报告英军偷袭的消息之前，整个北美殖民地一直都是英国王室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

1763年的《巴黎条约》将法国在北美洲加拿大南部的大片殖民地割让给了英国，北美殖民地于是得到了往往抱悲观态度的英国议会的关注。如果能够应付殖民地的庞大开销又不致让英国纳税人负担过重，议员们愿意为此制定任何法律。除了一两个王权的反对者，比如反政府主义者约翰·威尔克斯之外，殖民地在议会中没有代言人，在整个英国也是人微言轻。

《巴黎条约》签署后，英国多个政府部门开始相继将目光投向北美，考虑如何更有效地管理这13个殖民地，特别是如何在这里捞到钱。当然，捞钱的种种手段对于殖民地的人民来说是非常具有挑衅意味的。殖民地所有的小学生都知道《印花税法》(1765年)、特别关税委员会的试验品《汤森税法》(1767年)以及导致"波士顿倾茶事件"的《茶叶税法》(1773年)。到1774年年底，在这些法案的共同作用下，大范围的经济及社会动荡升级成了暴力事件。

在大肆造假及其他通货膨胀因素的作用下，富兰克林及其同行所印制的纸币持续贬值。旨在通过直接课税增加税收的《糖税法》实施之后，英国议会又于1764年通过了《货币法案》，禁止殖民地各公司在英国用已贬值的殖民地货币付账，也禁止发行在英国政府看来很危险的那些货币。同西印度群岛的糖、朗姆酒及糖浆贸易帮助殖民地获得了大西洋沿岸内部银行系统及贸易所需的硬通货，却遭到了《糖税法》的沉重打击，《货币法案》则是雪上加霜，导致了新一轮的钱荒。

英国"政治《圣经》"、威廉·布莱克斯顿的《英国法释义》(*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1765年)中所说的"国王、贵族院、平民院"的无上权威遭到了日益分化的殖民地社会那些爱国团体的反对。对于许多富裕的商人、银行业及专业人士来说，只要《印花税法》以及繁重关税之类威胁到自身生计的严苛的经济措施得以取消或废除，他们是非常愿意向国王效忠的。1765年，富兰克林仍然是英国国王的忠诚臣民，同时也是事业有成的国王的纸币印刷业主。当时他说，效忠于国王的人不愿意侵害"对国王的坚定效忠及对政府的忠诚支持，这是殖民地安全的保证，也是殖民地的荣耀"。

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倾茶事件"爆发后，乔治国王宠信的首相、

1770年至1782年在位的诺斯勋爵成了殖民地政策最主要的决策人。1776年英军占领纽约之后，豪威勋爵提出伪造美洲流通的大陆币，其后台很可能便是诺斯勋爵。总之，从1774年初，诺斯便开始制定并实施种种惩罚性法令，进一步剥夺了殖民地人民的公民自由权，并最终严重破坏了殖民地的经济。

随后出台的是一系列人称“不可容忍法案”的法案，包括：《波士顿法案》，规定自1774年7月1日开始关闭、封锁波士顿港；《马萨诸塞州政府法案》，基本剥夺了《殖民地宪章》赋予人民的权利，皇家总督则拥有近乎绝对的权力；特别离谱的是《公正行政法案》，任何被指控犯有造反罪的人都要在英国或是非案发地的殖民地受审；《驻营法案》强制要求波士顿及其他一些市镇的居民要让英国军队驻扎在自己家中；《魁北克法案》，在伦敦方面看来，它算不上是什么惩罚性法令，但是殖民地人民却不这么认为——根据这个法案，魁北克省的范围扩展至俄亥俄河，这条河流经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康涅狄格州及弗吉尼亚州。

1774年9月5日，几个殖民地代表在费城召集了紧急会议，大陆会议就此诞生。效忠派律师约瑟夫·盖洛维避免武装反抗的提议遭到了多数人的否决。会议制定了《殖民地权利及不满宣言》，并做出了抵制英货的决议。1775年初，英方提出的两项和解协议遭到美方拒绝。1775年4月19日，在莱克星顿和康科德打响了战争的第一枪。5月，美军占领了纽约州北部英军的两处要塞提康德罗加、克朗波因特，随后便在费城召开了历史性的第二届大陆会议。会议任命弗吉尼亚州大地主乔治·华盛顿为仓促调动起来的民兵组织——大陆军的总司令。

正是1775年的大陆会议制定了对于战争至关重要的金融措施。议员们着手准备在12个联邦殖民地(佐治亚州当时尚未加入联邦)发行货币。1775年6月22日，大陆军跟英军在波士顿附近的邦克山交战的消息传来，大陆会议下令发行总面值200万西班牙金元的货币。发行数量在12个殖民地根据大致的人口进行分配。纸币的面值小至三分之一、二分之一、三分之二元，大至一元、八十元不等。人口最多的弗吉尼亚州分配到了496278000元，最少的罗德岛州则只有37219.50元。

这种纸币的设计同革命之前的殖民地货币类似，长3英寸半，宽2英

寸半，外围是一个书写体和手写花体组成的装饰方框。其中一张纸币上的文字如下：

> (第 19034 号
> 8 美元纸币持有人
> 可以换取
> 8 个西班牙金元或者
> 等值的黄金或白银。
> 1775 年 5 月 10 日
> 费城大陆会议决议。
> 8 美元)

这些文字的左边是一句拉丁文的爱国口号："Majora minoribus consonant(大小共荣)"。有些人认为这句与其他面值纸币上不同的文字出自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手笔。大陆币上的一些图案在不同面值的现代美元纸币上还可得见：国玺、13 颗星(在佐治亚州加入联邦之后又加了第 13 颗星)、金字塔、鹰。先前的殖民地货币是用木版印刷的，大陆币则是用铜版，只有很少的防伪措施，多数都没有富兰克林的树叶纹防伪标志，最初还附有 195 名法定署名人中 3 位的签名，后来因数目太过巨大，签名也取消了。

由于现金、食物、服装、枪支、弹药等各类军用物资都很匮乏，乔治·华盛顿远征加拿大英军以及进攻波士顿英军的军事计划均告搁浅。1775 年 9 月 10 日，宾夕法尼亚州步枪部队发生兵变，被纳撒内尔·格林将军和一支罗德岛州军队所镇压，民兵的士气低迷可见一斑。在约翰·汉考克等有识之士的劝阻下，华盛顿放弃了进攻计划。汉考克当时是大陆会议主席，1776 年 7 月 4 日在费城，他在《独立宣言》上留下了漂亮的签名，如今英文中"John Hancock(约翰·汉考克)"一词已经成为有效签名的代名词。

1776 年 9 月 29 日，最初一笔 50 万元的大陆币送至波士顿戒备森严的英军驻地眼皮底下剑桥的华盛顿指挥部，是军队的第一批军饷。约瑟夫·霍奇金中尉在 10 月 6 日给妻子萨拉的信中写道："我给你寄了 11 元钱。"当时他每月的津贴是 13 元。

另一支由理查·蒙哥马利率领的美军展开了进攻加拿大的行动。他们没有华盛顿那么顺利,虽然攻下了蒙特利尔,不过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将军所率军队却未能拿下魁北克。这位阿诺德将军后来成了独立战争中最为著名的一个叛徒。乔治三世和诺斯勋爵开始雇用德国汉斯雇佣军来镇压独立军。恰在此时,英国的宿敌法国开始对革命军表现出了同情并伸出了援手。

英国人撤离波士顿后,华盛顿也移师纽约,豪威将军和他的兄长、海军司令理查德·豪威勋爵正准备从海、陆分别向纽约发起攻势。豪威司令曾提出过和解,被美方拒绝了。8 月 27 日,一支英国军队登陆长岛,击败了伊斯雷尔·帕特南将军率领的美军,美军撤退到纽约。到 9 月 15 日,斯塔滕岛、布鲁克林以及曼哈顿大部都落入英军手中。华盛顿退至哈伦高地。在此期间,豪威将军(很可能还有他的兄长)精心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秘密行动:通过大规模的造伪活动来破坏北美叛军的大陆币。

英方为了经济利益伪造殖民地货币已经是老皇历了,而且显然还留下了造假设备以及熟练的印刷工及制版工。在此次针对美洲新贵发起的新一轮经济战中,这些资源便可为诺斯勋爵的政府所用了。早在 18 世纪,此类行动便有了先例。比如,1729 年 7 月 30 日,一艘名为"迷人萨利"的帆船从都柏林出发,驶往费城。在旅途中一位名叫伊登的乘客去世了,人们打开他的行李,发现里头有 118 张伪造的新泽西州发行的 1 英镑纸币。1739 年 5 月,费城人彼得·隆恩回返故乡时随身携带了在英国印刷的假新英格兰纸币,总面值达 6000 英镑。给隆恩印制伪币的是一名英国的印刷工人,他给隆恩的表弟、新泽西州萨勒姆的罗伯特·杰金斯也提供了服务。这名印刷工人后来向英国警方供认了全部事实,英国警方随后通知了费城及纽约的殖民地当局。杰金斯抵达纽约后便遭到了逮捕,殖民地警方查获了 971 张伪造的面值 20 英镑的特拉华州纸币。在接受审讯时,隆恩供认自己在离开英国之前,把真正的新泽西和特拉华州纸币藏在马鞍中交给了那名英国印刷工人。他向对方订购了 1000 张 20 英镑的新泽西州币和 1.2 万张特拉华州币。从 1740 年至 1775 年独立战争爆发,殖民地的报章不厌其烦地提醒公众警惕日益泛滥的伪造的纸币和硬币。不过,警告也好,对造假者处以严酷刑罚也好,都是收效甚微。既然制造伪币已经成了

一种家庭手工业，如今英国政府要采取行动更是易如反掌。

不管有没有伪币，大陆币自发行伊始便已缺乏公信度。1775 年 11 月 7 日，费城公共安全委员会获悉，本地的贵格会教徒拒绝接受新币。他们宣称自己是反战主义者，不能接受为了战争而发行的货币。委员会提醒这些贵格会教徒，当年在抗击法国及其印第安盟友时，他们已经用过殖民地发行的货币了。1776 年 1 月，大陆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告诫人们，如果拒绝使用新币，便是"对祖国毫无爱意和敬意"，并坚称，到了需要偿付的时候，大陆币便可以兑换回硬通货。他们发表的声明称："一个破产的没有信用的共和国在政治领域就是个小丑，在令人尊敬的国家面前就像夹杂在一群纯洁高尚的太太中间的一名妓女。"

威廉·豪威将军是英军驻纽约的军事指挥官，其造伪计划得到了英国政府官员、纽约及其他殖民地效忠派的支持。历史学家大卫·麦克洛在近作《1776 年：战争中的英国和美国》一书中，形容豪威是"一个随和、平易的人，从来不会放过找乐子的机会"，在"优雅的宴会上参与法罗牌赌博游戏"——在波士顿被围期间这种特性显露无遗。他从波士顿去纽约时带上了"一位绝世美女……这位美女成了比利·豪威的克里奥帕特拉，即埃及艳后"。这位女子的丈夫是一个显赫效忠派家族的世家子弟小约书亚·洛林。根据当时的记载，"将军很喜欢这位女子，约书亚没有表示反对。这个人很识时务，也知道将军喜欢女人"。

洛林夫人随英军撤出了波士顿，豪威把她舒服地安置在纽约斯塔腾岛的英军指挥部。1776 年 10 月 28 日，英军在白原战役中击溃华盛顿的军队。11 月，独立军从曼哈顿岛制高点的华盛顿堡以及位于哈德孙河隔岸的李堡撤退。豪威打发时间的方法是要么跟洛林夫人调情，要么就是处心积虑地思考如何通过战场上的这些成果获得经济利益。同时，他和手下——几乎可以肯定还得到了伦敦政府方面的配合——也开始着手实施伪币策略。

这些伪币有许多是在英国印制的。美方一艘武装民船曾经扣留了一艘英国船，船上满载伪币，其中有许多是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效忠派印制的。显然，理查德·豪威司令所辖那些驻扎在纽约港一带及哈德孙河上的英国皇家舰队的军舰上也有造伪活动。在豪威勋爵的占领区，那些伪

造大陆币的个人行动完全不受限制，可以自由交易伪币——还可以堂而皇之地刊登广告。

多数研究这一课题的历史学家都会出示刊登于1777年4月14日《纽约信使周报》上的一则广告。英国占领军的官方公告及法令都是通过这份报纸刊登的。广告诚邀"要去往其他殖民地的民众"以"纸张的价格"购买伪币，"数量不限"。这些伪币"伪造得非常精细"，几乎无法识别。这则广告向潜在顾客担保："大量成功流通的纸币便是明证。"并邀请有意向者"在晚上11点至凌晨4点之间前往'咖啡屋'（当时纽约最著名的一家咖啡馆）垂询相关事宜"。

当时的相关文献指出，1777年、1778年之交的冬季，英军占领费城后，"英国官员和普通英国人的口袋里都塞满了假钱"。不过，早在占领费城之前的1776年，纽约就派出过英国间谍到供应大陆币用纸的纸张制造厂。在一封写于1778年1月22日的信件中，宾夕法尼亚州兰卡斯特地方议会向华盛顿将军报告，一帮给英军战俘运送衣服的马车夫遭到拘禁，因为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大量的伪币。在1779年12月7日致大陆会议的信件中，华盛顿证实，英方正在从费城不断获得纸张，这些纸张同最新版大陆币所用纸张非常相似，英方的造伪活动从来没有终止过。此前一个月，宾夕法尼亚州议会主席约瑟夫·里德向众议院汇报，货币的贬值"及其对美国荣誉及利益带来的致命后果"已是街知巷闻的事实，是时候采取坚决的取缔措施了。

1777年5月12日及1778年4月11日发行的大陆币遭到了大规模的伪造，国会只得将这两种纸币全部召回。截至1780年1月，面值共计7439974元的1777年版及面值12407294元的1778年版纸币遭到销毁。这些纸币大幅贬值，几乎完全没有了购买力。据托马斯·杰斐逊的报告，截至1780年，大陆币的发行面值达到了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的2亿（1843年美国财政部的一份报告中这个数字则为242100176）。纸币贬值后，到1780年，40张1元纸币才能换到1枚1元银币。到1779年9月，纸币已贬值为原有价值的五分之一，最后干脆就一文不值了。詹森·古德温说，杰斐逊的评论是：这些纸币"哼都没哼一声就气绝身亡了"。

"连一张大陆币都不值"一语在美国人当中广为流传，用以表示"一文

不值”的意思。一位理发师用大陆币来糊理发店的墙面。据报道，一位腿伤严重的老兵从自己的军饷袋里掏出一包大陆币用来做绷带，正因为此，美语中意为“胫骨痛膏药”的“shinplaster”这个词后来被用于指代“滥发的贬值纸币”。战时各州发行的纸币总数预计达 2.09 亿——也遭到了大肆的伪造，伪造者可能是英国人，可能是效忠派，还可能是纯粹为了牟利的犯罪分子。当然，也可能三者兼而有之。

历史学家麦克洛在书中指出，大陆军的财务状况极度糟糕，经常没有足够的大陆币来支付军饷。在英军及汉斯雇佣军围攻纽约期间，华盛顿率领部下顽强抵抗，但美国士兵当时的配给却少得几乎食不果腹，很多人整整 2 个月没能领到 1 分钱。而在东河对岸，他们的敌人却有着充足的粮食，还有长岛各家农场提供的其他物品。特别是那帮汉斯人，他们还向记者们炫耀，他们从来没有过得这么舒服过。随后，华盛顿被敌人逼退至特拉华河南岸，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获知可靠的敌情，据说为此他向手下人担保“为了得到这些情报就不应该省钱，我本人会非常乐意掏腰包的”。当时没有其他的资金来源，他动用了自己私人储蓄的硬通货，而且在其他很多时候也曾采取这种做法。

1777 年，英国人意图切断新英格兰同其他殖民地的联系，将大陆军一举围而歼之。英军将领约翰·伯格因在加拿大集结了大规模的军队。按原定计划，伯格因要沿哈德孙河而下，同自纽约出发的英军会合，但是这个计划未能实现：10 月，他的军队在萨拉托加遭到伏击，被迫投降。萨拉托加大捷让美军士气大振，但是其经济状况还在持续快速恶化，这其中针对大陆币的造伪活动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到这个时候，各州都不再主动向国会支付本州发行的货币以支持军队。日益弱化的大陆币必须同来源五花八门的其他各种货币竞争。各州依然发行本州货币用于支付各项开销。与此同时，英方的大规模造伪行动仍然没有中止。市场遭到破坏、地产被毁、军人及平民的伤亡等因素可能也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到 1777 年底，国会发现，其财政收入中竟然有 90%是已经大幅贬值，并且还在持续跌价的大陆币。

独立各州的形势日益恶化，本杰明·富兰克林放下和平时期手头的一切事务，集中精力投入了这场战争。此前他并未预见到会有这场战争，而

这场战争的转机正是由他促成的。

富兰克林以及法国的救援行动

1776年1月,在费城不事张扬的新年庆典之后,富兰克林辞去在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和公共安全委员会的职务,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防御事务上。1775年11月29日,经过长时间的权衡之后,国会设立了秘密通讯委员会,"其唯一的职责便是同我们在英国、爱尔兰及其他地区的朋友保持联络"。这是对乔治三世和诺斯勋爵发起的这场秘密战争做出的第一个回应。该委员会相当于美国的外交部门,共有5位委员:本杰明·哈里森、托马斯·约翰逊、约翰·迪金森、约翰·杰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其中,富兰克林曾到海外学艺,也曾到海外进行过准外交活动,因为这些独有的经历,他很快便成了其中的领军人物。

在7年战争中,法国遭到重创,1763年的《巴黎条约》剥夺了法国的许多海外殖民地。当时与会各方都倾向于让法国保有加拿大殖民地,交出加勒比海上盛产蔗糖的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富兰克林对此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加拿大有着丰富的皮毛、木质纸浆、建筑原木、矿藏资源,在未来会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于是英国让法国继续保有加勒比海岛屿以及加拿大海面上两个小小的渔岛: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至今这两个岛屿仍属法国所有。

为挽救新国家的命运,富兰克林及革命美国在欧洲结交到了一位最重要的盟友:法国年轻的外交官、韦尔热纳伯爵夏尔·格拉维埃。在土耳其同俄国发生冲突时,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宫廷捍卫了法国的权益,充分展示了非凡的外交才能。被路易十六任命为法国外务大臣之后,他将注意力投向了北美独立战争。1775年,他派出密使阿夏德·德·邦弗洛尔来到费城。富兰克林与邦弗洛尔早已结识。富兰克林以前在费城一位书商那里购买法国科学书籍,特别是电学书籍,通过这位书商认识了邦弗洛尔,他还曾经把自己的一些作品送到法国去。

1775年的波旁王朝势单力薄,根本无法公开同英国抗衡。直至1778年,法国才在欧洲公开对英宣战。在费城那位书商的居间调停之下,富兰

克林同邦弗洛尔秘密会晤。最初富兰克林是单独前往的，后来才带上了委员会的4位同僚。美国人告诉邦弗洛尔他们将在1776年年底之前正式宣布独立，邦弗洛尔将此事汇报了韦尔热纳。随后，富兰克林又同西班牙王子唐·加布里埃尔·德·波旁取得了秘密联络，他认为这位王子是又一位潜在的盟友，此外还同他以往去欧洲时结识的文友也取得了联络。他绝不积极寻求"经济盟友"以外的任何东西，在谨慎的国会面前否认自己的做法，并对外宣称"一位处女去追求别人"是不合适的。

一位名叫博内的法国特务被富兰克林从费城派往法国，为革命军寻求军需供应。殖民地货币已经是靠不住了，美国人手里又没有黄金，所以只能通过出口物资来换取军需。1776年3月，康涅狄格州的塞拉斯·迪恩在经富兰克林面授机宜后，怀揣富兰克林写给法国友人的信件出发去了法国。他的伪装身份是一位商人，目的是寻找能跟北美印第安人交易的货品。他的真实使命则是会见韦尔热纳，将富兰克林同邦弗洛尔传递过的美国宣告独立的信息再重申一遍，此外就是同他的北美同僚秘密取得联络。

与此同时，富兰克林本人则被派往加拿大承担一项危险的使命，这一使命差点害他丧命。与他同行的有国会议员塞缪尔·蔡斯和约翰·卡罗尔，这两位都是天主教徒，都是在法国受的教育。他们的使命就是争取到对北美独立事业漠不关心的法国天主教徒的支持。他们沿哈德孙河、乔治湖和夏普伦湖北上，冰天雪地和刺骨寒风让他们行进缓慢。一路上，时年70岁的富兰克林经受着巨大的痛苦，最后终于找到了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将军，当时将军正在围攻魁北克，却一直无法将其一举拿下。阿诺德断言，要争取到法国天主教徒的支持是没有可能的。阿诺德的部队已经没有钱了，极有可能发生兵变，富兰克林只得自掏腰包给了他们300枚英镑金币。随后，精疲力竭的富兰克林回返费城，刚好赶上了《独立宣言》的起草。

富兰克林随后着手起草了同法国、西班牙的友好条约，甚至还有未来同英国的和平协定。他跟乔治三世派来的议和代表理查德·豪威勋爵谈判，豪威提出的和解方案中没有美国独立的内容，被富兰克林一口否定。随后美方遭受了一连串的败仗：华盛顿失守曼哈顿。白原战役中，英军抓获并绞死美方间谍内森·黑尔，三分之一的曼哈顿毁于一场大火。

1776年长达数月的阴霾日子里，领不到军饷的士兵纷纷逃离部队，兵

源流失的速度几乎赶上了征募新兵的速度。随后，富兰克林收到了法国朋友巴尔伯·杜布尔格博士写于6月10日的信件，面前出现了一抹曙光。信中说，他跟富兰克林派往法国寻求援助的法国特工博内见上了面。在杜布尔格看来，博内更像是个英国间谍：他声称为了避开边境海关官员的检查，自己所有的证件以及身份文件都留在了鹿特丹。怀疑归怀疑，杜布尔格还是把博内引荐给了凡尔赛的法国财政部官员。杜布尔格以杜伊勒里先生的名义——当时法国并没有公开支持北美独立战争——跟官员们谈妥了“借”1.5万支法国1763型来福枪给美方，今后还会提供新的枪支。出于对北美殖民地的同情，也出于他跟富兰克林的友情，杜布尔格又冒险谈下了其他多笔交易，包括由美方向法国提供优质弗吉尼亚烟草，为期1年。他还带博内去见了外务大臣韦尔热纳，韦尔热纳仔细询问了北美的形势。后来，韦尔热纳又秘密会见了塞拉斯·迪恩。他向迪恩保证，法国方面会尽己所能来帮助美方，不过在美国实现独立之前或者说法国尚未对英正式宣战前，这种援助是不能够公然为之的。迪恩还同富兰克林的另一位熟人爱德华·班克罗夫特博士取得联络，得到帮助。直到后来，迪恩同富兰克林才知道，班克罗夫特是英国的双重间谍，他一直在尽己所能地向英国国王汇报美方的一举一动。

1776年9月26日，美国国会正式向路易十六请求援助，并派出塞拉斯·迪恩、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3位公使前往法国。富兰克林人还未到，在巴黎就已经是一个名人了，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在文学上也颇有建树。这很可能跟他1767年及1769年对巴黎的两次短暂造访有关。12月底，富兰克林抵达巴黎，受到了巴黎社交界非常热烈、有时候甚至还非常亲切的欢迎，那帮博学、时尚的法国贵妇尤其如此。在巴黎期间，他的业余消遣便是印刷。对此，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的形容是：“在他自己带去的一架印刷机上印些好玩的玩意儿，有时候是法语，有时候是英语。”在工作时间，他则一门心思想办法从法国人手里借到硬通货，好支撑住摇摇欲坠的大陆币。

富兰克林后来搬进了巴黎远郊帕西的一个豪华庄园，这是法国政府的一位承包商雅各-唐内西安·勒雷·德·肖蒙慷慨提供的。肖蒙受韦尔热纳的委派，向美国客人提供私底下的帮助，并通过一家公司做掩护，售卖

美国武装民船从英国船只上缴获的货物。此时，殖民地方面传来了几周前战场上连续失利的坏消息：衣衫褴褛的华盛顿军队在新泽西州被英军一路追击，在华盛顿奇袭特伦特而大获全胜之前，英军已经逼近了费城。国会也搬到了巴尔的摩。他们不知道韦尔热纳已经批准了贷款事宜，被英国人大肆造伪的大陆币又无法再用，于是国会发行了2000万英镑的公债，利息是6%。大陆军新增了近100个步兵及骑兵营、13艘快速军舰、36门大炮。为了筹措所需资金，国会没有把宝全押在3位驻法公使身上，而是又委派新的公使出使欧洲其他王室。其实，美方之前就已经派出使节向有些王室求助过了，其中包括西班牙，这让富兰克林懊丧不已。

1777年11月15日，国会通过《联邦条例》，正式确定联邦名称为美利坚合众国，并将条例发至各州确认。美军在北部纽约州的萨拉托加击败了约翰·伯格因将军的部队，这个胜利却被中部的失败抵消了——华盛顿的军队被豪威将军赶出了费城。不过，在法国，富兰克林及其美国同伴的努力终于有了丰硕的成果。伯格因战败、所率部队投降，加上富兰克林的种种努力，韦尔热纳终于在秘密给予美方经济、军事援助2年之后，说服了其时态度还甚为勉强的路易十六。1778年2月6日，时年22岁的路易十六签署了《法美友好及通商条约》及《法美同盟条约》。而在1777年的夏天，法国的约瑟夫·德·拉法耶特侯爵和约翰·德卡尔布男爵便已奔赴美国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援。以法国剧作家、实业巨头兼花花公子皮埃尔·德·博马舍的公司为掩护所进行的秘密援助行动如今也可以公之于众了。

此后，法国的援助及海陆部队为美国独立事业提供了极大的助益。1778年7月，让-巴普蒂斯特·德埃斯坦伯爵指挥一支法国舰队驶入特拉华角，1780年7月，让-巴普蒂斯特·德罗尚博伯爵率6000名法国士兵登陆罗德岛新港。在富兰克林和另外两名公使的努力下，法国答应帮助西班牙收复直布罗陀(1719年被割让给英国)及佛罗里达州。1779年7月，西班牙对英宣战。

美英两方在战场上倒是各有胜负，但是，尽管有来自法国硬通货的注入，在诸多因素——英方的造伪行动、操之过急的国会过度印发大陆币导致的极度通货膨胀、英军封锁等因素造成的贸易急剧萧条——的共同作用下，1779年的美国经济已是岌岌可危。9月3日，国会决定不再随意发

行大陆币。国会设定了 2 亿元的上限,达到这个上限后就停止发行。截至当天,合法发行的大陆币已达 1.6 亿元,同时大约有面值 2 倍于这个数的伪币在流通。剩下的 4000 万元份额只能维持几个星期的时间。到时候各州又只得再次各自发行纸币来应付开支了。富兰克林为此忧心忡忡,他给国会议员塞缪尔·库珀写了一封信,以嘲讽的口吻描述了纸币的优点——在纸币还受信任的时候,大陆币却还没出生呢。

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银行家及商人需要美国的货物,却无法通过英国的封锁线把货物送给他们。他们只接受黄金这种支付方式,而美国当时压根就没有黄金。

富兰克林只好私下去找拉尔夫·伊扎德——一位在欧洲的美国特工,私产甚丰——告诉他革命财政没法源源不断地给他提供津贴了。富兰克林让伊扎德把之前拿到的津贴退回来,用于几百名美军战俘同英军战俘的交换事宜上,他为此事已经辛苦奔走了 1 年多,如今终于有了结果。伊扎德愤怒地向国会投诉了此事,还徒劳地要求将富兰克林从巴黎召回。

国会最后还是发行了超出自己限定的 2 亿元上限的大陆币。国会要求各州负责提供军队需要的物资、食品及服务,这一举措缓解了政府采购人员开价偏高导致的通货膨胀。各州不再以货币形式缴纳税金,而是有权直接征收所需物资。如今几乎一文不值的大陆币的数量减少了,美国军方采购体系的欺诈、浪费、腐败行为也减少了。1780 年,国会再次下放权力给各州,让他们自己支付当地招募的士兵的军饷。这一举措有助于降低联邦的负债,不过在加强各州权力的同时也降低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这是 1861 年至 1865 年美国内战的一个核心议题)。

1780 年 3 月 18 日,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导致了仍在流通的大陆币的大幅贬值:新发行一种可以兑换至少多达 40 大陆币的美元。此举威胁到了富兰克林在欧洲为建立美国信用做出的种种处心积虑的努力。各州将对这种新美元课以每月 1500 万元的重税,使之贬值。等各州将老纸币上交后,国会再发行已经贬值的新纸币,有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双重担保,他们要提取 5%的利息,用汇票支付。此举实际上是拒绝偿付美国现存的所有纸币。持有纸币、期票或者有借款给他人,都意味着你的投资缩水到了原先的四十分之一。欧洲人不再信任美国所有的货币,只接受实物

付账。

费城此时又成了美国的"首都"。1780年4月，法国公使谢瓦利埃·德拉吕泽尔讷向韦尔热纳汇报，腐败、管理不善及各种阴谋正在破坏美国的战斗力。尽管乔治·华盛顿及其法国盟友正逐步对英国人占了上风，他们的军队却再次面临严重的供给危机。农场主和商人都不愿意接受纸币了。

同时，在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在英军的重压之下，本·林肯将军的军队供给严重不足。他率部想从英军手中夺回萨凡纳未果，只得退回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如果不能坚守，整个南方也许就得拱手让给英国人了。林肯要求增援1200名常规军士兵及2000名民兵。英军的总司令是亨利·克林顿爵士，副指挥是康沃利斯，他们正在召集8500人的军队，其中有近3000人是美国人中的效忠派。迎战克林顿14艘战舰的只有3艘快速军舰和1艘战斗帆船"突击队员"号。围攻1个月之后，英军于1780年5月12日攻陷查尔斯顿，他们发现城内的美国人已经在准备成立效忠派政府了。到6月21日，南卡罗来纳州及佐治亚州大部都被康沃利斯和美国效忠派联合组成的英国军队重新攻占。

黎明前的黑暗

就在美国命运陷入低谷的时候，约翰·亚当斯对韦尔热纳及路易十六宫廷那些毫无外交策略的举动，差点让富兰克林在欧洲苦心经营的一切毁于一旦。尽管西班牙同英国人和美国人分别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谈判，导致了诸多尴尬，韦尔热纳还是通知拉法耶特坚守对富兰克林的承诺。路易十六派让-巴普蒂斯特·德罗尚博伯爵率领一支1.5万人的海军远征部队前往美国。7月9日，法国部队在罗德岛州登陆。

德罗尚博跟拉法耶特产生了分歧，美国糟糕的财政状况也令法国盟友气馁不已。8月，德罗尚博汇报说，大陆币纸币对英镑金币已经降到了60:1的新低，乔治·华盛顿得给每个新兵100枚"硬美元"，否则就一个人也招不着。一位法国参谋在家信中写道：

> 我们非但没有帮到美国人，反而拖了他们的后腿……为了保证我

们的补给，他们自己的补给更加不够了……我们用现金购买补给，导致他们的纸币贬值，结果那些商人提供补给时都不接受他们的纸币。

美军如今只剩3000人，许多美国人都发牢骚说，法国人应当派2万人、20艘军舰，把英国人赶出他们的纽约大本营，不该像现在这样就驻扎在罗德岛州。华盛顿向国会汇报，如果法国没有更多的援助，包括"至少4000至5000支枪和200吨弹药"，那么法美联军没法进攻纽约的英军。

康沃利斯率军进入卡罗来纳州后，法国清醒地意识到了这场战争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韦尔热纳认为，美国人自己做得不够，而且还越来越依赖法国。他的强大对手、财务大臣雅克·内克尔，跟其他同僚及几位前任财务大臣一样，从一开始便反对支援美国人。到1780年底，法美同盟似乎已经处于破裂的边缘。沙皇叶卡捷琳娜大帝敦促英国同美国各州分别议和，进而分裂革命。首相诺斯勋爵称，英国愿意同法国议和并签订协议，不过前提是法国必须放弃同美国的联盟。

对于乔治·华盛顿的军队及反叛各州的平民来说，1780年、1781年之交的冬天是自1776年以来最为低落的时期。大陆币已经一文不值，尽管国内的费城阻碍重重，欧洲也有很多敌对势力，本杰明·富兰克林还是设法让韦尔热纳及路易十六再拿出一些法国硬通货来给美国。1780年1月，国会派驻法国的一位新任公使约翰·罗伦斯向路易十六呈上一份紧急函件，请求支援美国2500万里弗，之前富兰克林已经从法国要到了这么多钱。乔治·华盛顿写信给富兰克林说，"我们需要紧急援助……我们自己已经对此无能为力。我们需要支付士兵的军饷(新泽西州等地已经爆发了兵变)、美国军队以及日益增多的法国援军所需的服装和食物"。

拉法耶特也从美国向韦尔热纳告知了美国急需用钱的情况。韦尔热纳只得告诉富兰克林，法国财政没法再拿2500万出来了，国王本人慷慨地拿出了600万里弗，此外还有韦尔热纳本人给富兰克林的300万。这些款项被打入户名是乔治·华盛顿的特别账户，只有华盛顿本人才可以支取。(韦尔热纳和富兰克林都担心，国会或其他什么人会把这些军队的救命钱挪做他用。)

罗伦斯来到巴黎后，与富兰克林差不多是分头作战，他募集到了250

万里弗现金，此外还有220万里弗是他回美国后留在法国用于购买军需物资的。富兰克林此时已是75岁高龄，深受痛风和其他疾病之苦，事业上又如此失意，于是便向费城的国会提交了辞呈。国会拒绝了他的辞职请求，鼓励他继续自己的使命，这给了他极大的鼓舞。

1780年8月16日，郝瑞肖·盖茨将军在新泽西州卡姆登战役中败给了康沃利斯将军。随后卡罗来纳州也是败绩连传。9月23日，美军抓到了英国间谍约翰·阿德雷少校，一起阴谋浮出水面：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将军要把纽约西点要塞拱手交给亨利·克林顿爵士。阿诺德成功逃脱，带领新效忠派及英国人进攻美军，阿德雷则于10月2日被处以绞刑。

1781年1月，乔治·华盛顿终于听到了一些好消息：丹尼尔·摩根将军击溃巴纳斯特尔·塔里顿爵士的骑兵部队。到9月底，卡罗来纳州山林饱受美国民兵游击队骚扰的英国军队撤至查尔斯顿。此间，华盛顿耍了些花招，让纽约的英国人误以为他打算同法国盟军携手进攻纽约，因此英国人在纽约驻扎了大量的军队。与此同时，康沃利斯也在弗吉尼亚州集结军队，增强约克镇的防御。

在这个命运攸关的时刻，路易十六派弗朗索瓦·德格拉斯伯爵率领法军一支主力舰队共20艘战船前往切萨皮克湾。华盛顿、拉法耶特和德罗尚博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对康沃利斯形成合围之势。从9月30日至10月19日，法美联军从陆上海上向康沃利斯发起了持续进攻，将其困在约克郡，并封锁了英军补给和援军的海陆通道。

1781年10月19日，走投无路的康沃利斯只得率部下7000人投降。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当年在投降仪式上，康沃利斯的司令部军乐队演奏的乐曲是《倒转的世界》。战争并未就此结束，不过乔治三世和他的大臣们不得不承认，必须要同美国人议和——如果可能的话，必须通过议和阻止美国独立。必须保留英国对加拿大的控制，而这样的议和对于法国在新大陆的利益没有任何的好处。

在法国国内，众多同僚认为韦尔热纳对美国人的经济军事援助太过慷慨、太过挥霍，对他大加挞伐，韦尔热纳的处境非常艰难，而西班牙和美国这两个盟友他都得罪不得。法国方面的行动因此有所耽搁，富兰克林、约翰·杰伊、杰斐逊及其他美国谈判代表也坐不住了。费城的国会指示他

们不要抛开法国单独跟乔治三世议和,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英国一方面要实现对美贸易及双方和好,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让法国的目的得逞,因此他们接受了和约。

1783年9月3日英美双方签署了决定性的和平条约,最终确认了美国的独立。新美国东北及西北边境的遗留问题后来导致了同英国的矛盾,促成了1812年战争的爆发。有关南部边境的条款则导致了同西班牙之间的矛盾。纸币贬值导致的金融危机、无限期拖欠的债务、战争对民生的极大破坏导致了双方的债主都很难合法收回债务。国会提议归还效忠派分子被没收的财产。相关条款从未得到完全的实施。英美船只都可以在美国西部边界密西西比河上航行。

在漫长的议和过程中,富兰克林想方设法从法国财政部弄到了60万里弗,法国方面还允诺,等国库充足,会追加至600万里弗——最后这个允诺没能实现。法国王室和巴黎人将和平条约的签订当成一个节日来庆祝,王室祈祷和平,向平民提供免费葡萄酒和香肠,向本杰明·富兰克林敬酒。富兰克林很快便回到费城继续从事科学及学术研究。他于1790年逝世,这位壮志得酬的开国元勋得到了全世界的敬重。

对美国的援助导致法国国库亏空,民主和自由的观念在法国人民中迅速流传,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却并未意识到"他们正在走向政权的灭亡"。受美国独立战争的影响,法国大革命的枪声也很快响起了,法国随之进入新的乱世:经济极度混乱,外敌的伪造货币行为更是火上浇油,欧洲其他政权很快也纷纷效仿。再之后便是法兰西帝国的征服战及拿破仑·波拿巴的最终覆灭。

第六章
法国大革命：软钱对硬钱

在对劳动阶级的所有欺诈中，没有什么能比纸币欺诈更有效。

——丹尼尔·韦伯斯特[①]，1850年

法国同英国在美洲、欧洲及亚洲(为了争夺亚洲，尤其是印度的殖民地控制权)连年作战，路易十六的王朝劳民伤财，几近破产。国力衰竭是导致法国大革命(1789—1799)爆发的部分原因。反过来，革命又给法国的经济、贸易、社会带来了进一步的破坏；拿破仑的征服战争更是给整个欧洲都带来了深重的影响。这其中，敌对国所实施的货币造伪行动也是因素之一。

巴士底事件发生6年之后，法国的经济陷入了严重危机。国王财政监督委员会于1783年发起的改革也以失败而告终。法国人民开始意识到，路易十六和他的大臣无法独力解决这些问题，即便那些能力出众的、曾经是受人敬仰的瑞士银行家的高级财务大臣也无从措手。他们认为韦尔热纳之流的愚蠢外交官以及拉法耶特之流的空想家给美国独立战争提供了代价极其高昂的援助，而他们从中获得回报的如意算盘却很快便落了空。北美战事消停之后，法国的老对手英国很快便恢复了元气，导致法美贸易额急剧下降。贸易的繁荣为英国经济注入了资本。美国人还开始抢夺法国固有的市场，比如北非的土耳其人领地，甚至还把触角伸到了被法国垄断的加勒比殖民地市场。

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发起了武装革命。此时的法国社会还算

① 丹尼尔·韦伯斯特(1782—1852)，美国政治家，曾两次任美国国务卿。——译者注

富庶,政府却已破产。新兴的中产阶级发现自己能够在皇家的官僚体系中找到很好的职位。机构庞大、效率低下的政府机器已经很难适应一个以贸易及农业为主的国家的运营。法国时事评论员对政府的种种弊端大加挞伐。尽管各地的法院,尤其是巴黎最高法院试图要履行起议会的职责,事实上整个法国并没有真正的议会机构。拥有地产的农夫通常都是拥护王室的,在大革命早期,他们却实施了消极的对抗,许多人甚至还参与了革命。

同新近在法国帮助下赢得独立的美国一样,法国面临的最为重大最为紧迫的问题也是财政赤字过高,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之中。1789年5月5日,在凡尔赛召开了"三级会议",与会者中有1000多名中产阶级(称为"第三等级")代表以及教士、贵族及平民各300人左右。大家在会上争论如何将"三级会议"转变为有效的立法机构——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却未能采取任何有建设性的举措。国王失去了耐性,便在巴黎附近集结了皇家卫队。

在巴士底事件爆发的前三天,路易十六采取一个重大举措:罢免财务大臣雅克·内克尔。内克尔一直以约翰·劳导致极度通货膨胀及随之而来的伪造纸币的激进行为为鉴。他本人是一位瑞士银行家,而在18世纪,瑞士银行家便是品行端正、行事谨慎、守口如瓶这些美德的代名词。

内克尔出生在日内瓦,最初在瑞士银行当办事员,1762年来到巴黎后成立了一家银行,很快便投机致富。他在1776年至1777年担任国库主管及财务署长,并尝试了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也许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也参与了对美国独立战争的大规模资助,向本杰明·富兰克林提供贷款以及无偿的物资。有段时间,内克尔设法隐瞒了国家赤字不断增长的事实,1781年真相败露后遭到撤职。1788年,他又被召回担任财务大臣,应对王朝日益严峻的破产局面。在群情激奋的"三级会议"及制宪国民代表大会上,他也暂时抛开了自己的银行专业,提出了一些社会及《宪法》改革的建议,而这些正是路易十六及其幕僚最不乐意听到的。内克尔很受公众拥戴,因他被撤职而产生的混乱是巴士底事件的诱因之一。

此后法国政府采取了一项财政举措,抛出了一种不可兑换纸币,其购买力飘忽不定,但是政府仍力图确保其流通,此举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此类政府行为中规模最大的,同时也是继罗马戴克里先皇帝之后最大规模的

政府出面设定商品限价的行为。1789年底，革命的国民大会宣布教堂产业为公共财产，随后革命者开始印发“指券”。指券没有黄金或白银作保，也不能换成黄金白银，为其作保的正是那些没收来的教堂产业。

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安德鲁·D.怀特写于1912年的一份重要研究报告指出：

> 最初一批指券的担保是全法国三分之一的地产，均为城市和乡间最上等的地产——教堂以及逃亡贵族（巴士底事件之后贵族便开始逃往国外）被充公的地产，另一个担保就是这些指券印发后可以以极低的价格购得这些地产。

最初，国民大会计划发行面值1000、300及200里弗的大面值指券。对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消费来说，这些面值是大了些，不过用于购置教堂地产却是相当便利。(指券还可生息，以此鼓励所有者持有指券。国民大会认为，所有至少值20亿里弗的充公地产的价值会是一个坚强的后盾，足以保证法国走向兴旺繁荣。)在大会的辩论中有人指出，发行4亿里弗的纸币(不是最初提出的有息债券，而是面值大小不等的纸币)可以刺激贸易、支付国债并且提供购买充公资产所需资金。内克尔、奥诺瑞·米拉博及让·西尔凡·白伊等人则对此表示怀疑。白伊是一位天文学家，时任巴黎市长，并于1789年担任国民大会主席，在恐怖时期却被送上了断头台(1791年)。

战事急转直下、极度通货膨胀、货币造伪

1790年9月，在国王的首肯下，国民大会表决通过发行第二版指券的决议，此次发行量为8亿里弗。决议附加条款规定，未来的总流通量上限为12亿里弗。为抑制通货膨胀，用于购买土地的指券进入国库后，立即予以焚毁。第二版指券不像第一版可以生息。同新独立的美国情况相似，法国民众要求发行小面值纸币的呼声也很高。小面值纸币逐步取代了小面值的银币、铜币。当时仅在巴黎一地，便流通有63种被称为“信用币”的私

人印制期票。外省及其他区域也开始发行各自的指券。

此后，革命者提出的不再发行旧纸币、指券发行量上限为12亿里弗的承诺逐渐被淡忘。谣言四起，称波旁王朝及其包括英国间谍在内的盟友正在藏匿硬通货，迅速贬值的指券发行量还要增加。当时的里弗或法郎换购主食或其他商品的购买力只相当于如今的美元及欧元的几分之一。

同普鲁士及奥地利的战争(1792—1797)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革命政府的财政压力。战场上的失利则进一步激发了法国国内的革命热情，杜伊勒里宫暴动事件爆发，国民大会的权力也移交给了巴黎公社和雅各宾派。1792年9月至1795年10月间掌权的是国民公会，由激进派人士罗伯斯庇尔、丹东(丹东跟罗伯斯庇尔后来都死在了断头台上)等人主导。国民公会正式废除了君主制。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处决之后，法国对英国、荷兰、西班牙宣战。以孔代王子为首的逃亡贵族宣布被羁押在狱中的路易十六的幼子为路易十七国王。在英国及其他盟友的支持下，保皇派在旺代发起了叛乱，差不多与此同时，逃亡贵族在海外政府，尤其是英国王室的秘密支持下，开始印制假指券，以破坏已然陷于通货膨胀的革命法国的经济。

到1793年初，已发行指券的票面价值大约达30亿法郎。初期的发行都是公开进行的，不过国民议会领导下的激进的公安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开始秘密发行纸币。1793年2月28日，日渐穷困的民众在激进派领导人的煽动下，在巴黎掀起了一轮暴动风潮：暴民抢劫了几百家商店及面包房、布店及奢侈品店，政府花700万法郎才收买了他们，平息了暴动。

幸存的中产阶级深受强制贷款的压迫，囤积农产品或金属货币则会面临死刑、焚毁房屋等严酷的刑罚。国民议会颁布法令，贩卖金银币、纸币及通过硬币差价牟利者，将被处以6年的戴铁枷监禁。拒绝接收指券者将遭受更为严重的刑罚。1794年5月，国民议会宣布对"在谈妥交易之前询问对方以何种货币支付者"处以死刑。

1795年7月底，流通的指券面值达到了14亿法郎。100法郎面值指券的价值从4枚金法郎跌至3枚，最后跌至2.5枚。到1796年2月，1枚路易金元已由最初的25法郎指券飙升至7200法郎指券。1793年至1794年的恐怖时期，罗伯斯庇尔专制政权对物价及工资实施封顶，试图遏制物价无

限上涨的趋势。该方案的大部分举措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规定的上限也屡屡被突破。尽管如此，这些措施还是暂时制止了指券的全面崩溃，保证了同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及其盟友作战的军队供给。这种做法算不上社会主义调控，只能算是紧急时期必需品的限量供给制。

18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为了破坏法国革命，对法作战的各个盟国同流亡的保皇派联手，大肆伪造指券。而此前革命独裁者已经发行了数额庞大的指券，面值已高达 40 亿法郎。法国各地犯罪团伙、流亡至敌国的保皇派以及各色各样的投机分子开始大量伪造指券，其数额相当于甚至要高于革命政府发行的数量。伪币的主要来源是伦敦。英镑纸币，尤其是 1 英镑和 2 英镑的纸币，非常易于伪造，任何一位熟练的铜版雕刻工都可以做到。1797 年至 1815 年期间，伦敦造伪活动非常猖獗，约有 313 人因为同造伪有关的罪名而被绞死。显然，其中一些雕刻工如今就受雇于流亡贵族约瑟夫·德皮赛伯爵，印制了数量极其庞大的假指券。德皮赛将这些精心刻版、印制的伪币运往布列塔尼及法国其他反革命势力中心。坚定的革命卫士路易·拉扎尔·奥什将军曾报告说，截获了 1 艘载有面值 100 亿法郎假指券的货船。

旺代及其他反革命活动中心的保皇派则在当地雇用雕刻工及印刷工自行印制纸币，上头有波旁王朝的鸢尾花纹章、狱中皇太子（即路易十七）的肖像以及“国王御制”的铭文。反叛区民众被迫接受、使用这些纸币，到 1799 年底，在法国全境革命都取得胜利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这些纸币都还有出现。

革命政府颁发了一系列法令，安德鲁·怀特所称的“经济花招”开始实施，孤注一掷地试图挽救被极度通货膨胀及造伪整得奄奄一息的指券。1796 年 6 月之后，面值在 100 法郎以上的指券都不得流通，但是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实施。还有一项法令规定，1 法郎纸币可以购得 10 磅小麦。1796 年 7 月 16 日的法令规定，对于纸币，不管是指券还是那种称为“芒达”的短期国库券，都应按照其面值来接收，人们可以自行选择交易货币，包括金币、银币、铜币。这一法令导致芒达贬值至其票面价值的 2%。

整出闹剧的高潮是 1797 年 2 月，恐怖时期之后依照新《宪法》于 1795 年成立的督政府宣告挽救货币失败，下令销毁所有用于印制纸币的雕版

工具。指券和芒达都不再是法定货币。拖欠政府的债务可以在限定时期内用纸币归还,不过纸币的价值仅仅相当于其面值的 1%。1797 年春,督政府颁布法令,宣告废除当时仍在流通的面值 210 亿法郎的指券。1797 年 9 月 30 日,督政府宣布,政府将用债券偿还三分之二的国债,这些债券仍然可以用于购买没收的地产。剩余的“合并的三分之一”将计入政府的国债“大本”,督政府将来会在时机合适的时候予以归还。

债权人被迫接收这些债券,很快,这些债券也跟指券及芒达一样迅速贬值,最后其价值仅为原来的 3%。当拿破仑·波拿巴将军在意大利及其他地方战事频频告捷时,督政府用以偿还“合并的三分之一”国债的主要是新印制的取代旧有纸币的新法郎纸币。在新的通胀压力下,新纸币也逐步贬值至票面价值的 6%。

其后两代,法国没有再发行纸币。合计面值达 700 亿法郎的指券和芒达都被扫入了垃圾堆。不管是那些本已穷困的大众还是一小撮富有人士,包括那些特别精明的商人、投机者以及成功的骗子,都陷入了破产的绝境。有些富裕人士,比如 1794 年任国民公会主席的 J. L. 塔利安,靠着自己的精明成了百万富翁。而他们的那些傀儡,那些叫嚷着要发行纸币的人,则都成了穷光蛋。塔利安安然度过了革命最后的动荡年月。他本想推翻罗伯斯庇尔,却被对方给打倒了。此后他加入了督政府的 500 人议会,1798 年还随拿破仑攻占了埃及。

革命晚期,共和派及其头面人物,如塔利安夫人,一改昔日的俭朴作风,变得像没落贵族一般挥霍无度。这帮夫人生活穷奢极侈,狂热追捧时髦奢侈品,硬通货的回归让这一切有了实现的可能。她们对自己的丈夫和情人索取无度,好穿上最最时髦的衣服,满足自己的每一个奇思妙想。在此期间,劳动阶层和靠薪水、养老金或者其他固定收入过活的人,特别是那些住在城市里的人,生活则是困苦不堪。很多人只能靠政府救济为生,救济的面包通常都是难以下咽的,那还得男女老少排着长队,通常要等上一整天才能轮上。

随着旧纸币的废止,强制借贷以及其他各种不守信的举措逐步取消后,金币、银币开始从欧洲其他地方慢慢回流。起初量还很小,只够进行一些小规模交易。随着交易需求的增加,流入法国的硬通货数量也随之水涨

船高。货币恢复稳定是个缓慢的过程，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一直到1815年拿破仑征服战争结束之后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法国的货币才算是完全稳定了下来。

革命政府统治晚期，拿破仑在奥地利及意大利皮德蒙特取得连续的军事胜利，在政界及军队心目中树起了威信。到1798年，反法联盟中，只有英国还坚持对法作战。身为征英军团统帅的拿破仑认识到，实力严重削弱的法国海军无法控制海上局势，于是谨慎地宣布放弃对英国的陆上攻击。他的意见是，尽可能地打击英国的商业和经济，伪造货币便是他理想中的手段之一，他在大革命时期已经领教到了伪币的威力。

1799年，拿破仑被任命为终身第一执政。此后法军在欧洲战场上有胜也有负。1802年，《亚眠和约》的签订终结了法国大革命战争。拿破仑掌权后，着手制定《拿破仑法典》，对法国律法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如今该法典对法国司法及社会仍有重大影响。当他着手整顿财政时，极度通货膨胀及革命期间的造伪活动导致的经济崩溃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严峻考验。未偿国债数额巨大，大部分政府部门都已破产。由于估税系统的紊乱，规模像点样的税收均无法实施。甚至连军队都已数月未发军饷了。可借到的最大一笔款项也仅仅能够维持政府一天的开销而已。

在拿破仑成为第一执政后召开的首届内阁会议上，议员们问拿破仑打算如何应对眼下的财政危机，他的回答是："我要么就不付钱，要付就只付现金（意指硬通货）。"他审慎安排了税收评估工作，筹集资金偿还国债，用金币、银币来支付一应开支，这些金币、银币中的大部分显然是用国库搜集的珠宝及其他物品熔化后铸造的。

1800年1月18日，在掌权三个月之后，拿破仑成立了国家银行——法国国家银行，以帮助法国摆脱巨额债务的困扰。法国国家银行是法国发行纸币的唯一合法机构，并且颁布严格法令：新纸币发行面值不得超过法国的黄金储备。该银行是一家私营银行，在巴黎证交所可以购得银行的股份。拿破仑妻子约瑟芬·博阿尔内的家族也是大股东之一，可以说这是在向国人担保拿破仑对自己的作为有着坚定的信念。在统治法国及大部分欧洲的那段时间里，拿破仑兑现了自己所做的大部分承诺，包括在1808年之前偿清所有未偿债务的利息。马尔丹-夏尔·戈丹于1815年至1820

年任拿破仑的财政大臣,1820年之后成为国家银行首任行长,而当初革命派要他执掌财政大权时却被他拒绝了。

在1807年同俄国及普鲁士签订《提尔西特和约》之前,拿破仑的军队转战马伦戈、奥斯德立兹、耶拿、埃劳、弗里德兰,其间只有很短一段时间拖欠过军饷。当欧洲诸国组成第一次反法同盟对抗法兰西帝国时,拿破仑面临着极度严重的财政压力,大臣们提议改用纸币。他给财政大臣的信中说道:"在我的有生之年,绝不采用无法折现的废纸。"后来政府设法弄到了足够的黄金偿付了各项主要开支。1815年6月15日,法军在滑铁卢被击败,路易十八上台(其实是获得胜利的盟军一方拥立的),法国除了庞大的军费开支外还需偿付巨额赔款,但是在法国并没有出现指券时期那样严重的经济危机。

而在使用货币作为打击敌国武器的问题上,拿破仑及其他几位19世纪早期欧洲领袖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造伪是他的秘密武器库中的一件重要法宝。正统历史学家对这个话题要么避而不谈(也许是因为缺乏相关史料),要么就是含糊其辞。不过,纸币收藏家及钱币商手头有的是证物。

拿破仑手下有一位机智绝顶的阴谋家、警察署长约瑟夫·富歇,身兼国家安全顾问及皇家情报部门主管二职,富歇和其他一些人在拿破仑的授意下伪造敌国的货币。可以肯定,拿破仑和富歇也对欧洲的造伪先例有所耳闻。欧洲在7年战争时期,奥地利和俄罗斯军队占据波兰期间,普鲁士弗雷德里克大帝便向波兰输入了大批的伪币。

1806年,拿破仑的军队占领维也纳期间,他在巴黎及意大利的秘密印刷工厂便伪造了大量的奥地利纸币。拿破仑同没有生育的法国贵族妻子约瑟芬离婚后,娶了奥地利皇帝19岁的女儿玛丽-路易斯,玛丽于1811年给他生了儿子弗朗索瓦·夏尔·约瑟夫·波拿巴。随后拿破仑显然认为伪造奥地利纸币的目的已经实现,旋即下令停止伪造。不过,在劣币驱逐良币这一古老定律的作用下,这些伪币其后又流通了一段时间。伪币同真钞唯一的区别就在于纸张的色调。1805年到1812年法军败退莫斯科期间,拿破仑的手下在巴黎及莫斯科伪造了面值为25及50的俄国卢布。尽管缺乏有力的证据,有些纸币收藏家还是认为,此间他们极有可能也伪造过英国的纸币。

来者之鉴

1991 年，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联邦储备银行分行详细研究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困境同当代经济之间的关联。该行发表了托马斯·萨根特(保守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的评论文章,将当时的货币及财政动荡归结为一场“挣脱旧秩序、构建新秩序”的斗争的结果。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时期制定纸币政策的那些人,或出于道义或出于各自代表阶层的利益,其实都不愿意让法国政府拖欠巨额债务。只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的种种实验均已失败,他们发行的纸币及有价证券已变得几乎一文不值。

法国人本应以 18 世纪早期约翰·劳时期的极度通货膨胀及货币造伪现象为鉴,可惜他们没有。他们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采取的种种权宜之计其实也预示了 20 世纪某些财政陷入困境的政府的命运。在一战中遭受重创的那些政府在战后陷入了困境,他们采取措施试图阻止通货膨胀,制造伪币的犯罪活动也随之而来,其中以 1919 年至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的魏玛德国政府尤甚,当然也包括奥地利、匈牙利、葡萄牙以及年轻的苏联。在德国和葡萄牙,一战的后果是导致法西斯上台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本书后来的章节会有述及。

当年法国理论家和革命独裁者采取的这些权宜之计同 20 世纪的货币发展及二战后出现的货币理论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革命者为自己大量印制的指券、芒达、债券提供了一个虚幻的担保物:教堂以及封建贵族被没收的土地。这样的担保能否预防纸币的贬值,纸币的管理者应当是政府还是私有的中央银行,这是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在争论的两个问题。

指券的职责从短期信贷工具演变为偿付国债的工具，最终成了典型的不可兑现纸币,仅仅在理论上可兑现,因此很快便失去了公众的信任。当欧洲的敌人向革命法国宣战时，革命领导人竭尽所能地推动纸币的需求:严格限制民众使用其他资产,尤其是硬通货,后来还将指券引入法军新征服的地区。阿道夫·希特勒也曾试图推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犹太囚犯伪造得极其精密的 1 英镑纸币——被他那些高明的财务顾问及时制止

了,因为他们认为,此举会损害欧洲占领区纳粹帝国的经济架构。

几乎所有的政治及社会变革都可以归结为21世纪的评论家所津津乐道的"恐怖主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时期正是一个突出的范例。这个时期的法国领导者因为突如其来的权力而忘乎所以，他们一边拿国家的货币和愈来愈陷入穷困深渊的社会作为试验品,一边相互屠杀,把对手送上断头台。

拿破仑是历史上最为出名、最为臭名昭著的独裁者之一,他在一个制度严密的集权国家实施保守的财政及货币政策。而在战场上,他也并不避讳通过制造伪币来打击法国的敌人。他在军事上的失败以及遭到放逐的结果终结了这一切,波旁王朝暂时得以复辟。不过法国也好,欧洲其他国家也好,都已不可能再回到拿破仑统治之前的状况了。

下一章我们将探讨:大西洋两岸经历剧烈动荡后民主的艰难曙光,以及随后的美国内战如何进一步改变了世界的货币格局。

第七章
美国内战和绿背美元的诞生

邦联政府发行货币的职责是美国公民赋予的……联邦政府参与制造伪币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有人发现，联邦政府提供大量的伪币给入侵部队的士兵，以此从本已穷困不堪的南方民众那里榨取钱财，武力进攻也许都不能造成这样的恶果。

——美国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于1862年在邦联议会上的发言

1861年2月23日拂晓，美国当选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抵达华盛顿。为躲避那些意欲谋杀他的反政府暴徒，他的专车在头天晚上趁着夜色悄悄穿过巴尔的摩，驶向华盛顿联合车站。在国会大厦附近的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车站，他坐马车径直去了威拉德酒店。酒店老板约瑟夫和亨利·威拉德是来自佛蒙特州的北方人，他们给他安排了酒店最好的套房。

很快，威拉德酒店便在实际上担当起了国会大厦的职责：联邦那些大人物的指挥部，也是各种或合法或地下的商人、战争投机家、联邦和南部邦联的特工人员的豪华落脚点，他们齐聚在此，完成各种交易和事务。与此同时，这里还汇集了很多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漂亮能干的女性。她们一方面是间谍，想方设法从枕边人那里套出政治、军事机密情报，同时也是传递伪币和有价证券的秘密信使。

伪造的南部邦联纸币和有价证券在波托马克河两岸被走私，进入反叛的南方各州。伪造的纸币和有价证券，特别是债券，在北方自由交易，跟南部邦联的纸币一样，出口到欧洲，尤其是伦敦市场上售卖。在南方，入侵的北方军队用伪造的纸币来支付给间谍酬劳、换取硬币及贵重物品，更重

要的是要给建立在棉花和奴隶劳动基础上的南部农业经济以致命打击，进而在战场上置其于死地。

序曲：货币盛宴

美国独立战争到美国内战期间是伪币猖獗的年份。民众对新独立的国家纸币的信任度几乎为零。流通中的面值不等的纸币数量极其庞杂，令人眼花缭乱：据估计，共有3000到5000种。发行这些纸币的有各州银行、市立“银行”、贸易公司、商店店主以及个人。面值低至3分，高达1000元，到了19世纪，还出现了面值高达10000元的钞票。跟之前的大陆币和法国指券一样，这些纸币数量太过庞大，无法辨识哪些是“真”币（也就是由特许的州立或地方银行发行的纸币），哪些是随意印制的。

1861年，内战爆发前夕，有1600家州立银行自行印制纸币。伪造钱币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非法之徒通过贿赂或者从相关执法部门手中购买许可证，自行开设银行，印制纸币。那些造伪者雇用印刷工在伪币上印出银行的印记。1787年的美国《宪法》没有赋予联邦政府发行纸币的权力，联邦政府只能够发行一些纸质票据和凭证，有些可以生息，有些不可以，不过都不可以流通。

一直到20世纪，纸币（不管真伪）同金币及其他硬币之间的激烈竞争一直都是影响美国战时资金供给的关键因素。竞争除了导致印刷技术的改良之外，同时也是对抗国外国内造伪者的一个关键。内战前期及内战时期也不例外。

1792年的《铸币法案》确立美元为美国货币的基本单位，建立了货币的双金属标准。政府得到授权，以1美元对24.75克的价格购入黄金，白银则是1美元购入371.25克。法案规定用金银合金来铸造金币、银币。法案颁布后，数代之中都很少有美国公民将自己的黄金、珠宝或其他物品交出来用于造币。跟历史上绝大多数社会一样，美国社会也开始囤积黄金。究其原因，是因为白银同黄金的官方比价是15:1。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沙姆法则再次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在公开市场用黄金购买白银，然后把白银卖给美国铸币厂，就可以获得相当丰厚的利润。

1933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取消了金本位币制。在此之前的数代美国人都很少使用金币，而是把金币存起来。造伪者似乎也不染指金币，因为美国货币是建立在价值不甚稳定的白银的基础之上的。1846年，美国为扩张领土同墨西哥交战，詹姆斯·波尔克政府苦苦维持战争所需国库货币储备，由此开始以硬币和可兑换为金银的纸币来付账，并要求人们也这样做。不过，数百家州立银行及冒进的“私人”银行仍然不计后果地发行自有纸币。内战爆发1年后的1862年，半数纸币被认定是伪币，或者干脆一文不值。

内战之前，公众要求印发小面值纸币的呼声持续高涨。有些不怕麻烦的人印发了3至50美分面值的纸币，邮票也被用于流通，这两者的伪造品也是泛滥成灾。当时出现了很多指导人们判别真钱假钱的小册子，1839年比克诺尔所著的《发现伪币》便是其中之一。该书罗列了20种莫须有银行发行的纸币、43家其纸币已不值一文的银行、54家破产银行以及254家发行纸币遭到伪造的银行，对1727种伪币进行了描述。面临伪币威胁的各州立法机构开始给反伪币组织分派资金。内战爆发前，纸币造伪风潮愈演愈烈，而在内战期间，针对敌方及己方货币的造伪不单是有利可图的好营生，还是一件威力强大的武器。

战时资金：联邦篇

1860年11月，共和党人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第16任总统，他在施政纲领中提出反对奴隶制向西部边疆扩展，因此南部蓄奴各州一票都没有投给他。

1860年12月20日，南卡罗来纳州发表声明反对林肯当选，率先宣布退出联邦。尽管联邦政府徒劳地试图通过协商来挽救联邦，比如1861年2月4日在华盛顿召开了“和平大会”，还是难挽狂澜。当年1月至5月，密西西比、佛罗里达、亚拉巴马、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弗吉尼亚、阿肯色、田纳西、北卡罗来纳等州都相继脱离联邦。

2月4日，正是当年华盛顿召集和平会谈的那一天，意图脱离联邦的各州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集会，成立了美国南部邦联临时政府。2月8

日,杰斐逊·戴维斯当选为邦联总统,亚历山大·H.斯蒂芬为副总统。邦联攫取了联邦在南部的土地和财产。4月10日,邦联军队要求联邦军队撤出查尔斯顿港的萨姆特要塞。4月12日、13日,南卡罗来纳州民兵用大炮轰击联邦军队,罗伯特·安德森少校为首的驻防部队抵抗两天后,终于被迫投降,而此时,联邦海军派出的一支救援部队刚好抵达。

4月15日,林肯号召7.5万名志愿者为联邦效力3个月,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北方具有压倒性的优势:23个州,近2300万人口,对手是11个州,白人人口只有区区500万,其他则是享受不到任何民主权利的奴隶(以及很小一部分的自由黑人),人口不详。北方的经济实力主要是银行业、基础设施制造业、发达的铁路交通以及分布广泛的电报网络。南方经济主要依赖于棉花种植业,1861年4月19日联邦海军正式封锁南方各个港口,极大地制约了南方棉花的出口。5月13日,戴维斯反叛政府得到一大鼓舞:英国承认南部邦联为交战国,此后5年中,此举为大西洋两岸众多商人、银行家、制造伪币者、偷越封锁线的船只大开便利之门。

林肯下令联邦进入备战状态,当时国库只有20万现金。他和他的顾问团,包括精明的财政部长萨蒙·P.蔡斯,起初都认为战争很快便会结束,不致过度耗费包括税收、关税、印花税在内的联邦财政收入。弗吉尼亚州战场上的第一次布尔仑战役颠覆了林肯原先低调的作战计划。1861年7月21日,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的部队被皮埃尔·博尔嘉德将军任总指挥的邦联军队穷追猛打,最后逃回华盛顿时已是溃不成军。林肯和蔡斯这才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并不是一次速战速决的警察行动,而很可能是一次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漫长战争。到了现在,联邦政府急需筹措现金给联邦的志愿兵发放军饷。蔡斯便着手向北方各家银行借款,发行战时公债。

1862年春,在联邦军队败多胜少的形势下,蔡斯在林肯的授命下勉强决定印发纸币。4月,他敦促国会通过了印制绿背美元的重大法案,绿背美元就是正面为黑色、反面为绿色油墨的美钞。第一版印发了1500万绿背美元。这些美钞是法定货币,可用于偿还各种公共及私人债务,不可以偿付进入美国的货物关税以及欠政府债务产生的利息。秋季印发了第二版1500万美元,包括几百万美元的1元钞。用于偿付政府债券的是黄金,新

纸币源源不断印发后,囤积黄金的现象进一步加剧。国会的这个法案同时还许可发行5亿美元的政府公债。卡尔·桑德伯格在其经典著作、四卷本的《亚伯拉罕·林肯:战争年代》中指出,政府要卖给"民众"了。当然,政府其实是作价5亿美元把自己卖给了投资者和银行。林肯告诉蔡斯,因为他"对货币缺乏认识",所以不会不懂装懂。不过蔡斯是懂的。蔡斯借助自己在商界的广泛人脉来实施资金筹措方案。他心里很清楚,必须将方案予以实施,因为否则的话,"钱就维持不了多久,没法给那些斗志低落、思乡心切的士兵发饷了"。

在这整个过程中,蔡斯和其他北方决策者共有的那些货币理念拖了他的后腿。他本能地不信任货币以外的任何支付形式,情愿从国库搬出黄金来付款,而不愿意用支票在账户之间转款。刚开始的时候,蔡斯及其同僚还很不情愿利用纽约、波士顿、费城现有的私人银行来存放联邦基金。不过,因为债务不断增多、硬币短缺以及通货膨胀的威胁,林肯和蔡斯终于还是要寻求新途径来增加税收、借入资金。蔡斯开始委托实业巨头及费城银行界头面人物杰伊·库克来管理战时公债的销售事宜。库克精心策划了一次营销活动,通过报纸广告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并派出一支2500名特派记者队伍挨家挨户去做动员,说服100万的北方人(涉及大约25%的北方家庭)购买了公债。销售额高达30亿美元,在当时的确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此举开了美国成功发行战时公债的先河,到了20世纪,美国在历次战事中屡次采用同样的策略。民众用新发行的绿背美元购买战时公债,不过利息则是用黄金按照战前的金价折算的。

北方各州对于新的绿背美元的态度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蔡斯意识到,民众对于绿背美元普遍缺乏信任。他告诉林肯及其他人:"有些人、有些机构拒绝接收,也拒绝使用绿背美元来付账。"

林肯担心,新美元的发行会进一步加剧本已非常严重的造伪威胁。他告诉蔡斯:

> 我们发行的纸币显然都没有防伪保护措施,我想不出来在纸币回收之前如何鉴定真伪,而且即便到那个时候,真品跟仿品之间也无法分辨。

国会成立了联合委员会,研究如何在纸币印制过程中加入安全措施。不过,纸币安全性真正的改进进度非常地缓慢,一直到内战结束后几十年仍在继续。

绿背美元折算成黄金白银的价值随战事变化而起伏:邦联胜则跌,邦联输则涨。1863 年 8 月,北方军队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取得胜利后,1 绿背美元可换 82 分硬币,到了 1864 年 6 月南方取得几次胜利后,又跌至 35 分。1862 年 6 月、7 月,在波士顿和纽约,所有的 25 分、10 分和 3 分银币都销声匿迹,因为硬币都被所有人持在手中。多数硬币都流到了加拿大。1858 年,加拿大也施行了十进制货币单位元。蔡斯建议用邮票来满足对于小面值货币的需求。这个提议最初遭到美国邮政部长蒙哥马利·布莱尔的反对,布莱尔很担心自己的邮局会被小摊小贩、骗子、投机者挤得人仰马翻,北方各个城市里这样的人多的是。但是,到 1863 年春,邮局已经发行了 2000 多万美元的邮票货币,财政部却一直没有付款给邮局。这些邮票被士兵们塞在靴子里、揣在口袋里,拿来买酒、赌博、嫖妓。

1862 年 3 月,当时绿背美元还是一种未被广泛接受的新生事物,一帮纽约富人担心联邦会被颠覆,甚至害怕敌人会从海上长驱直入。他们组成代表团,请求联邦资助 1 艘炮艇来保护他们的城市。林肯对此的答复是:

> 先生们,我无法满足你们的要求……政府的信用已经陷入了低谷。绿背美元只能换顶多 40 到 50 分硬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能有诸位财富的一半,我将会造 1 艘炮艇,捐给政府。

1862 年底,3 枚美元金币能够买到 4 绿背美元。

1863 年 5 月,绿背美元发行 1 年多以后,林肯故乡伊利诺伊州的《局县爱国者》报和其他数百家报纸刊登了一幅名为"亚伯·林肯的情人节礼物"的漫画。漫画中,总统收到的情人节礼物是一只美国鹰,这只威严的鸟儿正忙着啄食金币。桑德伯格用优雅的笔触形容道:"鸟儿距离头部最远的部位是一叠'绿背',那些黄澄澄的金币似乎是神奇地变成了这种东西。"林肯把漫画拿给蔡斯看,蔡斯并不觉得有趣,还说他愿意悬赏100 万

美元找出那位匿名漫画家。林肯说这个主意“似乎很民主”,不过如果蔡斯告诉他应该先用哪一堆钱,他也许能做出更好的判断。蔡斯的怒气依然没有减退,林肯开导他说:

> 哦,不要介意,不要介意。等战争结束后,我们就可以补救了,把鸟儿倒个个儿,让它吃进绿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到1862年初,林肯政府及其高级军事将领都清楚地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挽回北方在情报方面的败局,要赶紧填补有关邦联军事、政治及经济情报的空白。此外还必须遏制对绿背美元愈演愈烈的造伪行为。

美国第一家营利的私人侦探所是苏格兰移民艾伦·平克顿在内战前开设的。平克顿来到美国后,在位于芝加哥西部的伊利诺伊州邓迪镇经营他父亲在苏格兰从事的行业:生产箍桶用的木头箍。在一次外出采集木材原料时,平克顿无意中进入了一帮游荡的制造伪币者的露营基地。观察这帮家伙好几天后,他将此事报告了县治安官,随后带了一批武装人员将这帮人逮了个正着,当时他们正试图把大量伪币埋起来。当地的镇议会就请平克顿去实施一次诱捕行动,对象是一个名叫克雷的有制造伪币嫌疑的地主。平克顿联系上克雷的代理人约翰·克雷格,提出要购买面值4000美元克雷炮制的伪币。在一家饭店的酒吧里,平克顿把125美元真钞交给克雷格,从对方手中拿到一大把伪币,此时两名便衣从天而降,抓住了克雷格。县治安官随后给了平克顿一份永久工作:请他担任调查员。平克顿欣然接受,随即开始了终其一生的侦探生涯。内战时,他成了联邦的首席间谍。

间谍与反间谍

就在1861年3月4日林肯总统就职典礼的前夕,到巴尔的摩侦查案件的平克顿听到一个消息:有人要暗杀新总统。平克顿向林肯提出了警告,林肯旋即改变了行程。内战爆发后,林肯召平克顿到华盛顿,请他在华盛顿特区设立秘密情报局,作为对他的忠诚、勇敢及远见卓识的奖励。当

时华盛顿的威拉德酒店及其他一些场所都成了南方邦联散布言论、实施颠覆及间谍活动的温床。把平克顿推荐给内阁时,林肯发现军队总司令、老将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拉法耶特·贝克。后者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家伙,之前在俄亥俄州当律师,曾采用大胆的策略一举摧毁了旧金山码头的帮派,赢得了"罪犯克星"的美名。

林肯在两个人之间要做出最后的取舍。在此期间,负责防卫华盛顿的波托马克部队指挥官乔治·麦克莱伦将军招募平克顿从事情报工作。1861年温菲尔德·斯科特退役后,林肯任命麦克莱伦接替斯科特总司令之职。麦克莱伦一直任用平克顿和他的侦探事务所的几位侦探担任谍报工作,直至麦克莱伦因指挥不力被林肯罢免。他们的办事处设在华盛顿的I街。

年轻迷人的凯特·沃纳便是其中一位侦探。她搜集到了大量有关军事行动的情报。她还发现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就是在未来刺杀了林肯的那个家伙,是个同情南部邦联的危险分子。还有一位成功的联邦女间谍是伊丽莎白·贝克,她设法打入了位于她家乡弗吉尼亚州里奇蒙德的卓德嘉钢铁厂,将邦联海军实验潜艇的图纸带回去给了平克顿和海军部长吉蒂奥恩·韦尔斯,这样的设计在当时尚属首创。平克顿的手下蒂莫西·韦伯斯特则负责监视南方秘密社团"金环骑士会",这个社团是南方的间谍机构。平克顿还让他16岁的儿子威廉在华盛顿周边执行情报任务。威廉参与了有史以来的首次空中侦察任务:利用热气球观察弗吉尼亚州伯托马克河以南邦联军队的动向。

不过,平克顿事务所侦探的反间谍活动取得的最大成功当属揪出了邦联间谍罗斯·奥尼尔·格林豪,这位迷人寡妇的亡夫是一个支持奴隶制的编辑。格林豪在社交界长袖善舞,加之妹妹嫁的又是已故总统詹姆斯·曼迪逊的遗孀多莉·曼迪逊的侄子,所以她能够结识到众多要人名人,还常常在位于十六街、紧邻白宫的家中举办宴会。在她的客人名单上有林肯的前任詹姆斯·布坎南总统、国务卿威廉·H.西瓦德、参议员亨利·威尔逊。她通过邦联陆军通信兵的密码,将联邦众多重要军情发送给里奇蒙德的邦联间谍头目托马斯·乔丹。

1861年8月23日,格林豪夫人跟女儿一起散步时,平克顿的手下逮捕了她。侦探们在她的家中找到了密码信件、图表、南方的联络人地址、一

本记录了她同邦联其他间谍联络往来的日记。因为当时所崇尚的骑士风范，也可能是因为审讯太过繁琐，格林豪跟她的女儿一直没有被处以绞刑。值得一提的是，陆军部还提前释放了她，也许是因为那些对她有着不正当情感的官员的关系。她被押送回里奇蒙德，军方认为在那里她不可能再对联邦带来损害。这真是大错特错。

蒂莫西·韦伯斯特向联邦提供了许多非常宝贵的情报，他提供假情报给巴尔的摩的金环骑士会，提供给平克顿的则是有关南方的关键信息。有段时期，他在里奇蒙德赢得了很好的声誉，邦联国防部长尤达·P. 本杰明还任命他担任手下情报网络的一名顾问。平克顿知道格林豪夫人应该已经知晓了韦伯斯特的真实身份，当他获悉格林豪夫人已经获释并被送往反叛政府首都时，惊恐不已，赶忙派出一位侦查员前往里奇蒙德。这位侦查员赶到时，一切都已无法挽回：格林豪夫人指认出了韦伯斯特和他的另一名同事，他们在宾馆被捕，邦联议会将他们按间谍罪处以绞刑。

此次灾难终结了平克顿的间谍生涯，帮助拉法耶特·贝克更快地得到了任命，成为林肯的新任情报局局长。贝克花费大量精力实施北方的货币造伪行动，并安排信使或间谍，尤其是女性，到南方去。这些频繁去往南方的人员中，有很多人把邦联伪币注入南方经济当中。

平克顿在北方干回了侦探的老本行，尤其致力于追查那些哄抬物价的联邦的不法供货商，同时继续同那些伪造纸币及债券的人作斗争。有一件事情一直令他耿耿于怀，1865 年 4 月 14 日这天负责总统安保工作的人不是他——就在这一天，林肯签字确认特勤局为常设机构，保护美国货币及总统的安全。当天晚上，正在看戏的林肯被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刺杀。

战时资金：邦联篇

战争初期，南部采取了跟北部大相径庭的财政策略。战争爆发前，南部各州流通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数以千计的纸币，而在“只顾一己私利、对其他一切不管不顾”的人生哲学的驱动下，有很多人在大肆伪造钱币，南部各州深受其害。南卡罗来纳州民兵炮击查尔斯顿海港的萨姆特要塞，揭开了战争的序幕。仓促成立的邦联政府先是设在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后于

1861 年 5 月迁至里奇蒙德，他们没有负责征税的官僚机器，税法也不像北部那样深入人心。硬通货和纸币都不是很充足，南方资产的主体是土地和奴隶，以农业为主的经济非常容易受到通货膨胀的冲击。

议会提出了多个通过征税提高财政收入进而为战争提供资金的方案，事实证明效果都不是很尽如人意。1861 年，邦联议会下令征收一项关税，不过在 4 年战争期间仅仅带来了 350 万美元的收入。议会还下令对房地产及个人产业征收小小的 5%的所得税，但是里奇蒙德政府只能依赖各州来收取这项收入。跟独立战争期间一样，多数州根本就不会去收税，他们通常从民众那里借钱，或者干脆多印些本州纸币来完成配额。

杰斐逊·戴维斯总统的财政部长克里斯托弗·曼宁杰是一个德国移民，1803 年出生在德国符腾堡的奈兴根，曾在查尔斯顿学习法律，后来入选南卡罗来纳州议会，成了邦联《宪法》的主要起草人。尽管反叛政府掌握了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的联邦铸币厂，不过铸币厂的保险箱及金库中只有数量极少的金块，因此他们并没有铸造硬币用于流通。据钱币史学家道格拉斯·B. 鲍尔考证，他们只铸造过 4 枚有特殊用途的 50 分硬币。

> 这些硬币送到了几位官员手中，如今都收藏在博物馆里，其中第 4 枚于 1865 年在杰斐逊·戴维斯总统的行李中被人发现，如今价值约 5 亿美元。

在南部各州脱离联邦后，民众马上开始持有硬币，包括古老的西班牙银元以及其他各种 18 世纪的硬币，南部银行开始纷纷倒闭。邦联政府马上联系现有的纸币印制厂，如新奥尔良的南方银行纸币公司(其实就是纽约美国银行纸币公司的分公司，邦联成立后仓促改了名)和里奇蒙德的海耶·路德维希公司，让它们印发纸币。

为阻止通货膨胀，政府采取了孤注一掷的实验，试图官方限定商品的价格上限。这绝对是个可悲的失败举措，以后魏玛共和国的遭遇也证明了这一点。南方主食豆子的限价，从 1863 年 5 月 1 美元 1 磅升至 4 美元，到战争结束时，已飙升至 30 美元。通货膨胀的连锁效应随之而来：政府发行

纸币越多，物价就越高，而物价越高，对纸币需求越多，就越需要印制纸币。据估计，南部邦联发行的纸币在 10 亿到 20 亿之间，这还不包括债券以及各个州、县、市和私人公司发行的纸币。甚至连北美土著居民切罗基族都发行了自己的纸币，可折换邦联纸币。

戴维斯及其内阁希望，欧洲的贷款（主要是英国的贷款，英国是同情邦联的）以及在国外深受欢迎的长绒棉的销售能够帮他们支付军费、找补发行纸币的损失。战争初期，联邦海军严密的海上封锁阻碍了棉花的出口。不过西班牙的古巴殖民地是一个很好的以物易物的市场，南方的棉花在这里可以换到耐用物资以及食糖等食品。随后联邦海军进驻古巴海域，在外交上向西班牙施压，并扣押了十几艘穿越封锁线的船只。到 1863 年秋季，哈瓦那港口几乎已经看不到邦联的船只了。

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有很多，除了联邦士兵、间谍走私进来的伪币外，还有邦联内部的造伪行为，以及本地纸币种类太过繁杂的现状。邦联议会试图发行长期债券收回短期债券以对抗通货膨胀。1863 年 3 月 23 日，议会下令逐步削减民众可用纸币购买的债券的利息。不过，该法令同时还授权财政部长梅宁格每月发行 5000 万美元的纸币。总之，在急速加剧的通货膨胀下，债券投资越来越无利可图了。

最初发行的邦联纸币中有一部分采用了高压凹版印刷工艺，如今包括美国财政部在内的绝大多数拥有良好信誉的纸钞印制者用的都是这种工艺。凹版印刷使用的是雕有各种图形的金属板，耗时耗力，能创造出“石质平版印刷通常无法实现的细腻精确的效果”，此后大部分邦联纸币采用的都是石质平版印刷工艺。这类纸币质量良莠不齐，图像比凹版印刷纸币要粗糙得多，不过印刷速度提高了。南方邦联更看重的是高速度和数量，而不是质量和凹版印刷那缓慢得多的印刷速度。

同一种面值纸币会有多家印刷工厂的不同设计。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多数印刷厂都采用了蔓叶花饰的设计，另外，油墨和纸张时有短缺，会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这一切都意味着：不管是梅森-迪克森线（南、北方的分界线）以南还是以北的造伪者的工作都因此而容易了很多。这样的结果自然也就无可避免：梅宁格开始陆续收到报告，称众多邦联伪币正在流通。有一些就是“拿木头雕刻而成的电铸版粗制滥造出来的”。不过，大多数

伪币都是平版印刷，有一些的质量甚至比同是平版印刷的真币还要上乘。

造伪者的天下

战前，美国货币造伪的主要中心在纽约、费城和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造伪者的目的纯粹是为了一己私利。战争爆发后的造伪行为除了私利因素之外，还有破坏对方经济的考虑在内。到1862年，《纽约时报》撰文推测，林肯对于绿背美元的忧虑正在成为现实——所有流通纸币的80%都有了伪币版本。在更易伪造的新版海耶·路德维希版邦联纸币开始流通时，梅宁格向国会提议制定法律，对伪造邦联纸币者处以死刑，这一提议过了1年多才获得批准。

1862年8月20日，在查尔斯顿的邦联助理财政部长B.C.普雷斯利发电报给梅宁格，称当地有一种50美元面值的伪币太过猖獗，银行出纳“拒收该版50美元纸币，因为(伪币)同真币的区别太不明显了”。查尔斯顿，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萨凡纳、奥古斯塔，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的财政部工作人员及银行家的报告蜂拥而至：高品质的20、50、100美元伪币进入流通。梅宁格立即召回所有这三种面值的海耶·路德维希版纸币。邦联货币专家乔治·B.特雷默在报告中指出，某些地区对货币不信任及拒收，导致了“公众、商人及银行家中爆发了货币恐慌。人们不再接收这几种纸币，有些情况下干脆拒绝接收所有邦联货币”。

梅宁格打算用一种利息为6%的中期有息证券取代召回的纸币，等有了纸币后再用带息中期国库券逐步交换这种证券。战争的第一个年头，钱荒非常严重，梅宁格也建议在伪币上加盖“有效”印记，然后重新投入流通。这两个提议都没有能行得通。邦联议会如今高度关注的是被俘的联邦士兵及返乡的邦联战俘身上夹带的伪币所带来的影响，于是制定了新法令：“对伪币制造者及携带者”处以3到10年的监禁；处5000美元以下的罚款，“或者是绞刑”。

首届邦联议会的第二次会议上，议员们针对此项法令展开了辩论，相关记录显示，围绕北军造伪一事的辩论非常之激烈。有一位议员称：

> 大量此类伪币已经流入了我们的银行……北军所到之处……都散布了这些伪币……(这是)对我方政府最具破坏性的打击行动。其目的是彻底毁掉法定货币的信用……对这些不知廉耻的北佬恶棍，不管处以什么刑罚都不算冒进、草率……他们的种种恶行……跟他们的政府是同出一炉的。

弗吉尼亚州各家报纸报道，在卡尔佩帕县，北军士兵几乎买断了一位乡间商人的所有货品，用的是

> 联邦印制的邦联伪币……他们披着士兵的外衣，其实是一群奸诈的恶棍。他们不仅仅手里拿着武器，口袋里还揣着假钱。

1862年8月18日，梅宁格向国会发言人托马斯·S.柏科克透露：

> 为了在我们这里散布假钱，他们显然正在通过战俘或叛徒开展有组织的行动；我们还发现了广告印刷品，费城切斯特纳特街那个地方可以向订购者邮寄假钱，数额不限。

此处提及的切斯特纳特街指的是北方最具野心的一个造伪者的店铺所在地，这个人有办法让自己的伪币通过官方或非官方渠道大量进入南方。此人名叫塞缪尔·柯蒂斯·阿伯翰，1819年2月2日出生于佛蒙特州的蒙彼利埃，在纽约、里奇蒙德及南部其他城市长大、工作。他在美国海军服役了很长一段时间，其间还曾到国外执行出海勤务，1845年退役，定居在佛罗里达州彭萨克拉。1849年淘金热期间，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参与了众多冒险活动，后来又在费城出了一段时间的报纸，最后终于在费城安定了下来，开了一家报纸文具店。1862年，他将店面迁至切斯特纳特街310号，后来卖了店铺，自己又搬到了第八街南25号。他以后的工作就是在第八街的店铺里售卖各色各样的货品：从专利药品到香水到“爱国”战时文具。

1862年2月24日，阿伯翰留意到，当天的《费城探寻者报》被抢购一空，其原因是头版上有一幅邦联纸钞的图像，人们购买这份报纸，是为了

将上头反叛政府的纸币图像留做纪念。阿伯翰自此开始了他为期 18 个月的造伪者生涯。他从《费城探寻者报》以及纽约《莱斯利周刊》那里搞到了印制纸币的电铸版，然后便开始印制南方纸币的纪念版，“批发零售兼可”。他还用“高于票面价值的黄金收购南方货币的新样本”，得到这些样本后他就可以对其进行复制和销售。此后他还进一步扩大了业务范围，供应印在高品质印钞纸上的钞票，上面没有他自己的商标，却有背书签名和序列号。里奇蒙德的报纸开始抨击阿伯翰这个“无耻的北佬”，刊载辨识他的那种伪币的方法。战后阿伯翰在一封信中回忆道，他当时听说田纳西州的邦联议员亨利·S. 弗特在邦联议会上说，阿伯翰对邦联造成的破坏“超过了整个联邦军队”。在同一封信中，阿伯翰还写道，他听说杰斐逊·戴维斯总统悬赏 1 万美元缉拿他，“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南方人眼中另一个北佬重犯是纽约的温斯罗普·E. 希尔顿，他在曼哈顿斯普鲁斯街 11 号经营一家印刷所。不过，里奇蒙德的邦联情报人员精心策划了一次诱捕行动，把他给整了。此次行动也许算得上是整个内战期间安排最周密，也是最成功的一次行动了。得知阿伯翰在费城取得的成功之后，希尔顿于 1862 年秋季伪造了他自己的邦联伪币，他称其为“摹本”，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称号跟阿伯翰所谓的“纪念币”一样都是一个很好的委婉语。希尔顿于 1862 年 10 月至 1863 年 4 月在《哈泼周刊》上刊登广告，吹嘘自己的伪币“同真币毫无二致，只要真币能流通，那么他的这些杰作肯定也没问题”。希尔顿的伪币质量确实很好，阿伯翰不得不降价以应对竞争。

直到 1863 年 12 月 16 日为止，希尔顿的印刷机几乎从来没有停过。这天，执法官罗伯特·默里率一队联邦警察突袭了希尔顿在斯普鲁斯街的店铺，逮捕了希尔顿。1863 年 12 月 31 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他们搜出了面值 100 万美元的邦联伪币、600 万美元的邦联债券，还有模具、印刷机、车床等等所有雕版及印刷所需的工具。希尔顿被收押至纽约拉法耶特要塞监狱。

不过，事情何至于此呢？希尔顿的所作所为其实可以帮助联邦军队加剧南方的通货膨胀、剥夺南方的产业、破坏南方民众对邦联纸币的信任，难道联邦政府真的打算阻止这样的行为吗？里奇蒙德的《每日快报》于 1864 年 5 月 10 日对此事予以了揭露，特雷默据此进行了全面的调研，得

出了有信服力的说法:差不多在希尔顿刚开始行动的时候,反叛政府就已经留意到了他,邦联特工安排了一次巧妙的诱捕行动,让联邦政府自己逮捕了希尔顿,让他无法再有作为,从而消除曼哈顿这位对邦联大业造成威胁的"印刷工"。

特雷默说,整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希尔顿着手伪造邦联纸币时,纽约城内到处都是南方间谍和同情南方的人(这种人被称作"铜头蛇")。南方间谍留意到,报童叫卖5分钱一张的100美元邦联伪币其源头是希尔顿位于斯普鲁斯街的店铺。很多伪币上还有或伪造或真实的邦联登记员和司库的签名。这些钱的买主是那些打算到南方去的人。到南方后他们跟当地人私下达成交易,实施洗钱,或者干脆就把钱花掉。南方间谍发现,希尔顿同一个叫乔治·H.布里格斯的人有秘密交易,布里格斯以前住在亚特兰大,后来到北方来搜罗伪造的债券拿到南方去售卖、流通。特雷默说,他的行动非常成功,以致后来

> 南方到处都是假钱……最后几乎彻底毁掉了邦联货币,邦联政府被迫销毁原有印版,召回货币,重新印刷新币。

希尔顿以此给了邦联以沉重的打击。邦联政府拿出对付阿伯翰的方法,也派了一名间谍到纽约去阻止他的行动。

其实,希尔顿还曾跟邦联间谍达成协议,印制真的邦联纸币和有价证券,这些纸币和证券可以在国外,尤其是英国市场上,换到金币、银币等等各种具有购买力的东西。特雷默认为,希尔顿极有可能也伪造了联邦的纸币,只是缺乏确凿的证据而已。3位联邦密码专家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破译了联邦政府截获的加拿大一个邦联间谍发给纽约同事的密电,其中提到了希尔顿的活动。联邦政府对希尔顿伪造邦联纸币的行为也许是故意视而不见,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伪币可以帮助削弱南方的实力。但是,当他的作为开始威胁到联邦财政时,他们就采取行动了。

在北方发起的攻势中,伪造货币尤其伤害南方的自尊。邦联纸币富有艺术感,描绘了老南方乡间的各种植物以及南方的英雄和领袖。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银行家、商人和普通老百姓身上,这种传统表现得尤为强烈。当

年托马斯·杰斐逊从拿破仑手中花1500万买下路易斯安那州后，法语及法国亚文化在此地又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1833年，新奥尔良成立路易斯安那国民银行，发行了设计非常华丽的纸币，面值最高为1000美元，其流通范围最北到了匹兹堡，密西西比河内河船上的赌徒和其他主顾用的一直都是这种钱。

这其中，10美元面值的纸币流通最为广泛。跟路易斯安那州多数印刷品一样，10美元纸币一面印着英文（“Ten”），一面印着法语（“Dix”）。在纸币流通的广阔的南部和西部地区，人们将10美元纸币称为“迪克西(dix)”，当时这种纸币的信用远远超出了其他各类纸币。在北方乘汽船旅游的人往往会说他们去南方的目的是“挣迪克西”。跟其他纸币一样，“迪克西”也难逃被大肆伪造的命运。

一位北方人在新奥尔良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南方优美的田园风光给了他灵感，于是他谱了一支曲子，名字就叫“迪克西”，在纽约机械音乐厅首演。内战爆发后，邦联的阿尔伯特·派克将军又填上了富有爱国主义的歌词：

我希望站在满是棉花的土地上，
古老的时光难以忘怀，看吧看吧
尽情地看吧，迪克西的土地

歌词温婉的《迪克西》成了南方的战时圣歌和行军曲，“迪克西”也成了最富感情色彩的形容邦联的词，一直沿用至今。内战结束一个多世纪之后，乐队合唱团的罗比·罗伯逊也写了一首歌，描述了精疲力竭的罗伯特·E.李总司令在里奇蒙德投降的那个夜晚，歌名是《他们放倒老迪克西的那一夜》。

贝克上校、哈瓦那女士、美国财政部的深夜狂欢

拉法耶特·贝克上校继艾伦·平克顿之后执掌情报局，此后便一直是北方情报工作及反间谍行动的实际负责人。有关这位仁兄在华盛顿威拉

德酒店种种奢靡行径的流言甚嚣尘上。卡尔·桑德伯格在《亚伯拉罕·林肯:战争年代》说贝克是“黑社会霸主”,因为他同北方各犯罪团伙都有广泛的联系,而且还负责指挥那些间谍,特别是女性。到1863年底,贝克手下有了1000名核心间谍,此外还有2000人受命于他执行不定期的任务,男女都有。他对形形色色的坏蛋及忠于自己的人都了如指掌。白宫工作人员威廉·O.斯托达德负责处理总统的往来邮件,很有可能同时也是林肯的智囊。此人曾经说过,任何在华盛顿滞留过的“可疑人物”在贝克那里都有记录。

贝克的祖父李曼姆博·贝克是独立战争时期伊桑·艾伦为首的佛蒙特州民兵组织格林山兄弟会的成员。李曼姆博的孙子,就是我们这位贝克仁兄,先是到过东部,后来又去了西部,再后来又加入了治安维持会。当时的旧金山没有法纪,他们维持治安用的是大棒而不是软绵绵的胡萝卜,尤其是在1856年整治那帮桀骜不驯的爱尔兰移民的时候。因为早期在南方的间谍业绩,贝克获得了林肯的战争部长埃德温·M.斯坦顿的赏识。埃德温将他提拔为准将, 不过包括多数历史学家在内的大部分人还是习惯称他为“贝克上校”。

当时文献中对贝克的描述是“一头红发、雪貂一样的眼睛”。跟其他许多特务头子一样,他也是出了名地无视那些被钉梢、被逮捕、被审问的对象的人权。他的指挥部位于宾夕法尼亚大街217号,在他的管理下,这里越来越像个治安团体组织。他在公共场合时经常戴着一枚胸章,上头戏剧性地刻着一句箴言:“叛国贼必亡。”他也取得了一些影响深远的成就,包括建立了全面的美国罪犯档案以及罪犯头像库。

贝克的主要职责是推进邦联伪币在南方的流通。对此,他有了充分的准备。据贝克自己描述,就在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任命他掌管联邦情报部门后不久,他就被捕了,当时他在敌后距离前线大约50英里的地方。抓住他的那些邦联士兵怀疑他的身份, 并且怀疑他在联邦军队中也许是个重要人物,于是把他径直送到在里奇蒙德的杰斐逊·戴维斯总统那里。当时贝克用的是他众多化名中的一个——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的塞缪尔·穆恩森,穆恩森确有其人,是贝克在加利福尼亚州结识的。

戴维斯派助手去找个诺克斯维尔人来证实“穆恩森”的身份,贝克就

在他的办公室里等着。很快,一位布洛克先生的名片被递了上来,戴维斯让布洛克本人进来。贝克居然认出了布洛克,让布洛克大为诧异。不过布洛克也马上认出了老朋友穆恩森,他们是年轻时候在加利福尼亚认识的。贝克认真听着布洛克拉拉杂杂地扯着在加利福尼亚的那些美好时光,并想方设法给出了让布洛克和戴维斯都满意的回答。随即戴维斯命令释放"穆恩森"。不过,当他往外走的时候,听到有人大声喊着:"是你啊!贝克!"贝克闻言惊恐不已,原来12年前贝克坐渡轮时救了一个落水的孩子,现在叫他的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他认出了贝克。贝克告诉对方认错人了,便赶紧开溜了。

随后他可能是去了弗吉尼亚州的弗雷德里克斯堡,弄到了邦联的安全通行证。在曾经两次被捕又巧妙脱身后,他不敢继续在公共餐厅或旅馆露面。后来他发现有两个荷兰人住在一条小河边的帐篷里,这条小河一直流向波托马克河,他们的小船就在河里。贝克在他们的帐篷里住了一晚,黎明时分,他偷偷跑出帐篷,开走了荷兰人的小船。荷兰人发现后让他把船划回去,其中一个还拿猎枪指着贝克。贝克也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把左轮手枪,也许是偷来的,他一枪撂倒一个荷兰人,另一个家伙赶忙跑去搬救兵。贝克划着船进了波托马克河,在一段4英里宽的河面上,躲过了邦联士兵密集的子弹。他整整划了两个半小时的船,最后终于安然抵达联邦的河岸。

这之后不久,贝克就邂逅了一位非比寻常的女性,她在美国历史舞台上只是昙花一现,但她却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里将这段经历记录了下来。1876年出版的《战场佳人:洛丽塔·珍妮特·薇拉兹开兹女士、即邦联政府军的哈里·布福德中尉的传奇经历》一书描述了作者以及一些挡了她道的人物围绕联邦及邦联伪币的混乱生涯,其中充斥着争斗、刺探活动、恋爱事件和交易。

薇拉兹开兹是法国、西班牙混血儿,出生于古巴,自命是支持南方独立大业的坚定爱国者。她极有可能参与了南方大规模的制造伪币行动。专业的历史学家,特别是理查德·霍尔教授,研究了她的描述之后认为,尽管其中不乏夸张之词,总体说来还是真实可信的,堪为研究美国内战史的重要文献。薇拉兹开兹效忠南方的热烈宣言让她得以进入邦联军队,还搞到

了一张假证书。她穿上制服，戴上假发和假胡子，摇身一变成了哈里·布福德中尉。她学着像男人一样走路、抽雪茄、在制服底下垫东西好让自己看起来更大个、更壮实。在开始间谍生涯之前，她以布福德的身份参加了第一次布尔仑战役及唐奈尔森堡和夏伊洛战役。她在夏伊洛受了伤，军医给她治疗时发现了她的真实性别。军队不允许她重返战场，于是她去了里奇蒙德找间谍头子约翰·H. 韦恩德，后者在她的游说下，同意接受她成为南方的间谍及信使。内战的最后1年半时间里(1864—1865)，拉法耶特·贝克也在她的游说下雇用了她，她于是成了邦联的双料间谍。

她给贝克当了几次信使，圆满完成任务后取得贝克的信任，成功地成为双料间谍。她往南方带入了数量极为可观的邦联伪币，并在此过程中发现贝克和他的手下拿伪币作为南方间谍活动的经费。她还留意到，贝克认为在南方散布伪币是一种很好的颠覆南方经济的手段。

在华盛顿，赌博等各种有伤风化的行为非常猖獗。打击这些行为是贝克下达给自己的一项任务。贝克的手下经常会突袭妓院和可疑旅店，比如坎特伯雷酒店，有时候贝克本人还会亲自出面。让贝克投鼠忌器的是流连于赌场的那些精英分子。桑德伯格的书中描述道：这些赌场里“主要玩法罗牌和扑克牌”，“需要有人引荐才能进入，里头有州长、国会议员、政府官员、政府职员、承包商、政府出纳员”。层次最低的则是那些低级夜总会，“在这里，巧舌如簧的女人一杯接一杯地给年轻的(联邦)步兵敬酒，让他们花光领到的每一分军饷”。1863年夏，贝克向斯坦顿汇报，“有163家赌场需要留意”。

不过，最让斯坦顿和林肯政府头疼的则是贝克安排财政部的女雇员从事间谍活动。华盛顿的报纸上有时候会有此类报道，比如年轻的财政部女雇员同斯宾塞·莫顿·克拉克在夜间发生了不正当行为啦。克拉克是负责印制联邦纸币的助理工程师，最终成型的绿背美元经他的手交付给各家私人货币公司再进入流通渠道。到1864年春，《纽约世界报》和其他反对林肯政府的报纸纷纷报道，财政部铸印局的女雇员身着男装去坎特伯雷酒店看色情表演，这种场所只许男士入场。对贝克素无好感的《纽约论坛报》发表社论称，这是联邦特务头子“参与策划”的一起阴谋，他找来一个名声不好的女演员(也许就是洛丽塔·薇拉兹开兹，她在北方确实参与

过一些表演活动)和“一些妓女”充当密探,“败坏铸印局女雇员的声誉,以此对财政部施加影响”。

蔡斯（他的头像印在1万美元面值的纸币上）也为很多事情忧虑不已:贝克的女间谍,南方北方的有价证券都已遭到伪造的担忧(事后这种可能性得到了证实),要么就是“秘密”印制这些纸币的印版已经被偷偷带出了财政部。蔡斯耍起了性子,前后14次递交了辞呈,每次都被总统好言挽留,直到1864年6月,林肯才勉强接受了他的辞呈。

此前,林肯通过其他顾问以及媒体得知伦敦的金价已经涨到了新高。绿背美元贬值了，而且尽管贝克尽了全力，还是有大量的伪币流入了北方。更糟糕的是,财政部登记员卢修斯·E.奇腾登报告说,贝克在制造伪币时被他逮到了——桑德伯格的书中没有说贝克制造的是哪种伪币——而且“一点也没有害臊,脸也不红一下。这家伙微笑着看着我,说:‘这种游戏没法玩,是吧?’”

与此同时,一门心思为南部邦联效力的洛丽塔·薇拉兹开兹逐步取得了贝克的信任。1864年,贝克开始派遣她去执行秘密调查和谍报任务。在贝克被调至财政部、受萨蒙·P.蔡斯管辖后,他察觉到财政部内部有腐败行为,便让薇拉兹开兹着手去调查。她在书中写道,财政部和铸印局就是“盗窃及造假团伙的总部”。这种行为已经持续数月,还有要人参与其中。薇拉兹开兹进一步指出:

> 在北方,邦联的债券和纸币可以随意制造,政府绝不会介入,不仅如此,联邦的官员还会在便利的时候使用这些伪币。

她发现,贝克就经常支付期票给他安插在南方的间谍。这种期票“本应由里奇蒙德发行,但却是在纽约和费城印制的,而且流向了全世界”,这显然是指阿伯翰和希尔顿。既然贝克认为伪币是对付南军的正当的武器,“我们南军也有权对北方以牙还牙”。

薇拉兹开兹向财政部职员寻求帮助。有一位她没有指名的职员认为,假的联邦债券也许是“在华盛顿”印制的。她写道,必须在欧洲散布这些债券,越多越好。方法就是开出比官方汇率更低更有吸引力的汇率,官方汇

率是出售真债券的联邦特工开出的。薇拉兹开兹开始辗转纽约、费城、华盛顿三地,运送债券、纸币和造假用的印版,称自己是一位“秘密经理人”。那些经纪人给了她资助。英国就是她“下手的目标”,南北双方的伪币和假债券都可以在这里脱手,“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对待这场伟大斗争的双方的方式都不地道”。因此,我们应当让他们支付“进行斗争的部分费用……这一来,这些伪币就注定要流入约翰牛①的口袋”。为了这个目的,薇拉兹开兹至少去过一趟伦敦。

在她那本大厚书的第41章中,薇拉兹开兹写道,她在财政部跟国家货币局局长斯宾塞·C.克拉克及其他政府官员一起印制伪币,有时候是在夜里进行的。这些官员找来“一些放浪的女人”进行造伪活动,她们习惯于深夜时分在办公室里狂欢。报纸对此进行披露后,公众一片哗然。当时蔡斯的辞呈还未得到林肯的批准,他便让贝克着手去调查财政部的夜间活动。

薇拉兹开兹写道,还有一个女人也偷运了真印版的复制品给国外的同谋。邦联和联邦的假债券在伦敦市场均有销售,她高兴地说,此举让联邦损失了“大量的钱财”。她在书中还写了另外一个故事:她经过讨价还价购得一块电铸版,然后带到华盛顿的柯克伍德宅邸,锁在一只衣箱里。她用这块印版来印刷面值100美元的复利票据,其产品堪称当时的“超级伪币”!

1864年的同一段时期,在史密森协会花园的一棵雪松树下,有人放了一包面值5.5万元的联邦证券给薇拉兹开兹。随后她去了费城,跟众多中间人取得联系,从他们那里搞到了大量假的邦联证券。她来到在纽约格林尼治街租借的一处民宅中,按照市场汇率,用这些假证券从她的经纪人那里换来英镑和黄金,随后又换成绿背美元。此次非法交易为她带来了巨额的暴利,她说“我们经手的这些伪币在整个战时印制的伪币中只占了极小极小的份额”。薇拉兹开兹称,这种地下交易的主要中心在纽约金融区的华尔街和富尔顿街,不过这帮金融骗子很多都是住在百老汇的,“很多人

① 约翰牛,英国或英国人的代名词,来自18世纪苏格兰医生兼作家约翰·阿巴思诺特的政治讽刺小说《约翰·布尔的历史》。“布尔”(bull)的意思是“牛”。——译者注

都有着无懈可击的好名声”。

洛丽塔·薇拉兹开兹回顾了自己的历次行动。她说，自己和其他邦联同志实施这些交易，“不仅仅充实了我们的国库”，而且还“通过很多方式收买了一些人，将他们罪恶的利己行为和不顾国家的贪婪转变成了对我们事业的利益”。

薇拉兹开兹战后的生活和冒险生涯，还有她的死亡日期及具体地点，都没有确切的记录。她书中所写内容的真实性够历史学家们争论上好多年了。看起来毋庸置疑的是，她为私利和南方的独立大业制造伪币，将作为一流的金融骗子而名留史册。

随风而逝

摆在内战史学家和读者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到底是多少邦联伪币导致了邦联经济的崩溃并最终让其走向失败。无可置疑的是，跟联邦几大决定性的军事行动比起来，伪币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将军经过佐治亚州时沿途烧光一切，北方在西部各州的胜利，入侵的罗伯·E. 李将军的军队在宾夕法尼亚州被击退，如此等等的事件当然也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正如北卡罗来纳州作家乔治·B. 特雷默最近所做的分析显示，对南方货币的攻击不仅大挫南方的士气，而且严重破坏了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以农业为主的南方经济。

特雷默对货币造伪及通货膨胀——这两者是互相助长的——对南方经济的影响作了分析。他首先根据勒纳美国国内物价指数对当时的通胀情况做了分析。邦联各州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指数从 1861 年 1 月的 101 涨至 1865 年 1 月的 5824(翻了整整 58 番)。1 美元金币同邦联纸币的折算价从 1861 年 5 月的 1.05 元涨至 1865 年的 100 元，增长了 95 倍。战争期间，通货膨胀的比率从 58 激增至 95。1861 年初至 1865 年初，邦联的纸币发行量增长了 18 倍，共计 15.4 亿美元。发行这些纸币的担保不是硬币，而是一个“6 个月到 2 年内”折现的承诺，这个承诺的前提是南方取得战争的胜利。

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名作《飘》(*Gone with the Wind*)及由此改编的影

片《乱世佳人》中,郝思嘉便亲身体验了这样的痛苦遭遇。1865 年战场上的枪声平息后,她向获胜的华盛顿联邦政府缴纳重建税的希望也破灭了。她的父亲将所有财产换成了邦联的战时公债, 南方战败后这些东西就成了一堆废纸。

特雷默估算,与此同时,各州、银行、地方政府及南方各铁路公司及保险公司等“私人”发行的货币也有大约 1000 万美元。至于进入流通的邦联伪币,他最保守的估计是 4500 万美元(也有可能是将近 10 亿美元甚至更多,共计 2007 种)。相比之下,纽约货币市场上,1 美元金币同联邦绿背美元的折算率,1862 年 1 月是 1.03 美元,1865 年 3 月战事接近尾声时则为 1.79 美元。

在此之前,南方财政早已破产。1864 年,得克萨斯州便发现邦联货币实际上已经一文不值,于是不再将其作为法定货币。此后得克萨斯州的交易要么是物物交换, 要么就用很不可靠的当地发行的货币或者是联邦绿背美元。1865 年南方投降时,其财政资产仅有 8.5 万美元金币、3.6 万美元银币以及 70 万美元的邦联纸币。

内战一个最大的讽刺是:战争结束时,面值数百万的邦联纸币,真假都有,被战败的南方人烧掉、扔掉、毁掉,到了后代,幸存下来的几千张纸币却备受收藏家追捧,卖出了大价钱,尤其是在 1965 年内战百年庆典时期,而且价格还在持续攀升。一位历史学家称,到 1992 年,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生产的一张未经流通的面值 1000 元邦联纸币, 售价为 1.8 万美元。

特雷默推断,之所以通货膨胀的涨幅远远高于纸币供给量的涨幅,可能是因为从 1863 年开始, 南方人开始逐渐意识到, 自己已经无法取胜,“邦联已经时日无多了”。伪币还有另外一个难以衡量但是肯定存在的作用:从邦联财政部、地方银行、商店和普通消费者身上吸走了他们已然无多的资源。南北双方为揪出造伪者都花费了很多的金钱、时间和精力,这导致南方资源的进一步流失。特雷默发现,为了应对伪币造成的恐慌、召回大量已发行的纸币,邦联财政部可谓雪上加霜。总之,“造伪不仅导致了货币供给量的增加,而且促成了货币兑换体系信用的丧失”。

内战遗留下来的产物——美国特勤局

在跟洛丽塔·薇拉兹开兹之流共事期间及以后，拉法耶特·贝克都花费(有时候是滥用)了大量的精力来追捕邦联间谍、伪币制造者以及各种现行及嫌疑的罪犯。1862 年绿背美元诞生后,很快便导致了 1862 年 7 月 30 日《纽约时报》所说的“造伪活动的惊人增长”。贝克和手下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追查到一个叫彼得·麦卡特尼的造伪高手,这个人不过是联邦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众多造伪者中的一员而已。

麦卡特尼效力于名声赫赫的犯罪王朝——印第安纳州劳伦斯的约翰逊家族。他用的是一种至今依然通用的工艺:他把 1 美元真币上的面值刮去,然后印上大面值,这些真币是他给一位农场主做销售经纪赚来的。后来他跟一位名叫阿克曼的德国移民雕版工学习造伪术,还在 1852 年娶了老师的女儿玛莎·阿克曼为妻。后来,他的雕版和印刷技术都达到了一流的水准。到 1864 年夏天,麦卡特尼和约翰逊家族联手使面值 10 万美元的绿背伪币成功进入了流通,在当时这可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1864 年夏，贝克手下的财政部探员在印第安纳州突袭了麦卡特尼和约翰逊家族，麦卡特尼及其同伙即将被送往臭名昭著的华盛顿特区老国会监狱。不过,当火车在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上行驶时,麦卡特尼从车尾跳了下去,逃之夭夭。他重获自由后继续制造伪币,直至 1865 年 4 月 9 日战争结束为止。

1865 年 4 月 14 日下午,林肯会见了蔡斯的继任者、财政部长威廉·P.麦卡娄。麦卡娄简要描述了当前紧急的伪币问题,建议设立一个“常设永久机构,以杜绝伪币活动”。就在林肯在华盛顿福特剧院被演员及邦联支持者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刺杀的那个晚上,林肯同意了这个提议。由于随后政坛的混乱局面及种种阴谋,特勤局一直拖延到 1865 年 7 月 5 日才正式成立,到如今一直存在。

林肯的继任人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发现贝克在白宫安插自己的间谍网络,由此与贝克反目成仇。约翰逊撤了贝克的职,撤销了新成立的特勤局。因为约翰逊对打了败仗的南方采取和解的政策,国会对他很是不满,

对他进行了弹劾和审讯(不过国会弹劾他的罪名是“犯罪率过高”),贝克提供了不利于约翰逊的证词。随后贝克又遭到指控,称他又重操心爱的旧业——制造伪币,以及制造假信件陷害约翰逊。

特勤局很快得到恢复,隶属财政部管辖。直至2002年伊拉克战争打响之前,乔治·W.布什总统才将其纳入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威廉·P.伍德是另一位热衷于打击伪币的斗士,还曾经帮过林肯的忙,被任命为当时的特勤局领导人。伍德在19世纪40年代的墨西哥战争中参加过游击战争,博得了“C连无畏领袖”的名声。伍德上任后,率领他新招募来的一小队特工人员,严厉打击像麦卡特尼和约翰逊家族这样的造伪者。

在某一次艰难的绿背美元保卫战役中,他们面临的对手是威廉·E.布洛克威,此人曾是麦卡特尼的同伙,后来被誉为“造伪之王”。布洛克威伪造的一种面值1000美元的财政部债券实在是天衣无缝,把财政部都给糊弄了,财政部花了7.5万美元的硬通货回购这些债券。财政部部长悬赏2万美元缉拿布洛克威,但是当伍德成功抓捕了布洛克威后,部长却食言了,他告诉伍德只能给他5000美元。备感愤慨的伍德于1869年5月5日辞去了特勤局局长的职务,他的继任者是原联邦军队陆军中校海勒姆·C.惠特利,也是该局历史上众多局长中的第二任。

此后的几十年间,特勤局的职责有了扩展,负责调查针对联邦政府的其他欺诈行为,打击南方三K党的种族主义行径。最后,在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1885—1889,1893—1897)任内,他们又接受到了第二项重大使命:为美国总统提供贴身保护,后来其保护对象又包含了副总统及到访政治家,有时候也给一些名流提供服务。特勤局的这项使命有成功也有失败:1881年,一个家伙谋求官职未果,刺杀了詹姆斯·加菲尔德总统;1901年,威廉·麦金莱总统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暗杀;还有1981年,罗纳尔德·里根总统从刺客手下死里逃生。1898年美西战争期间,特勤局负责针对西班牙对手的间谍及反间谍活动。在多年的起起落落中,特勤局一直坚守内战时期以来执行反造伪任务的传统。有关此项任务以及大规模货币造伪的深远后果,将在后文中叙述。

第八章
英国的目标：颠覆德国经济

这场战争及其目的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新花样。跟以往的每一个时代一样，英国又摧毁了一个贸易对手。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1920年

1916年1月25日，英国皇家海军莫里斯·汉基中校在其牛津街52号寓所摊开他的皮面日记本，开始写日记。也许是在无意之间，他为后世记录下了一战期间保守得最为严格的一个秘密：在对付德国及其他同盟国时，英国用到了一种特殊的武器，除了汉基之外，没有哪位操作者会把这种武器的名字写下来。如今，这一秘密极有可能仍受英国《国家机密保护法》的保护。这个秘密就是专业伪造德国货币，以破坏德国经济、削弱其军事力量，当时德国同奥匈帝国和土耳其联手，其实力是非常可怕的。

时年39岁的汉基是炮兵部队和海军的一名成功的情报官员，懂7种语言。此外，他还在地中海和近东的海域和战场上立下过赫赫军功。战时他在高级别人士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中担任秘书，成为乔治五世和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伯爵的心腹，又是下任首相大卫·劳埃德·乔治的顾问，众多的顶级军事机密他都有份参与，最近的就是夺取土耳其加利波利半岛并进而征服君士坦丁堡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汉基在1963年去世，此前3位首相——劳埃德·乔治、温斯顿·丘吉尔和克莱蒙特·艾德礼——全都禁止他发表回忆录，因为他的回忆录也许会泄露高级机密。

斯蒂芬·罗斯基尔是汉基担任海军情报人员期间的同事、朋友，也是他很欣赏的一位传记作者，斯蒂芬的一本书里引用了汉基1月25日晚上

所写的日记，日记是英国的秘密档案管理人员泄露出来的。日记中写道：财政干事及军需大臣埃德温·蒙塔古爵士当天来到汉基的办公室。蒙塔古此行的目的是"说明他的一个计划：让伪造的德国纸币进入流通，我答应一定尽力提供帮助"。汉基说，享有盛誉的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沃尔特·坎立夫"伪造了一些非常精妙的伪币，财政大臣和首相都知情。这种手段也许是很卑鄙，不过德国人罪有应得，拿破仑以前也用过这招"。他也许还写到了，在拿破仑之前，乔治三世也用过这招来对付羽翼未丰的北美叛乱者和法国革命者，不过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有理由怀疑，德国佬已经在用这招来对付我们了……"

汉基说伪造敌国货币是"卑鄙的手段"，这种说法也许能得到许多领袖——从美国内战时期的亚伯拉罕·林肯到二战时期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共鸣。罗斯福无所顾忌地支持并指挥了众多针对希特勒及日本的秘密行动，却从来没有伪造过他们的货币。战争快要结束时，纽约州布法罗一位银行家写信给罗斯福，建议美国空军向敌国空投伪币和假配给票证，以打击其经济。罗斯福将信转给了新近成立的战略服务办公室(OSS，即中情局的前身)主任"野牛"威廉·多诺万。多诺万答复说战略服务办公室已有类似计划，"一切就绪，只等总统的准许便可实施"。

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赞成这个计划，战后他给《科利尔》杂志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我们害怕使用的秘密武器"。罗斯福彻底否定了这个计划，他的回答足以载入史册："杀戮可以接受，你也可以攻击别人的信仰而不受惩罚，但是这样就是在破坏对许多人来说比生命还要宝贵的东西。"(当时罗斯福肯定还不知道，纳粹正在役使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犹太苦力，驾轻就熟地大规模伪造英镑，同时还准备伪造美元，这一切直到1945年罗斯福去世前后才画上了句号。)

汉基日记中提到的"德国佬"的作为并没有确切的依据。德国时事评论员在说到一战时顺带提及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希尔玛·沙赫特博士曾经在德占比利时组织伪造货币。沙赫特是一位杰出的银行家，曾经帮助魏玛帝国摆脱一战后极度通货膨胀的困境，后来在希特勒手下担任中央银行行长。沙赫特伪造的货币主要用于德占区的消费需要。不过，评论员们并没有说到沙赫特及其他当时效力于威廉二世的德国人伪造过英国及其盟

友的货币。

不管怎样，汉基在答应蒙塔古之后很快便采取了行动，他向人人畏惧的英国战时海军情报处处长、“信号灯”雷金纳德·霍尔上尉(后来成了上将)求助。汉基在1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他“请他(霍尔)帮助实施伪币计划”。英国海军部传奇的40号房间是霍尔实施各类秘密行动的大本营，这里有一帮军人及平民专家，其中有一帮语言学家和英国各大学调派来的其他学科专家负责针对敌方及盟友的密码破译工作。(1917年，德军齐默曼向德国驻墨西哥大使发去电报，称如果墨西哥同意加入轴心国组织，对美国宣战，那么就将美国西南部的大片领土割让给墨西哥，这封电报正是这帮人破译的。)他们破译的密码还包括美国爱德华·M.豪斯上校的私人密码。

汉基在日记中写到伪币行动的那段时间里，美国还保持着中立。豪斯上校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私人信使的身份随一支和平考察团来到伦敦。他此行的目的是，即便不能让双方停战，至少缓解英国的海上封锁和德国日益强大的潜艇的威胁。但是，德国人不仅拒绝了威尔逊提出的解决“路西塔尼亚”号沉没事件的条件(冠达公司的邮轮“路西塔尼亚”号于1915年5月7日沉没，众多美国人因此丧生)，而且，根据破译的电报显示，他们还准备在大西洋采用更大的U潜艇发起更大规模的战役。霍尔在40号房间的密码解译员有好几次乐呵呵地把解码后的豪斯跟威尔逊之间的往来电报给汉基这样的知情人看。豪斯上校、威尔逊总统及当时美国的其他领导人对于英国顶级机密的造伪计划并不知情；事实上，英国也只有很少几个人了解此事。

汉基和他的同谋去找海军情报处的霍尔上尉，却没有找已有5年历史的秘密情报局，个中原因我们只能是推测了。首先，霍尔的网络具备情报站以及随时待命的间谍，尤其是在英国人可以到达的如荷兰、瑞典和挪威等中立国的海港。外交邮件很可能也能够送到瑞士。当时皇家飞行部队已经向德国投掷过炸弹，他们当然也可以投掷秘密伪造小组伪造的伪币和假邮票。在散布伪币、假邮票及其他轴心国假票据时，霍尔可以借助皇家海军及被征用商船的力量，比人员及资源都严重缺乏的秘密情报局当然要更有优势。

秘密情报局(即后来的军情六处)于1909年正式成立。1914年一战爆发时，其国外事务处的负责人是年轻的曼斯菲尔德·乔治·史密斯–康明中尉，他曾在海军情报部门服役，还是一位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不过，因为军阶和职位都很低，他很难大施拳脚。直到1915年1月，他才升任代理上尉。史密斯–康明手下根本没有海外情报站和间谍，没有"信号灯"霍尔那么多的眼线。战事在欧洲爆发后，秘密情报局才有了任务，用英国情报史学家尼吉尔·维斯特的话来说，它终于跟海军部庇护下的海军情报处"平起平坐"了。政府的秘密"造伪委员会"——我们就姑且这样来称呼这些参与者吧——在英格兰银行找到了行事慎重的现成盟友和新生力量，带头的是时任英格兰银行印制部主任的赫伯特·G.德·弗莱恩。在他去世后的1960年，他的女儿琼·德·弗莱恩将他的自传《这间屋子的仆人》(*Servant of This House*)付诸出版，其中便透露了这个重大的机密。不过，德·弗莱恩比汉基要谨慎得多：他只用"伪造的德国单据"来形容他们在极度机密的情况下伪造的纸币、邮票及其他单据。这些单据数量非常庞大，当时银行的印刷机常常是24小时连轴转。

德·弗莱恩书中有一个含糊其辞的时间表述："战争爆发后"。据此推测，极有可能在汉基和霍尔得知内情并受邀参与散布"单据"之前2年，造伪计划便已开始酝酿并付诸实施，至少已经进入了筹划及印刷阶段。德·弗莱恩写道，"有一天"，银行董事沃尔特·坎立夫到他办公室来找他，坎立夫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绰号"伦敦城的暴君"。

> (他)告诉我，他已经答应海军情报处处长霍尔上尉(后来成了霍尔上将)，向其提供有些德国单据的仿制品——直白地说，就是伪造品。他让我和我的副手S.B.张伯伦安排印制部的所有资源供霍尔上尉驱遣，并称此事高度机密，只有我们三人——不能有其他人——可以知道。

德·弗莱恩说，银行的印刷机还可以承担大量的额外工作量，他们采取的保密措施有：

将一些日常工作（印制英镑、印度等地的皇家货币以及各种有价证券）安排到可自由出入的场所，这些单据的印刷场所则带有厚厚的双层铁门。有时候封锁太过严密，董事本人都无法入内，只好跑来找我给他做担保。对此，他非常地满意，认为我们的（安检）措施是万无一失的。

早在一战之前，英格兰银行位于针线街的主楼内的印刷场所就已经太小太过拥挤，无法满足银行大量印刷任务的要求。后来他们找到了老街的“圣卢克疯人院”。这座疯人院建于18世纪早期，建筑宏伟，前面还有500平方英尺的空地，距离银行很近。1915年，银行方面听说圣卢克疯人院董事会打算卖掉伦敦市内的房子，迁到郊外去。1917年4月，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银行买下了疯人院的房子，采取了一系列的加固措施，比如木地板上加了铁质材料，把沉重的印刷机和其他设备搬来，银行主要的印刷业务都改在此地完成。

早在1916年，在搬到圣卢克疯人院原址之前，德·弗莱恩就已经安排好了造伪工具的安装等等一应事宜，还从外部找好了“专家”人选。他一共招了16个老员工，对他们比较冠冕堂皇的称号是“银行公务人员”。那些值班员、消防员、窗户清洁员、木匠以及普通维修人员及一般保安人员都不得进入印刷车间。

最初的时候，设计、印刷、雕版工人从周一上午干到周五下午，12小时轮班。周五，他们都要接受严密的清洗和搜身，“任何可能招致怀疑的纸条”都不得带出。部分印刷机还得大卸八块地接受检查。本周全部废纸都要在特定区域内的垃圾箱内焚毁，“纸灰也要仔仔细细地检查过”。

联手合作

情报部门的霍尔、银行方面的沃尔特·坎立夫和德·弗莱恩各自在英国的实业界及学术界招募帮手。霍尔招来的人有：伦敦股票经纪人德克劳·瑟寇尔德、后来成为大法官的托马斯·英斯基普、牛津万灵学院的菲利普·贝克·威尔布拉汉姆爵士、短篇小说家A.J.艾伦、伦敦的葡萄酒商人詹

姆斯·兰德尔。这几位先生中有哪几位参与了造伪行动，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其他的秘密行动也需要他们这样的人才。举例来说，40号房间的密码破译工作以及对破译文本的必要分析等工作都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特别是德语、土耳其语和俄语等语言人才。不过，至少，葡萄酒商人兰德尔应该是参与过造伪行动的。德·弗莱恩的书中写道：

我们把伪造好的票据（也就是伪币、假邮票等等）钉在普通的葡萄酒箱子上，用牛皮纸包好，贴上我们自己印刷的铁路标签，再用蓝色铅笔标上符号。

周日上午，这些"货品"用出租车送到海军部交给霍尔本人。德·弗莱恩写道，在海军部，两名海军警卫员"把我们的货品推到他的房间，那里不像办公室，倒更像是间客厅"。房间里有一把套着印花套子的长沙发、几把舒服的扶手椅、"一块印有鲜艳花卉图案的可爱地毯"，再加一只白色的博美狗狗"跑过来跟我们打招呼"，感觉更像是一个家了。

德·弗莱恩称霍尔为"活力无限的小个子上尉"，他用赞美的语气写道：

个子不高，胡子刮得很干净，下巴凸出；但是你只要看一眼他那双不同常人的眼睛，马上就会受到震慑。他已经谢顶了，不过头两侧和后脑勺还有头发，乱蓬蓬的，也许是他经常要思索难题，头发就受累了。

看到有那么多形形色色的人为霍尔效力，德·弗莱恩惊奇不已。霍尔管理着遍布各地的特工人员，解决有关敌军、有关协约国的种种难题，40号房间其实是他的办公室周围多个办公室的统称。在这里进进出出的有：身着制服的皇家海军军官，他们中有些已经过了服役年龄；牛津、剑桥大学的学者；一位英格兰银行董事；一位知名的音乐评论家；一位前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会长；一位美术专家；还有一位闻名世界的服装设计师。的确，一场全世界范围的秘密行动是需要如此阵容庞大的专家才行！

有些外部专家显然是由老牌货币印刷企业沃特洛公司提供的，很可

能是沃特洛在伦敦郊外沃特福德的工厂，不过沃特洛公司其他的办公场所都在伦敦城内，离英格兰银行不远。(后来出现在拍卖场上的德国、奥地利假邮票以及一些私人藏品上都用非常小的字印着“沃特福德印制”的字样。)

进入战后的20世纪20年代，沃特洛公司的事业到达了顶峰，为国外客户及王室客户印制合法纸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资深合伙人威廉·沃特洛爵士的介入下，到了30年代，沃特洛公司开始逐步走上了下坡路，终至彻底消亡，个中原因便是20世纪规模最大、最具野心的一次造伪行动：葡萄牙伪币事件。此事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具体论述。

1930年，作为沃特洛公司的责任代表人，威廉爵士(1929年至1930年担任伦敦市市长)因欺诈罪名而遭到了英国上议院最高法庭的审判。他的上诉没有成功，最终被定罪并罚款。通过审讯不难看出，伪造德国货币的行动是高度敏感的事件，而且极有可能受到了《国家机密保护法》的保护。一审时，一位法官问威廉爵士，他在20年代无意中参与了印制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大面值葡萄牙埃斯库多纸币，是否是“他参与过的最为机密的行动”。威廉爵士答道：“我想是的。”

后来，在上诉审判庭，在众位威严的上议院法官面前，他承认：

> 阁下(即赖特法官)，事实并非如此……我参与过最为机密的行动是战时的情报活动。我没有跟任何一位同僚透露过此事……如果您想知道，我可以把它写下来。

莫里·泰格·布鲁姆在他那本描写葡萄牙伪币事件的名著中写道：“赖特法官很敏感，没有让他把那次事件写下来。在有些读者看来，威廉爵士显然很是失望。”布鲁姆(他的这本书首版于1952年)及后来的评论者都认为，威廉爵士提到的秘密行动就是一战时的造伪行动。

1980年，在伦敦发现了有关造伪的证据。11月，主营邮品的老字号收藏品经纪公司哈默斯公司刊发了一期伪造邮票的拍卖手册。手册的宣传语写道：

协约国间谍伪造的奥地利、法国邮票，协约国间谍宣传活动伪造的德国邮票，非常精彩。荟萃众多战时间谍邮票及宣传邮票，是全世界此类邮票中最为完整的一批藏品。

手册上列出了战时敌对双方发行的各种假邮票及讽刺邮票，其中还有一张“1391号拍品”，说明文字是“面值20马克伪币，约1916年印制，未经流通，完好”。手册上估计其价值为7英镑，后来被一位收藏家以15英镑购走。

赫伯特·A.弗里德曼是美军一位退役军士长，本书创作期间他住在纽约州北部。他曾在美军心理战部队服役，这支部队自二战以来印制了大量的敌方纸币、邮票及宣传传单，弗里德曼本人也经历过多次战时造伪行动。弗里德曼目睹了那次拍卖，随后在网上发布了一份篇幅很长的报道，展示了一张20马克伪币的复印件(序列号F3530024，1910年4月21日印制)。报道中提供了很多的详细资料及一战时英国印制的一些复制品，主要是邮票及伪币。后来，一些私人藏家手中也出现了一些马克伪币。

秘密行动和经济战

不难想象，在1916年的那个晚上，莫里斯·汉基写日记时心中有一种罪恶感，同时又不得不屈从于现实。汉基在战前及战后都是皇家海军陆战队的活跃分子，后来更是被提拔到了战时决策核心委员会，直接为国王、温斯顿·丘吉尔等人担任谋士。这些经历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此次同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的战争会是一场恶战。到他写日记的时候为止，英方取得的主要胜利还仅限于皇家海军对德国港口的封锁以及在公海上打败了德国舰队。

1916年初，协约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打算彻底变成了泡影，而那本是温斯顿·丘吉尔非常欣赏的一个计划。尽管英国极力笼络保加利亚，对方还是加入了同盟国(汉基的日记中对此有述及)。好战的小国塞尔维亚已向奥匈帝国臣服，战争的导火索——1914年奥地利大公费迪南德的遇害——正是在这里发生的。希腊首相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是备受

崇敬的民族英雄，以他为首的希腊政府积极倡议加入协约国，对抗希腊的敌人及占领者土耳其帝国。不过，君士坦丁国王却希望保持中立，韦尼泽洛斯政府因此垮台。后来，当盟军(主要是法国军队)攻占萨洛尼卡，打垮了当地的土耳其军队后，希腊政界一度分成了两派：中立派和结盟派。

英国、澳新军团及法国联合部队试图突破达达尼尔海峡，攻占君士坦丁堡进而打垮土耳其。但是，登陆加利波利半岛之后这一计划便宣告破产了。英军及盟军无谓地牺牲了很多人，澳大利亚人伤亡最为惨重。近一个世纪后，如果让乔治·W.布什总统及灾难性的对伊军事行动的支持者们来形容盟军的溃败，他们也许会说：盟军“割锚溜走”[1]了。

在西线阴冷泥泞的堑壕战场，尽管第一军团统帅、陆军元帅道格拉斯·海格爵士极力反对，英军指挥部还是下令第一军团在法国路斯发起攻击，最后英军付出了6万条生命的代价，夺得了大约8000码的土地。同年秋天对香槟及阿图瓦区的进攻又无谓牺牲了5万名英国及法国士兵。

在东线，德军埃里克·冯·法勒根汉中将在波兰的哥黎士大败盟军，200万俄国沙皇联军因此阵亡、被俘或者失去战斗力。在伊索左战场，1915年12月，意大利接二连三地大败于奥地利人手下。在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英军少将查尔斯·汤申德爵士率军从巴士拉向巴格达挺进，在库特阿尔阿玛拉被土耳其-阿拉伯人联合部队包围。从1915年12月5日到1916年4月29日，英军及英属印度军队联合部队三次试图帮他们解围，均以失败告终。在20世纪的北非及中东战场，除了沙暴和敌军外，洪水和烂泥也是两个劲敌。灾难性的加利波利战役开战前，盟军曾试图收买土耳其人，却导致了土耳其人更为猛烈的抵抗。1916年4月29日，1万名英军在库特阿尔阿玛拉被土耳其人及其阿拉伯盟友包围。

尽管没有文献记载，不过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推论：加利波利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失败，进一步坚定了伦敦的秘密造伪委员会伪造土耳其里拉的决心，目的是进一步打击土耳其已然破败的经济。至于对德国票据的伪造，邮币拍卖行及私人藏家的藏品为我们提供了证据。1988年7月

---

① “割锚溜走(cut and run)”，常常出现在各大媒体对伊拉克混乱局面的报道中，表示“急忙逃走”。——译者注

13 日《钱币世界》刊登的斯科特·E. 科尔德里的文章称，英国有充分的理由要“扰乱、破坏”土耳其、土耳其统治的巴勒斯坦及其他阿拉伯地区的货币供应，“我们发现了 1918 年仿造的做工精良的土耳其 10 里拉伪币，这是英国实施过造伪计划的物证”。

1969 年，这些伪币开始在收藏界现身，1987 年更是大量出现，跟伪造的德国马克一样做工精湛，印有不同的序列号。弗里德曼说，所有的假里拉都有一个“明显的”错误：钞票背面左边罗马文及伊斯兰文的数字“10”是由内向外书写的，而真币上则是由外向内的。

货币贬值及伪币在土耳其历史上占有特殊的一席之地，在奥斯曼帝国早期便困扰过土耳其人。土耳其小说家、2006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在其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借书中那位 17 世纪土耳其主人公的口，说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 但我知道金钱贬值的问题哪里都一样。有传言说佛兰芒和威尼斯的商船载满了一箱箱伪币运至伊斯坦布尔。过去，官方的铸币是用 100 德拉克马的银子铸成 500 个硬币，然而现在，由于与波斯连年征战，同样重的银子开始铸成 800 个硬币。土耳其禁卫步兵发现赚来的硬币跟菜贩码头上掉落海中的干豆子一样，居然可以漂浮在金角湾上，于是群起暴动，把苏丹的宫殿当做敌人的城堡团团围绕……卖酱菜的小贩……谈到伪币、新威尼斯金币、上面刻着狮子的假弗罗林以及含银量逐年降低的奥斯曼硬币……把人们拖往堕落的深渊，难以自拔。

攫取德国殖民地

显然，英国殖民军队在德国东非殖民地战败后，伦敦也针对德国殖民地当局发行的货币策划了类似的造伪计谋。

1870 年至 1871 年，普鲁士首相奥托·爱德华·莱奥波德·冯·俾斯麦故意挑起了普法战争。击败拿破仑三世之后，他又成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宰相，尽管他并不是特别渴望建立一个海外殖民帝国。不过，在 19 世纪晚

期，为了发展新兴的制造业，欧洲列强争相抢夺领土、原材料及市场，俾斯麦也向强大的院外活动集团殖民联合会和德国殖民社团屈服了。1880年后，德国占领了东非的一部分、西南非洲、喀麦隆、多哥兰以及众多南太平洋岛屿，将这些地方变为自己的殖民地。

1890年俾斯麦辞职后，威廉二世开始发展一项新事业，宣布德国要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他开始发展德国海军，其实力足以同英国皇家海军抗衡。1897年至1899年间，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帛琉群岛以及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并入德意志帝国版图。威廉二世和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还把目光投向了北非。1911年，德国派出一艘军舰到摩洛哥阿加迪尔港，战事差点提前爆发，最后德国跟同样觊觎摩洛哥的法国达成了妥协。当时法国已经开始向摩洛哥派兵，而且占领了大港口城市卡萨布兰卡。1912年，摩洛哥正式成为法国的保护国，只有北部一片已由西班牙控制的地区除外。

一战爆发后最初几个月的战事中，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联军攻占了多数有德军驻防的德国殖民地。战争初期，在盟军阵营内部，日本在英国小规模派遣队的帮助下，获得了德国在中国和南太平洋的多数领土。

相比较而言，德国的东非殖民地是块难啃的骨头。在阿斯奎斯政府及其秘密助手们看来，既然如此，就很有必要破坏东非德国殖民地的经济。1914年8月，英军对坦噶尼喀的德国人发起了攻势，皇家海军炮轰海滨市镇巴加莫约和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独立后的首都)。英国人指挥下的印度军队随后也开拔到东非参与战役。不过，事实证明，德国将领保罗·埃米尔·冯·莱托-福尔贝克将军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对手。1914年11月，他击退了数量占据绝对优势的盟军登陆部队。此后，盟军的进攻一直收效甚微。1915年11月，皇家海军部队终于攻占了坦噶尼喀湖。1916年夏天，登陆部队先于7月攻占了坦噶，后来又攻占了巴加莫约。葡萄牙后来也加入了盟军一方。到1916年底，南非将军让·斯姆茨和一支葡萄牙部队联手将莱托-福尔贝克逼到了殖民地的东北角。

1917年，莱托-福尔贝克展开了反击。他攻占了坦噶尼喀的马西瓦，随后大举入侵葡萄牙人的东非领地(今莫桑比克)。莱托-福尔贝克当时手

下的兵力只有3000名欧洲人和1.1万名非洲民兵，却毫无畏惧地屡屡向人数多达37.5万人的盟军部队发起突袭和游击战。1918年11月2日，欧洲战场上，精疲力竭的盟军和战败的德国人开始偃旗息鼓，并于11月11日签署了停战协议，而在非洲，莱托－福尔贝克却入侵了英国的罗得西亚殖民地。停战协议原定于11月4日在非洲生效，莱托－福尔贝克却仍然在战场上厮杀。直到11月25日，他才率部在莫桑比克投降。英国人花了两周的时间才找着他，告诉他战争已经结束的消息。东非战事让英军伤亡6万人。莱托－福尔贝克的殖民地土著部队在德国名声大振，后来魏玛共和国还给他们发放退休金。1918年德国在战场上的失败彻底终结了德意志帝国。《凡尔赛和约》将德国在东非的领地瓜分一空，东部卢旺达－乌隆迪归比利时，鲁伍马河南部的一小片土地划归葡萄牙，称为莫桑比克，其他地方都归属英国所有，英国称其为坦噶尼喀。

在这4年中，莱托－福尔贝克牵制住了近100万的盟军部队，这些部队来自黄金海岸、冈比亚、尼日利亚、南非、英属东非、乌干达、桑给巴尔、比利时属刚果、莫桑比克、印度、西印度和英国。显而易见，德属东非是英国秘密经济战的一个重要目标。

除了德国本土和土耳其之外，英国也针对德属东非实施过造伪行动，这样的消息慢慢地在收藏圈里流传开来。英国人伪造了邮票，其中有些非常拙劣，显然是用于宣传的。二战及战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国家在战争中都使用了这一手段。一战期间，英国仿造了5种常用的德属东非邮票，上面印有威廉皇帝的游艇，后来被称为“霍亨索伦王朝游艇系列”邮票。乐观的英国印刷工还在上头加印了“G.E.A. BRITISH OCCUPATION”(德属东非英国占领)的字样。

莫里斯·汉基答应加入伪币行动时，英国皇家海军已经对欧洲大部分海域实施了封锁，也包括非洲的各个海港。莱托－福尔贝克驻东非部队所需的各种原材料及供给都被切断了。当地银行的马克都是从德国运过来的，如今已经断供了。1915年3月，德国当局授权殖民地印制“过渡纸币”。他们以为战争很快会以德国的胜利而告终，这种纸币不会用上很久。

关于英国伪造德属东非纸币的问题，有两份研究资料相当重要：伯纳德·萨尔福1972年发表于《钱币收藏家》的一篇文章以及1976年11月发

表于《纸币报告》的《德属东非的纸币》。萨尔福写道，真正的“20卢比的过渡纸币”于“1915年3月15日”在塔波拉印制，随后他又写道：

> 英国人在邻近的英属东非殖民地伪造了这些纸币，意图破坏德国殖民地的经济。英国伪币数量很少，不过很容易识别。纸张不是三层的（真币是三层的），颜色偏粉，正面手写的序列号跟背面印刷的序列号不一致。

1983年6月，一位钱币商人手中一张这样的伪币卖了400美元，他告诉弗里德曼，这张伪币跟1979年卖掉的另外一张可能是一样的。弗里德曼评论道：“显然，这种伪币非常少见，战后80多年来，鲜有发现。”

盟军战争的真正目的何在？

瓜分短命的德意志殖民地帝国、接手其市场及劳力只是一战盟友英国和法国的战利品之一。而在欧洲，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像在海上一样彻底摧毁德意志帝国的军队，大举入侵德国本土。当然，这一目标并未实现。

盟军最终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意志帝国经济的濒临崩溃，而战争以及随后的和平协议促成了崩溃的发生。经济史学家J.奥林·格拉伯对此有着相当直白的描述：

> 1914年战争……是代表英国，而非法国或比利时的利益……其目的便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彻底打垮德国，让它在经济上无法同英国抗衡。从1916年开始，除了战场上的军事战争外，一场有组织的经济战也已打响，为的是彻底置对方于死地。

格拉伯及其他作者都认为，协约国借助《凡尔赛合约》的赔偿条款给德国施加了经济重压，其后果无异于1916年至1919年经济战的延续。

1870年至1871年，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打败法国。此后俾斯麦治下的德国并未马上迎来经济的繁荣昌盛，直到1895年德国经济才完全复

苏。此后,除了 1901 年及 1908 年有过两次小小的经济衰退外,德国经济相对都比较繁荣,受惠的不仅仅是大工业家和私营银行家,还有中产阶级甚至工人阶级。19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一股萌芽状态的全球化风潮席卷全球,德国借此机会赶上了欧洲邻国,以及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殖民地帝国,具体表现为电气化、汽车的诞生以及随之而来的交通机动化,最重要的则是实现了无线通讯。

1914 年,在英国成功实施海上封锁的同时,各协约国政府及其中央银行发起了经济战,包括造伪行动以及经过审慎安排、威力强大的货币战争。

跟英国、法国及其他欧洲主要国家一样,德国拥有稳定的货币,那就是德国马克,1 马克折合 4.2 美元。随着战事的推进,盟军在英国封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其他的措施,马克开始逐步膨胀贬值:1918 年大战接近尾声时,1 美元折合 8.9 马克, 很快这个数字就上升到了几百、几千乃至几百万。到 1923 年,在大量伪币的作用下,通货膨胀益发势不可挡,马克已经贬值到了 1 美元折合 1 万亿马克的地步。下一章将详细讨论这一现象。

战争开始时, 除英国以外包括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内的所有参战方都已取消金本位制,纸币也暂时无法兑换为黄金白银,政府及中央银行控制市场、管理金融交易。不过,在像瑞士和瑞典之类的中立国家里,货币市场是开放的。二战时的模式与此基本相同,那些国际私人银行家及货币兑换商从中牟取了巨额利润。几乎可以肯定,英国情报部门在这些市场,尤其是荷兰市场安插了众多的官员及间谍, 霍尔那些密封于葡萄酒箱内的伪币和假邮票就是通过这些人散发出去的。还有一些伪币则被空投到德国或通过陆上边境线走私入境。

战争爆发之后,在中立国的自由市场上,法国法郎的价值很快下跌了 8%,意大利里拉跌了 17%,沙俄卢布跌了 28%。英镑最初还涨了一些,欧洲大陆资本的流入抬升了英镑的价格。美元已经具备了威胁英镑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的实力,如今依然坚挺。法国法郎最后终于也稳定下来。德国占领比利时期间,比利时法郎急剧贬值,几近崩溃。如前所述,据说德国人在战时伪造了比利时法郎。英国一直是盟军最重要的银行主。直到德国发动潜艇战,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才于 1917 年宣布美国参战。

不过，1915 年，就在英国准备秘密伪造德国马克的那一年，大量黄金涌入美国，威胁到了英镑的价格。英格兰银行于是将美元对英镑汇率固定在 4.764:1。为力挺英镑，英国借由 J. P. 摩根银行组织的一次行动，介入了纽约市场，此次行动的资金来源是纽约市场上的游资以及英国投资者义务上缴的美元资产。在银行家们看来，4.764:1 的汇率极大地超出了英镑的应有价值。英国由此获得了大量美元，在北美大批量购置军需品、食品以及各种战时所需物品。

脆弱的战后经济

战时本国货币的价值已经日益成为衡量交战国战果的一个指标。德国马克在战时极不稳定，沙俄卢布在各交战国货币中最为敏感、最为脆弱。欧洲各国都在支撑各自的货币，其中最具挑战性的货币战争斗士则要数德国那些经济战略家。

康奈尔大学教授乔纳森·克什纳尔指出，德国货币战争的目的之一是要同俄国之间保持和平。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同盟国伪造过沙俄卢布，不过随着沙俄军队的屡战屡败，卢布在不断地贬值，最后俄国退出了战争，并在 1917 年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德国战略家帮助流亡的列宁回国领导俄国革命，他们非常清楚，货币越脆弱，俄国就越得需要离开协约国，寻求和平。

战前，卢布基本上是由黄金作为后盾的，可以兑换为黄金或白银。到俄国革命时，黄金存量只有已发行卢布面值的 8%。投机商把赌注押在俄国战败上，卢布持续贬值；国内的造伪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16 年，莫斯科开始向柏林发出修好的意愿，德国的经济战略家们尽己所能地搜集卢布，然后用非常低廉的价格倾销到斯德哥尔摩的自由货币市场。卢布贬值越多，俄国寻求修好的压力也就越大。德国人在市场上换到了瑞典克朗、瑞士法郎等有价值的硬通货，可用于购买军需品。他们还用这些硬通货全部买下马克，以缓解其贬值的趋势。英国的造伪行动极可能促成了马克的贬值。

为了保护本国货币，德国和奥地利都严令禁止发行外汇票据。投机商

们只能从事地下交易。在日内瓦、苏黎世、斯德哥尔摩及其他中立市场，德国人和效力于他们的商人开始大规模买断马克，抛售法国法郎及其他货币。此举基本上没能遏制马克对美元汇率的下跌趋势，但却将马克对法郎的汇率从1:60暂时抬升到了1:90。德国人在瑞典抛售卢布的做法没能帮他们战胜俄国，1918年3月3日签署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与此也无直接关联。根据该和约，俄国放弃了对波兰、乌克兰、立陶宛、波罗的海各省、芬兰、外高加索的统治及司法权。不过，正如克什纳尔所说，德国人倾销卢布的行为是现代史上首例"为政治目的直接操纵货币"的案例，是二战时纳粹大规模造伪活动以及其他操纵他国货币行为的先声。

一战期间，同盟国和协约国都颠倒汇率，伪造敌国货币。每个国家都尽己所能地支持本国的货币、破坏敌国的经济。同协约国的举动加速了魏玛德国的通货膨胀，导致其经济及中产阶级的覆灭，并进一步导致了阿道夫·希特勒及其法西斯纳粹党的崛起。

后面我们将会讲到：一战盟友们在20世纪20年代针对上述形势采取的种种相互矛盾而又毫无成效的预防措施；魏玛共和国经济的崩溃以及部分复苏；法西斯分子在一战后对协约国的反击；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一战战败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秘密造伪者。

第九章
伪币作手、老千和法西斯分子：魏玛年月

德国输掉了战争，简直如梦游般地踏进了它未尝有过准备的共和国……大苦楚大尴尬的年代，醉酒的老兵油子脚踩滑板巡行街头，在一个似乎完全由满目乞丐、娼妇、残疾人和肥脖子的投机者组成的国家里。

——汉斯·萨赫尔《卫道士回忆录》，1934年

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魏玛时期和20世纪30年代的希特勒时期，勉力渡过当时经济、政治和道德危困的德国犹太人及非犹太人哪一段都不会忘记。这两场20世纪的灾难在历史上就像连体婴儿般并在一起。二者皆肇始于1918年开始的德国财政崩溃。

1965年在纽约召开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会议上，生于德国的国际石油问题顾问沃尔特·列维谈到了自己的童年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魏玛共和国。他说起他的父亲如何在战前气象繁荣的1903年签署了一份寿险保单，月月为这份为期20年的保单缴纳足额保费，可1923年当合同到期时，正赶上德国的超通货膨胀达到顶点，赫尔·列维老先生兑现了保单，整笔收益（面值数十亿马克的大堆钞票）仅仅够他买一条面包。

昨日的历史学家和今日的报刊记者一致认为，德国蓝领工人阶层与白领文员阶层穷困潦倒、忍饥挨饿的处境，对于希特勒及其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1933年的上台发挥了助推作用。历史学家和记者们钩沉了导致帝国马克的价值一泻千里直至彻底沦为废纸的诸多因素。大量来历不明或时至今日已难追溯其来源的伪币，随同魏玛当局大量印行的官方纸币以及各银行、各州乃至市镇政府发行的钞票一道流通，一同落向万劫

不复的深渊。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或者是没有人愿意追究和考量以下问题：战时及战后英国与其盟国伪造货币的行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拉动了德国“高烧式的”(借用沃尔特·列维的说法)超通胀。

职业老千主持的伪币制作，对于延续36年之久的构成简单、作风峻厉的葡萄牙萨拉查政权奉行的法西斯主义(有时也被称做“社团主义”)的形态起了直接影响。(此例将在下一章中展开。)历史上，伪造货币也是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屡试而终弃、希特勒在1939年至1945年世界大战期间投入了比苏联大得多的人力物力、旨在摧毁西方经济和社会的阴谋。贝尼托·墨索里尼与意大利法西斯集团的谋士们在这一点上还算有头脑，对大规模通货膨胀加以遏制，同时以严厉手段打击伪币，故二者在墨索里尼统治期间均未对社会构成冲击。

伪币在法西斯头子阿道夫·希特勒的发迹史上究竟起到了何种作用，有些线索是不容忽略的。魏玛时期希特勒的蹿升与同步发生的德国中产阶级的瓦解作为悲剧原本可以避免——而且当时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们差一点就躲过了这一劫。这些主角既包括复仇心切的协约国政治家——特别是法国、比利时两国政要，因为大战中在德国手里吃尽了苦头，一心借《凡尔赛条约》等停战协议将屈辱性的、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加到德国头上——也包括了战后涉足德国政坛的多方人士：引人注目的极端分子，麻痹大意的民主派，诚信度良莠不齐的银行家，极左派教条分子，法西斯分子，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和犯罪分子。很快，我们就会谈到其中的几个。

变革频仍

随着1917年4月美国参战而投入进来的数量巨大的金钱、人力和武器，使胜利天平猛然倾向了协约国一方。协约国发起的，和经济间谍的渗透相辅相成的经济战，特别是英国实行的封锁，可谓一大撒手锏。德皇想不出多少办法，欲借潜艇战突破封锁，也难以取胜。为协约国立下头功的是英国海军情报处40号房间的男女工作人员。他们或者伪造敌人的货币(当然，这与其说是主攻项目不如说是顺手之劳)，或者破译敌人的密码——预先掌握并最终阻断敌方船舰和潜艇在海面上下的一切活动。

尽管一些硬通货和战略物资从中立国悄悄流入了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但在中央权力控制的中欧地区，食品和燃料的短缺程度日益严重起来。在德国，衣服也和食物一样成了稀有品。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民众，和比利时、塞尔维亚等被德奥占领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一样，开始了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苦苦支撑的生活。由于基本的大麦、黑麦一类粮食匮乏，大家不得不常常对付着用马铃薯和蔓菁做的面包果腹。大量牛、马、山羊和绵羊被屠宰，变成了盘中餐，致使欧洲大部都陷入了缺衣少食的境地。

至 1918 年夏秋间，德国对法国的最后一次大进攻以失败告终。德军总指挥保尔·路德维希·冯·兴登堡和埃里希·鲁登道夫两位将军提醒德皇威廉二世：1918 年 10 月是与协约国实现体面停战的最后期限。威廉的亲戚马克斯·巴登亲王受命出任首相。作为首相，他邀请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列示有关和谈条件。然而协约国想要的是号令而不是协商。他们迫使德国接受了一切条件中最苛刻的部分，协议签订于法国贡比涅。后来也是在贡比涅，希特勒反过来迫使 1940 年被德国闪电战击败了的法国接受了他的苛刻条件。签约双方为时任协约国军最高统帅的法国元帅弗雷德里克·福煦和德军上将威廉·格勒纳。一些历史学家坚信，协约国不应该在未能武装占领德国境内的领土之前同意进行停战谈判，执此见解的学派同时认定，威尔逊总统在拒绝直接同掌握实权的德国最高统帅部打交道这一点上犯了错误。

结果就是，德国民众整体对于他们这一次失败得多么彻底、损失有多么惨重完全缺乏认识。于是兴起了一个经久不息的德国神话，也就是被希特勒和像约瑟夫·戈培尔这样的纳粹头牌理论家看中的、添油加醋后进行广泛宣传的“匕首刺背”说。这套迅速流行开来的说辞称，德国并未真正战败，相反，是内部的“颠覆分子”出卖了它，“和平派、自由派、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尤其是犹太人(特指某些银行家)削弱了国境内的防线，直闹到军队再也打不了仗的地步”。

著名历史学家兼媒体评论家尼尔·弗格森 2006 年出版的《世界大战》一书中对导致魏玛共和国最终灭亡的缘由做了有力的概括。弗格森强调，魏玛政权在打造社民主义福利国家的同时设法去偿还（也设法去逃避——弗格森可以再补上一句)《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巨额赔偿，它所做的

是不可能做到的事。1923 年的超通货膨胀由此酿成，希特勒未获成功的啤酒馆暴动就发生在这一年的慕尼黑。希特勒被囚期间写了《我的奋斗》，该书在今天的新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圈子里仍极受追捧。经历短短几年的恢复后，1929 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德国经济随之迅速回落。弗格森重申，通货膨胀的愈演愈烈对德国人来说，意味着他们先前稳如磐石的中产阶级已土崩瓦解。早先的德国社会“百般珍视的和平与秩序”已灰飞烟灭。极左派和极右派策划的，多数伴随着喋血场面的政变和骚乱此起彼伏，从 1918 年一直延续到超通胀有所缓解的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将上述品质抹杀殆尽。德国在政治上的分裂为 1933 年希特勒赢得普选打开了方便之门，选情发生逆转是在 1930 年，而分裂要上溯到 7 年以前，当时堆满手推车的不值钱的钞票正象征着魏玛共和国的破产。

一战结束前夕，大变局已初现端倪。1918 年 10 月中旬，德国海军在基尔港发动哗变，事件很快平息。紧接着，在记者库尔特·埃斯纳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激荡下，慕尼黑爆发左派起义。和当时流行的观点相左，埃斯纳将战争完全归罪于德国。巴伐利亚人破了产。他们对纸帝国马克的信任度几乎降到了零点。巴伐利亚同样伪币横行。很多人相信，如果获胜的协约国军队进占南德意志（协约国在一战中并未这样做过），肯定还会冒出更多的伪币来。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国王逃跑后，工人、农民和士兵组建了治国委员会，11 月 7 日宣告成立了一个很快便夭折了的共和国。动荡蔓延到了柏林。一位名叫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前制鞍匠在柏林郑重就任新成立的全德意志共和国的首相，德皇退位后，共和国随即将首都迁往魏玛。

应时性的利益联姻将温和的多数派社民党和独具布尔什维克倾向的独立社民党绑到了一起。这个缺乏基础的结合受到了“斯巴达分子”的挑战，领导斯巴达克同盟的是诸如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萨·卢森堡等共产主义者。这两名共产主义者都在柏林一次大规模血腥镇压中死于非命。对付所谓的“赤党”，艾伯特总统成功地动用了改头换面了的、由一些退伍军人和急需解决饭碗问题的饥肠辘辘的青年新兵组成的“共和国军队”：德国国防军。停战协定和后来的《凡尔赛条约》意欲解除这些军人的甲胄和重型武器，还有他们的战舰和飞机。而德方显然突破了限制，二战中间，德国又如法炮制，把同样的限制套到了法、比等前协约国成员的头上。

艾伯特政府的代表带着不得向协约国的漫天要价让步的明确指示，于 1919 年 4 月动身前往凡尔赛。待协约国将条件一一抛出，德国人亦不得不接受对他们来说苛刻得匪夷所思的要求：放弃德国八分之一的领土、650 万人口、分布在全世界的各个殖民地以及一切海外投资。自然，放弃投资的条款意味着，德国还没有开始偿还赔款就已经损失了金额上亿的掌握在外国人手里的硬通货。在欧洲部分的领土损失包括：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奥伊彭、马尔梅迪、莫列斯纳划归比利时，上西里西亚的一部分划归波兰和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西普鲁士和波兹南划归波兰，但泽交由国际联盟委任统治，默麦尔交由协约国统治；在中国的胶州湾移交日本；其余在太平洋地区和非洲的领地权被协约国以国际联盟委任统治的名义瓜分完毕。莱茵河地区暂由协约国占领。德国国防军总员不得超过 10 万名，普遍义务兵役制废除。海军仅允许保留少量海上舰只，不得拥有潜艇。总参谋部解散。最屈辱的莫过于《凡尔赛条约》第 231 条：认定战争造成的一切人员和财产损失均由德国当局承担。这一条构成索取巨额赔偿的平台。凡此种种自然让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正中下怀，纳粹的宣传机器很快就忙活开了。

伪币及对策

1914 年至 1918 年，政府连连印钱用来支付战争开销的时候，帝国马克还只是缓慢地贬值。1914 年 8 月，马克对美元的比价站在 4.20:1 之上。协约国持久且步步紧逼的经济战——主要就是英国的封锁，更逼得德国只能不断加印钞票，用现款来充当对远离帝国的前哨的补给。这在前一章有关英国印制德属东非马克的部分已有提及。

德国的银行家们一开始并没从通货膨胀中嗅出多少危险，认为任何旷日持久的战争必然伴随着一定程度的通胀。大债权人和实业家对此还求之不得，指望收进的数量远多于平日的以硬通货支付的债款能让他们在日后发上一笔横财。但是在停战谈判进行时以及 1919 年年初几周，甚至直到签订《凡尔赛条约》前夕亦未见平息的骚乱和动荡中，马克对美元汇率下跌到了 8.90:1。军队遣散费加上付给协约国的作为战争物资及燃

料补偿金的巨款加速了通胀的发展。要知道德国在战争结束时背着1440亿马克的国债，其中890亿为长期债券，550亿为其他类型的债券。中央政府和帝国银行驱使共和国的印钞机开足马力，源源不断地印出更多更多的钞票。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品质参差不齐的伪币，不知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印的（很可能既有国内印的也有国外印的），开始涌入经济生活。流言四起，怀疑帝国银行与包括庞大的德意志银行在内的私人银行无意当中接受了伪币并给予重新发行。（20世纪90年代美国发生了多少有些类似的问题，不过为时甚短。联邦储备银行在迈阿密和佛罗里达的机构无法将一些自中东流入的“超级伪币”检测出来。银行发行新的纸币替换了它们，被换纸币所代表的价值也一并被纳入。）

1919年6月，帝国银行发表正式声明，否认引导舆论风向的两大德意志期刊上关于它接受了伪币的说法。《德意志》也称，有俄国人在柏林豪华酒店阿德隆使用伪造的巴伐利亚地方纸币结账。巴伐利亚货币发行银行、中央银行和州政府都被告知了此事，但各方似乎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20世纪20年代中期，法国军队未征求其他协约国成员的意见就开入鲁尔[①]，意在逼迫德国缴付赔款，占有德方资产，包括铁路全部车辆、煤炭，甚至架设电话线的杆子。当时，涌动于德国经济领域的伪币已达到非常大的比例。法国的行动引发了这样的谣传：占领军随身带着伪造的德国货币，用做日常花销来满足他们的各种需要。柏林警察局长与帝国银行方面一致认为，有必要增设一个专门的反伪币机构。希特勒及其纳粹理论家忙着煽风点火，挑动很多德国人旧有的反犹倾向，还要把它升级为一种准国教，德国报刊有关俄罗斯犹太人进行非法货币交易的捕风捉影的报道流露的正是这种反犹情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伪币流通开始趋于失控，通货膨胀一时间却降了下来。

---

① 鲁尔是德国最大的工业区，1923年1月11日侵入鲁尔的包括法国军队3万余人和比利时军队2500人；1月25日，英国驻美大使和美国国务卿会谈时明确：在法军采取行动前，英美政府没有从普恩加莱（当时的法国总统）那儿得到任何声明。——译者注

缓和期很快终结。1922年年初几周，纸马克对美元比价跌到了20:1。用德国最敏锐的一位记者兼历史学家塞巴斯蒂安·哈弗纳的话讲："也就是说，德国的货币资产蒸发掉了。"

什么是造成超通货膨胀的主因？国外流入抑或本土出品的巨量伪币，占纸马克的平均比例有多大？第一个问题回答起来比第二个问题简单得多。通胀—超通胀—崩溃，其他地方的货币在历史上也经历过。1949年中国内战末期，等着被共产党接管的上海就经历了类似状况。1989年7月，阿根廷的物价一个月内上涨了近200%。而德国的这场"钱疫"是最凄惨的，整个即使被战争伤了元气也还算得上发达的经济都被它拖向了毁灭。政治方面，包括希特勒一步步爬上权力顶峰等事件，与此也有着密切的关联。1923年11月9日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暴动，在此之前，与1美元等价的马克的数值从1月时的17972飙升至7月的40000，随后以极速到达了11月的4.2万亿。大多数历史学家将这一使全民陷入赤贫化境地的货币加速贬值主要归因于在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宣布德国未履行《凡尔赛条约》所规定的赔偿义务后，法国(后来又加上比利时)在上年冬季和这年春季对鲁尔的制裁性占领。

当然，危机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战时国会的预算只有不到10%来自税收收入。爱德华·蒙泰居先生、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和包括英国的伪币计划在内的其他协约国经济战的设计者们想必知道，战时德国国会无限期中止了公民以纸币兑换黄金的权利。帝国银行被允许以政府债券和商业票据等有价证券充当储备。法律要求以此类储备作为新发行货币的价值保证。因此，德国和奥匈帝国政府只要不断加大马力驱动印钞机就能解决战争经费问题。

1919年至1923年间，德国存在着数以几十亿金马克计的巨大财政赤字。税收对支出的比例从未高于35%。一些私人银行和地方银行也在进行的钱币印制，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描述的，达到了"奋不顾身"的程度。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经济学家对法国和其他协约国发出了警示：条约规定的赔偿数额因1923年危机的抬头而愈见沉重，远远超过了德国全部资产的价值。然而经济学家的努力未见成效。赔偿不光要求弥补战争导致的直接损失及其后果，还包括了为死亡及幸存的协约国士兵提供抚恤金

的部分。即使不把如今的金融术士很可能会称为“垃圾债券”的那些票券计算在内，总价值亦高达 175 亿美元。这在当时属于天文数字，相当于英国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协约国方面，特别是法国，不愿意见到德国出口回升。另外如《经济学家》指出的，它们也不愿意支援人力重建欧洲。

如此，印刷机源源不断地吐出形形色色的真钞、伪币，德国的总货币供应量从 1903 年 11 月的面值 292 亿马克跃升至 1923 年 11 月的 4.97 万亿亿，正是沃尔特·列维的父亲那份不走运的寿险保单存续期间。

魏玛政府发起了号召积极抵抗法国和比利时占领军的全民运动。(动作之一就是暗中伪造法国货币。我们会在下文中讲到。)为酬答在被占村镇和工矿一次次发动总攻的工人们，当局继续发行更多的纸马克。就像诸如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期间发生的其他超通胀式“钱疫”一样，“真”和“伪”之间的界限变得很窄，人们干脆不再加以辨别。德国人匆匆忙忙要赶在涨价之前买进面包、菜豆、书籍，没工夫也没心思对购物所需的大摞钞票逐一检查。有时候价格一天之内就会上涨 10 倍。各市政府开始发行印在价值远高于纸张的丝绸、亚麻或皮革上的本地纸币。这些被称为“应急钱”。其他印刷厂，有私营的，也有黑店，都纷纷印起了纸币。在造假成风的高峰阶段，300 多家造纸厂和 2000 多家印刷厂一天 24 小时运转，以满足对于一切形似真钞的“印刷品”的需求。

1923 年 11 月，也就是列维家为了一条面包兑现那份 20 年期保单的时候，确实存在着沃尔特·列维、历史学家路易斯·施奈德和其他人称做“身不由己的狂舞”的现象。一个挽着一筐子百万(甚至 10 亿)马克大钞、两眼放光的女子来到柏林一家肉铺，把钱筐摆在入口处的地上，排到队尾，不管什么肉制品，只要轮得上，她都准备买下。突然，她发现自己的钱筐被人丢弃在排水沟旁，装满的钱已被偷走。主妇们购买食品，一天得跑好几趟，一磅黄油、一方奶酪的价钱 24 小时内有可能上涨 4 倍。一个妇女要花她六周的薪水才买得起一双新鞋。有轨电车司机要待乘客下车前才肯收下车钱，因为就在短短几分钟的车程内，马克的价值说不定又跌去了不少。与此同时，持外币的“肥猫”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要不了几张 1 美元票就能订到歌剧院的王室包厢。

1923 年，在柏林，一对正要庆祝金婚的英国夫妻收到了官方发来的函

件，被告知，依照普鲁士风俗，市长将会登门拜访并赠礼金。次日上午，身着礼服的市长同几个官员来到老人的住处，以普鲁士州的名义奉上了1000,000,000,000(1万亿)纸马克。这笔钱相当于英国夫妻口袋里的半便士。

"钱疫"对德国社会造成的影响，在那个时期的书籍报刊、戏剧、音乐和像马克斯·贝克曼、乔治·格罗兹等等印象派画家的图像中均不乏鲜明的记录。读者可参阅克里斯托弗·爱舍伍德的作品《柏林故事》，观看改编成话剧的《我是一台照相机》或歌舞剧《夜总会》。请看当时一位作家笔下的柏林街头：

> 德皇肖像坐落于裸体艳女丛中；皇储迈宁根与"女性美的典范"比肩而立……再往前走，"人体奇观夜总会"跃入眼帘……妓女，皮条客，小贩。从雨衣到可卡因，从珠宝到爱情——应有尽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些人变卖所有，另一些人只肯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掏美元，人类的清仓大卖场就这样开了张。就像人平常出卖劳动、体力或智力那样，如今他们卖他们自己，肉体加上灵魂……样样都有价钱，用价值数百万马克的美元标记，价钱很贱。

但凡有点值钱的物件，特别是贵金属，人们都拿出来换别的东西：吃的，穿的，药品。搞得到美元、英镑或其他可靠货币的德国资本家"肥猫"大发横财，最管用的一招就是逼债。而依靠固定工资、银行储蓄、保险年金等马克收入的人全破了产。中产阶级和坠入了贫困、后来全心拥护希特勒及其国家补助全职就业政策的蓝领工薪阶层一样，失去了他们所有的积蓄和资产。在最糟糕的那几个月，尽管德国整体资产因支付赔偿而大失血，但像蒂森克虏伯和法本等几家顶尖大公司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放贷者的注资，手持外币，依然维持景气。大债权持有者，比如一些私有银行，借着向外国人追讨旧债——要求债主从海外以金、银、美元或英镑偿还——获得了大把收益。

美国人出手

就在 1923 年 11 月希特勒在慕尼黑首次向权力发起冲击而未果之前，重重黑暗中闪现出些许转机之光。

1923 年 8 月，魏玛政坛最具政治家风范的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出任总理。他随即展开工作，为深渊中的德国寻求出路。斯特莱斯曼政府设立一家新的地产抵押银行，发行新货币以取代铺天盖地的不值钱又赝品百出的马克，但该币很快被正式召回，未及召回的亦遭抛弃。希尔玛·沙赫特被任命为货币专员，此人早先被披露曾于 1914 年至1918 年德国占领比利时期间伪造比利时法郎。甫一上任，他便暂停了官方的纸币印制。沙赫特治下的地产抵押银行旋即着手发行以土地和房产价值作为信用保证的地产抵押马克。(约翰·劳以及 18 世纪法国大革命指券的余响！)沙赫特赋予地产抵押马克与战前金马克相等的价值：24 美分。

美国人来了。查尔斯·G. 道威斯这位随后因帮助德国摆脱困境而分享了 1925 年诺贝尔奖，并在 1925 年至 1929 年卡尔文·柯立芝任总统期间作为共和党人出任副总统的美国银行家于此时登上前台。道威斯受命领导一个欧洲协约国同时参与的、旨在安排德国赔偿事宜的委员会。在对德国的实际偿付能力做了长时间仔细研究后，道威斯及其手下制定了 1924 年 4 月公布的所谓《道威斯计划》。该计划确立了外国对于德国财政的实质性监控，指定了根据德国的收入(比如新交通税、铁路债券、工业企业债券，以及啤酒、烟、糖等商品的销售产生的收入)缴纳赔偿的比例。不过，它未就结清赔偿的时间设立最后期限。德国须一直支付下去，不知道赔偿将持续到何时为止。一系列美方借款充当了计划实施的润滑剂。

这样一来，美国资金大批涌入德国。德国使用美元或部分美元来清偿赔款：一方面资金周转流回美国，另一方面也部分满足了《凡尔赛条约》中其他协约国的要求。多数赔偿归英法两国，这样它们就能向美国偿还各自欠下的好几百万战争借款。美国则相应地可以把更多的钱借给欧洲，特别是德国，作为储备及投资。

德国政界和实业界人士随即养成了万事指望美元的习惯，指望美元

的涌入将永无止境。而在 1927 年，斯大林尽管自己正急需货真价实的美元，却已经开始动手制造伪币，试图对美元发起攻击了。1929 年由美国股票市场崩盘引发的大萧条，猛然间击碎了德国人对于美元持续性流入的幻觉：投资和借款渠道纷纷枯竭。银行灾难性的倒闭造成了经济的不景气，也让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大陆愈演愈烈。

1923 年至 1924 年斯特莱斯曼的班子上任头几个月里，与地产抵押马克的问世同时，政府发行了至 1935 年到期并可兑现的“金债”票券。通货膨胀开始明显消退，远比汇率的升值来得快速。物价随即稳定下来。肉类、黄油以及用小麦、黑麦做的面包等等食品替代了艰苦时期的合成面包。不过，超通胀给德国社会留下了永远的伤痕。数百万德国人一生的积蓄化为乌有。其后，在约瑟夫·戈培尔、出版商尤利乌斯·斯特莱歇尔这些人（更别提写了《我的奋斗》的希特勒本人了）的纳粹宣传的蛊惑下，他们捡回了从前那套阴谋论：德国从 1914 年开始就被犹太人、国际银行家和国内那些对垂涎于赔偿的协约国持姑息态度的派别结成的集体在后背捅了刀子。

1981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运用集体心理学原理编排其小说情节。他把纳粹对待犹太人的方式同魏玛时期的超通货膨胀联系起来：敌视、贬黜，搞得犹太人如同从前德国的帝国马克那样，可以被“千人万众毫无顾忌地摧残”。《经济学家》1999 年的社评提到，卡内蒂的类比虽然牵强，但“失控的货币是致使整个国家道德沦丧的缘由之一，这一点他没说错”。

反戈一击

此前不久，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军方人士，同政客以及见缝插针的老千一道，主动谋求某些财政方面的动荡。他们的中心目的（似乎被严重地歪曲了）是要制造数量庞大的以法国法郎为主的伪币，通过扰乱占领方的经济来伸张德国对协约国的报复心理。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布达佩斯作为战败的、贫困化了的和陷入破产中的匈牙利的首都，饱受通胀和伪币的困扰，对于二者的恐慌不断升级。

1920年的《特里亚农条约》削去了奥匈帝国原匈牙利部分将近四分之三的领土和三分之二的居民。新的缩小了的匈牙利同意向协约国支付赔偿，军队员额仅限于3.5万人，并承担原奥匈帝国的部分债务。余下的800万居民在1918年的下半年经历了一场革命，之后却未能如愿建立起一个共和政府，该政府计划由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贵族米夏埃尔·卡罗伊伯爵和一位匈牙利布尔什维克、列宁的追随者贝拉·库恩联手领导。库恩从莫斯科返回后在布达佩斯一度身陷囹圄。贝拉·库恩很快将匈牙利领入了一小段红色专政时期。当侵入匈牙利的罗马尼亚军队攻至布达佩斯时，他被撵下了权力宝座。1920年2月罗马尼亚军队撤退前将布达佩斯城洗劫一空。《特里亚农条约》签订前夕，尼古拉斯·霍尔蒂(一位没有海军的海军上将)担当了国家首脑。他宣布匈牙利为君主制国家，但无人居于王位——在逃的奥匈帝国皇帝正流亡瑞士。

匈牙利战后的形势大大有利于伪币的孳生。根据停战协定的规定，原奥匈帝国的钱钞，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后继国须在上面加戳记，而后用新货币取而代之。旧纸币所盖印章极易伪造，以至于在匈牙利流通着不计其数的旧币。这就助长了通货膨胀的势头，直至变成超通货膨胀。贝拉·库恩的苏维埃共和国结束后，维也纳的前奥匈帝国中央银行宣布，所有克朗币——贝拉·库恩的政权发行的战后匈牙利的第一种货币——均系伪造。1925年的货币改革以潘戈取代了克朗，12500克朗可兑换1潘戈。这次改革多少可以和发生在德国的货币改革相提并论。

针对法国法郎的阴谋成形于柏林、贯彻于布达佩斯，实际上它开始得更早，1923年下半年至1924年上半年就付诸行动了。德国作家乔治·克雷奇曼指出导致攻击法郎的缘由之一：

> 法国人在1923年占领鲁尔期间带来了大量伪造的帝国马克纸币，以便进一步损害已经不堪一击了的德国财政。

克雷奇曼没有指明假马克印制于何地。如果他的信息是真实的，那么公允的推测是，伪币既有可能是在法国、比利时造的，也说不定是从战争时期英国海军情报处负责人、代号“布林克尔”·霍尔那些没有交付的酒桶

流出的“遗存”。

卡尔海因茨·瓦尔兹也是一位二战前曾供职于德意志联邦银行[1]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德国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对德国伪币做了专门研究。瓦尔兹在一本著作中提到了冯·泽克特将军所领导的魏玛军队情报部门，该部门通过秘密与苏联展开合作暗中践踏《凡尔赛条约》要求解除武装的规定，有时被谑称为“黑暗国防军”，

> 马克斯·霍夫曼下令印制法国法郎和苏联钞票，为此特别聘用了一批卸任官员和有前科的俄罗斯移民，根据德国高层提供的有关知识进行伪造活动。

这一活动，由匈牙利的舞弊之徒和心系法西斯主义的冒进政客于1924年构想并付诸实施。此事最终在国际上引起了高度关注，成了促使总部目前设在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创建的一大因素。各方面材料表明，行动的主要执行者正是马克斯·霍夫曼和马克斯·波尔两位上校率领的前魏玛情报部门的“转包商”们。他们手里的印刷机、印版和其他设备让匈牙利的阴谋分子省了不少力气。

行动的后台老板和实际的主导者是路德维希·温迪斯格雷茨亲王，一支古老的奥匈贵族的后裔。他的家族是封建领主，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正如常被人指出的那样，它既不神圣也非罗马，只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主体的过时称谓，到了后代那儿差不多和“哈布斯堡领地”是同一个意思）的孑遗。这个名字连同哈布斯堡的实质随着一战后的《特里亚农条约》而告消亡。该条约将奥匈帝国的匈牙利部分，如同奥地利本身那样，撕裂成一个又小又穷、政治经济乱象丛生的国家，领土只剩下三分之二，操马尔扎语的居民[2]仅余原来的58%。1924年，38岁的温迪斯格雷茨有着充满了危险和刺激的经历：参与过1904年的日俄战争；旅美期间被几桩祸事送入了纽约一所监狱；在非洲猎狮；在塞尔维亚为奥匈帝国搞地下工作；在欧

① 德意志联邦银行，即德国中央银行。——译者注

② 马尔扎人是匈牙利的基本居民。——译者注

洲的赌馆和马场输掉了大票家资。

一战结束后，回到匈牙利的温迪斯格雷茨囊中羞涩、债台高筑，但又不愿意将祖传的产业变卖或拿来与人做交易，祖产中包括出产在匈牙利大受欢迎的托凯葡萄酒的葡萄园。替退位的卡尔皇帝沽售哈布斯堡家族的珠宝和油画这件事，他也办得一塌糊涂。和大部分同胞一样，这位亲王对搞穷了他们的国家的协约国的做法痛恨极了。匈牙利的政治局面促使满腹国仇家恨的温迪斯格雷茨相信，对他自己和对匈牙利，冯·泽克特将军及其在德国情报机构的上司们提出的针对协约国的大规模伪造货币行动应该是一条出路。

从布达佩斯的角度或者说从温迪斯格雷茨的贵族产业的角度来看，匈牙利可以说是陷入了绝境。贝拉·库恩在战后短促的革命被残余军警力量无情地扑灭了。尽管不像当时德国的情形那么剧烈，匈牙利货币也正面临超通货膨胀的加速演进。而这儿存在着一个“没有国王的王国”，最详尽地记述了20世纪20年代通胀、伪币和政治极端主义的各种表现的作家莫里·布鲁姆这样描述。

匈牙利名义上处在作为摄政者的海军上将尼古拉·霍尔蒂的统治下，此人后来被说成是独裁者。总理斯蒂芬·拜特伦领导的联合党在议会的245个席位中占据着169席，联合党人都对复辟哈布斯堡王朝这一完全背离了现实的目标抱有幻想。其他政治派别中，势力最强的有极端民族主义者、法西斯社团和作为原住民的马尔扎人征召的武装民兵组成的TECZ，该联盟汇集了多个右派团体和民兵组织（同一时期的魏玛共和国正饱受武装民兵的祸害）。

在1923年的下半年或1924年的上半年，曾试图在啤酒馆暴动中助希特勒一臂之力的鲁登道夫将军和情报专家马克斯·波尔上校，温迪斯格雷茨都拜会过了。这两位德国官员削尖了脑袋在为棘手的战争赔偿的支付问题找办法。魏玛的军界首脑甚至于走到了这一步：请了一批科学家，在诺贝尔奖得主、德国化学天才弗里茨·哈贝尔的带领下，从海水中提炼所需要的黄金！这个方法虽然理论上可行，苦于开销过于巨大，只得不了了之。自称精通炼金术的39岁的弗朗兹·陶森德，高调进行了用氧化铁和石英造黄金的公开实验，未果。用黄金解决问题的希望自此破灭。

魏玛情报机构高层于是认定,伪造大量坚挺的、有黄金支撑的纸币,用它们来支付赔偿和购买一切能买到的物资才是上策。黄金保证的法国千元法郎大钞似乎是最合适的猎物了。为制作印版,德国情报人员拟将一员名叫亚瑟·舒尔茨的柏林刻版高手招至麾下。但是保尔·兴登堡将军作为旧式普鲁士德行的捍卫者,基于道德考虑反对拿伪币当武器,否决了任用舒尔茨的提议。

温迪斯格雷茨结束在德国的会晤后回到匈牙利搜罗其他帮手。他被灌输了伪币计划,然后又把它灌输给了一帮既欲谋取私利也渴望对法国还以颜色的来自各种背景的匈牙利人。成为他同谋的有匈牙利国家警察总署首脑埃梅里希·冯·纳多希,还有陆军少校、匈牙利制图研究所的技术专家拉迪斯劳斯·格罗,假法郎的制作就准备在这个制图研究所内进行。温迪斯格雷茨可以得到亚瑟·舒尔茨从柏林秘密提供的用于造法郎千元币的纸张,还有在押的职业伪币作手尤利乌斯·梅萨罗什的帮助。

作家莫里·布鲁姆列出了三条温迪斯格雷茨为其同谋擘划的纲要:

一、制造价值1亿美元的法郎千元币(当时每张约值32美元)——他们相信这么大的一个量,只要传播得够广,就能搞垮法国经济。

二、为1925年圣诞节当日在匈牙利举行的法西斯—君主主义暴动订立计划,并提供所需资金。

三、使空缺的匈牙利王位重归哈布斯堡大公奥尔贝特(卡尔皇帝已于1922年去世)。

温迪斯格雷茨允诺为行动调拨专款。他私底下计划在假法郎投入流通产生的利润中抽取40%,这是他未向同伙声明的一点。很快,他就发现,要造假钱他首先需要不少真钱。他出得起的仅仅只有约1300美元。法西斯组织TECZ的领袖、经营着邮政储蓄银行的加布里埃尔·鲍罗什提供了6000美元的无抵押借款,这笔钱是他从邮政银行的资金中拿出来的。一台莱比锡产的特制印刷机购自德国,还有些工具是沿多瑙河航行的匈牙利拖轮运来的。协约国军事委员会仍然设在布达佩斯,为了避免被委员会官员查到,制图研究所的一些区域设置了炸药,以防备来人视察或遭突击搜查。

至1925年夏天,受经费匮乏和由此导致的技术低下的限制,每天生

产的法郎千元币不足1000张。尽管先前已将目标降到了仅仅制造约合3200万美元的100万张纸币，路德维希亲王又再次将目标值削减到了价值320万美元的10万张纸币。策划者放弃了通过整垮法兰西银行造成法国经济崩溃的念头，只希望以此资助酝酿中的1925年12月政变。

鲍罗什对匈牙利的银行家友人展示他们的产品后，情况显得更加不妙了。银行家们告诉他，仿制水平低得可怜，就连普通的检查也通不过。鲍罗什的心悬了起来。如果连布达佩斯的银行家都能轻易看出有假，那还怎么指望拿它们在那些熟悉法郎千元币的西方国家首都里放贷呢？鲍罗什把心一横，对总理拜特伦透露了此事，后者要求他不可谋求在匈牙利扩散这些票子。

无论如何，在1925年12月初，参与者照样实施起了他们的散布方案。为首的传播人阿里斯蒂德·扬科维奇上校是一名能征善战的武将，但在金融方面实在谈不上有何本领。不过他的连襟、国防部长卡罗利·查基伯爵举荐了他，还随他一同投入了这项"爱国"行动。另一名传播人头目、炮兵上尉格奥尔格·毛尔绍夫斯基曾做过霍尔蒂上将的助理，既是匈牙利法西斯党创始人暨领袖尤利乌斯·格埃姆博斯的秘书，也是法西斯—君主主义集团想要扶上匈牙利王位的奥尔贝特大公的好友。一旦伪造的法郎成功流通——只要不晚于平安夜，格埃姆博斯的法西斯暴动队伍就将占领布达佩斯。那么奥尔贝特大公就将在圣司提反大教堂由集团成员之一毕晓普·扎德拉唯茨主持加冕为王。霍尔蒂上将则成为王军总指挥，包括格埃姆博斯在内的其他举事者成为内阁要员，路德维希·温迪斯格雷茨亲王出任总理。

印成的纸币一部分存于温迪斯格雷茨的府邸——邻近托凯和捷克边境的沙罗什保陶克的一处城堡内，一部分在毕晓普·扎德拉唯茨的家里。路德维希亲王的管家卡斯珀·科瓦奇用挂号信寄了6张法郎千元币给在荷兰一家银行做出纳员的朋友泽韦林，请他将约合192美元的6000法郎按照通行汇率兑换成荷兰弗罗林。事情成了。伪币在荷兰的顺利过关让温迪斯格雷茨敢于在12月12日派遣传播人员前往被选中的欧洲国家首都。每人携带着面值约合25万美元的仿版法国货币。神经紧绷的扬科维奇上校在荷兰入境时遇到了问题，因为布达佩斯的组织者忘了给他的外

交护照办好荷兰签证,12 月 13 日他在阿姆斯特丹一下火车就被告知必须在两天之内去海牙补办手续。他在旅馆房间打开一个预备交给驻海牙的匈牙利公使的包裹，取了约合 8000 美元的 25 张法郎千元币揣在上衣口袋里,来到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在那儿,他同预先约好的毛尔绍夫斯基以及使用假名持罗马尼亚护照赴荷兰的另一名传播人格奥尔格·曼科维茨碰了头。扬科维奇把钱转交给他们。他们在归整时不慎漏了两张。扬科维奇就把这两张票子塞进自己的皮夹,和两张真正的千元法郎、若干荷兰弗罗林放在一起。

星期二扬科维奇来到海牙,办妥了签证。他犯了一个最终决定了整个行动的命运的错误:错拿了一张他以为是真钞的伪币,在一个兑换处换荷兰币。伙计接过一看就火了，质问他怎么敢用这么粗制滥造的伪币来蒙人,随即打电话报了警。扬科维奇抢回钱塞进袜子,扭头就跑,还是被警察追上了。来到警察局他先是一口咬定这张钱取自银行,后又改口强调自己享有外交豁免权。而匈牙利公使对秘密行动未尝与闻,不愿出面做保。扬科维奇身上的一张字条牵出了另两名 12 月 13 日和他碰过面的传播人,包括他们各自的旅馆地址。警方迅速对所有线索展开排查,发现有 4 人涉案。起初他们拒绝开口。奈何时运不济:在卡斯珀·科瓦奇寄出的那 6 张千元法郎被验出是伪币后，从巴黎的法国安全部门召来的一位专员回忆起了此前有关温迪斯格雷茨亲王有意组织针对法国的伪币行动的报告。荷兰国家警察总署首长 K. H. 布勒克霍夫拿到那 4 个人的供状后,给布达佩斯和巴黎分别拍去电报。行动参与者之一、警察中尉拉鲍当即从布达佩斯发了含意一目了然的“姨病速归”的电报给全体传播人。哥本哈根的传播人连同他携带的相当于 20 万美元的伪币此时已经落网。

在布达佩斯，开始接受国际调查的总理拜特伦及其内阁本来正谋求匈牙利加入国际联盟,准备由拜特伦率代表团赴日内瓦。国际联盟将提供资金援助，帮助匈牙利发行黄金支持的新货币潘戈以取代已陷入严重通胀的克朗,后者当时对美元比价为 67000:1。拜特伦十分清楚,他要是有阻挠调查的举动,那么所获国际地位和资金援助将化为泡影,他知道,只能以维护国家的声誉为由牺牲掉自己的一些老朋友和政治支持者了。

集团成员在销毁印刷设备和其他证据时，忘记了舒尔茨从德国带来

的造币用纸尚有余存。这些纸张遂被警方查获，1926 年 1 月 2 日起，随着拉鲍中尉和温迪斯格雷茨的管家科瓦奇被捕，网收紧了。尽管布达佩斯实行严格的新闻封锁，拜特伦的名字仍然时不时地冒出来。拜特伦对《纽约时报》表示，有两名他无比信任的手下肯定是中了匈牙利法西斯分子的圈套。1 月 4 日，温迪斯格雷茨被捕，警察总署署长纳多希被隔离审查。不久他俩就被投进了布达佩斯阴森的中央监狱。

40 位从巴黎赶来参加调查的法国侦探中，有一位名叫亨利·科拉尔的侦探到达时身上没有匈牙利货币，就请出租车司机帮他兑换一张并非伪造的法郎千元币。信奉社民主义的司机立刻把科拉尔拉到附近的警局，宣布捉到了另一名伪币集团成员，要领取赏金！

渐渐地，匈牙利和德国的行动参与者，包括亚瑟·舒尔茨在内，一个接一个地浮出了水面。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在否认报界关于马克斯·波尔上校卷入此案的准确报道的同时，承认了以下事实——作家莫里·布鲁姆称这是“总参谋部发的一切公开声明中最坦白的一条”：

> 毋庸讳言，总参谋部曾接到许多关于伪造英镑、美元这些外国货币以克服国家财政困境的提议。尽管有过讨论，但从未被采纳，亦从未启动制造伪币的准备工作。

大部分涉案人被关了起来。亚瑟·舒尔茨和匈牙利法西斯党派觉醒党党魁乔治·希尔死得蹊跷：舒尔茨因在监狱举止过激被转入柏林的一家疯人院，死于特护病房；希尔在对国会调查人提到见过由总理拜特伦签署的颁给参与者的“免责保证书”后立刻被送进了布达佩斯的医院。有传言称，这两起死亡由霍尔蒂上将及其支持者创建的法西斯秘密社团“双十字之血同盟”一手造成，该同盟就意识形态而言正是希特勒时期主导了匈牙利国家事务的“匈牙利法西斯箭十字会”的前驱。

1926 年 5 月 7 日，对温迪斯格雷茨等 24 名同谋举行开庭审理，有 23 名国会议员作为辩方证人出席。法西斯党派议员兼温迪斯格雷茨的律师弗朗兹·乌洛因宣称亲王是一个喜爱冒险的梦想家，还把他同一战后波兰首位总统约瑟夫·毕苏斯基元帅以及当时的捷克外交部长、后来的捷克斯

洛伐克反纳粹总统爱德华·贝奈什相比较。乌洛因对法庭重申:拿破仑伪造过英镑,英国政治家威廉·皮特批准过对法国指券的仿冒。

5月26日,法庭宣判,前警察总署署长纳多希被判处4年劳役及约合2000美元的罚金。温迪斯格雷茨同样领到了4年劳役,但无须缴纳罚金。那些粗糙印版的制作者格罗被判了2年。其他人所受刑罚更轻。最高上诉庭最终解除了温迪斯格雷茨的劳役。以后他又被转入了监狱医院,他的妻子隔三岔五从布达佩斯最有名的馆子为他捎去美食。要求赦免他的全国请愿书征集到了10万个签名。他获得了一份鉴于其健康问题而特批的"准假书",终其一生再未重返囚室。

1931年10月尤利乌斯·格埃姆博斯成为法西斯总理时,默许军事荣誉法庭作出了"温迪斯格雷茨伪造法国法郎是出于保护匈牙利国家和民族免遭损害而承担起合法的责任"的裁判。1932年岁末,也就是在希特勒1933年被选上台前不久,亲王放弃了自己的匈牙利国籍,加入德国籍。其子安拉达尔成了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温迪斯格雷茨用策划伪币行动的人并非是魏玛国防军的鲁登道夫将军和波尔上校,而是1923年任总理、后任外交部长直至1930年去世的魏玛民主党人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这样可笑的声明来帮助纳粹加强蛊惑宣传。斯特莱斯曼与法国政治家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分享了192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白里安对1928年将战争非法化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①]的缔结也起了积极作用。诿过于斯特莱斯曼帮了纳粹的忙。他们正想抹黑魏玛共和国,顺便找个借口停止向斯特莱斯曼的遗孀提供津贴。

1940年,纳粹情报人员威廉·赫特尔在着手准备纳粹针对前协约国的伯恩哈德行动这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伪币行动时,就涉及伪币制作的一些关键问题访问了亲王。对自己的"爱国之心"换来了牢狱之灾仍耿耿于怀的温迪斯格雷茨举出了多名当年的同志——法西斯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们。他去世于维也纳,已经不怎么为人关注,时间大约在1950年下半年。

斯蒂芬·拜特伦1931年离开了总理的位置,主要原因是他未能化解

① 其正式名称为《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译者注

再度发威的通货膨胀和其他财政问题。拜特伦的朋友尤利乌斯·卡罗伊一度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但1932年10月总理的权柄就落入了尤利乌斯·格埃姆博斯之手。此人为了实现匈牙利对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要求，很快巴结上了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基于纳粹运动在匈牙利渐成气候，他随即出访柏林，对希特勒同样极尽讨好之能事。

紧接着《道威斯计划》，另一个美国人、律师欧文·D. 杨格也在一段时间内为超通胀结束后魏玛共和国的稳定发挥了作用。1929年1月，就在预示着世界性大萧条的华尔街股市崩溃前不久，杨格成为协约国为重新研究并最终设法解决战争赔偿问题而组建的委员会的负责人。德国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被称为《杨格计划》的方案于7月出炉。

支付赔款时，德国需承担将德国马克转换为外国货币的责任。在瑞士巴塞尔新建一家国际清算银行来处理有关事务。该银行董事会由所有西方国家中央银行的代表组成。预计德国按年缴付赔款到1988年为止，其中前36年的赔款额逐年递增。德国国家铁路充当赔偿的抵押担保。17亿马克的年赔款总额低于在《道威斯计划》框架下德国已成功完成的数额，所以设计者相信这应该是一种具有可持续性的清偿方式。1933年至1934年，当选德国首相进而大权独揽的希特勒拒绝了包括裁军、赔偿各方面要求的一切“凡尔赛指令”，开始为德国对欧洲的新一轮征服做准备。

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伪造货币已成风潮，如流行病一般在欧洲蔓延开来。同时，它也将法西斯主义传播到了别的国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有葡萄牙。在唯恐天下不乱的柏林银行的帮助下，苏联的斯大林决定制造和散布大量假美元，目的有三：一是支付苏联的海外间谍的薪酬，二是购买一切可以用制作精良的假美元买到的关键物资，再就是动摇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

第十章

葡萄牙：机灵老千搭台，独裁政权唱戏

这个气候条件多样、族群分布如犬牙交错的小国是孜孜不倦的抄袭、剽窃、模仿的专家，葡萄牙的富人据说是全欧洲最富的。

——玛丽·麦卡锡，1955年

20世纪最大胆的非法“盗版式”伪币计划引出了一个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来得持久的法西斯政权：葡萄牙1932年至1968年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的独裁统治。其准法西斯主义的“社团主义”，在某些方面参照的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向民主制度低头。它见证了葡萄牙庞大的殖民帝国从四分五裂到丧失殆尽的全过程。

被视为殖民帝国掌上明珠的安哥拉富产石油、钻石、磷肥及铜，自2006年起已是国际石油卡特尔欧佩克组织之成员国。葡萄牙之所以失去安哥拉，阿尔维斯·雷斯无意之中制造的金融恐慌和混乱可以说起了很大作用，这名造假高手致富心切，设计出一个近乎完美的伪币计划。

经历了流血斗争的安哥拉于1975年赢得独立，葡萄牙告别独裁统治也是在这一年。而蹲过班房、学精明了的梦想家阿尔维斯·雷斯当年正是从融为一体的葡萄牙—安哥拉未来的繁荣上看见自己所觊觎的财富和权力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安哥拉这片扩张中的、辽阔而破败的非洲殖民地既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又出了名地缺乏规矩和秩序。这儿也是阿尔维斯·雷斯开始其高智能犯罪生涯的地方。

阿尔维斯·雷斯希望他制作的无可挑剔的葡萄牙埃斯库多币，善加投资运用后，可以帮助安哥拉发展成一个殖民地天堂，并使他本人以及参与计划的若干同伙财源广进。事与愿违，这一气魄惊人的宏图最终以失败收场，紧随而至的是阿尔维斯·雷斯一度梦想着自己来统治的葡萄牙绵延多

年的经济和社会大骚动。

尽管已很少有人记得，事实上萨拉查政权和葡萄牙殖民帝国经受了最早的恐怖主义挑战，后者第一次成功劫持了一班远海游轮——这和标准的海盗行径也不乏相似之处。1961 年 1 月 24 日，葡萄牙前海军上校恩里克·加尔旺及一批拉丁美洲革命者带着他们招募的一支游击队控制了葡萄牙豪华游轮“圣马利亚”号。他们射死了船上一名试图抵抗的大副，还打伤了两名船员。随后宣告，反对萨拉查的“解放斗争”就此展开，打出了德尔加多将军的大旗。德尔加多曾为葡萄牙驻华盛顿的军事专员。在 1958 年的一场总统竞选中，德尔加多落败于萨拉查方面指定的候选人阿梅里戈·托马斯上将。“圣马利亚”号事件让里斯本萨拉查当局深感震惊，乃至求援于他们的英国和美国盟友。加尔旺计划将游轮连同人质驶至葡萄牙非洲殖民地之一的费尔南德波岛，然后再去安哥拉，在这两个殖民地发动兵变。他寄希望于起义风潮波及葡萄牙本土，从而将萨拉查赶下台。

美国和英国的飞机和战舰盯住了去向不定的游轮。由于葡萄牙战舰在非洲海岸严阵以待，它改变了航线驶往巴西。2 月 2 日，加尔旺屈服了。他在巴西累西腓将 607 名被扣乘客和船员放下了船。巴西当局对加尔旺一干人等给予政治避难，把游轮返还给葡萄牙。

“加尔旺把事情搞砸了，”德尔加多在笔者卡萨布兰卡城郊的家中喝咖啡时说，“他——还有我们——事先应该和葡萄牙整个军队一起做更周密的计划。”德尔加多相信，萨拉查为在 20 世纪 20 年代伪币丑闻后一番彻底的清洗而采取的严厉的紧缩性和剥夺性政策，以及非洲殖民地纷起反抗所导致的海陆两军士气不振，让国家迎来了革命的时机。

对德尔加多来说，不幸的是一些经济和社会因素，比如葡萄牙货币的力量，比如动员受压迫的劳工的可能性，他从未将其纳入思考。按照他老式的、拿破仑时代的说法，他认为，像葡萄牙第一共和国 20 世纪 10 年代和 20 世纪 20 年代的无数次政变中的那些部队起义，他们这些部队里的持不同政见者最擅长不过。发起一场武装力量联合哗变，将萨拉查及其法西斯政府赶下台来，基本无须假民间之力。迪亚曼蒂诺·马沙多，一位重视德尔加多的历史学家，称他为自此以后每况愈下的“中低层资产阶级的希望和(间接)发言人”。

1961年12月31日,德尔加多发起了最后的冲锋,他曾邀笔者报道此事,可惜事先笔者没把他的提议太当回事,结果错失良机。德尔加多和一干志同道合的准将、上校拉起一支百来人的队伍,进攻效忠政府的部队在贝雅的营房,希望各地驻军群起响应。战至夤夜,葡萄牙陆军大臣在厮杀中丢了性命。而德尔加多手下有多人被杀或者被擒。德尔加多本人易装逃脱,乘船来到卡萨布兰卡。于是笔者同他,还有他的巴西女友兼"秘书"阿拉亚里尔·莫雷拉·坎波斯小姐,再度会面了。他俩虽然沮丧,但看起来谁也没从根子上对德尔加多定的策略有所怀疑。令笔者抱憾终生的是,这一次成了笔者与德尔加多及其红颜知己之间最后的会面。1965年,萨拉查的特务组织PIDE将他们诱入了在西班牙、葡萄牙国境线附近布下的圈套,二人随后遇害。

贝雅事件后,再无人谋划搞军队暴动了:由高层官员发动的、于1974年推翻了萨拉查接班人马塞洛·卡埃塔诺的"天鹅绒革命"几乎未闻枪声。在他们的努力下,葡萄牙总算重返议会民主制,成了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的一员。萨拉查留给葡萄牙的是在发生了阿尔维斯·雷斯庞大伪币计划的灾难之后,为整肃金融体系而推行的保守的紧缩性银行和财政政策。

阿尔维斯·雷斯:绅士、拆白党兼造假高手

这个撼动了全能的葡萄牙中央银行、想要操纵最高权力从而登上权力顶峰的人出生于1896年9月8日。阿尔维斯·雷斯的父亲是里斯本一位自学成材的簿记员,偶尔放贷,一度尝试经营一家殡仪馆。

阿尔维斯·雷斯主要是在1910年君主制被推翻前的最后几年里受的教育,1914年高中毕业时,其父已在破产边缘,故无法升入大学。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名义上中立的葡萄牙逐渐投入协约国的怀抱,卷入了非洲的德国殖民地内部及周边的战斗。雷斯的家,如同其他许许多多人家一样,被耗干了积蓄。投资于安哥拉的财富仿佛消失在了黑洞中,葡萄牙石油公司在那儿徒劳地钻探着石油。一直要到后来,1932年至1968年萨拉查统治期间,美国和欧洲的公司才从安哥拉的土地里成功地打出了石油。

阿尔维斯·雷斯在一所技术学校修了1年工程学;20岁娶了一个又矮

又胖却还可人的姑娘，名叫马利亚·路易莎·雅各贝蒂·达韦兹多，是他在海滨野餐会上结识的。在传统盟友兼其优质葡萄酒和其他产品的最佳消费者英国的频频示意下，葡萄牙于1916年3月9日正式对德宣战。4万人组成的葡萄牙军随即乘船奔赴西线紧挨鬼门关的泥泞战壕，阿尔维斯·雷斯躲过了应征入伍的命运。

蒙住征兵人员的是他自造的第一件大赝品：他精心地勾描然后刻印出一份盲目崇英的葡萄牙人敬若神明的牛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的“毕业证书”。这份证明他对于从地理到民法、从机械工程到电力工程(从这时起“塞尼奥尔工程师”就成了他的代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课程的精通程度的文凭上，唯一货真价实的部分是一个与他交好的公证人盖的印章。

阿尔维斯·雷斯带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于1916年11月来到安哥拉，大受欢迎。有技能的高才生，特别是白人专家，正是殖民地所短缺的。他投入了这片面积相当于14个葡萄牙、如得克萨斯州那么大的天地。安哥拉当时的人口包括大约2万白人、1万黑白混血儿及3万非洲黑人，后者被白种移民呼作“japas”——葡萄牙语的“黑鬼”。这是一处农业殖民地，对外输出咖啡、谷物、蔗糖、烟草和大米；缺少煤炭，也没有足够数量的铁来发展重工业。

一开始，阿尔维斯·雷斯干的是沉闷的公共建设工程方面的工作。之后，顶着所谓“牛津毕业”的机械工程师的光环，他运用自己毋庸置疑的机械才能对安哥拉上了年头的破旧火车头进行维修。借助50名当地人的劳动力，他进一步扩张业务，他的一套灌溉方案挽救了一位移民朋友陷入困境的烟草公司。他开始和妻子马利亚一起环游安哥拉各地，大批收购谷物来首都罗安达加价转售，两个儿子留给家中的用人照顾。1919年，他已经搞起了收益可观的战时盈余物资贸易，1922年重返里斯本时可以算得上是衣锦还乡。阿尔维斯找了两个合伙人在此租下一座有12个房间的豪华公寓，开办了自己的贸易公司：A. V. 阿尔维斯·雷斯有限公司，一度还是美国纳什汽车在当地的代理商。

然而时势不利。1917年大战中间，亲德的西多尼奥·帕埃斯将军领导了一次暴动。他逮捕了亲协约国的总统贝尔纳迪诺·马沙多，将其驱逐出

境，自己登上了总统的宝座，独揽朝政。1918年12月14日，帕埃斯被一名激进分子刺杀。议会民主体制名义上得到了恢复，但经济和社会整体一片混乱。这样的环境底下，做生意很不容易，做小生意的A.V.阿尔维斯·雷斯有限公司更是举步维艰。一个文盲比例高达65%的国家，经济总难有起色。政府屡屡更替。每届平均只能延续约4个月。政变和暴动反复上演，金融状况日益恶化。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兰格所见："部门重叠设置，政治大面积腐败，骇人听闻的低效率，成了1918年至1928年这10年的显著特征。"所有这些为阿尔维斯·雷斯及其同伙推出他们的惊天大骗局提供了绝佳舞台。

贸易公司办得并不成功，1923年阿尔维斯·雷斯发现，他可以花仅仅4万美元买下安哥拉皇家泛非铁路公司的控股权。因为这家公司股价暴跌，股票持有者要求公司对所欠股息及分红以现金偿付。于是阿尔维斯·雷斯通过他在纽约的国民城市银行开立的账户签发一张"空头支票"。那个时候还不存在什么横跨大西洋的航班，靠海轮传送的邮件从里斯本到纽约至少需要8天。待他那张支票寄达国民城市银行之日，已不再是"空头"的了。购买安哥拉皇家泛非铁路公司控股权的那一周里，阿尔维斯·雷斯玩了这一手。他赶在支票抵达纽约的银行、账户上须补进相应金额之前，从安哥拉皇家泛非铁路公司的现金储备里抽出4万美元电汇至纽约。他还用安哥拉皇家泛非铁路公司储备金以6万美元买下了南安哥拉采矿公司的控股权。不过这些操作本身并不足以产生赢利，阿尔维斯·雷斯和其朋友向里斯本小而保守的股票市场里那些买家吹嘘他们所谓的资产，如此抬高股价。在这个阶段，他会晤了在以后的超级伪币行动中成为他最关键的同伙之一的若泽·班代拉，后者为葡萄牙派驻荷兰的外交官，号称代表一家正在安哥拉开采石油的荷兰公司。

一些起了疑心的安哥拉皇家泛非铁路公司的持股人终于发现阿尔维斯·雷斯是如何拿公司的钱在安哥拉的采油、淘金上博大运的。他们控告他挪用安哥拉皇家泛非铁路公司资金10万美元，使他在1924年7月5日遭到了逮捕。他被关押在波尔图，他的两个合伙人，班代拉和名声不佳的德国商人卡尔·亨尼斯前往探监，想劝他卖掉手上的安哥拉皇家泛非铁路公司股票，把钱送还公司金库，回到笔直然而狭窄的正道上去。他不赞

成他们的想法，他们便也放弃了说服他的打算。他上了法庭，被宣判有罪。蹲了 54 天班房后，阿尔维斯·雷斯靠变卖妻子的珠宝和住宅筹齐了 10 万美元保释金。朋友们为他的出狱在豪华酒家举办了热情洋溢的惊喜聚会。他明白了，这年头在葡萄牙被判伪造罪也不一定会叫你众叛亲离。

正是在波尔图服刑期间，阿尔维斯·雷斯构想了攫取葡萄牙央行控制权的大手笔，他还希望借此最终问鼎整个国家的控制权。他钻研了随身带去的该银行的章程细则。他发现银行实际上并非由政府掌握，而是半私有性质的。仅有小部分股份归政府所有。至关重要的是，葡萄牙所有钞票的发行权处在它的垄断下：与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当时的情况不同，葡萄牙的钱币是没有任何私有银行或地方银行在印的。阿尔维斯·雷斯对银行章程的研读以及出狱后做的一些打探表明，银行员工中无人负有检查钞票序列号是否重复的责任。简直出人意外，毕竟这是查伪币的稳当途径。

他认为，钞票的权力与价值，大半取决于持有者怎么看待它。葡萄牙很久以前已放弃了金本位制。印钞机加班加点，已经用超通胀之后的对抗通胀的新马克使德国重新拥有了衡量财富的标准。匈牙利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的印钞机也执行了同一任务。那么，何不设法自己来造钱呢？只要造得和正规的、葡萄牙银行委托英国著名的沃特伦公司印制的葡萄牙货币难分彼此不就行了吗？之所以把这项工作交给沃特伦公司，是因为葡萄牙战后穷得连必要的设备也置办不起，没办法自力更生。

（当然，不论阿尔维斯·雷斯还是其他人，当时谁都不知道，沃特伦一战期间曾协助伪造德国的帝国马克和各种印章——很可能是为英国银行刻制了印版，还领了一部分印刷任务；这倒不是说如果他们知道，事情就会有什么变化。）

阿尔维斯·雷斯同时注意到，葡萄牙银行的收益是在个人持股者和在位政府之间按比例划分的。按照法律，其所供应的货币总量应以实缴股本的 3 倍为上限。不过他发现这家银行步了欧洲其他中央银行的后尘，发行了面值已逾实缴资本百倍的货币。（所幸造成的通货膨胀尚远低于 1919 年至 1923 年魏玛德国的水平。）自 1891 年葡萄牙纸币不可再自由兑换金银以来，要制造更多的“真”钱，所费的不过是纸张、油墨和印刷成本。

阿尔维斯·雷斯接下来的动作，不仅对于他大胆的伪币计划来说是跨

出了一大步，对于实现掌握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安哥拉的经济命脉这一目标,也是关键性的一步。他精心伪造了一份指定他为葡萄牙银行代理人的合同。他在合同上临摹了安哥拉首长、财政部长及安哥拉殖民政府一位技术代表的签名。他一手炮制的文本称,该合同授予他提请印制相当于 5 万美元的通行安哥拉的安哥拉埃斯库多币的权力。这笔钱将被交付给一个“国际投资人集团”。而后者将向安哥拉殖民当局提供与之相当的英镑借款。一位公证人助理证明阿尔维斯·雷斯的那些签名有效,便也(尽管是象征性地)证明了合同本身有效。接着,阿尔维斯·雷斯来到法国、德国和英国的领事馆请人加盖公章,为他的假合同、伪签名又镀了一层金。

显然，这份无中生有的合同连同印制委托书是要交给曾为葡萄牙银行印过 500 及 1000 埃斯库多币的沃特伦公司的。阿尔维斯·雷斯接下来的问题是,为自己的事业寻找合适的合伙人。他们必须是面对法网敢于铤而走险、操纵金额规模再大也不会露怯的人。其中至少要有一位享有外交豁免权,那么由他充当传递人,携敏感物品亦可轻松出关过境,这里的敏感物品指的就是阿尔维斯·雷斯定制的数百万埃斯库多币,以及署有伪造的葡萄牙银行总裁的签名的信件,还有其他一些不寻常的文件。这样的人他当时已认得一位:若泽·班代拉的兄弟安东尼奥——葡萄牙派驻海牙的公使，也是在对安哥拉石油开采做可行性调查的荷兰德国金融家小组的成员;此人后来成了雷斯集团的三号人物。

他的另一名合伙人古斯塔夫·阿道夫·亨尼斯是德国人,11 岁时就移居美国,长年在巴西和荷兰协同制作和散布伪币(1914 年至 1918 年一战期间在荷兰是为德国情报部门工作),熟能生巧,慢慢地在这一行站稳了脚跟。后来在阿尔巴尼亚,墨索里尼的军队已悍然来犯,他和另几个作手还在筹划建一家银行来替这个君主制小国清还债务，直到被意大利人赶走方才作罢。

最后一名成员是卡尔·马朗，这个能干的荷兰商人做进出口生意,开了自己的商号,经营得有声有色。给他带来丰厚回报的副业之一就是为发了战争财的和其他来历的“新贵”购买贵族称号和荣誉职衔(如驻外领事一类)。他给自己置办了一个委内瑞拉驻海牙领事的头衔。鉴于纯粹的荣誉职衔并不能使他获得什么实际的权力，他又不惜血本地买来伪造的委

内瑞拉外交护照。这样他在过海关时就有了外交豁免权的庇护。安东尼奥·班代拉的弟弟若泽是个无法无天的赌徒兼好色之徒，他也很快投身于这场冒险中，扮演起了重要角色。

阿尔维斯·雷斯对上述3位分别进行了拜访，说服他们加入自己的计划。但他保留了关键的一点：准备向沃特伦出示的委托印制钱币的信件上，包括总裁科玛乔·罗德里格斯在内的葡萄牙银行高层官员的签名，均系雷斯本人伪造。雷斯对他们宣称，他在这家银行有"身居要职的朋友"，能为他们大开绿灯，他手头那些信也是这位朋友一手包办的。雷斯对马朗透露，沃特伦印好的第一批500万埃斯库多币，他要拿到安哥拉殖民政府那儿去交换英镑，以购买适量黄金充当埃斯库多币的信用支撑。雷斯通过关系设法向时任葡萄牙总统的特谢拉·戈梅斯（1925年12月被贝尔纳迪诺·马沙多接替，这是马沙多第二次赢得选举。此前，又一场葡萄牙常见的未遂军事政变方告平息）引见了马朗，马朗才好歹接受了这套其实很容易被戳穿的说辞。

尽管一开始马朗和班代拉更希望把印制新埃斯库多币的工作交给位于哈勒姆的、由恩斯赫德经营的享有盛誉的荷兰造币公司，但他们很快意识到，恩斯赫德并不想从老对手沃特伦那儿抢走这笔业务。恩斯赫德也可能从来龙去脉里嗅出了某些可疑的气息。不过，班代拉兄弟还是得到了恩斯赫德的一封介绍信。此信实际上也使马朗在里斯本为阿尔维斯·雷斯活动时拥有了合法的代理人权力。在相当厚实的纸张上伪造了葡萄牙银行的笺头，又分析了伦敦的沃特伦公司的情况，雷斯集团决定就从董事长威廉·沃特伦先生身上突破。此人出了名地自大，而且很看重和他打交道的人的名望头衔，往往不屑理会合伙人和手下(其中一些人后来白费口舌地劝他对雷斯一伙要提高警惕)的忠告。雷斯认准了，派马朗去见威廉再合适不过了，他们俩性格相合。

马朗漂洋过海到了伦敦，住进了里兹饭店，从这儿比较容易和威廉·沃特伦先生通话并获得他的约见。1924年12月4日，他们在伦敦金融城大温彻斯特街，沃特伦位于一楼的办公室见了面。班代拉呈上的名片自称"珀西亚总领事"(纯属虚构)。他交给威廉先生一封"葡萄牙驻海牙公使安东尼奥·班代拉阁下"手书的介绍信，证明持信人所持系葡萄牙政府的公

文急件。介绍信上还有科玛乔·罗德里格斯阁下的签名,是雷斯根据印在面值 500 的埃斯库多币上的签名临摹的。令威廉先生以为雷斯集团大有来头的还有马朗所佩戴的玫瑰花结领饰"基督之谕",威廉先生认出此乃在葡萄牙独占鳌头的公教所颁高级勋章,便好一番端详。

马朗对沃特伦介绍了安哥拉借款方案。雷斯集团定制的金额达 500 万美元的面值 500 的埃斯库多币,据他讲,将会被盖上"安哥拉"的印戳。这样它们就和流通于葡萄牙的埃斯库多币有所区别, 后者也并非安哥拉的法定货币。1925 年 1 月 6 日,沃特伦书面应允向阿尔维斯·雷斯集团提供价值约 500 万美元的 20 万张面值 500 的埃斯库多币。印制费约合 7200 美元,平均下来付给沃特伦的 1 美元能给造伪者带来 700 美元的进账。雷斯等人唯恐威廉先生直接与葡萄牙银行总裁罗德里格斯进行沟通来验证他给予两名来使(后来有几次是班代拉代马朗去的伦敦)的信任确实无懈可击,他大可以写封信通过邮局寄给对方,确认接受了这项"机密的"印钞委托。事实上,威廉先生的确写了这样一封信,明明白白地由他的一位属下寄出。但雷斯集团的运气实在好得惊人:里斯本的葡萄牙银行居然一直没收到过这封信。假如这封信顺利抵达,就会完全扭转事件的走向。葡萄牙的未来也会大不一样了。

在 1925 年 2 月 10 日,即约定沃特伦交付第一批钱币的日子之前,雷斯紧急找亨尼斯交换了意见。亨尼斯也同意他的看法:尽管马朗和班代拉一向对威廉先生声称 (为了确保印钞过程中一切正常他们不断地去伦敦拜会他)这些钞票将在安哥拉使用,这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他们曾对沃特伦言之凿凿,将给钞票盖上"安哥拉"的印戳,但这个计划要改,必须在葡萄牙将雷斯的埃斯库多币兑换成英镑、美元、法郎等硬通货,快速洗钱。他们将面向葡萄牙各家有信誉的银行和货币兑换行展开兑换行动。在商店抑或街头小铺购物时使用这批钞票的数量要压缩至最低限度。据估算,要在葡萄牙对他们的面值 500 的埃斯库多币顺利实现洗钱的目的, 总价值不应超过 1500 万美元, 从而决定了后期还可预定和提取约合 1000 万美元的款额。雷斯和亨尼斯一致认为,超出这个数目的话就不保险了:按照平均律, 官方发行的钞票和雷斯私印的钞票上的序列号迟早会发生重号。雷斯当时还没有,实际上自始至终都没弄明白葡萄牙银行所使用的数

字和字母的排序规则，而他们必须解开这一环才能攻破整个系统。（这最终成了他们的致命伤。）

雷斯于是将所拟方案的得意之笔、也是最后一步告诉了亨尼斯：购入葡萄牙银行超过半数的股份，赢取对它的控制！既然何为真钞何为伪币归根结底是由中央银行定的，那么当他们坐上了银行最高官员的位置，就将完全掌控葡萄牙整个的货币供应——而且再也不用顾虑会东窗事发。阿尔维斯·雷斯咯咯直乐。亨尼斯放声大笑。作家布鲁姆形容这“简直是两个（不妨再添上‘异常调皮的’）小男孩的笑，为想出了一道可以难倒家长的难题在那儿笑”。亨尼斯来来回回地讲：“他们还怎么抓我们呢，到时候他们和我们不成了咱们？”

班代拉和马朗在约定的日子从沃特伦公司领走了第一批印好的钞票，把价值500万美元的钱盛在自带的大箱子里，通过与港口船只联运的火车运到了荷兰。班代拉的外交人员证件让他们免检通过了荷兰海关。雷斯的两名里斯本雇员被派往马朗在海牙的办公室，对新钞票做一番打乱顺序的工作，以避免在选定机构兑换英镑、美元、法国或瑞士法郎时，交出去的是一摞摞依序列号排列的钱。他们是按稍高于官方汇率的黑市汇率进行洗钱交易的。这样的交易不会留下书面记录，原因很简单，交易本身是非法的，尽管普遍存在。接下来的两批钞票分别于2月25日和3月12日从沃特伦公司运到。到3月底，阿尔维斯·雷斯集团一直忙于洗这笔价值500万美元的钱。钱在葡萄牙银行的眼皮底下流过，一次次被判定为法币。

雷斯及其合伙人决定，下一步他们需要自己来成立一家银行。这样不仅能以更高的效率更加保险地洗钱，这家银行作为领有执照、可在安哥拉进行投资的合法机构还能对安哥拉的经济进行事实买断，更有利于早日取得葡萄牙中央银行的多数股份和控股权。雷斯相信，这会成为他通向葡萄牙最高权力的门票。新银行定名为安哥拉大都会银行，没有立即获批，因为班代拉过去的不良记录令当局有所迟疑，于是董事名单上勾销了他的名字。越来越多的新钞完成了换手。7月，为满足业务需要，安哥拉大都会银行在里斯本和波尔图开了分行。

雷斯一伙并没有践行他们自己关于公开的购物取乐不得轻易为之的

主张。雷斯的妻子马利亚从巴黎的商店成堆成堆地搬来了昂贵的珠宝首饰和高级时装。雷斯等人大举购买房产以及各种类型的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有几笔数目可观的旧债,他们也是拿新钞票去还的。银行章程一获批准,阿尔维斯·雷斯就和妻子马利亚动身前往他最爱的殖民地安哥拉。他和他宣称携来的巨款受到了至尊级礼遇。在他凯旋般的安哥拉之旅中,雷斯为安哥拉和它白种主人的兴旺构思了鸿篇巨制的计划:他将翻新安哥拉的基础设施,建设更为完善的街道、铁路和码头。他设法拿下了100万英亩的土地,他被当地报纸誉为安哥拉的塞希尔·罗德斯,此人是英国殖民地政治家,英国殖民地罗得西亚的名字就取自他的姓氏。

在葡萄牙本部,雷斯的银行对于包括财产抵押借款在内的各类借款可谓来者不拒,而且开出的贷款利率极具吸引力。只要你拿得出值钱的抵押品,银行就会许给你格外优惠的利率。由于雷斯的洗钱令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货币进入了流通,顿时令葡萄牙的财富呈现出并不真实的上升态势。集团成员决定,他们需要更多面值500的埃斯库多币,于是马朗带着又一封伪造的葡萄牙银行总裁的密信,于1925年7月29日再度造访了威廉先生。这次他总共弄回了38万张跟雷斯定制的前几批一样、也和葡萄牙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一模一样的印有葡萄牙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肖像的面值500的埃斯库多币。马朗付给沃特伦2850英镑,相当于大约1.4万美元。

流言四起,里斯本的报纸称,日常买卖中冒出了大量假的面值500的埃斯库多币。这让雷斯集团将他们的放款业务暂停了一段时间。不过,每一次葡萄牙银行检验从雷斯的安哥拉大都会银行流出的钞票,得出的都是同一个结果:这些钱绝对可靠。雷斯和亨尼斯以投资公共设施建设的方式将约合10万美元的钱输入了安哥拉,马朗和班代拉则快速而谨慎地把他们的份额向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和德国的银行转移。

相反,若泽·班代拉因为花了价值15万美元的"雷斯币"买下了加尔达伯爵、萨格里什侯爵和丰沙尔侯爵这三大贵族的三大领地而使自己成为焦点人物。他买下了里斯本的一支出租车队,买下了为他供应衬衣的衬衣制造商的控股权,买下了里斯本的一家新潮男士发廊。他还乘一辆配专门司机的希斯巴诺·苏萨轿车在里斯本和乡村到处兜风。如此排场给他的

长期女友及度假伙伴，荷兰影星兼歌星菲·卡莱尔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雷斯委派若泽·班代拉去完成他的梦想：购入葡萄牙中央银行的多数股票从而取得其控股权。若泽和为他工作的其他人逐渐收集到了接近40%的股份，但是由于收购的消息在银行界传开了，股票价格陡然拔高。阿尔维斯·雷斯因此获利丰厚，他声称这笔钱得付给他那位所谓的葡萄牙银行的高层朋友。集团其他成员似乎对这一要求也无异议。布鲁姆和美国金融问题专家萨姆·波顿认为他们的态度“也许说明这些人觉得向葡萄牙官员行贿这种事合情合理，完全正当”。

唯一一个卷入此事的美国人于1925年夏末登场，短暂地露了一下脸。当时40岁的小乔治·U.罗斯是沃特伦唯一的美国雇员，在伦敦斯克鲁顿街上的沃特伦造币制版工厂担任经理。罗斯曾在美国铸印局从事美元印制工作，后来转入私营部门，协助管理位于纽约布朗克斯的美国银行纸币公司旗下的印钞厂。威廉·沃特伦先生听说了罗斯在业务方面的突出能力，用一份优厚的7年期合同将他从美国银行纸币公司挖了过来。当葡萄牙银行的所谓特级验钞专家佩德罗索先生来伦敦访问沃特伦公司，考察序列号编号设备——为的是了解葡萄牙银行能否进行某种仿制或者复制，以便把印制葡萄牙钞票这件事移回本土去做，罗斯也没有停下手上的工作，并且帮助马朗和一位负责护送的沃特伦公司职员把最后一批印好的钞票带到利物浦街的火车站，那是他们跑惯了的英伦—欧陆之旅的起点站。没有任何记录显示，罗斯对雷斯的伎俩有所识破，如同公司其他员工和威廉先生本人一样。

雷斯及其同伙的失败，葡萄牙金融体系的动荡，萨拉查独裁统治的起因，肇始于1925年最后几个月。此前已经出现了怀疑，一部分见诸报端，指出有过量面值500的埃斯库多币自金融系统流出。尽管雷斯集团也常不厌其烦地对钞票进行人工造旧和揉折，但不能保证每一次都做了处理，有不少纸质挺括，一看就是新的。之所以尚能安然无事，显然得益于钞票的图像、纸张和油墨三大部分绝对正宗，经得起任何检验。最终打乱了他们的如意算盘的是序列号系统。雷斯仅有这一处破绽，却是一个十足的硬伤。

在波尔图另一家银行，一位办理安哥拉大都会银行购汇业务的出纳员吃惊地发现，他的珠宝商客户购自该行的面值500的埃斯库多币未见

对应的序列号记录。他同时注意到，银行账簿上外汇业务涉及“雷斯币”的页码都被人撕掉了，已不见踪影。1925 年 12 月 4 日，他向一位银行家客户谈起了自己的怀疑。这位银行家迅速通知了葡萄牙银行，警钟于是敲响。紧跟着在第二天，亦即 12 月 5 日，警方查封了安哥拉大都会银行在波尔图的支行，并逮捕了支行经理，此人已于 6 月获悉骗局的内情。葡萄牙银行的官员匆忙赶来波尔图检验安哥拉银行金库里的 4000 张面值 500 的埃斯库多币，又一次判其为真。不过一查序列号，它们的仿品面目便暴露无遗。更多的逮捕令随即发出。

接下来的周一即 1925 年 12 月 6 日，上午，当局命令葡萄牙所有银行对印有瓦斯科·达伽马像的面值 500 的埃斯库多币召回，用另一图式的面值 500 的埃斯库多币替换。任何准备换超过 200 张达伽马票的人都必须出示身份证件并留下签名(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欧洲很多银行对收进的每张百元美钞也采取过此类措施)。

与此同时，12 月 4 日雷斯夫妇及朋友结束了非洲之行，正乘坐德国汽轮“阿道夫·沃尔曼”号返回里斯本。船还在海上，但已临近位于塔古斯河河口的里斯本的时候，船上的德国司务长提醒同胞亨尼斯，轮船公司里斯本办事处拍来电报通知他不能继续接受已被视为伪币、正在接受调查的带瓦斯科·达伽马像的埃斯库多币。亨尼斯把雷斯叫到自己的头等舱房间，宣布了这个坏消息。他力劝雷斯夫妇不要在里斯本下船，以免落入警察之手。他本人将会待在船上。他本来就有伪造、欺诈的案底，而且被民间舆论和葡萄牙报刊指为潜在的德国间谍，密谋将葡萄牙在非洲的领地转手给魏玛共和国。所以他打算去巴黎、阿姆斯特丹或柏林去寻找避风港。

阿尔维斯·雷斯垮台：法西斯主义崛起

雷斯苦涩地对亨尼斯说，要是再给他们一个月时间，就可以拿下葡萄牙银行的控股权了。亨尼斯答道：“现在已经来不及了。”雷斯说他会宣称这完全是葡萄牙银行自己腐败的官员制造的阴谋来“反戈一击”。领航艇上午 7 点抵港，亨尼斯上了岸，在港口旁一家咖啡馆喝了咖啡，然后再次登上轮船，船长按照约定，待他返回才又起航；他最终靠着不断变换身份

及大笔银行存款，成功隐迹于战后百废待兴的欧洲。当日上午9时，警察登船，阿尔维斯·雷斯被捕。亨尼斯从咖啡馆座位上遥望警车载着他昔日的老板和同事绝尘而去。

在接受里斯本市长和刑事调查部门负责人的简单讯问后，雷斯被押入大牢。后来他把监狱形容为“一个可怕的洞穴”，“令我内心每一丝与人为善的情感畸变……我的报复就是制造丑闻，我冷冷地、心安理得地计划着攻击无辜者——葡萄牙银行总裁和副总裁，安哥拉首长，政界人士”。

由于序列号相重的钞票和真钞难分彼此，葡萄牙银行和警方一开始认定系印版及其他制币材料失窃所致。雷斯在落网前伪造了大批文件栽赃葡萄牙银行的总裁和部分董事为阴谋始作俑者。这些足以乱真的假证据甚至让警方忙不迭地把总裁科玛乔·罗德里格斯和副总裁莫塔·戈梅斯抓了起来。他们虽在24小时后获释，但这一逮捕行动以及事发数月后仍被发行量最大的报刊用做头条的有关指控搞得银行董事会人心惶惶，竟敦促两人辞职。从自以为是变得战战兢兢了的威廉·沃特伦先生来到里斯本，接受了整整一周的粗暴盘查后被允许离境。民众的怒火已经燃遍葡萄牙，警方也保证不了他的人身安全，他化名“史密斯先生”方得以脱身。有些报纸耸人听闻地报道说，这场阴谋源自苏维埃俄国（不多久，斯大林倒真的大规模地伪造起美元来了），还有一些称主谋乃是伪币泛滥得让马克成了废纸的魏玛德国。雷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妻子被监禁了一段时间后获释，再后来又被指控为从犯）自狱中发起了对葡萄牙位居显要的银行家和金融家的口诛笔伐。不过，被捕的班代拉和马朗在受审时双双泄露了天机。雷斯的妄语在恐慌而愤慨的国民听来也显得越来越不可信。他们预计银行面临倒闭，开始排着长队从银行提现，搞得许多银行果然因此倒闭。

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毕生积蓄或养老金。总体上他们的行为比魏玛德国超通胀时期有相同遭遇的人要激烈得多。里斯本、波尔图和一些市镇发生了暴乱。葡萄牙政治高压下的工人们开始组成无政府—工会性质的团体，组织袭扰行动。共和派与君主主义党团两方面的武装民兵开始在城市的街道混战，战火偶尔波及乡村。国家宣告进入战时状态，不少混乱核心地区，军队取代了警察。经济连连走低，保持着法币地位的埃斯库多币迅速贬值，生活开销相比于1914年的水平提高了13倍。

渴望重返1911年前的君主政体的团体逐渐对共和派和自由派的政治家占了上风。1926年5月25日，在信奉君主主义的政治家门德斯·卡贝赛达斯的鼓动下，由戈梅斯·德科斯塔领导的军队运动于王党重镇布拉加拉开序幕，准备一路打进里斯本，去推翻马沙多任总统的政府和安东尼奥·马拉·达席尔瓦任总理的内阁。这二位在雷斯财运亨通的日子里，就算不是他的密友，至少都同他建立了交情。

一场准备充分、获得了大部分部队支持的军人起义在葡萄牙北部爆发。自负而大胆的戈梅斯·德科斯塔将军对政治其实既不敏感亦缺乏手腕，一时间却被奉为民族英雄。经过相当规模的流血冲突后，马沙多—达席尔瓦当局垮台。获胜的起义者不仅遣散了国会，还取缔了依法组建的政治党团。然而事实证明，戈梅斯·德科斯塔和他委以重任的亲信们无能得令人发指。1926年7月9日，另一位将军安东尼奥·弗拉戈索·卡尔莫纳举兵将戈梅斯·德科斯塔罢免，后者被"体面地"流放到了葡萄牙在大西洋上的亚速尔群岛。

在这一片纷乱中间，伦敦的葡萄牙大使馆加紧了对沃特伦公司的调查。使馆人员若泽·奥古斯特·多斯·桑托斯·卢洛斯上校发现了雷斯的前安哥拉大都会银行存放于米德兰银行和威斯敏斯特银行的支行的款项。虽然威斯敏斯特银行的户头已被支取了大笔金额，两家银行尚且各有价值近50万美元的可疑英镑存款。伦敦警察厅督办F.J.伊夫利陪同卢洛斯上校约见了威廉·沃特伦先生。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威廉先生乃是自备警力的伦敦城[1]的一位参事(极有可能出任大市市长)。警察厅方面必须申请许可才能进入伦敦城。威廉先生承认沃特伦公司依照葡萄牙银行的要求为雷斯集团印制了价值总计超过1500万美元的面值500的埃斯库多币。卢洛斯上校告诉他，所谓葡萄牙银行的文书均系伪造。不过，对沃特伦的指控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才提出的。

手忙脚乱的里斯本警方除对葡萄牙银行官员实行临时逮捕外，还向伦敦和其他欧洲国家首都发出了对沃特伦公司驻葡萄牙前任代表亨利·

① 伦敦城又称伦敦商业区，位于伦敦中心区域，为英格兰银行、伦敦证交所等大型银行和金融机构所在地，占地约1平方英里。——译者注

罗默以及潜逃各地的雷斯集团成员的引渡令。警察在里斯本置外交豁免权于不顾，对委内瑞拉公使普拉纳斯－苏亚雷斯伯爵的寓所暨委内瑞拉公使馆进行搜查，搜出了“雷斯币”8.5万张。伯爵虽然遭到逮捕，稍后却获准离境：他辩称收下这些钞票只是不想驳雷斯集团的面子，并不知道它们是伪币，从而成功脱罪。

阿尔维斯·雷斯在狱中享有特权和优待。富于同情心的地方法官似乎更是把他看做葡萄牙的恩主，而不是一个抹黑了葡萄牙金融在国际上的声誉的巨骗。当雷斯和同伙班代拉兄弟及秘书弗朗西斯科·费雷拉在监狱里等待审判时，整个国家正快速滑向紧随经济衰退而来、未来半个世纪都无法挣脱的独裁统治。

金融混乱以及雷斯集团造成的经济和心理损害所导致的动荡仍在继续。卡尔莫纳总统的军事独裁看起来也无法令局势改观。1927年2月3日至2月17日两周间，波尔图和里斯本又相继爆发了新的起义。产业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在无政府—工会运动的激荡下群起响应。他们的不少思想来自一个倡导改革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团体。现政权支持者和起义军、民兵组织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波尔图的大片城区几乎被炮火夷为平地，政府好不容易将运动镇压了下去。起义者中122名遭到枪杀，其他人被流放到亚速尔和佛得角。

卡尔莫纳总统和为他出谋划策的那些人1年多来一直以为，如果说还有一个人能让葡萄牙走出腐败的泥潭和普遍的贫困，或者至少能在财政方面有所作为，那么此人就是科英布拉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生于1889年的萨拉查勤奋好学，起初入神学院，后曾转修法律，最终皈依经济学，欣然接受了保守经济学家中的最保守者提出的许多古典理论。卡尔莫纳的手下常问政于萨拉查，简直把他当成了1926年的无冕财政部长，不过他手上并无实权，更没有他本人最迫切期待的对政府各项开支的否决权和对可疑银行操作的监督权。雷斯丑闻一经披露，萨拉查便对这桩伪币事件产生了浓厚兴趣。欣赏他的那些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萨拉查的博士论文写的不就是葡萄牙的货币发展史吗？

经过了一个政治相对稳定、金融持续波动的时期，在1928年3月28日的总统选举上，卡尔莫纳将军赢得连任。卡尔莫纳在1951年去世前始

终担任葡萄牙总统，尽管从1928年起萨拉查已经是独一无二的国家最高权威。权和利仍然掌握在军队而非国会的手里。就在1928年4月27日，萨拉查教授的39岁生日前夕，他实至名归地成了真正的财政部长。在就职宣誓仪式上，他穿着葡萄牙顶级教授的标准装：一套深黑色西服。作家布鲁姆写道，他“那么瘦，那么苍白，一些不那么友善的评论家觉得他看着就像‘一个工资太低的殡仪馆伙计，要将葡萄牙的资财永远地埋葬’”。

但事实远非如他们所想象的。短短数月之内，多数大额埃斯库多币被回收，萨拉查的财政部亲自监印新钞以替换旧币。与此同时，萨拉查的支持者们积极行动起来，目标是在他的领导下，在新的法西斯主义一党制国家巩固既有地位。国家经济从此将建立在政府各部门严格的审批和问责制基础之上，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严密控制货币价值，同时对伪币严加防范。

1930年7月30日，执政党国民联合党成立，这是在政治上走向萨拉查设想的“新国家”的第一大步。国联党之外不允许存在任何党派。“新国家”的建筑师们一步步地为将来打着基础。正如希特勒缓慢而有条不紊地，直到1932年至1933年大选期间方才踩着魏玛共和国的废墟登上德国权力顶峰，萨拉查的上台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1932年7月5日，他被卡尔莫纳总统任命为总理。国联党党徒敲定的新《宪法》于1933年2月22日颁布。同一时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着手巩固其独裁；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及其同党开始准备对西班牙共和国下手，内战在即，佛朗哥在1939年至1975年的最高权力即将到手。

萨拉查的《宪法》以墨索里尼式“社团主义”为纲，徒留民主的外表。当选总统任期7年。内阁由总统指定，对其一人负责。国民会议相当于议会，成员由各个家庭受教育程度最高者选举产生。按照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模式设立资政团，代表各行各业，但仅有建议权。萨拉查组建了特务系统“对外和国防警署”，简称PIDE，因其越来越接近于盖世太保而成为萨拉查反对者的噩梦，一旦落入其手，等待他们的就是牢狱、酷刑，甚或死亡。

尽管刺杀事件时有发生，丧失了合法地位的葡萄牙共产党、像德尔加多将军那样的人以及各种自由运动也并未偃旗息鼓，但1934年对左派革命的镇压加上1935年的选举，让整个体制显得更加不可动摇了。通过选

举，卡尔莫纳获得了《宪法》规定的首个7年任期。1936年西班牙内战一爆发，葡萄牙就迅速站到了佛朗哥一边，并成为德国向佛朗哥叛军输送援助的主要通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国，特别是英国，费尽心机方才保住了与中立的葡萄牙的传统盟友关系。同盟国之所以这样做，部分也是因为要在大西洋上打反潜艇战，迫切需要萨拉查承诺向美国提供的亚速尔群岛基地。亚速尔群岛上的拉日斯基地冷战期间也发挥了作用。目前该基地依然为美国所用。

雷斯案的结局

运用依然可用的银行存款，与高层的旧交反复周旋，阿尔维斯·雷斯在1926年被捕并遭监禁后，和他的律师一起努力，将审判拖延了超过4年的时间。葡萄牙圣克拉拉的军事法庭最终于1930年5月6日开庭审理雷斯案。主审法官西芒·若泽与军人执政团关系密切。6人陪审团由另外6名法官组成。雷斯对每一项指控都表示服罪。他提出，法庭不应对自己的合伙人追究责任，因为他们并无欺骗意图，都以为他做的一切是为了增进葡萄牙在安哥拉的利益。辩护律师主张雷斯充其量只是个“通货膨胀制造者”，还算不上真正的伪币制造者，他推行葡萄牙中央银行的政策而无须银行破费。雷斯花钱请沃特伦印制钞票，乃是一种有别于伪造的“复制”。判决书于1930年7月20日下达，共计66卷1.2万页，雷斯被判有罪，不仅仅因为他使33万张非法的面值500的埃斯库多币流入葡萄牙，还因为他冒用了工程师头衔——将此并列为罪行颇显古怪。对他的刑罚是流放亚速尔群岛25年，或12年流放加8年监禁。1931年，上述判决修正为20年监禁。安东尼奥·班代拉和缺席的亨尼斯同样获刑20年。若泽·班代拉被判6年。在海牙负责将“雷斯币”混序重排的银行职员被判3年。塞尼奥拉·马利亚·雷斯判了2个月零8天，不过她的在押时间已经超过了刑期，故被开释。正在荷兰奔走请托的马朗也被判有罪，他先上诉后越狱，逃到了比利时。

葡萄牙银行在伦敦对沃特伦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对方赔偿不当使用

埃斯库多币印版所造成的相当于300万美元的损失。这个数字本来还要高得多，所幸葡萄牙银行已从安哥拉大都会银行的资产以及雷斯和班代拉兄弟的个人资产中收回了大约250万美元。雷斯之前有意保留了相当于850万美元的伪币，这些未投入流通的钞票中有一部分序列号欠规范，他担心招致怀疑而扣下，其余则是因为他没有足够时间通过洗钱而置入系统内。伦敦方面一直等到威廉·沃特伦先生1年的伦敦市长任期结束后方才进入审理程序。1930年11月24日正式开庭，历经耗时持久的拖延，在英国最高上诉庭(由5位上议院议员组成)结案。1932年4月28日最终做出了不利于沃特伦的裁定。审理和上诉前后差不多花去了100万美元。银行界、造币界和财政部官员对此案的关注用布鲁姆的话来讲近乎于“病态的执迷”。沃特伦的律师约翰·西蒙先生在辩词中声称，整个过程无非就是更换了一套纸币，葡萄牙的实际开销也不过就是为此而付的印制费用。初审阶段法官避免了对外披露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沃特伦曾参与制作帝国马克伪币。他们把重点放在葡萄牙财政实际遭受的损失上——同时避免提及其政治影响：萨拉查独裁政权的崛起。

最后，葡萄牙银行在5位上议院议员中以三票对两票获胜。沃特伦必须承担对葡萄牙银行的约300万美元损失赔偿。令人吃惊的是，中断6年后葡萄牙银行又把印钞工作交给了沃特伦公司，这一次备有周密的防护措施，以免类似丑闻重演。威廉·沃特伦先生不久便去世了，法院的判决让公司财务在一段时间内陷入了困境，的确在心理上和物质上对他造成了致命创伤。威廉先生至死都不愿相信，这样一个计划是出自一个完全没有背景的葡萄牙骗子之手。他认为丑闻背后另有“真凶”，继续雇私家侦探进行调查，试图找出连累他丢掉了公司领袖地位和职业声望的罪魁祸首。

马朗逃脱了抓捕和审讯，从比利时和德国给沃特伦寄圣诞贺卡，还给沃特伦公司的朋友寄过一盒雪茄。亨尼斯坚持宣称自己是犯罪集团无辜的受害者，而集团从葡萄牙输出的250万美元很有可能大部分在他手上，新成立的国际刑警组织对他的追踪一直毫无结果。有传言称他使用阿道夫·德林这个德国名字，德国进入纳粹时期后依然健在。若泽·班代拉和其兄安东尼奥一个下狱，一个流放。

阿尔维斯·雷斯1930年10月在里斯本监狱开始了他20年的刑期，但因为受审前已被关了好几年，1945年5月便刑满出狱。他在狱中写了一部名为《我忏悔的秘密》的回忆录，并皈依新教。出狱后他去了波尔图。他在某个教堂仪式上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悔罪，按现在的说法，变成了一个“获得新生的基督徒”。他和妻子、两个长大成人的儿子一起努力在巴西传播信仰。1950年从巴西回国后，雷斯并不成功地经营了一些小本生意，直至1955年7月6日去世。20世纪伊比利亚半岛最大的骗子埋葬在一处无碑墓下。

20世纪20年代席卷了葡萄牙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伪币风潮带来的一项后果是国际刑警组织的建立和逐渐壮大，它已演化为今日世界的执法工具，即使不能说是全能的，至少可以肯定它很有用。1923年该组织建立后，欧洲、美洲和远东地区的执法者又面临着一项新的国家级挑战：苏联统治者斯大林为了满足海外间谍活动的经费需要，并尽可能地大量购置正在困境中挣扎的苏联经济所急需的食物、燃料和军需品，多管齐下地努力研制和散布足够数量的假美元。斯大林的早期地下经济战是我们下一章的主题。

第十一章
斯大林的美元：恩将仇报

打倒资产阶级，得先搞臭它的货币。

——列宁，1918年前后

1930年1月23日，苏联格鲁乌（总参谋部情报部）高层官员沃尔特·克利维斯基在罗马开往维也纳的火车上翻阅《柏林日报》时，注意到了一个横跨整页的通栏大标题："谁在伪造美元？"报道写于柏林，导语如下：

> 市面流传100美元伪币的消息成为今日银行界和（柏林）证交所热议的话题。到目前为止，伪造者及其印版均未被发现。不过近来的调查表明，曾将伪币带回柏林的新温特弗莱德斯特劳斯街3号的弗朗兹·菲舍尔是1929年3月从俄罗斯回国的。

克利维斯基肯定后背心一激灵。他在回忆录（该书出版于他1937年叛逃西方两年后，又过了两年他在华盛顿遭克格勃暗杀，具体时间是1941年2月）里写道，当时他心想："见鬼！准是我们干的！"

作为处于起步阶段的苏联特务部门的一员，克利维斯基对国际政治、经济和战略问题既不乏灵敏的直觉，也拥有广博的知识。他反对伪币计划。他相信，无论如何，苏联的印钞机既造不出、其网络也传不开那么多的假美钞——多到足以对美国经济造成实实在在的影响。更糟的是，他认为，罪责迟早会被查实。伪造货币是一项严重的罪行，用做经济战的武器，将在国际上成为众矢之的。苏联政府迫切希望得到美国的外交承认，而赫伯特·胡佛总统及其前任柯立芝、哈定和威尔逊均予拒绝。如果假美钞源于苏联的消息传开去，这个希望就更渺茫了。

克利维斯基从媒体及同事那儿得知，一个加拿大矿业股的美国承销人集团购买了创建于1846年的柏林私有银行“萨斯·马提尼”。银行很快经这批买家转入了一些柏林人之手,其中有个叫保尔·罗德的。这位罗德一度是柏林市议会的共产党议员。他作为“苏联驻德国大使馆的机要人员”,与克利维斯基相识。

克利维斯基也认得弗朗兹·菲舍尔,此人自1920年起成了萨斯·马提尼银行的主要客户。克利维斯基1923年曾与之共事,当时的魏玛德国正被超通胀、政局不稳以及与苏联方面的秘密交易搞得焦头烂额。那一年他协助菲舍尔为德国共产党组建了他称之为“军事人员”的班子。菲舍尔效力格鲁乌多年,顶头上司是阿尔弗雷德·蒂尔登(又称“蒂尔腾”、“帕凯”)——在特务圈子内很长时间仅以“阿尔弗雷德”被人所知,作为军事情报机关高层官员,从1927年开始主要在美国活动,为格鲁乌的秘密间谍(特指隶属苏联使领馆或以其他方式拥有外交身份掩护或外交豁免权的人,包括男性和女性)。

克利维斯基看出控制萨斯·马提尼银行正是惯于隐身遥控的苏联情报机关所为。在确认弗朗兹·菲舍尔是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绝不会为了他个人的利益去洗假钱的基础上,克利维斯基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肯定是在执行来自莫斯科的命令。苏联买下这家德高望重的银行,显然是为了让人以为从它那儿出来的那些本身亦属精工细作的美元伪币是无可怀疑的。

一手对抗“赤祸”,一手援助灾民

尽管赫伯特·胡佛和20世纪20年代其他信奉保守主义的美国民众和总统坚持既定政策,拒不承认苏联政府,并希望苏联的制度有朝一日改头换面,却用食物和药品援助苏联所遭逢的饥馑。仅美国救济总署一家就在当时任商务部长的赫伯特·胡佛的领导下,在1921年饥荒爆发时向苏联输送了价值5000万美元的食物、衣被和药品。胡佛相信,救济行动可以做到联军军事干预没有做到的,即促动民众倒戈,推翻现政权。然而尽管从饥饿中拯救了数百万苏联人,美国救济总署的努力实际上反而消解了

民众运动的可能性,使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地位趋于稳定。

从 1921 年起,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不再视外国为洪水猛兽,不再将私有工业和资产收归公有。实现新经济政策就是为了在一定时期内鼓励私有企业,吸引外资,从而使国家从战争所开启的苦难和饥馑的深渊中走出来。列宁的观点是,一旦经济恢复常态,社会主义在国内就能搞起来。他相信,给美国实业界以特许权,保证其获利,就能吸引到苏联所渴求的资本。起初美国人反应迟缓。列宁去世后 1 年的 1925 年中,在 90 份生效的涉外特许权里,美国人的只占到 8 份。占有这 8 份的人中就有后来罗斯福总统任命的驻莫斯科大使 W. 埃夫里尔·哈里曼,还有得到了石棉开采和铅笔制造特许权的阿曼德和朱利叶斯·哈默。

1928 年至 1932 年间,苏联的间谍工作重点是窃取美国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技术。与此同时,斯大林还希望对资本主义美国的经济进行暗中破坏。这些都需要通过系统的间谍活动,以及对苏联制造的以假乱真的美钞的隐蔽运作来实现。列宁去世那年,即 1924 年,斯大林网罗的制版和印刷高手造出了好几百万的冒牌美元。

针对美元的伪币行动也可能部分出于苏联上层对美国的报复之心——这并非凭空而来的猜想。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以理想崇高的调停者自居。他努力避免美国在一战中受裹挟加入战圈,直至 1917 年上半年德国的行动使美国再也无法置身事外。然而当 1918 年大战结束,威尔逊却试图凭军事手段,扶持反革命力量,在刚刚诞生的苏联制造易色政变。美国纠合其他一战协约国派军队开进俄罗斯,在 1918 年至 1921 年白军对红军的内战中充当前者的后援,白军最终未能获胜。美方的军事干预始于 1918 年 6 月 18 日,距一战西线全面停战协议的签订恰好 5 个月。美军前锋部队 6 月抵达摩尔曼斯克和阿干折,5000 人的美国远征军随后跟进。1918 年 8 月 19 日他们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自 1917 年起被日本人占领),协同白军在西伯利亚和远东攻打红军。

列宁对此的反应之一是给美国工人党发去一封既含劝诫又带褒奖的信,对西雅图和华盛顿工人联手反对美国军事干预的行动给予回应。美国工人党在 1920 年并入了新生的美国共产党。该党许多早期成员很快就为苏联在美国的情报活动当起了帮手。捐赠给纽约大学的前美国共产党的

文件资料2007年3月在该校对外展出。1920年关于两党合并的文件中列出的人员里有后来担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厄尔·R. 白劳德的党内化名“迪克斯”，还有参与了伪币行动的杰·洛夫斯通的党内化名“L. C. 威特”，不过洛夫斯通后来公开宣布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而与反对苏联的美国工会组织、美国工党暨产业工业联合会以及中央情报局合作。

对抗布尔什维克人未果，包括美国人在内的联军部队在1919年9月、10月撤出了阿干折和摩尔曼斯克，1920年撤离西伯利亚。至1922年，联军全体被赶出了苏联。

列宁争取美国经济、技术帮助的尝试甚至在美国军事干预尚未结束前就已开始。有限的收获偶尔会被苏联在美国的早期间谍活动打乱。1919年初，莫斯科任命L. K. 马腾斯为苏联驻美国的官方代表。虽然没有外交身份，马腾斯还是在纽约开设了办事处。1919年3月9日至16日，经威尔逊总统和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双方首肯，外交官威廉·蒲立德前往俄罗斯，此行目的在于摸清形势，如果可能的话，使“军事冲突”(即指联军对俄罗斯内战的干预)在当年5月前停下来。列宁成功促成了“对俄技术援助协会”的建立。协会的主要任务是向有意赴苏联工作的美国工人和技术人员提供帮助。10月5日，芝加哥《新闻日报》刊登了一篇对列宁的访问，列宁强调：“我们愿意同美国和其他所有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特别是同美国。”“推动美俄贸易美国商团”随即在12月成立，这是一个面向美国商界的非政府组织。

到1920年7月，出口美国货物到苏联已获得当局的批准。附带一个条件：贸易风险由私人商户自担，美国政府不提供任何担保和支持。不过这时候联邦调查员已经发现，苏联情报部门以L. K. 马腾斯的贸易活动为掩护搞起了间谍活动。12月，马腾斯被驱逐出美国。尽管强烈需要来自美国的几乎一切形式的经济援助，苏联外交部为给予还击还是宣布与美国商户签订的所有合同一概取消。

这样一来，“对俄技术援助协会”就仍然大有用武之地了。由协会牵头向苏联派去了一些代表，苏联政府把莫斯科汽车厂承包给他们。以此为契机，苏联向沃伦·G. 哈定总统发出了实现两国正常通商的呼吁。3月25日，国务卿查理·埃文斯·休斯做了有保留的正面回应，指出苏联方面保证私

有产权不受侵害是苏美贸易的前提条件。随着苏美之间恢复在1917年俄国革命后中断的邮政服务,两国贸易(以及苏联情报部门在美国的活动)的一大障碍消失了。

早在1929年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前，赫伯特·胡佛在对国外争取解放或遭遇饥荒的人民给予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表现就已无人能及。胡佛1874年出生于爱荷华州西布兰奇的一个小镇,6岁和9岁时父亲和母亲相继去世。从俄勒冈州纽伯格的教友派学校“祥和之友学院”毕业后,他进入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镇新建的斯坦福大学,主修地理。大学毕业后做过几份有关矿藏勘探和评估的工作,接着到了中国,1902年又到澳大利亚,足迹渐渐遍布了世界各地,始终担任采矿工程师,1908年创立了自己的矿业事务顾问行。到1914年,他不仅是技术工程师,还成了储量丰富的勃麦斯银矿的矿主,已然发家致富。他妻子也是学地理出身,他的每个海外项目(大多数相当成功)都有她的一份功劳。他是个乐善好施的成功资本家,有点像现在的比尔·盖茨、乔治·索罗斯。胡佛在一战期间为威尔逊总统执掌美国食品管理局，随后奉命统管美国对欧洲输送3400万吨食品、衣物和其他必需品的救济事务。加上后来给苏联的价值5000万美元人道主义援助,整套计划共为19个国家的人民带去了帮助。

1928年,斯大林以雷霆手段击溃列翁·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托派主义者主张重中之重是尽快在全世界铺开布尔什维克革命),颁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继续实践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斯大林抛弃了给予外国人特许权的政策,转而通过与外商订立合同来取得技术支持。这种形式对大部分美国企业家来说更具吸引力。许多人在1917年革命之后第一次成群结队地开始往苏联跑。美方对苏出口占绝大部分的美苏双边贸易在1923年至1930年间猛增20倍,达到了1.14399亿美元。到1930年,美国已是苏联的主要供应方,苏联进口总量中来自美国的占25%。同一年,苏联为美国的第八大进口国,并且是美国农业和工业机械设备最大的买家。

不过莫斯科还是不能从美国银行获得长期信贷。银行背后是美国政府的反对。莫斯科拒绝偿还沙皇时期欠下的战争借款和其他债务,两国之间也不存在正式的外交关系。苏联大批大批地购买斯大林为实现苏联工业化所急需的国外设备和各种物资，苏联财政部手里那点可怜巴巴的外

汇储备很快就不够用了。

斯大林的对策之一是将克利维斯基估计在1000万美元左右的假美钞在世界各地投入应用。克利维斯基在回忆录中提到，在1928年至1932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持续期内，

> 世界上流动着一批冒充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发行的100美元币。从三藩市，从休斯敦、纽约，从蒙特利尔、哈瓦那，从华沙、日内瓦、布加勒斯特、柏林、索菲亚、贝尔格莱德，伪币先是点滴渗入，然后大股涌入了美国内陆。

这些高仿伪币几乎可以肯定就是苏联格鲁乌十四局六处(印刷处)造的。美国军事历史学家雷蒙德·W.莱昂纳德在其著作《革命的暗哨》中描述六处的这项工作是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地下印刷厂为了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深化而派生的新功能。六处的印刷厂里造的不再是宣传画和传单，全部人力物力都转向了假证件和伪币的制造。

苏联谍战，伪币迷局及对弈者

真正意义上的苏联谍战以及相伴的格鲁乌散布美元伪币的地下行动在20世纪20年代末紧锣密鼓地展开。此前这些伪币已在中国、西欧和其他地方投入了使用。大卫·达林的《苏联谍战》一书综述了苏联男女特工早期的活动，诚然如书中所言，早期仅有零星的间谍行为在美国发生。执行人为美国激进分子，受1919年3月成立的半地下组织第三国际的委派，并有苏联“商务”使者(比如行动暴露后因身份可疑而被驱逐出境的L.K.马腾斯)的帮助。美军自俄罗斯撤离后，威尔逊、哈定和柯立芝这三任总统就尽可能不再主动介入美国之外的纷争事务了。西欧和远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反苏行动，很少与美国的特工或美国方面的运作相关，让莫斯科正中下怀。这也是俄罗斯在美国的“小动作”在那几年里得以维持在最低限度的一个原因。此外，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从未达到如海外兄弟党派那样的广度和强度。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美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

大体都是移民，包括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来自革命前的俄罗斯，既有俄罗斯人，也有附属国的极地人、波罗的海人、乌克兰人以及不同国籍的犹太人。

1924年，格鲁乌对美国贸易组织(AMTORG)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组织办事处位于曼哈顿第五大道269号，公开身份是两家普通苏联公司合并体，但它既是斯大林借以最大限度采办美国货的合法的商业运营体，暗地里还逐渐发展成了军事和经济间谍活动的掩体。不过，AMTORG大部分成员和代理是美国人，有很多并非共产党员，斯大林不怎么信得过他们。他指派苏联民事特务组织OGPU对其进行严密监视。(民事编制的OGPU和军事编制的格鲁乌过去是而且接下来也是竞争对手，为争夺财政拨款而斗得不亦乐乎，常常互相刺探，为叫对方颜面扫地不惜施以黑手。)

格鲁乌首任"驻美特工"姓氏不详。他在美国的身份是AMTORG雇员。与他一道工作的还有上文提到过的拉脱维亚籍共产党员阿尔弗雷德·蒂尔登和莉迪亚·斯塔尔，这两位之前均为格鲁乌在法国执行过间谍任务，后来为伪币行动美国分部的招兵买马、组织和运作出力不少。蒂尔登起初通过曼哈顿巴特利港区附近一家船运公司的办事处展开活动。他在共产党海员及其工会的帮助下建立了格鲁乌的传送网络，以后100美元伪币的散布从中得益匪浅，很多伪币就是由北德劳埃德轮船公司的班轮从德国汉堡运到纽约来的。

伪币行动的参与者，有许多简直就是格雷厄姆·格林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影片里的角色，莉迪亚·斯塔尔在所有这些非常人物中显得格外耀眼。她1885年出生于俄罗斯南部的罗斯托夫，闺名叫莉迪亚·契卡洛夫。丈夫斯塔尔是个富有的俄罗斯贵族。斯塔尔夫妇正如大部分同一阶级的人那样，在俄国革命中产业和财富尽失，移居到了美国。莉迪亚懂法语，很可能也懂英语和德语，对国际金融也颇通门道。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班，兼修哥伦比亚大学的课程。夫妻俩都加入了美国国籍。但他们的独子不幸夭折——大约是在1918年全球性流感爆发时。悲痛欲绝的莉迪亚只身返回欧洲。她留在巴黎做起了大学生，开始与共产党合作。达林的书中写到了她，说她在一战后的巴黎住着"又小又破的"的居民房，是个风韵天

成、优雅洒脱的女子，“穿得很差，头发凌乱，鞋跟磨得厉害，给人一种不修边幅的感觉”。她精通摄影，在巴黎开了一间照相馆，苏联特工把所获秘密文件送去翻拍。这为她后来在格鲁乌位于纽约哈勒姆区百老汇大街的工作室的活动打下了扎实基础，在那儿复制的既有特工窃取的文件，更有从德国运来的假美钞。

斯塔尔在巴黎的学生身份并不止是间谍活动的掩护：她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绝不是个门外汉。她在哥伦比亚大学修过医学，在巴黎涉猎了法学，而后又转向东方语言学，估计是为日后可能被格鲁乌派往远东做准备。她第一次在法停留期间，路易·皮埃尔·马尔丹教授从1923年起成了她最主要的男友兼工作伙伴，此人曾任法国海军部专员，而且是法国荣誉军团军官。

莫斯科启动伪币行动前后，斯塔尔回到美国与蒂尔登和菲利克斯·沃尔夫(又称“尼古拉·克莱伯森”)并肩工作，沃尔夫1924年至1929年一直在纽约从事AMTORG所掩护的地下活动。他们的格鲁乌同事菲力普·罗森布列特医生究竟是和斯塔尔、蒂尔登合伙干还是另开炉灶，我们并不清楚。他原本是纽约的一个牙医，后来成了替苏联人做事的美籍特工韦德葛·钱伯斯的格鲁乌联络员(或专项负责人)，1938年因共产主义信仰破灭而变节。他1952年的《人证》一书中曝光了苏联谍战的众多机密。

格鲁乌纽约站1928年的成绩可圈可点。特别是通过AMTORG的渠道为苏联买下两辆革新型主战坦克，一辆是始创型M-1928，另一辆是升级版的M-1930，由美国军事装备专家J.沃尔特·克里斯蒂设计。研制者试图把坦克卖给华盛顿的美国国防部，费了很多工夫还没什么进展，苏联人就携现款捷足先登了。两套先进装备被放进了贴着“拖拉机”标签的大箱子里，1930年12月24日装船自纽约运往苏联。这两件送给斯大林的圣诞礼品成了后来整整一代苏联装甲车的原型，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使用的T-34系列坦克、突击炮和坦克歼击车均源于此。苏联用这些装备造就了希特勒的德军，又用它们在二战中打败了德国人。到1945年，克里斯蒂减震装置的多种变体出现在了波兰、纳粹德国、英国和美国设计的坦克上。

代号“亚瑟”的尼古拉·道岑伯格也是一位出生于立陶宛的格鲁乌特

工，最终也成了苏联伪币行动纽约小组的一员——后来为此在美国联邦监狱服刑1年。从1904年开始，他随家人一起定居美国，曾在波士顿的前美国社会党等左翼组织任职，1921年加入了美国共产党。美共政治局后来就派道岑伯格与莉迪亚·斯塔尔进行接触。他化名“尼古拉·L.达朗”加盟苏联军事情报机关。莉迪亚·斯塔尔来到美国后，道岑伯格租下了哈勒姆区百老汇大街1180号一家影楼的暗房设施，后来又向影楼所有者约瑟夫·图灵买下了整个店面。斯塔尔运用她的巴黎经验在这儿开起了照相馆和工作室。

工作室原来的用途是配合AMTORG的特工，复制在间谍活动中偷来的文件。伪币行动开始之前，工作室内频繁进行的正是此类操作。因为大多只需在晚间进行，斯塔尔乘此机会组成了自己的特工分支网络。她设法从一个身份未详的“持合作态度的贪官”那儿为莫斯科搞到了为即将从加拿大送返英国的英国皇家海军“皇家橡木”号战舰拟订的行动方案。文件在斯塔尔的工作室复制完毕后被放回原处，英美当局直到多年后才意识到它们曾经失窃。

格鲁乌在哈勒姆区百老汇大街1180号的照相馆1928年内即开始翻造和散布那些在俄罗斯制作的、由德国船运来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100美元的仿品。不过在此之前，这批伪币已在欧洲、加勒比地区和远东现身。克利维斯基1937年向西方投诚后，开始对外声称是自己终结了这一遍及全球的行动。他认为，这样一来，苏联方才免予被罗斯福当局（罗斯福于1932年1月继大萧条阴影笼罩下的胡佛后入主白宫）公开声讨。不然的话，克利维斯基确信，官方谴责必然公开化，罗斯福关于和莫斯科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提案也必然遭到国会否决。

克利维斯基 vs 斯大林

沃尔特·克利维斯基原名萨穆埃尔·金斯贝格（他的许多护照中有几本就用了这个名字），1899年6月28日出生于波兰的波德沃洛奇斯卡的贫苦犹太人家庭。1917年，他18岁，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他加入了共产党，满腔热情地投向马列主义的怀抱。他把它看做是“能够把我生来就在

反抗的谬误统统消灭的武器”。尽管苏联和他的祖国波兰关系很僵，还打起了仗，他还是很快在全欧，尤其是德国，忠心耿耿地开始为苏联的格鲁乌效力。凭借非凡的外交才能，他在苏联情报机关和魏玛德国的半地下军队“黑暗国民军”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

怎样获取苏联财政部最需要的货真价实的黄金和硬通货以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建设？斯大林和他的心腹们把伪造美元然后洗钱看做是一大捷径。另外，格鲁乌和OGPU在受命展开行动时，也正在为缺少可支用的现金伤脑筋。为了搜求黄金和硬通货这两种储备，OGPU专门成立了“金元局”。

这类做法人尽皆知。不过，像历史上其他由执政者发起的伪币行动，比如乔治三世和威廉·皮特针对美国的、法国革命时拿破仑和普鲁士针对各自敌国的、英国针对威廉一世的德国的、希特勒德国针对英国等二战同盟国的，斯大林1928年至1932年针对美元的狡猾的全球行动也意欲保持高度的机密状态。的确，在很长时间内，它的保密工作比上面提到的多数行动做得更到位。20世纪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早期的100美元伪币来自何处，虽然许多执法和司法部门的官员已有所觉察，但在1938年被克利维斯基挑破之前，套一个丘吉尔的词儿，始终还是个“谜中之谜”。

扬·别尔津将军是格鲁乌首脑，也是执行该行动计划的最高负责人。别尔津的下属尽可能找有组织的罪犯进行合作，在东欧找美国骗子，在美国找芝加哥黑帮老大。其他帮手倒不是罪犯，而是单纯信仰或亲近共产主义的人士，不取或只取很少报酬，主要基于政治考虑参加进来。

1930年1月，克利维斯基比德国警方官员略早一些得知，他的旧相识、党内同志弗朗兹·菲舍尔在柏林萨斯·马提尼银行兑换了总共1.9万美元的百元美钞。银行随后把这笔钱存进了可靠的、素有威望的德意志银行，其中不少又被后者送到了纽约银行。当它们最后到达纽约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时引起了怀疑，财政部新发行纸币的尺寸已减小，这些却是大号的旧版票。经显微镜检查，发现它们属于一类在财政部已有备案的伪币。12月23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给柏林拍去电报，通知这些是冒牌美元，并提醒德国银行方面和执法部门，该种类型是所有已发现伪币中制作水准最高的。

柏林警察局局长冯·利伯曼下令突击搜查萨斯·马提尼银行，他发现了不少疑点(尚不包括该行与苏联政府的关系)，银行很快遭到封禁。德国调查人员查出，所有伪币的来源都集中在弗朗兹·菲舍尔一人身上，此人这时候已告失踪。柏林警方作出了错误的推断：创制这批伪币的团体要么在波兰要么在巴尔干地区活动。

克利维斯基担心莫斯科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将会暴露，从而危及他当时正在开展的间谍行动。他在罗马对前来巡视苏联海外秘密活动的斯大林的钦差弗拉基米尔·泰洛夫高调表明了自己的反对态度。“不足为虑，”泰洛夫对他说，“有老板亲自盯着。”克利维斯基意识到“老板”指的是斯大林，别尔津将军若没有斯大林的许可是不会迈出这一步的。泰洛夫认为计划可行，他指出格鲁乌买下萨斯·马提尼银行，唯一的目的就是通过它来洗钱，让苏联的伪币得以传播开去。继续争论了一番后，泰洛夫承认，行动可能确实会对苏联在欧洲的利益造成损害。

德国警方发布了有数百万张百元美钞赝品悄悄流通于欧洲的警报，随后，各种通报和警报在1930年的美国财政部和世界许多地方之间往返流传。1月23日的一道美国警报告知伯尔尼的瑞士联邦警署，伪币正现身瑞士。次日柏林警方报称发现了面值总计约4万美元的伪币。他们还悬赏通缉弗朗兹·菲舍尔。从古巴哈瓦那传来消息：古巴不止一家银行以及纽约国民城市银行的哈瓦那分行已存入大量100美元的伪币，许多假美元是通过哈瓦那最高档的聚赌场所“大众赌馆”流入市面的。

1月29日，德国律师阿方斯·扎克博士(纳粹时期著名的国会纵火案中担任辩护人的也是此人)告诉一家柏林法院，他能证明100美元伪币是莫斯科的苏联国家制币所的产品。2月，波兰的华沙、勒武和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发现了同一种伪币，还有一名罗马尼亚人、一名匈牙利人和一名捷克人因涉嫌参与伪造10美元币和500美元币(当时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还在发行面额为500美元的钞票)在安特卫普遭到逮捕。

在美国，为对付从曼哈顿的格鲁乌复印馆源源不断流出的伪币，情报机关和联邦调查局双双上阵。1930年2月22日，纽约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发布通告，列举了此类伪币可被检出的局部错讹。3月在墨西哥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现了伪币。回荡在欧洲和美洲的警钟声让格鲁乌头子泰洛夫

感到惊心，于是向莫斯科报告欧美当前的调查攻势可能会导致行动全盘暴露。按照克利维斯基回忆录中的说法，泰洛夫接到指示，委托他（即克利维斯基）去“了断”此事。

克利维斯基在维也纳会见了时任格鲁乌当地负责人的“亚历山德罗夫”，后者对格鲁乌的阿尔弗雷德·蒂尔登打发菲舍尔来维也纳、肩负着斯大林的命令迫使自己保护菲舍尔的安全并为其提供假护照帮其飞往莫斯科的举动颇多怨言。克利维斯基明白，菲舍尔自己大概也明白，莫斯科将是他的最后一站：斯大林不会容许他继续活在世上。

泰洛夫刚刚认识到行动的潜在危险——让苏联在欧洲颜面扫地，也怪起了蒂尔登。蒂尔登本人恰好正在维也纳。克利维斯基在孔斯特勒咖啡馆和他见了面。面对克利维斯基的斥责，蒂尔登是这样为行动辩护的：

> 你不懂。这是实实在在的钞票。它跟普通的伪币不一样，是真货。我弄到了他们在美国用的纸。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在我们的印钞机上而不是在华盛顿印出来的。

如果这番话当时就传到美国执法部门或美国财政部的耳朵里，定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那时候美国造币用纸的供应商是克兰公司，坐落在马萨诸塞州伯克夏山区的老牌造纸世家。该公司创建于 1801 年，从内战期间林肯总统发行新绿背币时起开始提供造币用纸。1879 年成为铸印局的主供应商（至今依然未变），虽然订单有时会被美国银行纸币公司等竞争对手得到，不过 1978 年以后就再未出现过这种情况。自此，克兰公司一直都是美元用纸的独家供应者，尽管英国纸业两大巨头“德拉鲁”和在美国佐治亚州设有造纸厂的“珀陀斯”老想抢它的生意。

偶尔几次接受媒体采访，克兰公司管理层始终坚称公司安全系统百分之百可靠，库存纸张也从未遗失、遇窃。这大概是实情，查到的所有苏联版伪币用的都是 1 美元币的“真”纸，在漂白后进行覆印，“改装”成 100 美元币。大约在克利维斯基记述的苏联拿到真正的美国币纸的前后，1928 年克兰公司又加了一道安全措施：往纸内嵌入丝线。（后来丝线被金属线和荧光线代替，为当今世界多数货币通用的防伪标识。）

尼古拉·道岑伯格和他的朋友兼助手，出生于俄罗斯的、事业有成的纽约医生瓦伦丁·布尔坦，费尽心机地把人脉延伸到了美国铸印局——克兰公司的纸定期由火车运送到这里。一位名叫波利亚科夫的格鲁乌官员以 AMTORG 雇员身份被派到了美国。他的任务是将道岑伯格和布尔坦在铸印局开发的人脉进一步引向深入。数名美国政府公务员——具体身份从未对外透露——可能在苏联人的诱劝下交出了技术资料。有两人据说还专门找过波利亚科夫，请他设法帮助他们离开美国前往苏联。其中之一，可能是克利维斯基一笔带过的那个生于立陶宛的“尼克”，又或许正是尼古拉·道岑伯格，据说帮助苏联人获得了大量正规的美国造币用纸。这些已印成 1 美元或者还未经使用的纸显然在 1928 年至 1930 年内运抵苏联。由于克兰公司的否认，加上美国财政部对伪币事件的细节始终保密，克兰公司的空白原版纸究竟是否落入了苏联人之手尚难定论。

克利维斯基说，他认为自己在 1930 年的上半年里已将伪币行动做了“了断”。1930 年 5 月蒂尔登返回莫斯科。菲舍尔也一样。6 月，克利维斯基来到莫斯科与扬·别尔津将军和泰洛夫会面。别尔津专门向克利维斯基致谢，感谢他收拾了在欧洲因警察的突击检查造成萨斯·马提尼银行垮台所遗留的残局。

蒂尔登被调到了毗邻波兰边境的内战期间反苏白军曾与红军有过激烈交战的明斯克。失宠的弗朗兹·菲舍尔被派到了 OGPU 的基建部，然后被送往遥远的西伯利亚北部的科雷马。往后便罕有音信，大约死在了古拉格。别尔津将军派克利维斯基于 1931 年秋末赴维也纳执行一项解困任务，他在那儿偶然碰到了道岑伯格和其非常年轻的妻子。

身材高大、衣着体面的道岑伯格扮演的是年轻有为的美国商人的角色。他在罗马尼亚以经营美国对罗马尼亚胶片出口公司为掩护执行格鲁乌的任务。在克利维斯基的帮助下，他在维也纳申领到一笔经费供他回纽约购买一套也可用于间谍活动的昂贵的拍摄器材。道岑伯格夫妇 1932 年初踏上了去纽约的行程。

道岑伯格在此次旅美期间同原格鲁乌小组的几位成员和他们周围的亲共分子又有过合作。这与伪币在大西洋两岸新一轮的蔓延在时间上相吻合。4 月初，瑞士银行界专家突然向全欧各家银行发出警报：注意警惕同

一种100 美元的伪币。4 月 29 日，柏林的一家报纸报道，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再现伪币。数月后，行动在美国败露。

1933 年 1 月 3 日，守在纽瓦克机场的美国情报机关人员逮捕了一名刚从莫斯科飞来、随身证件上的姓名为“冯·比洛伯爵”的男子。按照当时的有关描述，此人是斯大林针对美元的货币战争中最不寻常的参与者之一。据说他爱戴一副单片眼镜，酷似好莱坞影片里埃里奇·冯·斯特劳亨饰演的那类德国坏蛋。调查人员很快查明，他的真名叫汉斯·德肖，是个出道已久的骗子，在芝加哥留有案底。他被指控与伪币集团在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行动有关。对他的起诉书中并无一词提及苏联，事实上会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德肖肩负着向美国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的官员行贿，从而设法在拉丁美洲(特别是危地马拉)、可能的话也在加拿大散布假美元的使命。他本人也预备传播伪币，借洗钱捞上一把。根据已知线索，格鲁乌外汇储备极少，他打算收买那些高官所需要的贿金，是没有足够的货真价实的硬通货来充当的。

1933 年 1 月 4 日，胡佛政府卸任前最后的日子里，布尔坦从蒙特利尔来到纽约，刚下火车就被美国情报人员逮了个正着。《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在“冯·比洛伯爵”落网 24 小时之内，此人也作为伪币案嫌疑犯被捕。稍后从芝加哥传来消息，伪币集团成员已通过该市一家鲁普银行转手了 2.55 万美元。

W. H. 莫兰早在 1918 年便被威尔逊总统任命为美国财政部情报部门主管，一直有力地行使着自己的职责。1929 年 3 月，莫兰看到头一批被查获的苏联版伪币时就意识到，它们出自绝对专业级的策划和制作。附属实验室确认伪币所用为原版纸，明显是对 1 美元币作了处理，将其漂白，再覆印为 100 美元币。这是美国内战以来技术高明的伪币制作者常用的一招，在 20 世纪晚期彩色激光打印和其他电子影印技术问世前尤为通行。

美国财政部的一份通知警诫道：“这是一种极端危险的伪币……一般情况下难以辨识，在经手该版型、该面值的钞票时必须格外谨慎。”至 1930 年 2 月，又在市面上发现了另外三种带富兰克林肖像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大版 100 美元的苏联赝品。美国财政部发出了更高级别的警报。不过多数观点认为，被滤出的这些苏制伪币，总面值估计不超过 100 万美元。斯

大林的伪币作手如果改造1929年7月首发的小版联邦储备币，则会有更佳战绩。新的小版币的出现使得外国银行和其他美元海外持有者纷纷要求美国财政部就原大版币的赎回问题制定细则。

面对讯问，德肖决定供出对同犯不利的证据。对他的起诉于是从联邦法庭撤回。他的供认让联邦当局对他和布尔坦以及芝加哥黑社会之间的交易掌握了相当完备的材料。但是关键在于，慑于格鲁乌的纪律，德肖在陈述中将行动源自苏联这一点完全略去了。他说自己介入了军火生意，主要从事化学武器装备的采办，1932年的夏季在纽约同布尔坦相识。因德肖和芝加哥黑社会有一定关系，1932年11月布尔坦告诉他，手头有一个正巧是大名鼎鼎的阿诺德·罗斯坦帮派成员的病人给的共计10万美元的100美元币，暗示这钱属于"黑钱"——来自地下赌场，罗斯坦当时是这一行毋庸置疑的老大(此人后来在原因不明的帮派火并中被杀)，或者来自色情业、私酒业等等不法勾当。布尔坦神秘兮兮地对德肖解释说，这种热钱在纽约无法通过兑换或其他可靠途径完成洗钱。

1932年圣诞节前不久，德肖把一些苏联版100美元币带到了芝加哥，走黑社会的关系办成了代理洗钱交易，是一个姓斯迈利的私家侦探帮他牵的线。后来被起诉的涉案者中包括8名芝加哥老千。斯迈利的人答应想办法让钱在几家银行的出纳那儿获准存入。布尔坦来到芝加哥，达成了如下协议："白钱" 收益的30%付给代理洗钱方。他们拿到了需要兑换的10万美元伪币。只是他们还不知道拿到的是伪币。

按照克利维斯基的说法，接收了这批钱的银行包括国立依利诺大陆银行暨信托公司、北方信托公司和哈里斯信托暨储蓄银行。钱是旧的大版联邦储备币，这三家银行为其办理了兑换。1932年12月23日，银行将钱汇总上存至芝加哥的联邦储备银行。储备银行官员起了疑心，向情报部门报告后，其芝加哥分部主管、握有实权而且极富经验的托马斯·J. 卡拉汗亲自出马。经过仔细检验，卡拉汗断定这些确属伪币。他认为它们跟1930年在柏林，以及1928年以来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陆续发现的伪币相类似或者为同一批。芝加哥所有的银行都拉响了警报。随后一名男子在芝加哥第一国立银行遭到逮捕。此人想要把100张100美元币换成10张1000美元币，后者是当时法定货币之一，但不太常用。如此联邦调查局和芝加哥

警方得以直捣黑帮老巢。而那些老千愤怒地发现，设好的局未能蒙住银行，自己还先被别人的伪币蒙住了。他们交出了尚未脱手的 4 万美元伪币，表示愿与联邦当局合作。

德肖在芝加哥黑帮的压力和威胁下前来用真钱替换上回留给他们的假钱。一位 OGPU 人员现身纽约，警示他应赶快搭下一班轮船去欧洲。德肖却飞到了加拿大，1933 年 1 月初在蒙特利尔的蒙特·罗亚尔宾馆为处理一桩尚未解决的危机和布尔坦碰面。那个在纽约向德肖吹过风的 OGPU 的人这下又出现在了加拿大，再次敦促他逃往欧洲。可德肖还是坐上了降落在纽瓦克机场的飞机。就像上文提到的那样，他在那儿被逮了个正着。他把办案人员带到了布尔坦医生设在曼哈顿五十八街的办公室。1933 年 2 月 24 日的《纽约时报》报道，对布尔坦和德肖的调查，将流经芝加哥的 10 万美元伪币的源头引向了苏联。文章进一步指出，这批钱与被美国财政部视做"迄今发现的最能乱真的伪币"形制相似。

《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还指出，正在对据传为苏联政府工作的布尔坦展开进一步的调查。但在受讯时，包括在随后的庭审阶段，布尔坦对这一点矢口否认，也没有透露任何美国或其他国家同谋的名字。最后在 1934 年 5 月 4 日，芝加哥的一个联邦陪审团仅裁定布尔坦拥有并传播伪币罪名成立。在漫长的审理过程中，因供出同案犯而被豁免的德肖为检方主要证人。布尔坦被判在宾夕法尼亚州刘易斯堡的联邦监狱服刑 15 年。他坐了 10 年牢，交了 1 万美元罚金，并被吊销了医生执业资格。

1933 年 2 月布尔坦遭逮捕后不久，道岑伯格回到了莫斯科。像之前的弗朗兹·菲舍尔一样，道岑伯格从斯大林那儿得到的只是冷遇：既没有豪华的招待所，也没有格鲁乌和 OGPU 外派人员在莫斯科惯于享用的配给卡。

瓦伦丁·马尔金(又名"沃尔特"、"海尔曼"和"奥斯卡")是 OGPU 驻美国的高级特工，在大卫·达林笔下是"这位能干、忠诚的共产党员……鼓起勇气亲自跑到莫斯科报告"竞争对手格鲁乌的伪币行动和其他动作造成的"危害"。马尔金大谈格鲁乌如何一错再错，批评别尔津将军领导和管理无方。马尔金赢了：斯大林接受了他的建议，下令切实暂停格鲁乌在美国的行动。苏联人希望这样做可以让走马上任的罗斯福政府尽快给予自己外交承认。苏联政府长久以来的期待，随着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与

苏联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在1933年11月互换国书而实现。

苏联在美国的情报活动移交给了领导权正握在臭名昭著的亨利希·亚戈达手里的OGPU。受命为伪币行动和格鲁乌留下的其他烂摊子善后的马尔金被发现死在了曼哈顿五十二街的一间酒吧，明显死于谋杀。后来，另一位OGPU头子阿布拉姆·斯卢茨基告诉克利维斯基，马尔金是托派分子，是叛逃者。在克利维斯基看来，这就意味着马尔金实际上是被亚戈达的OGPU(1934年7月更名为NKVD)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干掉的。

离开了刘易斯堡监狱的布尔坦若干年后在美国去世，始终没有公开承认和苏联的关系。道岑伯格未遭指控，1932年接受格鲁乌的新委派前往德国和罗马尼亚，后来又被派往中国天津。斯大林令他心寒，他从莫斯科回到了美国，如达林所述，成了“一个心灰意冷的共产党员”。他被发现在美国护照申请书中造假，蹲了1年牢房。出狱后他留在了美国，更名改姓，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

莉迪亚·斯塔尔在美国同样逃脱了起诉。格鲁乌将她调回到她最初的活动地点巴黎。她在那儿加入了由马尔科维奇(此人姓氏不详，很可能是南斯拉夫人)领导的格鲁乌据点初建工作。1933年底，法国警方对该据点完成了合围，就在圣诞节前逮捕了斯塔尔和另外11名格鲁乌特工，包括一对美国共产党员的夫妻搭档，前美军下士罗伯特·戈登·斯维茨和妻子玛乔丽(又名“玛乔丽·蒂丽”)，他们也在美国为格鲁乌工作过。斯维茨的招供让其他人无计可脱，结果斯塔尔下狱2年，后来死在了法国这个最初做过她俄罗斯逃亡者庇护所、后来成为她间谍活动舞台的地方。

余波：孰得孰失？

伪币行动收场后，沃尔特·克利维斯基继续在西欧一门心思为克里姆林宫卖力，直至斯大林发动了1937年至1938年的大清洗。莫斯科连威吓带哄骗地要他回国，此前，苏联元帅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和另外20名开国元勋、从列宁时代起就一直在为巩固苏联政权奋斗的军界和政界头面人物已被处决，促使克利维斯基变成了——按照英国研究情报问题的历史学家奈斯特·威斯特在为加里·肯综述克利维斯基生平和事迹的著作

《华盛顿之死》所撰导论中的说法——“苏联情报人员倒戈这一极不寻常的现象最早而且最重要的一例”。

克利维斯基预感到在刚刚爆发的威胁欧洲的战争中，希特勒将会攻陷法国，故逃往美国。他化名塞缪尔·金茨堡乘坐法国轮船“诺曼底”号，于1938年11月10日抵达纽约；作为非法移民在埃利斯岛上被扣押了几天后，威廉·布里特大使和共产党员多萝西等实权人物出马终于使他获准持非移民签证入境。他在移民作家大卫·舒布和依萨克·唐·莱维内的帮助下做起了自由撰稿人。《星期六晚邮报》以每篇5000美元的稿酬，刊登了由莱维内捉刀、他本人署名的8篇文章。国防部鹰派苏联问题专家洛伊·亨德森在华盛顿接待了他，并将他引见给美国情报界多位重量级人物。克利维斯基关于伪币和其他苏联秘密行动的见报文章让联邦调查局一号人物J. 埃德加·胡佛眼红而不悦，他发现读到的恰恰是自己想要封锁在联邦调查局档案袋里的内容。关于苏联的秘密行动，克利维斯基有着包罗万象的认识，尽管许多美国官方人士基于对其价值的无视和无知，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甚或表现出完全的敌意，他最后还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西方得以对包括伪币计划在内的斯大林的地下活动有所了解。

早在1939年揭开伪币行动和其他苏联在德国、内战中的西班牙等许多地方展开的行动的内幕以前，克利维斯基就担心唯恐遭到泄密的莫斯科对自己盯得很紧。他屡次告诫友人，斯大林的间谍已经渗透到了美国政府的多个部门。

对结识的大多数人，克利维斯基仍以金茨堡自居，他和韦德葛·钱伯斯等前间谍过从甚密。他完全可以攻破那些怀疑他作为“沃尔特·克利维斯基将军”的苏联经历纯属虚构的说法。临时过境签证的延期许可帮他躲过了一回移民归化局的驱逐企图。他对美国国务院护照司司长鲁斯·希普利的指点帮助使后者鉴别出多例由美国共产党和苏联特工伪造的假护照。不明就里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倾向于关注一些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然而实际上无足轻重的人物。显然，他们受不了克利维斯基多谈苏联伪币行动这种大动作；相关内容是在他后期的文章以及1939年出版的书中公布出来的。

克利维斯基是苏联和纳粹德国地下合作的长期亲历者。仅有少数专

家对 1939 年 8 月 23 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纳粹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签署《苏俄互不侵犯条约》没有感到意外,他正是其中之一。苏德刚一缔约,希特勒就在 9 月 1 日悍然侵犯波兰领土——恰恰是克利维斯基的祖国位于德国和苏联之间的那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随之爆发。他 1939 年 10 月提供的关于苏联及共产国际活动的证词震动了马丁·戴斯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他还进行公开演讲,增加了个人知名度的同时也把自己更多地暴露在了苏联暗杀者的视线下。

克利维斯基作为情报来源的巨大价值其他部门并不了解,移民归化局在这一年年底吊销了他的过境护照。他在英国情报机关"军情六处"一位护送人员的帮助下,举家乘火车赴加拿大。英国人对他的价值远比他遇到过的那些美国官员来得重视,这样就无须多费周折,1940 年 1 月 19 日他登陆利物浦。接下来的周末,在伦敦兰厄姆旅馆回答了英国情报人员的密集讯问后,他回到加拿大。慷慨的英国当局准备了可观的现金酬劳。他把钱存入银行充当自己、妻子冬妮雅和两个孩子的生活开销,至少可支撑到来年。1940 年 10 月底,在英国、加拿大、美国友人的共同关照下,他重新踏上了美国的土地,这一次以沃尔特·波莱夫的名字取得了俄国移民名额。他把家安在了纽约布隆克斯。死期悄悄逼近的第二次驻美期间,他既未发表文章也未向美国的情报部门介绍任何情况。他和移民人士以及专家友人保尔·沃尔、大卫·达林等来往频繁,还计划买下弗吉尼亚州的一座农场。

克利维斯基清楚,苏联布下了天罗地网,一心要结果他的性命。他告诉朋友,如果从报上读到他自杀的消息,"你们要知道,那是被制造了自杀假象的谋杀"。他动身去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附近他想买的那座农场,无疑还买了一把枪以期自卫。致命的一枪于 1941 年 2 月 9 日凌晨时分在华盛顿靠近联合火车站的佳境旅馆击中了他。尸体旁边发现了一把 A38 口径的左轮手枪。哥伦比亚区凶杀案小组警佐德威·盖斯特断定此人死于自杀,验尸官做出了相同的判断。不过,媒体和他身居要职的朋友、家人和工作伙伴一致认为,从前的沃尔特·克利维斯基将军,来自苏联情报机关的最重要的变节者,实际上丧命于斯大林的特工,正是他造成了多则数千、少则数百名苏联特工被暴露或被剿灭的后果。然而可证凶杀的证据至

今阙如。

到克利维斯基死时，他在几篇文章及回忆录中揭露的苏联伪币行动，至少已经被媒体抛在了脑后，说不定连美国财政部、芝加哥警察局和联邦执法部门也已开始淡忘。该行动对苏联在若干欧洲国家(或许还包括其他地区)的谍战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功效，但是已经被1929年的股市崩溃及其后的大萧条搞得奄奄一息的美国经济并未因此蒙受多大损失。罗斯福总统想和美国媒体在希特勒1941年7月进攻苏联后开始亲热地呼为“乔[①]大叔”的那位搞好关系的意愿自然也对政治斗争的沉渣起了一定的过滤作用。

苏联伪造美国货币的官方行为还造成了其他重大影响。无政治背景亦无政府背景的诈骗犯在20世纪30年代及以后人数激增、队伍日益庞大，在美国和欧洲制造和传播伪币常能得手。这就使得美国情报部门进一步扩张，并连连立功。这也带来了国际刑警组织的崛起，该组织在纳粹统治下一度陷入了谷底——紧跟着就爆发了纳粹自己的、史上最大规模的伪币行动。

① 乔是约瑟夫的昵称，指斯大林。——译者注

第十二章
希特勒的伪币行动：二战的教训

至少这回，丘吉尔先生该信我了吧，我有言在先，一个庞大的帝国将被灭掉……

——阿道夫·希特勒在赖希斯塔格（德国国会大厦）的讲话，1940年7月19日

20世纪发生在欧洲、美洲的货币战争的前奏引出了历次冲突的最高潮：纳粹德国伪造英镑和美元充当特工和间谍经费，并企图借此摧毁西方世界的银行金融体系的计划。伯恩哈德行动在盟国高层金融决策者当中引发了对于其货币稳定性的极大不安——这种不安因英国高度严格的保密政策及政府审查制度，大部分被屏蔽于公众视线之外。

尽管伯恩哈德行动战时属机密、战后遭无视，这些年来对它的关注在平面媒体和影视作品中却与日俱增。2007年3月柏林国际电影节上首映的德国电影《伪币制造者》全面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是近期涉及该题材的佳作之一。澳大利亚当红导演兼编剧斯蒂芬·鲁佐维茨基在摄制过程中得到了两位尚在人世的伯恩哈德行动亲历者的亲身指点，两位老人均已年届九旬。他们属于那144名从奥斯威辛、毛特豪森等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囚徒中挑选出来的、被集中到了柏林附近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画手、印刷手、雕版手和其他犹太技工。虽然被给予了远优于其他苦工的生活水平，但性命照样危在旦夕。他们顶着巨大压力制造着数以百万计的高仿英镑伪币和其他赝品——包括后来的百元美钞。相比以前同类题材的纪录片和剧情长片《五指》（1952年上映，影星詹姆斯·马松扮演间谍"西塞罗"），导演鲁佐维茨基的这部影片的一大特点在于它对摆在144名囚徒——伪币制造者面前的道德困境所做的刻画。这是多数落入军队、歹徒和恐怖分

子(管理集中营的纳粹党卫队人员无疑集3种角色于一身)之手的人质和俘虏依然面对的困境：究竟是为了保住性命而与关押自己的人合作——做他们的帮凶帮他们赢得战争或接近目标，还是用消极抵抗或积极的破坏行动去反抗，并承受几乎注定的劫难？

阿道夫·布格尔，一位被强拉入伯恩哈德行动的斯洛伐克犹太人，现已92岁高龄。在他史料翔实的回忆录《魔鬼车间》中简洁而传神地描绘了这一困境。《伪币制造者》的创作人员指出影片构思和素材的主要来源就是布格尔的这部回忆录。布格尔同鲁佐维茨基进行了密切合作，据说最后还专门向后者致谢，感谢他拍出了这样出色的影片。

引子：纳粹接管国际刑警组织

在前伪币风潮刺激下，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执法机构，情报部门和国际刑警组织兴盛起来。1900年前后，犯罪行为在多数执法人员看来属地方性事件。不论是谋杀、有政治动机的恐怖行为、伪造货币还是诈骗和勒索，罪行通常被作为特定边境线之内的特定行为来处理。不过，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的德国，已有一位学者看出了犯罪及刑侦注定会变得越来越跨国化。在1893年，柏林大学的弗兰茨·冯·李斯特教授写道：

>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专业的扒手、骗子在自己的地盘作案或在巴黎、维也纳、伦敦作案，感觉并无不同；假卢布在法国或英国制造，又传入德国；犯罪集团持续地活动于多个国家。

问题在于——如今虽然程度有所减轻但问题依然存在——一个法国或英国的警察很难在(比方说)德国对在逃嫌犯或罪证确凿的犯罪分子实行逮捕。国际刑警组织和欧洲刑警组织仍在努力中，目前采取的办法是改进国际数据库和加强计算机联网。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摩纳哥阿尔贝亲王（亦即后来的兰尼埃亲王的曾祖父)，警界的高层人士行动了起来。他们决定，要对不法分子的信息作跨国交流，是时候对国际性犯罪和欺诈活动喊停了。1914年阿尔贝亲王

69岁,他的前妻是美国社会主义者爱丽丝·汉纳。她把自己的巨额财产分给了他,而他迫切希望把钱投入有价值的用途中。1914年4月,他邀请全世界资深法学家、警界高官和律师等出席在摩纳哥召开的“国际刑警大会”。与会代表约有188人,包括3名女性。美国代表仅1人,是俄亥俄州戴顿的一位法官。英国派去了英格兰萨塞克斯海岸霍夫的一位地方法官,还有伦敦的一位讼务律师和两位讼状律师。大会成果辉煌。通过的决议要求建立集中的犯罪记录(现存于国际刑警组织位于法国里昂的总部)以及标准化的引渡程序(虽然仍未问世,但许多国家正在热烈争取)。

在世界范围内打击犯罪的下一步,是在一位睿智的警方人士的推动下迈出的。他就是维也纳警察局局长约翰·朔贝尔。他也领导着一战后整个奥地利的警察系统。1923年以来通胀和伪币这对孪生瘟疫就在全奥地利蔓延。从1921年7月至1922年7月,既是位阶最高的警察又担任着奥地利首相的朔贝尔开始深切地体会到伪币的威胁。他追随阿尔贝亲王1914年的首倡,邀请世界各地超过300位警察局长参加1923年9月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刑警大会”。最后赴会的138名代表中,有71名是奥地利代表,来自国外的代表仅67名。1923年9月7日大会闭幕,国际刑警委员会宣布成立。委员会的国际常务机构设在维也纳。每年将在欧洲其他国家召开全体代表大会。其官方名称直到1946年才变更为“国际刑警组织”,此前,纳粹1938年至1945年间对它的控制已随希特勒的垮台而告终结。

纽约警察局局长理查德·F.恩赖特是热心的早期大会代表之一,面对普遍持否定态度的联邦政府的当权派,他力排众议,出席了1923年的会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号人物J.埃德加·胡佛在民间故事和在教科书里都是一位受推崇的人物。在他统管联邦调查局的58年中,一直使美国自隔于国际刑警委员会之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38年他最终同意美国的加入,而这一年希特勒控制了奥地利亦随之控制了委员会,大多数国家已停止参加。纳粹安全部门头子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撤掉了国际刑警委员会的奥地利秘书长米夏埃尔·斯库布尔,委员会实际上已不再作为一个国际组织而存在。

纳粹通过伪造英镑来搞垮英国的银行体系和敌对国的阴谋的策划者

中，有一位一度在国际刑警委员会任职的德国官员。此人名叫阿瑟·内贝，是魏玛时期的高级公务员，也是纳粹党的早期成员。他的忠诚和他对德国黑社会的了解让希特勒毫不犹豫地挑中他来领导纳粹党卫队的刑警（最初作为纳粹党的特种警卫部队而创设）。

内贝曾爆出魏玛国防部长冯·布隆贝格新娶的妻子是个从良妓女，帮助菲雷尔在1938年加强了对德国军队的控制，也因此博得了希特勒的欢心。劳伦斯·马尔金在《克吕格尔的人》一书中指出，内贝对纳粹的伪币计划做了周详的研究。在希特勒还未上台前，内贝是德国派驻国际刑警委员会的代表。纳粹1938年控制奥地利的时候，把国际刑警委员会的总部从维也纳迁到了柏林。15年来的案卷德国人尽可以调阅。内贝建议从中搜集伪币制作高手的姓名。

然而，将文件挪作这样的用途而使德国对国际刑警委员会的控制遭人诟病是海德里希不能接受的。作为党卫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创设的帝国保安部（RSHA）的部长，海德里希更感兴趣的是运用欧洲的情报网在帝国内全面追捕犹太人和其他反纳粹的在逃人士。J. 埃德加·胡佛刚让联邦调查局加入国际刑警委员会，海德里希就希望获得美国护照的格式样本，以便对美国护照进行伪造。一直到日本1941年12月7日袭击珍珠港前夕，联邦调查局才算和国际刑警委员会断绝了关系。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周后的1939年9月18日，内贝、海德里希、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经济部长瓦尔特·丰克和其他核心集团成员在位于柏林威廉大街61号的财政部开会。议题就是讨论如何通过印制巨量英镑伪币造成英国经济的崩溃并瓦解同盟国的战斗力。内贝概述了他对具体方略的想法。已经在柏林盖世太保大厦的办公室布置起了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全方位行动的海德里希这回举双手赞成。只有丰克一人持反对意见，认为伪造货币违反了国际法，会抹黑德国的形象，而且无论如何都起不了作用。

兼任帝国银行总裁的丰克和德国产业界保持着联系。他生怕有任何伪币传入德国占领区，那将导致当地民众摈弃占领方德国的代金券而选用他们以为是真钞的英镑。“在为帝国从他们那儿榨取资源时，他最不愿意看到的，”马尔金写道，“就是估值过高、人们对它怀有戒心的占领国货

币被大举涌入的假英镑挤出局。”丰克拒绝用帝国银行柏林总部的印钞厂来制造伪币。尽管如此，核心集团仍决定推行内贝的计划。

阿道夫·布格尔和其他德文资料均指出，执行伪币计划的“理想人选”是海德里希的至交：党卫队二级突击中队队长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一位脾气火爆的纳粹党老资格成员，作为拳击爱好者，魏玛时期喜欢和共产主义者过招。此人1931年加入党卫队，到了1934年已经是帝国保安部的骨干。1939年大战爆发时他担任着帝国保安部六处处长。他的特长中，有一项是伪造护照、身份证件和外币等供帝国保安部派往国外执行任务的特工使用。引起希姆莱和希特勒本人注意的是他一手策划了纳粹借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障眼法：在波兰边境的格莱维茨，一家德国电台遭到了所谓的攻击。瑙约克斯给波兰囚犯换上波兰军装，然后让警卫在电台门口将他们击毙。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宣称这次攻击意味着波兰打响了对帝国总攻的第一枪，以此为借口，海陆空三军在1939年9月1日拂晓时分大举侵袭波兰。

威廉大街秘会上采纳伪币计划后不久，瓦尔特·施伦堡就派给瑙约克斯一项新任务。（施伦堡不久成为帝国保安部六处处长，再后来德国情报人员密谋在中立国葡萄牙劫持或扣押温莎公爵以便在纳粹赢得战争后将其立为傀儡国王，他也是参与者之一。）1939年11月，瑙约克斯用投降假象诱骗两名英国情报人员来荷德边境的芬洛会面。一支纳粹小分队在瑙约克斯的指挥下将两人劫持到德国——用的还是英国人自己开来的车。德国宣传机器大肆渲染，称1939年11月8日在慕尼黑的啤酒馆地窖安置炸弹，企图暗杀希特勒而未得逞的阴谋，就是由他们挑起的。（实际暗杀者是个德国木匠，名叫格奥尔格·埃尔泽，逃往瑞士时被党卫队逮捕。盖世太保和法警在慕尼黑审问后将他送进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后转至达豪集中营，1945年4月大战临近尾声时，他在达豪集中营被杀。）瑙约克斯因抓到两名英国官员而被授予一等铁十字勋章。作为奖励，他们的汽车今后将归他私人使用。

怀着成功的荣耀带来的喜悦，他抓住机会向海德里希献上了自己的计策。如果能将伪造的英镑洗成货真价实的硬通货、金银和宝石，打赢这场战争所必需的战略物资，帝国保安部就不愁没有资金购买了。

对过去的伪币行动进行研究时，瑙约克斯的幕僚请教了维也纳大学的博士毕业生、从1938年起担任帝国保安部巴尔干事务专家的年轻历史学家威廉·赫特尔。赫特尔把自己关于20世纪20年代路德维希·温迪斯格雷茨亲王在匈牙利发起的针对法国法郎的伪币行动的报告交给瑙约克斯过目。瑙约克斯不屑一顾地推开了。“你还不明白？”他告诉赫特尔，“我对匈牙利这种拿伪币去搞个不入流的地下团体的事没兴趣。我要对付的是英格兰银行。”

瑙约克斯相信，如果纳粹造出10亿左右的英镑伪币，那么可以由帝国空军把它们空投至英伦三岛。（瑙约克斯的这个想法肯定借鉴了1939年下半年英国皇家空军几次对德国空投伪造的限量配售券的做法。）即使有的爱国主义者会把钱上交政府，更多的人却会把钱存进银行或者大手大脚地花掉，让战时食品和燃料的短缺进一步恶化。瑙约克斯还相信，要不了几次这样的空投，英国银行体系就会垮掉，一个民心涣散的英国对于德国军队来说要好打得多。

采取行动的基本决策定下来以后，瑙约克斯当上了位于柏林上流云集的夏洛腾堡区德布吕克大街的纳粹伪币工厂的技术总监。行动最初被称做“安德烈斯行动”，显然得名于英国国旗上的圣安德鲁十字架。按布格尔的说法，海德里希给瑙约克斯下了如下的“绝密”命令：

> 该行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伪造或复制（钞票）。必须形成一套完整的地下生产线。生产出的钱币必须达到在英国最有经验的英镑专家那儿也能以假乱真的水准。

这样一项行动，技术方面的管理是瑙约克斯无法胜任的。马尔金在查阅了纳粹档案和其他原始资料后指出：“他真正做到的是高度简化了官方手续，因为众所周知他办的是希特勒力挺的事情。”

内贝因海德里希不允许他通过好不容易搜罗来的国际刑警委员会文件查找安德烈斯行动所需的伪币制造者，中途退出了行动，于是由阿尔伯特·朗格尔在瑙约克斯手下担任技术总监。朗格尔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作为密码解译员起初效力于奥地利军队，后来进入秘

密警察部门。希特勒与奥地利结盟后，朗格尔加入纳粹党。他戴着厚厚的镜片，一副文弱书生相，他那些阐释共济会章程和亚瑟王圆桌会议奥义的文章，让希特勒迷上了这一类的神秘主义。

尽管一开始夏洛腾堡的生产基地连一些最基本的设备都没有，朗格尔还是很快发现，借助党卫队的能量，瑙约克斯能搞来需要的每一样东西，从印刷机、纸张到油墨、印版，以及相当紧张的200万帝国马克（相当于今日的1000万美元）的预算，已万事俱备。要在1941年顺利展开安德烈斯行动，瑙约克斯和朗格尔面临着四大难点。第一，他们必须翻造出英格兰银行使用的币纸：化学成分上无可挑剔，嵌入或在表面添加一模一样的防伪特征。第二，印版的刻制必须精益求精，以确保印成的钞票在所有细节上与英格兰银行的出品纹丝不差。第三，在朗格尔的专业领导下，数学家必须破解英镑现行序列号的编号系统。第四，必须在全世界各金融中心建立传播网络。

帝国银行几乎凑不出多少现款来购买瑞典钢、土耳其铬等战时战略物资。金库里只有一点儿5英镑、10英镑币。所以安德烈斯小组就向警方要来了几张正版英镑做样品。对币纸（1725年以来一直由英国汉普郡拉弗斯道克的名为珀陀斯的家族企业独家承造）的显微镜观察和化学分析表明，此系亚麻纤维和亚洲不少地区常见的一种苎麻纺出的苎麻纤维的合成物。德国以亚麻为原料造出亚麻纤维可以适用，而盟国匈牙利生长有苎麻类植物。

位于德国比腾的哈内米勒造纸厂的厂主里夏德·舍勒被召至柏林达勒姆区的帝国保安部总部，在他起誓保密后，被告知了何谓的安德烈斯行动。帝国保安部要求他的造纸厂造出一模一样的英国币纸来。哈内米勒的技术总监罗伯特·巴尔奇几番试验后发现无法在制成的币纸上复制英格兰银行的水印。帝国保安部于是将此任务派给了另一家设在德国迪伦的公司。将化学成分过关的纸和其他要素加以汇总，历经多轮烦琐的检测，成品被验定为合格品。造币用纸在哈内米勒自1942年投入生产，直到1945年4月德国战败时方才停产。1942年上半年，位于柏林德布吕克大街的暗房、蚀刻室、雕版室和电镀室开始了造币作业。工长是印刷业大亨奥古斯特·彼得里希，一名忠实的纳粹党成员。

一开始瑙约克斯希望在1940年6月法国投降之后、希特勒期待的对英国的攻势展开之前，由德国空军将伪币空投到英国去。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和他领导的空军对空投计划看起来不甚知情。不列颠战役中英国皇家空军的雄威很快让它显得毫无现实性可言。需要德国轰炸机投的是炸弹，不是纸片；英国皇家空军的喷气机让德国最优秀的战斗机驾驶员自顾不暇，根本没有余力去为空投保驾；传单也好，德国冒印的英国邮票也好，瑙约克斯认为可以破坏英国经济的巨量伪币也好，什么也投不了。

德布吕克大街上的工厂出产的钱币在传播之前，要通过苛刻的验钞测试——要由外国银行的专业人员来验。最佳途径莫过于把钱带到瑞士，在那儿办理兑换手续。帝国保安部的特派员以德国工厂主身份来到苏黎世(具体日期存疑：布格尔说是1941年3月1日，但可能要更晚一些)，随身携有一批假英镑，一封帝国保安部造的介绍信——落款是一家子虚乌有的贸易公司。信中对瑞士银行强调，该"工厂主"收到的钞票中可能混有伪币，柏林没有合适的技术手段，苏黎世银行能否以瑞士一贯的"彻底精神"帮助验钞？

经过三天的严格检测，这家瑞士银行的管理人员对德国特派员断言：这批钱绝对可靠。为了充分确定，保安部特工要求最后再验一次。他请瑞士方面拍电报给英格兰银行询问序列号、发行日期和其他细节是否无误。收到回复电文如下：

一切正常。依所示日期属流通货币。

瑙约克斯兴奋极了，海德里希下令继续推进安德烈斯行动。然而瑙约克斯和海德里希的关系很快降到了冰点。瑙约克斯比较常规的职责之一是对柏林臭名昭著的妓院"小猫"沙龙进行卧室监听，录下所有的私房话，便于帝国保安部搜集信息以招募人员或借此要挟某些特工。对瑙约克斯来说不走运的是，海德里希是"小猫"的常客。已有家室的海德里希获悉，他本人和某妓女的韵事已被瑙约克斯现场录音。"干脏活"的王牌选手得到的下场是被调往驻德俄边境的阿道夫·希特勒卫队，成了一名再普通不过的党卫队骑兵。瑙约克斯和海德里希之间有过一次剑拔弩张的正面遭

遇,应该发生在前者被调走前的1940年春。当时在场的还有党卫队国外情报处处长海因茨·约斯特。海德里希问瑙约克斯，伪造一些挪威钞票——可以拿到即将被德国占领的挪威去用——要花多长时间。瑙约克斯回答需要4个月,海德里希突然翻脸,骂瑙约克斯的伪币行动是“炼金术士的鬼把戏”。

希特勒1941年9月提拔海德里希为德军占领下的捷克两省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帝国保护官”。海德里希在那儿成就了自己“布拉格屠夫”的名声。捷克流亡政府和伦敦的军情六处将两名特工空降到捷克斯洛伐克,1942年5月成功地暗杀了海德里希。纳粹采取了疯狂的报复,捣毁小城利迪策并血腥屠城。

安德烈斯行动竭力挺过了1941年,最终却归于失败。大批优质高仿英镑被制造出来,但凭现存资料难以确定究竟有多少已流传出去、有多少仍封存在德布吕克大街的库房里。战后一位匿名的印刷工人对一家法兰克福的报社谈起了行动失败的原因。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帝国保安部雇来的专家对工作所应采取的方法和进度的提议常常遭到他们的党卫队雇主和监理的否定。眼看他的技术人员无法与纳粹政治头目协调一致,朗格尔便也辞职了。此后计划陷入了停滞状态,直到庞大的伯恩哈德行动使之重启。

浩劫中的一线生机

伯恩哈德这个名称来自行动的实际负责人伯恩哈德·克吕格尔。此人1904年11月26日出生于莱比锡东部小镇里萨的路德会教友家庭。克吕格尔的父亲是一位公务员,就职于国营电报局,看出了儿子在手工方面的天分，送他进入开姆尼茨工业大学深造。他学习了机床和纺织机械的使用，毕业后在波兰和法国的多家工厂工作过。1929年魏玛经济大萧条期间,他终止了职业生涯,很快投靠了纳粹党。1931年他加入党卫队,一路青云直上。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快速蹿升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为帝国保安部做的切实有效的工作，包括监测外国电台无线电波、当希特勒1938年霸占捷克斯洛伐克德语族裔聚居的苏台德区后组织人员加强对当地的控制。1940年他被安排到帝国保安部设在法国的六处,负责窃取或扣押英

国、美国、加拿大的护照，美国商船海员的证件以及加拿大飞行员的专用身份证。根据这些制作出几近完美的仿品，提供给帝国保安部的特工和间谍使用。

安德烈斯行动造出了一些纳粹版英镑伪币后，克吕格尔接到任务，与对纳粹持合作态度的法国前总理皮埃尔·拉瓦尔打交道，考察能否通过法国黑市散布假英镑。1941 年纳粹进攻苏联后他去苏联执行了一趟任务，随后返回德国完婚，婚后致力于解决安德烈斯行动中的若干技术问题，比如如何复制珀陀斯出品的英国造币用纸。

一解决造纸问题，柏林一家名叫“格布吕德·施密特”的公司即着手生产所需油墨。帝国保安部向印刷机械生产商“施滕茨”订购了所需印刷机。到 1942 年 8 月，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将行动从柏林德布吕克大街的厂房迁移至 25 英里以外、柏林东北方向的奥拉宁堡附近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原址现已辟为专门纪念大浩劫的博物馆)去了。19 号营房(后来变成 18 号营房)内清空了饿得皮包骨头、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囚徒，四周围起了 10 英尺高的铁丝网，将这片区域在集中营内完全隔离出来。把守该区的普通警卫换成了党卫队特别支队，以监视区内囚徒。

海因里希·希姆莱和瓦尔特·施伦堡认定，最有希望成就萨克森豪森的事业的人正是伯恩哈德·克吕格尔。在他的个人回忆录中(在笔者写作本书时尚未出版)，克吕格尔描述了他是如何接到这个命令的——还有他内心深处对整个行动的惶恐。1942 年 5 月 8 日，当时统管帝国保安部、党卫队情报系统，以及克吕格尔所在的情报六处的施伦堡在自己的办公室召见克吕格尔。这样的单独召见是非常罕见的。克吕格尔明白，他将面对某项极不寻常的任务。在前往施伦堡位于柏林贝尔卡尔大街的司令部的路上，他想起这天早上醒来时看见一只蜘蛛在织网。他记得有一次母亲“突然迷信起来”，告诫他，见到这一幕的日子里碰到的“都不是什么好事”。

在施伦堡的办公室刚刚坐定，这个帝国保安部的头儿就告诉他，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已经下令立即开始生产英镑伪币。他接着说道：

党卫队全国领袖命令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建一家地下印钞厂。

人手要从犹太囚徒中抽调。我(对希姆莱)建议,这件事交给你去办。将来就管它叫伯恩哈德行动……党卫队全国领袖无条件地接受了我的建议。根据你先前的成绩,我相信我不会看走眼。克吕格尔,抓住这个机会好好表现自己。我给予你全部的信任。明天你就动身去萨克森豪森。向营地负责人报个到。已经通知了他你要过去,也对他做了适当的布置。

克吕格尔回答说这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更是一道他无法抗拒的命令。想到安德烈斯行动已"无声无息地死去",这回从头再来会不会同样以失败收场,他心里没底。成功取决于"囚徒的手艺,还有管理他们的人的本事"。克吕格尔在回忆录里笔锋一转:"我的思想又回到了那只蜘蛛上。往后有的是困扰和争吵。"

克吕格尔问施伦堡,所有技术和组织方面的问题他能否自行决断。施伦堡粗声粗气地答了一句"可以"。克吕格尔于是接下了任务。后来他去见自己的部门主管,一位姓福斯坦的党卫队军官。他同福斯坦讨论谁是辅助他开展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面对克吕格尔强烈的反对,福斯坦执意指定赫伯特·马罗克和海因茨·韦伯这两个党卫队的人为他的副手。克吕格尔坚信这两人不可靠,而且能力不足。但是为了避免行动刚一上马就在党卫队和帝国保安部之间挑起争端,他妥协了,也可能是终于意识到,施伦堡对他的自由决定权的承诺不值一芬尼①。两个党卫队的人表现果然都很差劲,欺侮工人,暗度陈仓地捞油水,走漏计划的风声,勾搭外出当差的军官的妻子;给克吕格尔和他手下的犹太囚工带来了不尽的困扰和争吵。后来参加了安德烈斯行动的奥古斯特·彼得里希被征入队伍,负责指导工人使用先进设备。

纳粹死亡集中营作为技工的犹太囚徒,一开始只有三十来个,后来达到144人,被集中在萨克森豪森的18号、19号营房里干起了活。希特勒及其肱股之臣希望凭巨量英镑伪币,包括伪造的同盟国其他国家的货币,可以将战局扭转过来。因为随着1941年6月对俄攻势的展开,尤其是12月

① 芬尼,德国最小的辅币单位,100芬尼=1马克。——译者注

美国的参战，形势上他们渐渐落了下风。关于克吕格尔奴役的囚工小组所受的身心折磨，再没比阿道夫·布格尔更能道尽其中辛酸的了。

“我们就像是被延期执行的死刑犯。”布格尔在《伪币制造者》上映前对一位德国采访人回顾道。克吕格尔选中他们之前，布格尔在奥斯威辛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在比克瑙集中营染上了一种足以致人死命的斑疹伤寒，同囚的伙伴帮他切除了坏死的脚趾，还被一个党卫队看守打掉了门牙。另外，和其他工友一样，战争落幕前九死一生地躲过了纳粹的扫射。

布格尔 1917 年出生于斯洛伐克高塔特拉山大洛阅喀镇一个贫困的犹太人家庭。少年时代做印刷行学徒，后来开了自己的印刷铺子，他参加了“左”倾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青年卫士”。反犹神父、法西斯分子约瑟夫·季索掌权以后，布格尔加入了当时非法的斯洛伐克共产党。1942 年他在布拉迪斯拉发被捕，最初进的是奥斯威辛，然后是比克瑙，最后来到萨克森豪森。在那儿，机敏和流利的德语帮他逃过了死亡。

纳粹的出现中断了他和新婚的妻子，“热恋着人生，满怀着希望”的吉瑟拉的战时生活。1942 年 8 月 11 日——他 24 岁生日的前一天，他俩结婚才几个星期，盖世太保来到了他的印刷铺。他们推搡这对小夫妻上了驶往奥斯威辛的牛车。“这样一个夜晚，任谁也想象不出来，”布格尔对美国 CBS 新闻台的采访人讲述道，“60 个人和 60 件行李挤在一架牛车上。然后车队终于停下……车门被拉开，他们喊着‘全体下车，全体下车’。”夫妻俩在奥斯威辛操场上被党卫队哨兵分开。“她对我说：‘每天晚上 8 点想着我，我也会在那时想着你。’”布格尔回忆道，“‘这样我们的思念就团聚了。’”他们再未相见。吉瑟拉和其他数千人丧命于喷洒齐克隆-B 毒气的“淋浴龙头”(——按照纳粹警卫的叫法)下。她丈夫后来在萨克森豪森那段服苦役造伪币的日子里花了许多时间来梦想——梦想她还活着。而当战争结束，他重获自由时，得到的却是她确凿的死讯。

布格尔有着大量第一手材料的纪实作品中，关于他本人以及数百万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希特勒政权的各色敌人(包括真正的敌人和假想敌)在奥斯威辛、比克瑙和其他地方的苦难遭遇，自然只是来自幸存者的对于浩劫的众多真实记录中的一种。它和其他作品一样，历史专业的学生，尤其是拒不承认历史的那些人，是非读不可的。不过，在这里，我们关心的主

要是萨克森豪森的囚工们如何保全了性命——因为纳粹需要借他们的技能来实现自己庞大的伪币计划。另外，有的幸存者会强调：这也是他们钢铁般的意志加上神明庇佑的结果。

克吕格尔从别的死亡集中营和劳工集中营，依据囚徒申报的印刷、刻版、机械等等技能，征调了约 90 人送进萨克森豪森。他们老老实实地排着队，还不清楚又要面对什么新的恐怖，没想到克吕格尔只是简单而客气地和每个人交谈，最后挑出了 39 人。他选了一名雕版手，一名纸商，一名金融师，两名木工，一名电工，一名石匠，几名专业绘图师和几名印刷手。

他还配了一名波兰医生来照管工作队成员的身体。后来这位医生竭力向党卫队看守隐瞒他们严重的健康问题。他们的病只有住院才有望治愈，但如果和医护人员或其他病友谈到自己从事的绝密工作就可能给整个行动带来麻烦。(行动期间至少有 4 人被枪杀。克吕格尔诡称自己对此并不知情。)挪威人莫里兹·拿赫斯特恩，无政府主义者，原奥斯陆某报社的铸铅版工，在奥斯威辛—比克瑙听说他们这些人是根据囚徒花名册上列示的职业拣选出来的。劳伦斯·马尔金相信，是德国从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一家合资企业搞来的哈雷里斯编目系统编出了这份花名册。

“象牙塔”内的工作队，衣、食、住等各方面生活条件远远优于外面那些生不如死的囚工。甚至有一张乒乓球台供他们休息时享用，有时连看守也和他们一起打球，他们可以听轻音乐，每周日全天休息。这让集中营其他部分看起来就像是另一个遥远的世界。根据阿道夫·布格尔精心收集的数据，随着集中营的地盘不断扩大，境遇凄惨的囚徒人数从最初 68 间营房的 10577 人增长到了 1944 年 5 月的 47409 人。超过 20 万的进了萨克森豪森的受迫害者中，有超过 10 万人被杀。1941 年秋季的 3 个月中，希特勒的俄罗斯战役达到最激烈的阶段，2 万苏联战俘中的 1.8 万人遭到枪决。党卫队暂未处决的囚徒常常自行了断：他们向 9 英尺高的围墙冲去，除了 9 座瞭望塔，围墙铁丝网还通着 1000 瓦高压电。

工作队成员很快在彼得里希的指导下制作了用于造 5 英镑、10 英镑、20 英镑和 50 英镑伪币的印版。(帝国保安部和党卫队认为伪造 100 英镑币容易被人发现：因为市面上很少见到，所以相比面值较小的钞票，势必引来更加挑剔的检验。)前捷克商人奥斯卡·斯泰因暗中保留了一份所造

钱币的登记册。关于产出钞票的数量及其面值的总和，不同资料给出的说法不一。马尔金说斯泰因的记录是最可靠的：面值总计达1.32亿英镑的近900万张钞票。

斯泰因按照克吕格尔的指示将钞票分成若干等级。品相最完美的伪币用做在国外的德国间谍的花销以及付给线人、线报的酬金。次一等的仅有小瑕疵，一般不太容易被同盟国的验钞者发现。第三等的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错误，但相同的问题英镑真币偶尔也会出现。这些被输往国外，用于在瑞典、瑞士这些中立国购买原材料，偶尔会被检出是伪币。第四等的存入仓库，计划由德国空军空投到英国境内。但英国皇家空军在不列颠战役战绩可观，加之德国空军的飞机和飞行员均告短缺，党卫队不得已通过了任何情况下都不使用它们的决议。

同盟国前期反应

英国政府和英格兰银行迅速获悉此事。早在1939年11月21日，距货币战争的秘密计划在柏林启动仅2个月，雅典有个叫保尔·舒拉皮涅的俄罗斯移民就不知从哪儿知道了安德烈斯行动。他将一份关于该计划的详细资料送交给英国驻雅典使馆的公使迈克尔·帕勒里特，后者将其原原本本地呈报伦敦。帕勒里特1937年至1938年曾任驻维也纳公使，深知纳粹的行事风格，尽可能对他们的秘密行动保持不闻不问的态度。所以任何能在希腊获得的关于德国、意大利在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动向的情报，英国军情六处都是依靠被称为“十二使徒”的一群在雅典的英国商人来掌握的。不过舒拉皮涅有板有眼的报告一经帕勒里特传回伦敦，还是立即引起了重视，伦敦方面1940年2月专门通知了华盛顿。

英镑的稳定，维持英镑稳定的必要性，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再次用伪币对付德国的可能性，这些问题温斯顿·丘吉尔从欧洲几次发生金融动荡、伪币肆虐的20世纪20年代就一直在琢磨了。1939年9月24日，当时在张伯伦首相的内阁担任海军部第一大臣的丘吉尔在一封致财政大臣约翰·西蒙先生的函件中建议皇家空军对德国空投“大捆或者分拆成诱人小包的马克伪币”，代替过去只是空投宣传册页和仿冒的限量配售券的做

法。西蒙将此函转给英国财政部首席部长助理大卫·韦利。韦利显然发表了反对意见。1939年10月4日,西蒙复函丘吉尔称财政部考虑了这个提议,“不能不说,综合起来,我认为是反对的声音占了上风”。

时隔2个月,从雅典传来了帕勒里特发的那份警报。在财政部,对德国伪币行动可能奏效的想法报以嘲笑的英格兰银行副总裁巴齐尔·卡滕斯反过来被大卫·韦利报以冷眼。经过研究,总裁蒙泰谷·诺曼先生同意将防伪手段用到银行最常用也可能是最脆弱的低面值钞票上:币纸内嵌入金属线,这一防伪特征常见于现今许多国家的货币,欧元亦不例外。1940年发行新币时,银行和政府仍然对增加防伪金属线的真实原因秘而不宣,这让发行量很大的小报《环球新闻》对一篇关于纳粹伪币行动的新闻稿将信将疑,到底没把它刊登出来。

结果英格兰银行对面额在10英镑以上(含10英镑)的钞票全部进行了回收,发表的公开声明称这样做是为了让那些主要以现金操作的黑市商人无法为所欲为。银行印刷厂原址1920年以前是圣卢克疯人院,一战中曾在这里进行伪造帝国马克的行动,预料到德国空军1940年至1941年会轰炸城区,印刷厂已先行从伦敦东部撤离。1943年,作为防伪币计划的一部分,银行暂停了大版钞票的印制。1940年8月20日,银行已对自己发行的现存海外的英镑发布禁令,限制这批总额约在1000万到2000万之间的英镑流回本土,目的在于防止纳粹伪造的大面额英镑渗透入英国国内的经济。后来,连5英镑币也被回收、替换了一遭。尽管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而且官方始终保持沉默,但事后表明,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英国境内流通的英镑纸币中大约40%最终被验出系萨克森豪森伪币。

传播网络

在全世界散布伪币的关键人物是一个独立作业的富有的德国“海盗”,名叫弗里茨·保尔·施文德(又名“弗里茨·文迪希”,还有一大堆别的假名),其触角分布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远方国家。施文德出生在1906年。当他还是个不起眼的加油站机修工时,就娶到了多金的贵族小姐冯·格明根-古腾堡女男爵,她的舅父是遭暗杀的魏玛共和国自由派政治家、外交

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1932年，施文德加入了纳粹党，正好给他已经到手的财富镀上权力的金边。他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并在那儿替他妻子的姨母(属邦格家族)打理个人资产。经营跨国农工联合企业集团让他获利丰厚，也让他有机会结识了和好莱坞明星关系热络的德国总领事格奥尔格·吉斯林。后来他在纽约皇后区伍德赛德的德裔聚居区住过一阵子。1938年他移居意大利，一边仍在为他妻子的姨母工作，一边帮希特勒德国从亚得里亚海上的阿芭佳(今属克罗地亚)的产地批量订购食品和工业品——常常通过黑市交易。可是战争使他无法继续操纵邦格家族在美国的财富了，贵族妻子也跟他离了婚。他的第二任妻子叫赫达·诺伊霍尔德，岳父是一位富有的奥地利工程师，后来成了施文德的合伙人。

1940年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结盟加入战圈后，希特勒协助这位轴心国盟友攻占了希腊。纳粹入侵南斯拉夫后，施文德给自己惹上了麻烦：他试图把假的新式潜艇设计图推销给英国情报人员，结果被盖世太保盯上。不敢掉以轻心的盖世太保1942年春还把他关进了奥地利的监狱。但是，由于党卫队在意大利的洗钱手威利·格勒布尔的引荐，他霎时浮出水面，成了一名替伯恩哈德行动运作其大批伪币的党卫队少校。施文德的上司是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此人于海德里希遇刺身亡后接任其职位，最后在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中被判极刑。

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北部的梅拉诺（德语民族称之为南蒂罗尔的梅朗)附近的拉博斯城堡成了传播纳粹头子口中的“B票”的萨克森豪森伪币的中心。施文德以他从前做生意时在全欧洲、远东以及从北美最北的阿拉斯加到南美南端的火地岛的南北美洲的众多落脚点为基础，打造起遍布全球的网络。不过他得将本人获利的25%付给主要代理人。施文德的人洗过钱的包括数个非洲国家以及美国、阿根廷、巴西、智利、洪都拉斯、乌拉圭、印度、中国和日本。

在欧洲，施文德借助的有商人、高官和外交官，包括德国驻梵蒂冈大使馆的一位成员。德国驻安卡拉、伯尔尼、日内瓦、马德里和罗马大使馆的商务专员都接受过他委托处理的B票。他们用它充当间谍劳务费，为德国购买战争物资或者仅仅通过洗钱渔利。帝国保安部通过上述渠道用伪币换购黄金、珠宝和硬通货。布格尔在回忆录中列举了欧洲最有利于洗钱的

国家：安道尔、比利时，被占后的丹麦、法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南斯拉夫、列支敦士登、摩纳哥、荷兰，被占后的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傀儡政府统治下的斯洛伐克、西班牙、土耳其和匈牙利。

伯恩哈德行动也将东欧和巴尔干地区囊括在内。除了邮票、护照、身份证、美国商船海员的证件和其他文件，萨克森豪森命悬一线的犹太画手、制版手、印刷手、分拣手和质检手被迫伪造的还有巴尔干和东欧国家的货币。1944年春，阿道夫·布格尔首次进这座集中营服此苦役时，按他的说法，伪造南斯拉夫货币和债券的活儿"相对来说是小菜一碟"。

从1942年秋到1944年，德国占领下的所有国家，从法国经捷克斯洛伐克到南斯拉夫、希腊和(在墨索里尼倒台后投降了的)意大利，无不为游击队运动所席卷。在南斯拉夫，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和德拉娅·米哈伊洛维奇(此人后来与铁托反目，成了德国人实际上的帮手)领导的队伍解放了南斯拉夫部分领土。游击队控制的面积比奥地利、匈牙利和瑞士三国加在一起还大。1942年11月，南斯拉夫"自由"区域的村镇组建了一个"南斯拉夫解放区人民委员会"。该机构组织经济生产和设施建设，为抗击德国和意大利占领军提供物质保证。

游击队极度需要现金去购买武器、食物、生存和战斗所必需的各种物资。他们使用五花八门的民众捐资：匈牙利潘戈，沦陷前的南斯拉夫第纳尔，德国人发行的占领国代金券，意大利里拉，也不排除偶尔到手的美元和英镑。最后在1944年1月13日，人民委员会推出了首批面向全南斯拉夫的总计5亿第纳尔的债券——也被称做"库纳"。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黑山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也分别推出了性质相似、总额略低的地方性游击队债券。

解放区居民购买债券后，人民委员会就发给相应的本票。这成了最早的"游击队货币"，可在所有已获解放的领土上作为法币使用。在"自由"斯洛文尼亚的首府卢布尔雅那，一家发行货币的银行很快印出了数百万这样的货币。它也是德国占领下的欧洲第一家自由银行。盖世太保向柏林报告，发债收益提高了游击队的士气，也加强了他们的武备。是时候采取对策了。

所以纳粹方面勒令阿道夫·布格尔开印假南斯拉夫"铁托币"(假"铁

托币”在南斯拉夫解放区内也已出现)以及仿冒的人民委员会发行的债券本票。布格尔说,仿品与正品吻合度极高。德国人将他的产品投入解放区内广加传播,以期贻害南斯拉夫渐渐复苏的经济,破坏他们的备战努力。

萨洛曼、雅各布森和美元波澜

1944年9月的一天,伯恩哈德·克吕格尔现身萨克森豪森伪币车间,宣布:“先生们,从今天起我们要造美元了。”他要党卫队军官库尔特·维尔纳在工作队中选择8人专司制作美元。被选中的就有萨洛曼·斯莫良诺夫。

《伪币制造者》中,由著名德国演员卡尔·毛尔科维奇扮演的萨洛曼·索洛维奇的原型即萨洛曼·斯莫良诺夫。他是纳粹为他们的行动找来的唯一一个职业伪币制作者,这一点片中人物与原型是一样的。电影里好赌、好色、有时活像个受虐狂的“萨洛曼·索洛维奇”可能显得过分传奇了(当然,这样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且不论真实的“萨洛曼”是否有或者多大程度上有这些癖性,反正在被纳粹关进集中营之前,从绘制图样到制作伪币的各个步骤,构成他主要收入来源的手艺确实是他的强项。

发现了萨洛曼的本领让伯恩哈德·克吕格尔欣喜不已。之前在奥斯威辛,萨洛曼也是凭着给党卫军看守画通俗肖像的本领保住了自己的性命。1944年下半年希姆莱下令印制100美元的伪币,让他这些绝活又有了用武之地。

柏林送来了新的机器和新的按克兰公司生产的造币用纸仿制的纸张。克吕格尔拿出几张50美元和100美元的钞票要求进行翻造。新的难题是:制作合格的凹雕印版太费时间了。等不及的克吕格尔不管小组成员的顾虑,坚持改用胶版印刷法。运用敷有胶膜的玻璃板,以50℃收干在板上的重铬酸铵溶液后,可以获得效果极其细腻的100美元币上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像。

8人小组同其他工友被分开,转到营区另外三个单独的房间干活。他们先练习用胶印法翻造纸牌和明信片,随后开始尝试印制50美元币和100美元币。

(对布格尔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在巴勒斯坦的集体农庄做

寄宿者的哥哥姐姐,设法让位于瑞典的犹太"巴勒斯坦办事处"给自己寄来了一份批准移居巴勒斯坦的铅印证书。证书先被递到比克瑙,然后送来萨克森豪森,克吕格尔脸上挂着嘲笑地把它交给了布格尔。彼此心照不宣,不管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反正布格尔是没机会拿着这份证书跑到巴勒斯坦去了。)

1944年年底,8人小组达成了共识。战局走势已严重不利于希特勒,东面的苏军和西面的盟军都在节节推进,值此之际,尽可能拖延假美元的制造让纳粹无法再借助它们来力挽狂澜才是明智之举。尽管萨洛曼基于"职业荣誉感"完成了高品质的美元底图,亚伯拉罕·雅各布森还是毅然在党卫队看守的严密监视下做了手脚。通过破坏玻璃板上的胶膜,他阻碍了高仿美元伪币的生产,从而延后了纳粹行动的进程。

被施伦堡和希姆莱不断施压的克吕格尔急着要看结果。布格尔的印刷手同伴彼得·埃德尔直接向克吕格尔提出,在制作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纤细线条,要画就得从他家里把他那套笔头形如针尖的"中国毛笔"取来,不用那个就画不了。克吕格尔实在担当不起失败,行动的失败带给他的可能就是自己人生的失败,只好按下疑心派出了一个带着埃德尔给母亲的亲笔信的党卫队通讯员。得到儿子尚在人世的凭证让这位母亲又惊又喜,急忙捧出埃德尔的全套画具,包括那些毛笔。通讯员接过画具,快马加鞭赶回了萨克森豪森。

"要么造美元——要么死"

帝国保安部领导层原本要求小组造出200张无可挑剔的面值100的美元币。雅各布森巧妙的小动作让纳粹未能如愿。希姆莱失去了耐心,发布了这样一道由克吕格尔传达给他那些提心吊胆的下属的命令:"印制假美元的一切准备工作必须在4周之内完成。如果逾越此期限,相关囚徒将遭到枪决。"

小组继续埋头试验。距最后期限仅剩4天的时候,他们还拿不出令人满意的试验成果来。第215次试验,萨洛曼勾勒的底图一如既往地完美。雅各布森将它放上背衬光源、敷好胶膜的玻璃板,以甘油浸润,把美元图

案从纸面烤到玻璃板上。然后布格尔装好玻璃板，启动印刷机。他们终于得到了24张合格的面值100的美元伪币。用胶印法居然也获得了成功。这一夜，小组印出了面值共计2万美元的200张美元币。

次日上午克吕格尔前来巡视，挑出一批新印的伪币加以做旧后，混入30张正版富兰克林票，摆在绿色的台面上。克吕格尔和同来的几个党卫队的人用手指摆弄起了这些钞票，检验它们的质感。超过一半的伪币被他们判定为真。当晚克吕格尔打电话告诉希姆莱，一切都已到位，随时可以开印。

1945年2月2日后的几天，负责领导小组的维尔纳下达了施伦堡和希姆莱的最新口谕："按10小时轮班制在2天之内生产总面值100万美元的伪币。"但生产尚未来得及开始，柏林及其郊区就陷入了同盟国的轰炸，从萨克森豪森可以一览无遗。这让全体囚徒心潮澎湃，只是当着看守的面还不敢喜形于色。希特勒的失败已成定局。他们获准收听的广播(不含BBC等敌国电台)这时候告诉大家，苏联军队势如破竹地穿过了波兰和东普鲁士，即将兵临柏林城下。美军、自由法国武装和其他同盟国军则正从西面逼近。

1945年2月20日，又一道命令从柏林传到了萨克森豪森："停止生产！"布格尔记得大部分工友都担心这意味着很快他们就会被送入毒气室，明显在为自己的命运发愁的党卫军看守也不再与他们交谈。总算克吕格尔派来了一名副手，命令他们将机器设备打包，准备搬迁。能拆下的每样东西都要拆下，并在36小时内归整完毕。140名犹太工人(最初的144人中已有4人遇害)通宵达旦地好一通忙碌，终于将所有造假用具以及所造的伪币、邮票、身份证、纳粹关于行动的各种文件资料在大大小小的箱筐内安置妥当。这些，连同这批特殊囚徒中的47人带着他们可怜巴巴的行李，被塞进一辆特别列车的运货棚车内。(工作队其他成员俱保平安，稍后被转移出来。)经过长时间的夜间行驶，列车停住了。在捷克，小组成员莫里斯·戈特利布透过车窗望去，看到故乡布拉格上百的黄金尖顶让他叫出了声。组里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都在颤抖，因为喜悦，生起了隐隐的希望，希望纳粹在布拉格放他们走，放他们回家。

列车在原地停了几个小时。从棚车上，戈特利布望得到他的老家。然

而希望破灭了。列车再次启动,朝着最后一片仍在纳粹控制下的地区的死亡集中营驶去。

布拉格的中途停靠后,他们到达的第一站就在从前囚徒们称之为"魔的豪森"(Mordhausen,意为"杀戮之地")的奥地利北部臭名昭著的毛特豪森集中营旁边。警卫大喊:"出来!"组员被迫脱得一丝不挂地接受检查,如果查到某人有夹带伪币的痕迹,没有二话,纳粹举枪就杀。他们除掉身上的虱子,排队来到 20 号营房。克吕格尔的人注意到墙上的血污,警卫告诉他们,毛特豪森之前的囚徒是苏联战俘,企图集体出逃而被大批枪杀。接下来就需要他们将沉重的机器从火车上卸下。萨洛曼·斯莫良诺夫敏锐地发现,以毛特豪森不合格的设施,伪币行动是不可能再继续的了。

毫无疑问,在 2 天后即 1945 年 4 月 23 日,他们不得不再度转移,去毛特豪森位于萨尔茨堡和希特勒出生地林兹之间一处叫做"雷德尔-奇普夫"的秘密分部。这样他们就来到了纳粹阿尔卑斯山要塞的脚下。希特勒还一直滞留在被包围的柏林的地下掩体(不出数日将变成他的坟墓)里,按照原来的计划,他希望自己的党徒们守住这方最后的阵地。按劳伦斯·马尔金的说法,希特勒指望阿尔卑斯山要塞的根据地"作为西方和俄罗斯人之间的隔断(显然,他假设西方竭力杜绝斯大林染指西欧),能让自己获得偏安一隅的资格"。

这座分部已是纳粹存放他们从各占领国掳来的艺术品、黄金、珠宝、现金和其他贵重物品的场所。布格尔及其同伴眼看德国败局已定,不再需要借重他们的手艺,很怕将来难以活着离开此地。依阿尔卑斯山而建、附有地下室的雷德尔-奇普夫正是纳粹用来轰炸伦敦和如安特卫普等一些被同盟国军夺取的欧洲内陆城市的 V2 导弹的秘密生产基地。原来的 V1 导弹研制基地位于德国北部的佩内明德,已被同盟国空军拔除。克吕格尔的人在这里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到了其他囚徒, 包括维希政府抓来交给纳粹以冲抵一部分法国奴工数量的西班牙共和国流亡者。

造伪器材安顿好了,但为时已晚:美军正在向阿尔卑斯山要塞挺进。在搬迁过程中,克吕格尔从头到尾都没有露面。党卫队军官维尔纳命令他们把伪币除了精品以外统统烧毁。执行任务时谁若有懈怠,就会被当场击毙。克吕格尔冷不丁冒了出来。他和颜悦色地向工作队成员一一道别,并

祝他们好运。他说接到了命令，要把全体队员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直到他们获释。他号称会在那儿和他们碰头。然而他们从此再未见过他。根据一些囚徒的记录，他和他年轻漂亮的女友兼秘书希尔达·默勒驾一辆挂瑞士牌照的小车向萨尔茨堡方向驶去，这等于是向队员们宣告伯恩哈德行动就此落幕。

毛特豪森另一处分部，位于景色秀丽的萨尔茨堡卡默古特地区湖山之间的埃本塞是工作队的下一站也是最后一站。德国于5月的第一周投降前最后的时刻里，盛有伪币、黄金、从欧洲被占区搜刮来的贵重物品以及纳粹政权的秘密文件和档案的大批箱子被抛入了附近的托普利兹湖。一些箱子缚在导弹壳上，如浮标般在湖面漂移。

被告知即将重新开始制造假美元的雷德尔-奇普夫的囚徒，5月2日一起床便听到了希特勒已在柏林地堡自裁的消息。纳粹旗帜降半旗致哀，人人都清楚伪币行动结束了。但党卫队军官韦利·施密特并没有因此手软，还是以一剂毒针处死了克吕格尔工作队的维也纳成员，患病的卡尔·聚斯曼。与此同时，“彻底清理”的口令从毛特豪森传到了埃本塞。118名囚徒和留守的6名党卫队看守挤上了两辆封闭卡车。一出埃本塞，看到外面的囚徒们在荼毒他们的纳粹分子离开后打出的白旗，从雷德尔-奇普夫来的这群人恍然大悟：最后的“清理”已经结束了。他们发现埃本塞集中营的党卫队警卫不见了——节节进逼的美军让他们望风而逃，取而代之的是德国常规军国防军的部队。国防军官员无法相信这些身体还算健康、衣着也还过得去的伪币工作队的人真是集中营囚徒，因而拒绝给予他们保护，直到他们亮出了胳膊上所刺的编号——这一幕《伪币制造者》做了生动的刻画。

第二天美军第三军的分遣队，蒂莫西·C. 布伦诺少校率领的一队装甲兵抵达埃本塞，受到了克吕格尔的前队员乃至数百名饿得半死不活、形销骨立的囚徒的夹道欢迎。布格尔说，美国兵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对于人类竟能做出这等惨无人道的事情感到不可思议。

获释后囚徒们组织起来，当起了自己的警察。滞留集中营的党卫队和帝国保安部人员被他们缴了械，扭送给美国人。萨克森豪森伪币工作队的幸存者踏上了返乡之路。不少人，比如布格尔，回到从前的家园时发觉，屋室和家人已踪影全无。在斯洛伐克的家乡，布格尔打听到就在战争结束前

4 个月，他母亲被送去了拉文斯布吕克妇女集中营，他父亲进了萨克森豪森。他再也没能与他们重逢。

克吕格尔、施文德和其他参与了伯恩哈德行动的纳粹分子都在挣扎自保。1945 年 5 月 12 日曾被美军扣押随即逃脱的克吕格尔躲避着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直到 1946 年 11 月 26 日美国情报机关将他再次抓获。然而 1949 年 5 月他再度潜逃，隐迹的数年中就职于一家造纸厂，该厂是战后作为哈内米勒造纸厂继承者的企业之一。1956 年 8 月，他又一次现身，发表公开声明，承认自己受了希姆莱的指派，对伯恩哈德行动负有责任。而其他方面的罪行，如将患病队员处死等，声明中未置一词，在他的回忆录残本内也找不到任何交代。他抢在新的起诉提出前又藏了起来，用假名在斯图加特租房栖身。对他的侦查和搜捕工作终止于 1965 年，之后他才去世，终其一生从未被定罪。

除了 2005 年至 2006 年为鲁佐维茨基的电影担任主要顾问之外，布格尔还对一些探寻托普利兹湖底纳粹打劫来的财宝的行动给出了个人意见。这一带的奥地利居民，有些曾被党卫队强行借船并拉去帮工——为的就是湖上的"掩埋"行动。据他们描述，那是一箱箱从布痕瓦尔德、奥斯威辛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囚徒那儿霸占来的财物，还有伯恩哈德行动余下的钱币和文档。阿道夫·艾希曼是 1945 年 1 月初最早将 220 箱犹太人财宝沉入托普利兹湖的人员之一。(以色列人查出了这个纳粹刽子手的踪迹，1960 年终于在阿根廷逮到了他。1961 年以色列判其死刑，于 1962 年 6 月 1 日执行。)著名的党卫队特种部队指挥官奥托·斯科尔兹内对遭意大利人软禁的墨索里尼进行空中营救，因表现卓越而获嘉奖，拿到的就是英镑伪币，1945 年 5 月初由他亲自监督搬往湖边的 22 口箱子里就装有 20 根金条。

沉湖赃物的吸引力招来了世界各地数百位职业和业余潜水员和投机家。该湖变成了一大旅游热点。最早的发现是 1945 年夏季当地一位渔民捞到的大量 5 英镑伪币，面值总计 40 万英镑——被他上交给了驻扎在此的美军。稍早，美国海军潜水员曾在春季下湖，在距湖面约 100 英尺处，被一个从环湖山坡滑入湖中的原木搭的篷盖挡住了去路。1946 年，两名从附近一处废弃的海军勘察站赶来的工程师，神秘地死在湖中。1950 年又有 1 人在试图穿行湖底石灰岩礁石时丧生。德国新闻周刊《明星》1959 年在充

裕资金的支持下搞了一次深度搜索，布格尔也为他们提供了帮助。打捞上来的不仅有现金，还有党卫队关于特工、伪币传播人和接收人的详细记录，也有攻击或破坏敌国船舶、机场等目标的命令的荷兰语、英语、挪威语和德语抄本，另有特别通行证和大量其他种类的证件。

《明星》周刊的系列报道闹得不少商业、实业圈子里人心惶惶，布格尔写道："太多行业和企业被发现与伪币和劫来的黄金脱不了干系。"迫于压力，《明星》给相关主笔记者拍去电报叫停所有工作。1963 年 10 月 8 日，19 岁的潜水爱好者阿尔弗雷德·埃格纳下到托普利兹湖 350 英尺深的黑暗中，再也没有返回水面。凶手嫌疑人一直逍遥法外，涉及多名右翼从政者、工程师和格奥尔格·弗赖贝格尔。此人是希特勒的头牌军事间谍之一，后来向美国中央情报局自首，牵出大批手下，还把他大部分关于苏联的材料和记录交给了美国人。

此事一出，奥地利当局终于无法再坐视下去了。他们围起湖域隔开寻宝人，派专门人员携声呐探测器和水下摄像机进行了官方调查，随后宣布湖里根本什么也没有。著名水下生物学家汉斯·弗里克却起而质疑，他利用一艘微型潜艇对湖底做了 3 年勘测。他找到了更多的假英镑、导弹和纳粹五花八门的试验性军械，还发现一种在无氧环境下生存的未知类型的蠕虫。2000 年，"世界犹太人大会"与一位自述为以色列情报局和美国 CBS 新闻频道工作的以色列冒险家合作，展开了为期 5 周、耗资 60 万美元的托普利兹湖声呐探测。公告缘由是寻找隐藏的党卫队文档。浩劫幸存者及其律师还在苦苦寻找这些文档，以便有理有据地索回他们被掠走的贵重物品。此次的所得包括一箱啤酒瓶盖和更多的 5 英镑伪币，洛杉矶的西蒙·维森塔尔酷刑博物馆展出了这些啤酒瓶盖。此后，曾潜水搜寻美国内战中运载黄金驶离北加利福尼亚后沉没的"共和国"号轮船的诺曼·斯科特从奥地利当局那儿获得了 3 年的许可，在此探寻黄金。斯科特究竟有何斩获，到本书写作时尚未在公开渠道见到任何报道。

短期及长远后果

和过去的许多调查者一样，我们也可以这样问：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

伪币行动对于其试图攻击的经济和社会究竟产生了哪些实际影响？为了避免历史重演，已经采取了什么样的防范措施？

被占领的法国从1943年夏季开始成为纳粹传播伪币的试点之一。一些党卫队特工违抗反对在占领区内使用伪币的帝国财政部门的意见，携带以5英镑币为主的约10万英镑伪币来到一家法国银行，大概不是想把钱洗成正版硬通货，就是打算从投降了的法国订购些货物和服务。占领当地的德国军方几乎立刻听到了风声。所涉及的法国银行的行长和相关德国人马上被投入了监狱。在被占领的希腊也出现了类似事件，当时的希腊因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纳粹的掠夺和经济的全面下滑，甚至连抵抗运动都深受拖累。

鉴于上述事件，德国经济部长丰克发布了正式命令，严禁将伪币用于任何一个被德国占领的国家，担心伪币难免"扰乱本人竭力稳定的货币"。然而，随着墨索里尼垮台而向轴心国联军投降的意大利也成了"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丰克并未意识到，已经有面值10万左右的英镑伪币在那儿被换成了黄金和货真价实的美元及瑞士法郎。这对战后严重的通货膨胀，即使不算是主要因素，至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散布伪币者施文德掌握的网络建立了一支伪币散布者和洗钱者的庞大队伍。其中大部分是瑞典、瑞士、西班牙和葡萄牙大型宾馆经营者。有两人是开银行的，一个在瑞士，一个在意大利。几百万钞票在中立国家落入了纳粹间谍和各类特工的腰包或银行户头。

派给单个间谍的金额最大的一笔，进了英国驻土耳其大使休斯·纳奇布尔-休格逊先生的阿尔巴尼亚侍从耶扎·巴兹纳(又称"西塞罗")的口袋，从他那儿换取极具情报价值的文件。这项交易引出了历史上最耸人听闻的间谍事件之一，即所谓"西塞罗事件"。1943年至1944年，西塞罗陆续窃得同盟国作战计划和战后安排的关键性绝密文件交给德国人。(但施伦堡、希姆莱和其他纳粹间谍头子因对文件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未做恰当利用。有关情况下面还会具体谈到。)西塞罗本人很长时间被蒙在鼓里，他拿到的其实是纳粹的英镑伪币。跟这名侍从一样，参与制造和传播伪币的纳粹分子各显神通溜之大吉，无人因伯恩哈德行动而遭起诉、制裁。不过，两个作为行动制定者的纳粹领导人，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和恩斯特·卡尔

滕布鲁纳,还是为其他战争罪行血债血偿,丢掉了性命。

施文德利用从热那亚和的里雅斯特开出的两艘中立国轮船将纳粹伪币传入了北非、葡萄牙和西班牙——在 1943 年 11 月同盟国军攻入这些国家地区以前。为施文德办事的人预先被告知,在这儿洗钱切勿再换取英镑。有人违反了这项规定,结果发现换来的正是克吕格尔工作队出品的头等货。1943 年 8 月下旬,墨索里尼的女婿加莱亚佐·齐阿诺伯爵在意大利脱离囚室后,按希特勒的指示被带到了德国,他告诉帝国保安部的人,他对伯恩哈德行动完全了解,请求允许他携带面值相当于 50 万美元的伪币前往南美洲进行传播。尽管已在瑞士落脚的妻子埃达再三努力,齐阿诺终究未能逃脱厄运:1944 年，他在意大利被亲同盟国的意大利政府枪毙,罪名是“图谋不轨”。

素来严把口风的英格兰银行被迫在 1945 年 10 月 18 日出版的一份报纸上刊登公告,召回旧的 5 英镑币,为对付“战争期间德国对英格兰银行钞票的总额巨大的伪造”而发行新币。后有一则日期已佚的报道(见于方东·布雷斯莱编写的《国际刑警组织史》)指出,伦敦警察厅副厅长罗纳德·豪抱怨战后百姓对纸币已不复信任,犯罪集团在集中营里所干勾当造成的影响已波及全欧洲:

> 货币体系一片紊乱。如果能以实物交易,没人愿意接受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伪币的泛滥让原本立足未稳的货币进一步贬值,它们很多都是在德国集中营造的。

同盟国占领军在德国、奥地利的各地都发现了英镑伪币。伯恩哈德行动最老到的调查者之一、美国情报机关特工乔治·麦克纳利在一辆德国卡车上发现了大批货箱。麦克纳利通知英国政府和英格兰银行,银行附属印刷厂的厂长帕特里克·J. 里夫斯亲自出马。里夫斯汇报在 1945 年 6 月 8 日,他总共发现了 2600 万英镑的英镑伪币,连同一盒制版工具。在观察了这些钞票上的序列号等银行代码数据后，他推断还有装着数百万英镑伪币的货箱已流失。马尔金借用了麦克纳利的原文,描述里夫斯如何气恼地翻弄那一叠叠钞票,停下动作,直愣愣地盯了一会,“失礼了,”他开腔道,

"受不了,造出这些来的人让我们亏大了。"

和英国军事当局合作的学者兼财政部专家爱德华·普莱费尔担心,英格兰银行需要用真英镑去从受了造伪者愚弄的国外银行里把伪币换出来。(根据现有材料看不出它究竟有没有这样做过。)财政部对国外硬通货以英镑现钞形式流入英国有着严格的限制,以确保英镑对外币汇率处在有利于战后英国经济复苏的水平上。但在前赴后继的潜水队伍在托普利兹湖里(大部分伪币是从这里找到的)上下求索的那些年,瑞士、西班牙和瑞典的金融业者、商人和其他民众却因假英镑而吃足了苦头。

伯恩哈德行动以破坏英帝国财政基础和同盟国战斗力为整体目标,就此而论,它的失败是彻底的。康奈尔大学教授乔纳森·柯什内在他的《货币与强制》一书中提出,假使纳粹的计划成功,那么英国和同盟国早已被拖入了灭顶之灾。再者——或者至少可以这样怀疑,如果与实际发生的相反,并非只是少许的局部破坏而是全方位地搞臭英镑,那么势必会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因为英镑和美元有极大份额分布于世界各地。如此程度的英镑信用危机的确会如希特勒犬牙期盼的那样影响战争走势。柯什内认为,德国经济部长丰克对于在欧洲德国占领区散布伪币的反对"最终注定了整个行动的命运"。

作家莫里·泰格·布鲁姆 1953 年追溯伯恩哈德行动的世界性影响时的调侃或许很大程度上是大实话:

> 就算传播开来的伪币一张也没被查出来,全都流通无阻,或许也闹不出多大的动静。1939 年至 1956 年间,流通中的(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钞票增加了将近 3 倍,从 5.26 亿英镑变成了 19.13 亿英镑。这就证明,在制造通货膨胀上,现代伪币制造者压根不是发行货币无须黄金支持的现代中央银行的对手。

布鲁姆这番话从长远来看显然是正确的。但是他所指出的真相并未能阻止我们这个时代大大小小的犯罪分子继续钻研这门见不得光的手艺。

第十三章
秘密行动 vs 稳定：从越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

因为秘密战争是避人耳目的，既无条约也不会有公开表态，所以就像没这回事一样。

——美国五角大楼文件，1971 年

1946 年底至 1947 年初可怕的严冬时节的战后欧洲，笔者在一列没有暖气的军列上打着寒战，火车穿过战败德国颓败肃杀的景象向维也纳驶去；笔者当时是一名 18 岁的美军士兵；作为密码解译员前往驻奥地利美军司令部就职。在法兰克福和慕尼黑等德国城市，欧洲中部的废墟一幕接一幕映入车窗。从平原到山区，到奥地利西部的美军占领区，沿途尽是凹凸刺眼的断壁残垣。奥地利和维也纳，一如德国和柏林，同样被分割成了美占区、英占区、法占区和俄占区。

在维也纳，市中心繁华地段成了国际区，每个月依次由四支“解放军”的一支负责巡检和管制。四大军各自的军警轮流入驻区域中心警署——按照苏联人的叫法就是“军事管制总部”。临到俄罗斯人负责的月份，来自东欧的避难者和难民就会纷纷迁走，生怕苏联军队和秘密警察会逮捕和驱逐自己。格雷厄姆·格林和卡罗尔·里德的作品《第三人》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维也纳，好莱坞改编的同名影片凭借导演和影星奥森·威尔斯和约瑟夫·科顿的表现赢得了恰如其分的赞誉。甘兹巷一带，当我们的六十三独立营在临时征用的学校教学楼舒适地安顿下来时，民众们却在马路上和排水沟里搜寻着点灯的煤渣、生火的木头和充饥的残食。

这一区不论曾以格调著称的咖啡馆还是不入流的夜店，均沦为黑市的温床。不断有人兜售伪币，包括同盟国当局发行的奥地利先令票以及供

美国士兵、获得特许的美国陆军消费合作社工作人员、军需品经营者和其他军办单位使用的美国军方代金券。作为支付工具的货币替代品可谓五花八门：巧克力、尼龙袜、美国烟（“最好是‘契斯特菲尔德’，‘好彩’和‘骆驼’也没问题，谢谢！”）……用这些可以换到不常见的金币、艺术品、人民歌剧院精彩演出的头等座、与一个估计是饥肠辘辘的女人共度的一小时或一整夜，甚至搞得到稀有的宝石——只要你有足够多的香烟、真正的绿背美元或者其他可以换到贵重品的紧俏货。

在德国和在奥地利的苏联军队都开始把占领区当做自己的后勤基地，而且不分真钞伪币，只要是钞票他们都用。美军驻奥地利第一任最高长官、美国第五军总司令马克·W. 克拉克记录了苏联人如何将东奥地利洗劫一空。苏联人对齐特斯道夫油田和布尔艮兰州其他东部省份的采油设施表现出了格外浓厚的兴趣。遇到现金他们就想据为己有。当苏联部队率先进入奥地利并从顽抗的党卫队军团手中夺取了维也纳，就将德国在奥地利各家银行的帝国马克存款收缴为战利品；很快又强行把霸占的 4 亿帝国马克“借”给总统卡尔·伦纳领导的奥地利新政府。伦纳是一位在 1938 年德奥合并时和二战中幸存下来的民主派，他的政府原计划对这些纳粹货币加盖印戳而将其转化为特别钞票，作为奥地利货币再次发行。接受借款则该计划只得作罢。奥地利战后事务同盟国四方委员会颁布决议：四支“解放军”发行的军事先令将使用到奥地利发行和流通新的国家先令币为止。

奥地利人于是竭力要把“借来的”帝国马克还给苏联人。后者不置可否。1945 年 12 月，新奥地利国家先令到位。1946 年 1 月，苏联人要求以新奥地利货币再次偿还 4 亿帝国马克“借款”。原来的帝国马克这时已不值钱，一方面是伪币泛滥所致，但主要还是更替为同盟国控制的新货币的缘故。俄罗斯人想借货币转换之机揩油，得到了肯定的回应。克拉克总司令立即对伦纳政府提出，假如奥地利满足俄罗斯人的要求，那么美国也将要求他们以新先令币偿还美国在新币发行前交出的约 20 亿同盟国军事先令。军事先令在上交时和帝国马克一样属于法币，但被替换后就丧失了一切价值——如同过时的伪币一般。克拉克意识到，只还俄罗斯人的钱而不还美国人的钱，在奥地利人于理不合。对两方面的要求同时回绝将是他们

唯一的选择。维也纳驻军得到通知，新先令币就像美军代金券一样，远比另一些此时已废弃的钞票更容易招来赝品，不为别的，就因为它们的购买力要强得多。它们让黑市上香烟、巧克力、尼龙袜和其他可用做支付手段的货品的价值都面临缩水。

被占德国的货币和整体经济状况比奥地利的更混乱，有更多矛盾。不同程度忍饥挨饿，甚或接近饿毙的数百万德国人发现，很多人积攒下来的、在最艰苦的战争时期好不容易保存的希特勒时代的帝国马克(在 1948 年 4 月美国主导的货币改革开始前，它一直还是法定货币)根本买不到多少东西。欧洲许多地方的前纳粹中层和高层特工也发现他们捞到的自以为可观的财富其实只是萨克森豪森营伯恩哈德行动制造的伪币，并无价值可言。弥漫着针对所有纸币的普遍的不信任感，刮起了储存老的金币、银币乃至任何可以收罗到的贵金属的热潮。

要在德国购买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除了现金还需要有相应的配给卡和粮票。德国作家海因里希·波尔目睹这一不分阶层地重创了全社会的苦难，叙述了一个“无阶层社会”的诞生。前科隆市长、后出任首相的阿登纳·康拉德的友人，科隆天主教红衣主教约瑟夫·弗林斯宽恕了在 1946 年底至 1947 年初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严冬里对煤和贵重品下手的小偷小摸行为，称这些贪渎之罪情有可原。柏林施雷贝公园的“黄牛”即黑市商人们，包括向他们供货的美国大兵，把一包美国烟卖到了 20 马克，为了向求烟若渴的德国烟民(那个时候 14 岁以上的人差不多都是)维持稳定的供应，全国种下了 1200 万株烟草植物。一磅真咖啡的黑市价在 500 到 800 马克之间(马克对美元的官方汇率为 10：1，但如果你有幸碰到了购买真美元而不是代金券的机会，你要付的远不止这个价)。平均一个工人一个月能赚 250 马克，一些白领能赚到 450 马克。“黄牛”党的老大们则财大气粗，他们感兴趣的是花 6 万帝国马克买一辆美国制造的“史蒂贝克”或德产“迈巴赫”轿车。

在被占德国，包括伪造美元和其他硬通货在内的各种犯罪活动激增，加剧了整个社会的动荡。鲁尔地区爆发了失业者的示威游行，队伍里多数是饥饿的男男女女。上了年纪的人又回想起了 20 世纪 20 年代被法国占领以及超通货膨胀时期的苦日子。慕尼黑的一次 24 小时总罢工打出了如

“我们要活,不要悲惨地死掉!”和“我们是德国人,不是殖民地人!”一类的标语。汉堡地方商会会长阿道夫·库默努斯对12万位听众表示:“这成了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美国军事当局领导人卢修斯·D.克莱拍电报告诉华盛顿,被占德国的形势“着实可怕”。

接下来发生的可以被、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被2003年3月开始的美国主导的对伊拉克的占领援为先例。如果一开始采取的旨在稳定伊拉克货币的合理措施得到了有效贯彻,而不是因重建时过度的资源浪费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而被抵消,那么二战后德国和奥地利的经验教训本可以为今日劫难重重的伊拉克的未来廓清迷雾。

华盛顿的设计者和年轻的德国经济学家、未来的西德首相路德维希·埃哈德认为,在希特勒极权主义体制的废墟上建设市场经济,重振德国,要跨出的第一大步就是大刀阔斧的货币改革。德国人必须被给予他们可以信任的钞票,首先一点,这些钱能让他们购买日常所需。改革计划(很大一部分在1946年3月拟定,当时被归为机密,代号“鸟狗”)的主设计师是美国银行家约瑟夫·道奇和两位移民到美国的德裔经济学家格哈德·科尔姆和雷蒙·W.戈德史密斯。道奇是美国(驻被占领国)军管会财政处负责人。精心遴选的人数极少的一组德国财政官员(可能包括若干执法部门官员)从1948年4月23日起在卡塞尔附近的罗特韦斯滕空军基地度过了7周时间。他们获准与美国人“商议”即将展开的货币改革;实际上不过是将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已经定下来的事情向他们做了介绍。年轻的路德维希·埃哈德认识到鸟狗行动乃庞大的复兴欧洲之马歇尔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1948年2月和3月召开的一系列同盟国高层会议决定,三块西方占领区将参与马歇尔计划,如果可能的话,将组建为单一联邦国家。

作为先前西方国家会议的成果,1948年6月1日签署了西方占领三国与比、荷、卢三国的六方协议。该协议要求:对鲁尔实行国际监管,德国加入欧洲复兴计划(美国斥资10亿美元打造的马歇尔计划在协议中被如此定名),三块西方占领区更紧密地结合,起草一部联邦德国的宪法。这是对斯大林在东欧和中欧的扩张之势采取的防守。苏联3月20日的一纸命令召回了莫斯科在柏林的同盟国四国统理委员会的代表、苏联元帅索科洛夫斯基。以此为标志,德国的分裂拉开了序幕,最终演变成各行其是的

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为丘吉尔所称的“铁幕”阻隔的大形势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两德重新统一方告终结。

6月18日正式宣布启动鸟狗行动，发布实际由美国担保的稳定的德国马克，它们最初是美国财政部承包商之一的美国银行纸币公司在美国秘密印制的，等到替换已老朽不堪的帝国马克的时候才运入德国。兑换集中在周末6月19日和20日进行。德意志国民银行承担发布事宜。基础兑换率为1新马克比10旧马克。每位西部公民和合法居民首次兑换不得超过40帝国马克，以后逐次放宽至更高金额。

新货币通行的第一天，周一，即6月21日的上午，商店破天荒地提供了那些此前基本上只能在黑市觅得的货品和服务。埃哈德未向占领国请示，自主宣布即日起解除价格管制，并将逐步提高最高工资和对其他要素作出修正，直至过渡为自由的德国市场。备受推崇的“经济奇迹”带来了稳定，最终也把繁荣的工业经济带给了未来的联邦德国。

苏联对这次货币改革的反应是断然排斥，对穿过苏联占领区连接西柏林的同盟国控制的公路和铁路先是重重设阻，后于1948年7月24日完全关闭：柏林遭到封锁。美国率领其他西方国家对柏林西部地区展开了尽管仓促上马然而规模可观、效果显著的货物和新币的空运补给。由苏联人包办的“东部马克”迅速出笼，德国统一前它始终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法定货币。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一定年龄以上的普通欧洲人都将德国马克的诞生和它历时长久的稳健存在（21世纪初被新的欧洲联盟货币欧元所取代）视为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一大胜利。对专业伪币制造者来说，需求强劲的德国马克自然成了一个诱人的靶子。国内的刑警和国际刑警组织发现，狙击伪币的任务骤然变得复杂起来。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和无组织的个人开始在德国抛出他们的伪币，而后在民众对美元和德国马克的信任度远高于本国货币的一些国家（比如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巴尔干诸国）也出现了犯罪分子的形迹。伪币制造者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提高彩印技术、将凸版印刷与凹印相结合等等，让伪造的美元、德国马克、瑞士法郎和其他欧洲国家货币席卷了欧洲连同欧洲以外的地区。

不过从某种角度看，欧洲打击伪币和其他形式金融伪造的执法工作

在20世纪下半叶也可以说是变得不那么复杂了。因为——至少，如本书前面部分写到的，在欧洲之外发起的地下货币战争出现之前——“政府”没有造欧洲的伪。

远东的情形则大不一样。对于远东，特别是对越南和朝鲜，种类繁多、通常数量巨大的伪造，成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秘密武器库里的一件重要兵器。虽然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二战前期否决了造伪计划，但其后历届美国政府都曾周期性地造伪，从罗斯福的继任者哈利·S.杜鲁门总统开始。

中情局和美国军方的伪币制造者试水东南亚

几十年来，美国的仇敌、批评者甚至有竞争关系的盟友都过高估计了中央情报局的权力。中情局未能预先侦破(或者未能说服布什政府相信它分析到的有关信号的严重性）乌萨马·本·拉登的支持者2001年9月11日对纽约和华盛顿发起的攻击，使得它的神话色彩加速消退。中情局光环的黯淡随着多年前“祖传珍宝”的曝光便已不可避免，“祖传珍宝”是中情局资深人员对局里那些隐藏得最深、掩护得最好的机密的习惯叫法。

珠宝箱的打开缘于1974年12月22日《纽约时报》对一项明显违背了将活动限制于海外的中情局章程，专门针对国内反越战积极分子和其他持异见者的庞大的监视计划的概述。新年元月，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对照毁掉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的前车之鉴，感到有必要避免尼克松那种捂盖子的做法，因而任命副总统内尔松·洛克菲勒率专门组建的“蓝带”委员会展开调查。国会很快将这块“烫手山芋”摆上了议事日程。参议院组织的委员会在参议员弗兰克·丘奇的领导下揭开了中情局的众多“黑幕”(不过看起来都与造伪无关)，撕开了中情局的道德面具，令它在国内外的声誉都大受打击。

真正构成“9·11”事件前中情局误判的开端的，是在1979年至1989年长达10年的从阿富汗赶走苏联的战争中选择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雇佣军作为自己的代表、进而对这个国家掉以轻心、听之任之等一系列离谱的“臭棋”。华盛顿有许多人都未能察觉到，美国在反苏战争中的临时盟友乌

萨马·本·拉登和他扩张中的基地运动将很快手持美国方面在战争期间教会他们运用的杀器对美国下手了。从越南到1950年至1952年的朝鲜战争，再到古巴，最后是20世纪90年代起在伊朗和伊拉克，历次大张旗鼓而且花费高得不可思议的地下行动中，中情局和美军心理战部门的秘密战士将造伪和暗中操纵的宣传运动熔为一炉。中情局的行动虽然每一次的结果不尽相同，但没有一次可以称得上是对削弱对手的战斗力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我们的足迹遍天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20世纪50年代负责中情局远东事务的厄尔默夸口道，“天，那真叫痛快。”

根在二战

和众多秘密活动一样，中情局将造伪和宣传战相挂钩的做法萌芽自“疯比尔”威廉·多诺万的战略情报局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战争前期，美国鲜有外国情报部门的高超手段。随着罗斯福总统富于想象力的大胆计划的推出，一些难度较高的秘密战争项目也开始上马。多诺万学习着英国人的门道，而温斯顿·丘吉尔的秘密战士在克服了最初的反感和某些阻力后，特别是经历了伯恩哈德行动及其余波的扫荡以后，对德国人用起了拿来主义。

太平洋战争中对日本纸币的伪造为战后中情局的这一类活动创下了先例。美军第六军以及战略情报局统辖的士气行动伪造过各类日本货币——特别是菲律宾的日本侵略者自1942年1月开始使用的占领军货币。（战争后期，当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着手兑现自己1942年许下的要重新踏上菲律宾群岛的诺言时，冒牌的日本钞票涌入菲律宾的势头也显得愈加猛烈。）第六军的心理战部门还在从日军那儿缴获的正版日元纸币上加盖标语口号。其中一条嘲讽了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对新殖民帝国的粉饰性称谓“大东亚共荣圈”，写着：“共荣圈——值几个钱？”往日本钞票上加盖标语最早发生在美军于1944年12月解放的菲律宾城市塔克洛班。美国空军第五军将这样的钱币空投到了马尼拉和吕宋岛。前美国心理战干将、退役军事长赫伯特·弗里德曼引用了当年大量出炉的美国官方报

告中的一份，称伪币和标语的意图是要"让菲律宾百姓深刻领会占领军货币的毫无价值，顺带让日本丢脸、难堪"。

越南：法国人跑路，美国人顶上

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执政期间美军在越南展开了大规模军事行动，而美国在那儿的地下活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二战结束前最后几个月里，战略情报局少校阿基米德·帕蒂和未来的死对头、年轻的游击队头领胡志明并肩工作，对抗日本侵略者。20 世纪 50 年代前 5 年，美国出钱出力，地下活动不断，对从 1954 年起在阿尔及利亚面临严峻挑战的法国为保住其远东殖民地及二战前划定的势力范围所作的最后一搏施以援手。

试图瓦解敌人士气的法国和(法军在奠边府吃了败仗以后)新加入的美国用起了伪币和传单，传单或者单独空投或者附在钞票上。它们和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交战国一样，所依据的原则按心理战行动特工、前军事长弗里德曼的说法就是："哪怕向来对敌人的(宣传)毒品不屑一顾的最本分的百姓和士兵见了地上的钞票也会屈尊去捡，并且会在不知不觉间把标语读完，成为敌方宣传的被动接受者。"

法国人在对越盟的劳而无功的斗争中为继承其未竟事业的美国人做出了示范。他们伪造过至少 3 种面值的钞票，往伪币上加盖过的标语不少于 4 种。一种是敦促越盟战士当逃兵，"回家吧，你悲伤的老母亲、妻子和幼小的儿女已等了你那么长那么长时间"。印有这类标语的钞票被空投于西贡附近的交趾一带。标语里的句子摘选自越南传统歌谣和诗篇。

批准在越南采用伪币加传单战术的正式指示，可以在国防部分析家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窃得的官方保密文件的总汇——五角大楼文件中查到。《纽约时报》首次发表了全文，引起了轰动一时的诉至最高法院的案件，原告方尼克松政府败诉。

1954 年 6 月美国接过了败走的法国遗下的重担。此前中情局调来参加了在战后的菲律宾打击游击队胡克巴拉赫普("胡克")、最后大体取得成功的秘密战争的美国空军上校爱德华·G. 朗斯代尔，这一次他被派往西

贡。以朗斯代尔为首的“准军事行动”和“政治—心理战”专门小组所要攻击的是力挺后来被美国人称为“越共”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的秘密行动于1954年10月拉开序幕。朗斯代尔小组破坏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首府的城市公交所依赖的石油供应。他们大搞间接宣传，有些传单伪造成越盟传单的样式而内容却是各种失败主义标语。朗斯代尔领导的另一项活动是组建和训练了两支越南特工队伍。

行动中的美国秘密战士

不知在什么时候，五角大楼的常规记录之外又添上了朗斯代尔小组的一份2.1万字的详细报告。内容涉及1954年8月至1955年8月美国的早期活动。小组接到的命令是“采取准军事行动打击敌人，展开政治—心理战”。

美国官方记载以“援助(南)越南共和国军的项目”为题。一支“观察研讨组”受命对包括间接宣传行动在内的整场秘密战争进行指挥。其下6个分组负责制订地下行动计划，简称OPLANS。OP−33是模仿二战中战略情报局的士气行动科而设的心理战行动分组。1968年更名为OP−39“心理研究组”。按照赫伯特·弗里德曼的说法，“间接宣传和伪币(一开始)都是OP−33搞出来的”。小张的间接宣传传单和大型招贴不仅出现在西贡街头，还无孔不入地进入了军营和公司总部这些次级群落。1965年10月24日至1974年6月29日之间，稍上规模的印刷工作都交由美军第七军心理战行动组在冲绳岛进行。日本东京的德雷克营的美军附属印刷厂也印过一些。弗里德曼记录道，秘密攻势中的伪币部分在1968年即已启动，执行者是驻西贡的第四军心理战行动小组。五角大楼显然给予了批准，拨出了专款并下达了启动口令。以取笑敌人的经济和社会为主题的冒牌钞票的草样在华盛顿和西贡之间往返多次，以便定夺具体采用哪些标语和越南方言。五角大楼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心腹批准在美国信息局的马尼拉地区服务中心开始进行印制。成品在使用前存放于冲绳的马奇纳多基地。空投的时间和地点由西贡的第四军心理战行动小组决定。伪币的制作水准很高：一旦将所附传单揭去，这些钞票足以以假乱真——

正如制作者希望的那样。

河内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向美国抱怨，伪币造成了通货膨胀。在华盛顿的国会辩论中，一些议员反对以伪币作为战争手段。马萨诸塞州议员爱德华·M. 肯尼迪的介入使行动在 1969 年一度戛然而止。在此前后，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也做出过暂停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的决定。

弗里德曼搜检各种蛛丝马迹，提出了一个早得多的伪币行动启动的可能日期。1966 年 11 月 18 日，怀特普莱恩斯的《记者一快讯》报道，"河内附近的红河三角洲被空投了伪造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货币，此举旨在削弱其政权的财力"。1981 年 12 月 9 日，民主德国的一份党报《波罗的海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尤利乌斯·马德的文章，称首次伪币空投是在 1966 年 8 月。文章指出当时空投了 160 万张伪币票，1966 年 8 月至 12 月间在荣市、河静、前江、义禄、灵感、河内、茶温和海防各地共空投了约 1670 万张。弗里德曼说剩余部分存放于冲绳，直至尼克松总统下令重启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后被再度调用。1972 年从 2.5 万英尺的高空抛撒了巨量附贴了宣传品的面额为 1 盾、2 盾和 5 盾的伪币。河内方面报道了 1972 年 10 月 19 日、21 日和 26 日的空投。1973 年 3 月 31 日的《新共和国》说美国信息局在冲绳的印刷厂 1965 年至 1972 年间印制了 600 万份钞票传单。双月刊《地下活动》1979 年 7 月至 8 月刊指出马尼拉的"地区服务中心"是"中情局宣传品工厂"和空投的假越南盾的产地。第七军心理战行动组一名官员向弗里德曼证实，马尼拉确为主要产地，而印制工作受冲绳基地"管辖"。弗里德曼说，一位美国大使馆的官员解释这些伪币类似于"数年前"在首次全面轰炸攻势中使用的那批。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乌天称，在 1972 年 8 月至 9 月间数以百万计的伪币被空投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他斥责尼克松总统是个"国际伪币犯"，存心破坏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

难得有几次美国独立媒体和评论员就行动的不道德性和非法性发出质疑，中情局和美军心理战行动的官员也会振振有词：贴传单的伪币并非蓄意仿造敌人的钱币，而是间接宣传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仅此而已。弗里德曼针锋相对地指出，秘密战争小组 OP–33 在冲绳准备的，交给 OP–34 和 OP–35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散布的，恰恰是未附宣传品的伪币。这涉及一个代号"本松丝"的行动。除了造伪币票，还包括往越南民主共和国的

电台广播窜入假的信息播报。空投"本松丝"钞票的行动代号为"独鹅"。1969年底MC-130"战斗爪"运输机在河内和海防投下的既有传单也有伪币。弗里德曼断言造"本松丝"伪币的目的不一定是要动摇本来就弱不禁风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更可能是要将伪币植入"某个阵营或某具腐尸，从而尽可能广泛地制造不信任感，诱发怀疑，动摇军心"。

在本松丝行动过程中，中情局还派越南籍特工打入北部传播伪币。1961年曾有一位南越军队的少校拒绝携带这些钞票：他觉得一旦被人查出，那么破坏敌人货币的罪名难免让自己的身份暴露无遗。1963年6月，一个装有面值总计400万越南盾的伪币的大箱子被空投下来，随箱还空降了一支渗透小队，连人带箱一并被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擒获。1963年8月，又一支小队从水路运来了另一个400万盾的大箱子，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钉上了梢，布下埋伏，再一次连人带箱一举拿下。

可能部分由于未涉及宣传品的缘故，"本松丝"被归入了顶级机密，美国官方史料对这一行动向来无一字提及。不过有几本已出版的著作证实了它的存在。行动参与者、前美国官员约翰·普拉斯特写过一本《美国在越南的秘密战争的指挥官们》。普拉斯特告诉赫伯特·弗里德曼，越南民主共和国钱币伪造起来很容易，因为敌人没什么现代的防伪手段。但行动照样非常谨慎，每次收到这些钞票，普拉斯特都必须签署一份"经手收据"。在《危险任务》一书中，传奇的美国冷战少将约翰·K. 辛洛布将军指出OP-33小组的指挥官、中校汤姆·鲍恩是一位伪造越南民主共和国货币的行家，还精通别的"高超障眼术"，显然曾在冲绳受训。另几本谈到本松丝行动的书包括塞奇威克·D. 图里松的《秘密军队，秘密战争》和理查德·H. 舒尔茨的《对河内的秘密战争》。弗兰克·格列柯的《流动的侦查》介绍"本松丝"是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人商店和军需处通用的"军方提货单"的伪造行动。这些提货单显然跟几百万美国大兵在二战后的欧洲使用过的、常常遭到黑市商和老千们伪造的军方代金券差不多。

中情局和巴特寮

一份为约翰·F. 肯尼迪总统准备的关于跨部门特遣部队的报告的落款

日期为1961年5月8日，正是肯尼迪家族和中情局急于摆脱对古巴猪湾入侵未果的阴影的时候。报告的"附件六"题为"地下活动"，建议通过打入老挝西南部的特工寻找越南民主共和国在那儿的军事基地并进行攻击，同时建议派飞机往该地区空投打击敌人士气的物资(没有指明是伪币)。

其间，与老挝万象的亲西方君主政府为敌的红色巴特寮游击队发行了自己的货币，以匹配于他们在战斗中一个接一个征服的地区，包括面额10盾、20盾和50基普、100基普、500基普等几款纸币。正版巴特寮200基普币呈红绿两色，印的是老挝寺庙图。首批流出的伪币——不排除系万象的君主政府所为的可能性，不过十有八九出自中情局之手——用胡志明像代替了寺庙图。1977年的《曼谷邮报》宣称是君主政府为了向巴特寮指出他们是在为越南而战、并非为他们自己而战而制作了这样的伪币。

中情局著名的"美国航空"航线的飞行员威廉·瓦福德在公共电视网科教节目《新星》1992年3月的一期中展示了他1970年对巴特寮总部之一、老挝桑怒城空投的纸币。《新星》强调制造这些纸币的是中情局。瓦福德还有一次驾驶"C7A美国驯鹿"飞机对老挝北部进行空投，包括空投了重达"好几百磅"的钞票。克洛斯多佛·罗宾斯在《美国航空》一书中提到中情局的空投时说，"伪造的面值相当于数百万美元的巴特寮货币" 被空投到了老挝，中情局"想用铺天盖地的纸币搞垮它的经济"。

虽然没有很多细节可以佐证，赫伯特·弗里德曼仍然提出了颇具说服力的观点：除了多次对美国的伪币行动作公开谴责(在尼克松当政时期次数尤其多)，越南民主共和国也尽其所能地对美国以牙还牙。

麻烦此起彼伏地冒了出来。在一次代号"后座力"的行动中，逆风加上可能是机组人员自己的疏忽，让正要对越南执行空投任务的飞机一个倒栽葱，带着"成千上万张撒满了货舱的钞票"跌回了基地。货舱门一开，露出了大堆钞票，(未指明是哪一处) 基地的航空站保安人员以为发现了一桩货币走私案。机组人员被扣押了一阵子。事情很快掩盖过去了，但很明显，需要某些比较高端的技术才能确保空投的质量。罗宾斯在《美国航空》中提到在一次执行对老挝的空投任务时，中情局印制的钞票盛在宽松纸袋里，还没来得及抛投，钞票就从纸袋里迸开来。"结果飞机里从这头到那头满地都是伪币。"飞行员瓦福德不无遗憾地回忆道。

加强传播

在朝鲜战争中和在欧洲的冷战初始阶段，传播技术有所突破。气球的使用被证明是更好地散布各类暗战物资的捷径之一。

1953年，中情局—自由欧洲电台发起了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气球攻势，代号“普洛斯彼罗”。气球释放于1953年7月13日午夜启动，地点是在德国位于美军占领区内的一座巴伐利亚小镇上。气球伴随着自由欧洲电台的专题广播进入了目标国家。跟着气球从天而降的宣传品为伪造的捷克钞票加一枚新发行的捷克硬币的铝质复制品。

角逐古巴

2006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红色古巴仿照对手美国的做法更换了本国货币，此举确实有着充分的理由。早在约翰·F.肯尼迪总统犯下批准艾伦·杜勒斯领导的中情局组织反卡斯特罗的雇佣军于1961年春季登陆猪湾的可怕错误之前，团伙和个人在美国和古巴两地炮制的假古巴比索和假美元就已经让古巴经济苦不堪言了。

2006年，来到古巴的人会发现这儿有两套货币体系。普通古巴公民使用的是古巴比索。同样存在着“可兑换比索”，专供外国来访者使用。流通的包括两套比索的纸币和硬币，但标准比索不可兑换为外国硬通货。而入境古巴者必须以硬通货换取比索。第二套比索的可兑换性是它——而不是古巴中央银行发行的标准硬币和纸币——成为伪币制造者近年来青睐的对象的原因所在。

不过到2007年夏季，菲德尔·卡斯特罗身体不适——据报道他在1年多前接受了肠道手术，正处于恢复阶段，其弟劳尔·卡斯特罗的“临时”政府用2006年印制的理论上较难伪造的新版纸币替换了原来的可兑换比索。1989年至1990年，苏联的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苏联对古巴经济援助的彻底中断，还有在美古巴流亡者、中情局以及古巴境内的伪币犯共同发起的货币战争，都让古巴百姓遭受了格外的困苦。几十年来美元催生起

来的地下经济让形势尤显复杂。个人拥有美元在1993年得到了合法化，当时美元比价攀升至1美元对150古巴比索。美元合法化和其他稳定措施使得普通比索的价值在2007年升至1美元对20古巴比索的水平。“可兑换比索”和美元以1:1的水平挂钩,为生活在古巴的大部分人所拥有。不少人以海外汇款为生,汇款主要来自美国,大约每年能为经济带来10亿美元的进账。国际银行,特别是加拿大的银行,通过提供便捷的输汇服务与古巴就此进行合作。

2006年一位游客在博客文章里写道:“古巴承受着针对其经济和政治的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其中一项就是用美元伪币的洪流冲击古巴。”这使得兑换20美元以上现金的顾客会被要求出示其国外护照或古巴身份证,证件号码和所换钞票的序列号也会被登记下来。

劳伦斯·K.伦特是1961年猪湾事件前后负责在古巴经济领域散布比索伪币的美国特工之一。他在《让我留着我的心》一书中描述了自己参与的中情局秘密行动和为此在古巴经历的整整14年。伦特参加过二战和朝鲜战争。受雇于中情局时,他已经在古巴岛西部奥尔加诺斯山的一处大农场落下脚来。

作为定居古巴的地下活动者，伦特开始为中情局在各行各业的古巴人中发展下线,有海军军官和卡斯特罗班子里的行政官员,更有在官办餐饮业联盟任职的一位知名人士。后来在斯蒂芬·爱默森为伦特的书撰写的评论中提到,伦特还参与过“协助空投武器弹药爆炸物、比索伪币和药品的行动，最难忘的一次是配合空投一位反卡斯特罗游击队头领的歇斯底里的女朋友”。古巴安全人员显然早就将伦特置于监视之中,但即使是在猪湾事件之前和事件发生时中情局空投的面额20比索伪币席卷古巴期间,他们也不曾限制过他的自由。直到1965年的一天,正当他准备在哈瓦那登机去新墨西哥州的圣菲参加父母的金婚纪念时,被他们扣下了。接下来的14年里,伦特被关押在古巴监狱里。

另一个在尼克松执政前期积极给卡斯特罗政权制造麻烦的人是马里奥·加西亚·科利。他是20世纪30年代初古巴驻西班牙大使的儿子,后来带着自己的美国妻子随父亲一起返回古巴，回国后他父亲仍就职于政府机关。古巴导弹危机期间,1962年10月26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报道前哈

瓦那投资银行家科利博士被一个名为“流亡武装古巴政府”的反卡斯特罗运动选为总统。

1963年10月3日，肯尼迪总统遇刺前夕，《纽约时报》报道科利已经被美国特勤局的一名特工逮捕。报道的标题是“密谋以假比索冲击古巴的流亡领袖在美落网”。同时被捕的还有电子工程师罗伯特·莫罗及其画家妻子塞西莉。按照后来担任纽约城检察官的罗伯特·M.摩根索的说法，莫罗夫妇承担了伪币印版的制作工作。第四位嫌疑从犯比尔·格罗施（或为中情局人员的化名）仍然在逃。《纽约时报》说科利1959年逃出古巴，是“解放古巴联合组织”的领导人，居住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南乔伊斯街16号，并在华盛顿特区的康涅狄格街1025号设有办公室。

科利和莫罗夫妇显然没有伪造任何“美国货币”。他们也没有干美国政府——至少是某些政府部门（特别是中情局）不许可的任何事情。然而他们却被指控犯有可判5年监禁和5000美元罚款的阴谋罪。遭起诉后3人以5000美元交保。1964年2月，莫罗和妻子在巴尔的摩受审时表示“服罪”，得到了缓刑处理。1964年春，科利和（当时在押的）格罗施分别被判处了1年监禁。法官申明，发现为他们所有的比索伪币除了用于他们的个人开销，还用来为古巴地下党购买武器装备以及用为贿款。科利和格罗施在上诉期内以5000美元交保。事后发现，有关方面曾设法追查假冒印钞工加入伪币行动从而诱捕成功的美国特勤局特工的具体身份。

涉及伪币行动，各部门彼此掣肘的情况之前就有过，到了约翰逊这届政府则愈加突出。科利在法庭上称五角大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曾勉励他进行古巴比索的伪造，到了他被捕和受审的时候却又袖手旁观。科利撰写了一份获美军上校沃伦·H.胡佛背书的书面陈述为自己辩护。胡佛上校追述了猪湾事件狼狈收场后的1961年8月，在国防部任职的威廉·麦考密克与科利就伪币计划进行了商讨。科利建议用假比索为古巴起义者购买武器并借此削弱卡斯特罗政权的经济。胡佛也向麦克斯韦尔·泰勒将军（朝鲜战争中最关键的高级指挥官）表明了他对该计划的支持态度。不过法庭拿到了一封泰勒将军前副手J.埃维尔将军的信。信上说泰勒怀疑计划的价值，也不认为科利在古巴人民中享有广泛的号召力。

在法庭上，为科利的辩护一锤定音的是理查德·尼克松签署的一封来

信。1960年从事助理工程师工作的科利在华盛顿特区的"火树高尔夫俱乐部"与当时还是副总统的尼克松有过所谓的会面。根据罗伯特·莫罗写的一本叫《背叛》的书——此书将科利和另外一些人同肯尼迪总统谋杀案串在了一起,尼克松让科利和中情局接上了头,在高尔夫俱乐部会面时,和尼克松一起的还有中情局的两名高层官员。尼克松在写给法庭的信上请求法庭考虑对可能误以为自己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支持的科利施以缓刑。和他后来试图规避水门丑闻时讲的那些推卸责任的套话差不多,尼克松宣称他对"具体情况"并不知情。

《纽约时报》对科利并不成功的上诉的最终结果未做报道。但是显然,尼克松暧昧的辩辞并没有打动另一位法官。1966年3月26日,《纽约时报》报道因科利未能服从监狱管理者,他的1年期判决被加重为2年。不过在科利服刑9个月后,约翰逊总统的赦免使他获得释放。尼克松及其诸位传记作者的书中都避免言及科利。

和众多书籍电影为肯尼迪谋杀案留下的重重阴影一样,针对卡斯特罗的古巴比索伪币行动和其他地下活动也笼罩着隐晦和不确定的迷雾。确定无疑的一点是,中情局及其合作者确实印制和散布过大量假古巴比索。目的在于资助反卡斯特罗武装和损害古巴经济。要挖掘全部真相,尤其是关于这些活动在菲德尔·卡斯特罗执政的漫长时期内对古巴经济、安全和民众生活方式的实际影响,大概还需要多年时间。

从麦德林歹徒和莫斯科歹徒看伪币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特勤局和世界各地的执法机构正被形形色色的伪币搞得应接不暇。1994年12月5日的《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上,布里恩·达菲写道:"运用尖端技术制作伪币这一困扰全球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可能最终会在世界上造成货币危机。"

苏联的崩溃导致侵吞党产、银行存款和小金库的现象蔓延成风,从圣彼得堡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莫不如此。侵吞者从前苏联转移出了几十亿货真价实的美国绿背币。在塞浦路斯和从维也纳、苏黎世到伦敦的欧洲各国首都,从1990年起直到1995年前后,几乎每天都会迎来满载俄罗斯人和

其他民族的前苏联国民的航班，这些人的行李里塞满了正版50美元币和100美元币以及数量少于真钞的制作精良的赝品。根据欧洲警方掌握的情况，俄罗斯、车臣、哈萨克和前苏联其他地区的黑社会组织展开了名副其实的空运行动。他们会从莫斯科起飞，到了目的地将珠宝和金银市场上所有的值钱货一网打尽，然后返回莫斯科、基辅或圣彼得堡，接着又带着等待被再次填满的空包开始下一趟飞行——有时两次飞行只相隔一夜。私人的美元、英镑、德国马克和瑞士英镑账户大批开立。宽松的银行法规让塞浦路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不得不出台禁令，暂停开设新账户。非法收益和假美元渐渐让洗钱天堂盛名下的塞浦路斯不堪重负。

美元的大量流失虽在一段时间内让俄罗斯面临贫困，却让后来的新寡头们发了财，后者的财富中常常混合着数量可观的伪币。通过银行、房地产交易、珠宝店和金银制品市场的洗钱渠道也让黑社会分子有了众多手段去漂白他们来路不正的猎物。

1998年欧洲联盟的统一货币欧元出现以前，美元中最具吸引力的“C票”亦即100美元币在前苏联和东欧大陆各地成了正规货币的主流形式。良莠不齐的仿版也一茬茬地冒了出来。

1993年圣诞节前夕，4名持枪者袭击了俄罗斯南部城市罗斯托夫的一间小学教室。他们绑架了12名学生、一名教师和一名校车司机，要求以100美元币支付全部1000万美元赎金。事件持续的4天中，经叶利钦总统批准，俄罗斯中央银行不得不筹借于各家私人银行。直升机将赎金交给绑匪后，对方立刻提出了释放人质的最后一个要求：一台用于检验美元真伪的验钞机。

国际刑警组织1994年的材料显示，美元伪币在该组织查获的所有伪币中占到80%左右。美国特勤局的数据则显示，在美国以外发现的冒牌美元的面值总额在1992年为2490万美元，1年后激增到了1.2亿美元。不过，一些非官方的伪币问题专家相信，为了避免打击国内和国际上对美元的信心，美国财政部给出的只能是保守估计。

美国货币自1996年更换了可见、不可见的图像和防伪特征以来，美国财政部和其他政府部门合作，开始就触及美国公众的伪币公布更多的资料片断。据报道，美国特勤局2000年后进行的研究表明，“将近半数”在

传播时被发现或在美国境内查获的假美元是从国外——大半是从哥伦比亚——运或“驮”进美国来的。美国特勤局追踪了伪币的传播路径，发现它们与以麦德林为首的哥伦比亚及其邻国的主要贩毒网络关系密切。“驮手”能领到一小笔传送费。他们将假美元携带到像洛杉矶、纽约、迈阿密这些存在着广阔的毒品市场的大城市；假美元到达当地的服务于特定贩毒组织的“地头蛇”之手后便由这些人组织传播，通常与毒品的分运同步，可渗透至全美国的大街小巷。

美国特勤局对大城市进行了重点调查，并和美国海关一起对来自拉丁美洲的航班进行周密检查。美国特勤局驻波哥大办事处尽可能与哥伦比亚的同行联手，共同拘捕嫌犯、突击搜查地下印刷厂，查获了贩毒组织等大型犯罪集团准备偷偷塞给美国的数亿美元伪币。

美国特勤局强调，哥伦比亚的伪币制造威胁到了美元在全世界的稳定性。拉美国家等一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动荡促使它们对本国货币体系实行“美元化”，也就是说它们选择接受美元——正式或（如伊拉克被美军占领后的头几个月里）非正式地——作为法定通货。厄瓜多尔于 2003 年 4 月正式将本币美元化，以遏制通货膨胀和厄瓜多尔货币苏克雷贬值的势头。美元一成为厄瓜多尔的法币，在哥伦比亚的美元伪造者就开始大举将自己的产品输往厄瓜多尔。2001 年 7 月 17 日的《迈阿密预报》报道了哥伦比亚最大伪币犯之一的落网。此人被认为与传入美国的面值总计超过 900 万美元的伪币票有关，他在基多和一批超过 9 万美元的伪币同时落网。美国特勤局表示获得了克林顿和布什两届政府为“哥伦比亚计划”提供的资金。该计划旨在加强美国对哥伦比亚方面的执法力度，并为制止美元伪造的专项行动发放经费。美国特勤局还准备在其他“美元化”国家开设相应的当地办事处。

1996 年最新版美元开始流通之前，哥伦比亚被视为美国以外的假美元头号造家。马里诺·拉迪略带领一支情报局 8 人小分队以迈阿密为根据地，与拉美警方合作，从 1992 年至 1996 年在拉美各地共查获面值达 46281980 美元的假美元。其中的 20986090 美元来自哥伦比亚，阿根廷以 10733400 美元排在第二位。在此期间，哥伦比亚人开始对他们自己的比索币和委内瑞拉、秘鲁、巴西和古巴各国的比索下手。哥伦比亚警界高官在

20世纪90年代声称，以掌握先进的技术和工程手段的年长者为主的哥伦比亚伪造手是“全世界最牛的”。

制作流程的第一步是拍摄真钞照片，这跟20世纪40年代伯恩哈德行动中的做法差不多。再将图像移到铝制印版上。档次较低的伪币印在普通的钞票或其他商业票据上。采用复古的19世纪技术将钞票漂白，再进行覆印，通常印成50美元币和100美元币。拉迪略小分队成员阿德里安·拉蒙·冈萨雷斯告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位记者，美国财政部用瑞士“焦里”牌印刷机以凹印法制造的“凹凸感”，哥伦比亚人早就学会怎样仿造了。

伪币作手(尤其是运用最先进技术的那部分)最大的聚集地是在波哥大和哥伦比亚南部城市卡利，后者一度是贩毒集团的大本营。在哥伦比亚中部城市伊瓦格和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库库塔也发现了作手群。100美元伪币以质论价，便宜的只要1.75美元，贵的卖到了17.50美元。贩毒团伙自己很少去经营伪币。20世纪90年代的毒品大亨可不希望有朝一日吃伪币的苦头或者让这事搅乱了自己的毒品生意。

少有的被广为宣传的一次美国特勤局和哥伦比亚警方的突击行动见报于2000年11月。探员经过暗访发现了一家隐藏在哥伦比亚西部安德森山区的地下印刷厂。突击搜查找到了一台印刷机和制作高质量100美元、50美元和20美元伪币的各种必要设备。工厂每周最高可产出300万美元。哥伦比亚警署的阿方索·奥雷利亚诺将军推测该犯罪集团已运转了10年之久，或已产出面值达10亿美元之巨的伪币。奥雷利亚诺遗憾地对记者评论道：“倒霉的是这其实是一种天赋，因为有些无师自通的伪币作手的各方面技术已经炉火纯青。”

伪币和伊拉克的稳定

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酝酿期间，有关萨达姆·侯赛因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情报和假情报层出不穷。美国主流媒体亦未曾对1991年驱逐萨达姆的军队出科威特的沙漠风暴行动中，以美国为首的联军自己的伪币行动做过报道。

开往沙特阿拉伯配合沙漠风暴行动的美军秘密战争队伍中就有越南战争时表现活跃的第四军心理战行动小组。该小组以制作伪币传单开始了对伊拉克的打击，所产伪币被确认的有4种，均采用了科威特战争前主要流通于北部库尔德人地区的正版伊拉克货币上的萨达姆像和骑兵队冲锋场面。沙特人显然对发布能够以假乱真的高仿第纳尔币存有顾忌。这让他们的印手对图像多少做了些模糊处理。(按照一位钱币藏家的网站上的说法，首批票子从未流出，是稀有钱币和伪币收集者苦苦搜求的对象。)

另一支在土耳其行动的第四军心理战分队印制了一批25第纳尔的伪币传单，而且显然进行了传播。1991年，又制作了另外5种印在薄纸上的25第纳尔伪币传单，此次是作为所谓中情局秘密行动的一部分。这批票子尤其稀少，单张价格在收藏界达到了100到150美元。

伦敦的伊拉克流亡者发表内容未获确认的声明，称自沙特阿拉伯流出的伊拉克第纳尔伪币(并非伪币传单)作为图谋在伊拉克制造混乱的秘密行动的一部分，在1991年战争后大批出现在了伊拉克黑市上。他们同时宣称伪造者将伪币藏在母羊的膀胱里，包括用另一些同样可笑的手段，通过未设禁的沙漠边境地带偷运进来。

2003年4月中旬，第二次海湾战争才打了1个月，对潜匿的萨达姆·侯赛因的追踪就已开始。当一身戎装的乔治·W.布什总统在“企业”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骄傲地宣告5月即有望大获全胜时，许多美国人(但欧洲人未必)喜不自胜。

位于华盛顿特区宾夕法尼亚大街的美国财政部的身影奇怪地冒了出来。士兵们搜查了即将成为“美占区”的一所萨达姆总统府，这片戒备森严的建筑在用做美国大使馆之后又成了应美国要求自由选举产生的伊拉克政府所在地。美国兵意外地发现了藏在里面的数亿美元箱装现金。现场目睹了搜查行动的《洛杉矶时报》记者注意到，在巴格达这处总统府发现的箱子，每一口装有总计400万美元的百元美钞。按照标记，这是一批在此前4年中提取自波士顿、纽约和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美联储分行的联邦储备券。(调查者后来指控一些经不起诱惑的美军士兵有顺手牵羊之举。)这批钱箱被空运到了科威特的保险库。根据美国特勤局发言人约翰·基尔的说法，已调专人去对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真多少是伪进行鉴定。

很早就有人怀疑这些钱可能是1990年8月至1991年2月伊拉克占领科威特期间从科威特银行搬来的,但这仅仅只是怀疑,因为没有任何调查结果见报。按照2003年2月前一直在财政部担任专管法务的副部长的圣母大学法学教授吉米·古鲁雷的解释，除非这笔巨款源于犯罪活动,不然是没有理由去彻查它的来龙去脉的。他说:“臆断所谓的犯罪活动对美国政府来说是不妥的。”古鲁雷先生补充说,萨达姆清楚失败即将临头,伊拉克银行系统很快将被联军控制，所以会预留一笔款子以便在藏匿中仍能享有舒适的生活。(2004年12月藏身地洞暴露时,萨达姆随身带着95万美元。)

从总统府搜出超过6亿美元的同一周内，又有1.12亿美元在复兴党高层和共和国卫队军官云集的巴格达上流住宅区的7所养狗场被发现。美元巨款引出了不少风言风语。有说最初从科威特银行劫来的钱里被掺进了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伪币。还有说钱大部分都是真币,是用来资助正在萌芽的暴动的。或者说它们全是萨达姆及其家人和追随者的个人赃款,是为他将来的复辟准备的。另外还包括综合了上述3种说法的说法。

无论如何,2003年9月24日，美军第812宪兵连的男女军警发现了大批隐藏的250第纳尔伪币,以及尚未裁开的大版张伪币。按照与第812宪兵连调查者联袂行动的伊拉克侦探的估算,共有约200亿第纳尔(按当时的比价相当于1000万美元)，他们称其为伊拉克有史以来查获的最大一笔伪币。以此为契机,带着已废统治者肖像的“萨达姆第纳尔”开始退出历史舞台。货币改革于2003年10月15日正式启动。对本章前面提到的1948年在被占德国完成的极其成功的货币改革，布什班子里确实有人从中领会了维持货币稳定的意义所在。伊拉克战争和占领时期,从头至尾,很少有几场改革如货币改革这么成功,2005年4月创刊的货币印制工业方面的第一份刊物《货币新闻》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改革的首要目标,如《货币新闻》所述,是对当时普遍使用的两套货币中的一套进行更换,两套货币分别为发行于1992年的萨达姆第纳尔和主要流通于北部库尔德人地区的所谓瑞士第纳尔。第二目标是恢复汇率的稳定。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资金不断流入萨达姆保险箱的好日子里,1第纳尔可值3美元;到2003年,第纳尔对美元的比价已跌到了2300:1。第

三个目标是加强防伪手段：美国军事行动2003年春季推翻执政者后，巴格达许多公共设施遭到洗劫，中央银行的印钞设备也被人盗走。移走了萨达姆像的国家货币给了伊拉克人一套面额组合更加合理的钞票。原来那套只发行过250第纳尔和10000第纳尔两种面额的纸币。

统辖此次行动的是退役美军准将休·坦特，一位有着30年军龄的老兵。联军临时管理当局2003年7月就即将发行的新货币进行了公告。以英国主要造币商“德拉鲁”为首的企业集团承担印制工作，将发行超过20亿张新第纳尔币，包括50、250、1000、5000、10000和25000 6种面额。票面采用伊拉克名胜古迹和历史人物作为图案，配以色差、安全线、水印和凹凸感文字等防伪特征。新的伊拉克第纳尔币被分送至中央银行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243个货币兑换点。伊拉克货币兑换监管当局负责对央行收集和销毁原来的萨达姆第纳尔的工作进行监督——这一切都是顶着对于银行系统、占领状态和暴动者的极端敌对姿态的重重怀疑所累积起来的貌似不可逾越的障碍进行的。

参与行动的包括来自联军临时管理当局、伊拉克央行和作为私有企业的管理咨询公司“毕博”的数千名人员；提供安保服务的“全球风险策略”是众多因这场战争和占领状态而获大好机遇的私人保安公司中的一家；提供运输机的是汉诺威航空公司；提供军事支持的是美英等国联军；银行和243处兑换点还需要雇用临时人手来应付兑换工作。

《货币新闻》报道，在2003年10月15日启动兑换程序之前，对兑换点的900多名伊拉克银行人员进行了专门培训，分发了点钞机、验钞机一类的设备，并展开宣传活动以增进伊拉克公众对相关问题的了解。从2003年10月15日到2004年1月15日，在旧钞票被收集、归存的同时，新钞票持续不断地输往各兑换点。政府部门派薪也以新币结算。从某些方面看，它和1948年德国的货币改革或40年后欧洲采用欧元时的做法不无相似之处。在2004年1月15日后，剩下的旧第纳尔币即面临销毁，新币发放网络也将解散，所有行动最后移交给中央银行。

新发纸币总重量2300吨。价值总计63800亿新第纳尔（约合32亿美元）的22亿张钞票替换了重1.3万吨的旧币。每次装载纸币90吨的波音747包机共飞行了27架次。钞票从巴格达国际机场戒备森严的专门区域

运往中央银行及其在各地的分行，再从那儿运往北部摩苏尔和南部巴士拉的当地兑换点。每个兑换点的收纳对收上来的旧币进行清点、查验，并在上面留下不可消除的红墨水标记。新币对萨达姆第纳尔按1:1兑换，对瑞士第纳尔按150:1兑换。银行存款自动转换为新币。然后中央银行将旧第纳尔币汇总，用燃烧或者浸入蓄水池中沤腐的办法加以销毁。在查验过程中发现，收上来的旧币中有将近1%为伪币，按照《货币新闻》的说法，在某些分析家看来这大概是个低得惊人的数字。

作为行动核心的700人伊拉克货币兑换团队包括警卫和兑换人员两部分。他们主要来自太平洋岛国斐济共和国，其中有500名操阿拉伯语的斐济士兵。其余人员分别来自加拿大、南非、津巴布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中央银行雇用了4000名伊拉克人充当保安。在伊拉克各地运送货币的包括6架飞机和百部车辆。地面运输由美军和英军小分队护驾——确实少不了他们：发生过15次对地面运输队的直接攻击，7次对银行的攻击。坦特列举的一次是暴乱分子袭击了从巴格达驶往萨马拉的两支武装车队。火速赶到的援军正是驾着十辆坦克和1架阿帕奇直升机的美国步兵。在随后发生的战斗中，有56名暴乱分子、一名货币兑换团成员和5名士兵受伤。后来还有一名兑换团成员在巴格达国际机场遭突袭时被杀。

当然，对新第纳尔币的伪造不断有人尝试，但是据《货币新闻》报道，伪造中心移到了(已经因伪造了大量欧元纸币和硬币而出名)保加利亚。《货币新闻》指出这意味着“伊拉克第纳尔第一次在国外被看做是一种值得伪造的货币”。当时普遍认为，凡是伪造的萨达姆第纳尔都是大批量制作以期在换手中洗钱的。

美国主导的联军当年3月入侵时，20多年的不当管理已经让伊拉克货币陷入了绝境。1980年至1988年的两伊战争耗干了巴格达的外汇储备，还给国家留下了沉重的债务负担，生产投资骤降。1991年科威特战争后，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因投资支出的不足而遍体鳞伤。高通货膨胀(无疑因伪币猖獗而加剧)让一度坚挺的伊拉克第纳尔大幅贬值。联合国为了减轻美国的经济制裁给伊拉克民众造成的负担而组织的“石油换食品”交易的合法收益和非法所得让萨达姆的复兴党统治集团发了大财——

虽然也有助于稳定货币供应和遏制物价飞涨。联军入侵后,因美国方面疏于防范而发生的大规模洗劫使得在占领当局迟迟无法恢复水电供应和其他公共服务的情形下已经无以为继的经济越发潦倒不堪。

2003 年 5 月,在布什骄傲地宣布战斗已经停止之后,以 1 美元币和 5 美元币为主的现金从纽约的美联储经华盛顿特区附近的安德鲁空军基地成批运往科威特。联军临时管理当局计划用美元向伊拉克人派薪,但许多伊拉克公务员更想要的是他们的第纳尔。如此避免了拉丁美洲那样的美元化做法。美元将把伊拉克石油出口和美国经济联结在一起,当时以伊朗和委内瑞拉为首的产油大国已经开始拒绝以美元结算。面对国民经济被占领当局彻底美元化的前景,伊拉克人宁愿选择新的“干净的”第纳尔,这当然也是引发创制新伊拉克货币、销毁旧币的联军行动的因素之一。

艾哈迈德·沙拉比莫名的传奇

1972 年秋季的一天,笔者在贝鲁特与艾哈迈德·沙拉比初识。笔者那时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中东联络员,而沙拉比在贝鲁特美国大学教授数学。笔者想去伊拉克库尔德人聚居区, 那儿正处在周期性爆发的针对阿拉伯政权——当时以巴格达的复兴党的统治为代表——的动荡中。沙拉比和库尔德人的交情是出了名的。这位伊拉克什叶派大银行世家的后裔证明了自己并非浪得虚名。沙拉比为笔者安排了在他自己的国家会晤库尔德人当时的族长和头领毛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的行程, 他的安排清楚地表明,他和伊朗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的王族政权同样有着不凡的交情。

一位极有可能来自国王骇人的安全情报组织 SAVAK 的沉默男子陪着笔者,一开始乘坐清晨从德黑兰开往大不里士的灰色巴士,然后和两位同样一言不发的战士乘一辆吉普车来到通向伊拉克库尔德镇哈吉奥姆兰的山区交界点,镇子里的毛拉·巴尔扎尼的人把笔者带到了他指挥部诚挚的欢迎气氛中。他的手下正在组织库尔德“视死如归者”:准备与当时刚刚成为伊拉克执政者的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展开新战斗的游击队战士。

作为一名什叶派, 沙拉比效忠于一切在德黑兰建立的政权这一点并

不奇怪。1991年后，约旦的沙拉比创建的彼德拉银行陷入崩溃。约旦正式起诉了沙拉比并举行缺席审判，判他侵吞彼德拉银行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罪名成立，他对这一指控矢口否认，将其归结为同行的嫉恨以及侯赛因国王的领地对他的政治敌意。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沙拉比在伊拉克敌对政派间往来斡旋，建立了财力雄厚并且最终获得美国支持的伊拉克国民大会。他一心要让自己的祖国摆脱萨达姆·侯赛因及其逊尼派统治集团的阴影。

沙拉比逐渐和乔治·W.布什总统志同道合的奉行新保守主义的顾问和2006年前的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攀上了交情。伊拉克国民大会获得了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超过4000万美元的津贴，沙拉比成了冉冉升起的新星。2004年1月，乔治·W.布什举行联合演说的盛典上，电视镜头显示沙拉比就坐在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身旁。事后显示，他是《纽约时报》等媒体有关报道的主要消息来源，他对萨达姆·侯赛因传奇的共和国卫队的长篇大论让2003年3月发动的军事行动以它作为主要的理由，事实证明这个理由并不成立。在他关于共和国卫队的说法开始显得可疑进而被戳穿以后，副总统狄克·切尼和他的幕僚依然对沙拉比青眼有加，甚至在他渐渐失去国务院和国防部（他在中情局的行情倒向来不是那么热）的支持的时候，他们还是改不过来。

沙拉比就职于美国指定的伊拉克执政委员会。他摩拳擦掌，计划为争取将在2005年1月伊拉克普选后走马上任的总统或副总统的位置大干一场。突然，一记晴天霹雳：2004年8月，沙拉比正在访问伊朗时，伊拉克法官祖海尔·马利基签发了对沙拉比的逮捕令。对他的指控是：欺诈和伪造伊拉克货币。华盛顿的白宫发言人承认预先知道此事，同时声明美国与此案无关，这纯粹是伊拉克的事务。不过有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指出，沙拉比可能是因为向自己的伊朗朋友泄露了美国的机密而获罪的。沙拉比否认了所有指控，回到伊拉克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

在2003年至2004年进行货币改革之前，对萨达姆第纳尔的伪造有扩大之势。兑换期间的2003年10月，在对巴格达沙卜区的一次突击搜查中找到了大约600万第纳尔伪币和制作伪币的设备，还有3名嫌疑人落网。2004年夏天对沙拉比在巴格达的住宅的搜查中，美国特工发现了掺杂

在真币中的3000张萨达姆第纳尔伪币。沙拉比的一位巴格达发言人证实了此事。2004年9月，沙拉比及其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使央行专家和主审法官认可了他之所以有意保留大批萨达姆第纳尔伪币，是为了要在即将与银行和执法部门的官员举行的会谈中出示它们。起诉沙拉比的祖海尔·马利基法官以“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原来的欺诈和伪造货币两项指控。不过他补充说，如果有新证据提出，那么2年后还可以重开案卷。沙拉比退出政坛回到早年旅居过的伦敦，2007年他差不多已淡出了公众的视线。

基地组织上场

埃及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中有不少是兴起于1979年至1989年阿富汗战争的、结构松散的全球恐怖运动基地组织的前驱和协办人，他们采用了伪币加洗钱的办法为他们在埃及的运动筹措资金。1981年10月，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潜伏于军中的支部暗杀了安瓦尔·萨达特总统，以惩罚他在1979年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构成了这场运动的高潮。

一个名叫穆罕默德·阿米尔的激进分子及其志愿合作者赛义德·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同即将成为乌萨马·本·拉登主要副手的艾曼·扎瓦赫里一起酝酿了伪造大量美元、沙特里亚尔和埃及镑的计划，设想将伪币用于资助在埃及及海外的行动。计划执行人走私了一部采用尖端技术的印刷机，安置在偏僻的拜苏斯村，以为警方的触角伸不到这种地方。然而埃及法警设法促成一位颇有名气的职业伪造手弃暗投明，转而效力于警方。造假分子于是落网、受审、下狱。

2003年初，英国警方和军情五处在英格兰曼彻斯特的特工在嫌疑犯电脑的硬盘里发现了一份培训文件。其中提供了制造假证件、伪币票的操作细则。在押嫌疑犯称，这是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开展的训练的一部分。伊拉克暴乱晚近阶段冒出来的“在伊基地组织”在活动中以伪币为武器的做法，让这个组织顿时成为西方情报机关和美国特勤局关注的焦点。事实表明，后萨达姆时代的新第纳尔币伪造起来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难。正如南非分析家、大学教授苏珊娜·万纳贝里所说，造伪币“既可以解决活动经费问

题，又可以对心目中的仇敌(比如美国)发起货币战争，对基地组织来说是一个一箭双雕的诱人选择”。

另外，这样做还能进一步打击公众对于作为国际兑换中介的美元的信心——2006年至2007年随着欧元和英镑对美元比价的飙升，以及伊朗和乌戈·查韦斯总统领导的委内瑞拉等主要产油国倾向于用美元以外的其他货币进行结算，对美元的信心已经开始走低。

万纳贝里等分析家都注意到，假美元经由毒品洗钱网络的传播是迫使美国财政部每隔不了几年就要对美元进行重新设计的主要因素。国际刑警组织和欧洲刑警组织对2003年在荷兰破获的一个持有大量假美元的犯罪网络进行了深入调查。这批钱不是用凹版印刷机而是用施乐彩色数码印刷机制作的。这伙人仅在2周内就造出了总计3000万美元的伪币。

基地组织分布在某些地区的支部看起来更偏爱规模较小的伪币行动。这样，为恐怖分子提供安全场地、武器和伪造证件的所谓“地头蛇”更能便宜从事。基地人员通常像一般白领犯罪分子那样属于上班族。他们用假身份获取银行贷款，充当恐怖主义活动经费。

本书尝试投入远至古希腊的漫长历史，以发掘历史上的政治家、歹徒、间谍乃至平常老千是怎样为了赢得战争、搞垮对方的经济或者只是为了使自己发财而开始伪造货币的。

从这么多故事中不难看出，不论萨摩斯岛的古代暴君，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中世纪君主，对美国开战的英国的帝王将相，法国革命的斗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皇威廉二世，对抗欧洲仇家的拿破仑·波拿巴，南北战争中对抗南部同盟的北部联邦，对抗赫伯特·胡佛的美国的斯大林，对抗英国及其盟国的阿道夫·希特勒，抑或对付越南共产党和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中情局，没有人可以单单靠伪币赢得战争。恰恰相反，搞伪币的大部分人输掉了他们的战争，输掉了整个帝国或本人的财富。还有个别人，比如葡萄牙的阿尔维斯·雷斯，无意之中引发了政局的变迁，给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基本都是负面影响。

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战争将来不会在世界上重演。人作为贪婪的造物，

从人的本性看，几乎可以肯定，货币战争将永无止境。了解过去那些为首的伪币制造者成功和失败的手段和原因以及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或能有助于限制这类人带给将来的危害。笔者坚信，本书将为这一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书作者约翰·K.库勒穷其一生，撰写了很多有关国际阴谋的书籍。本书的主题是伪币。更具体地说，他为读者展现了人们如何试图使用伪币，以此作为发动战争或夺取权力的途径。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枯燥的问题，书里有很多诸如“货币”、“汇率”，以及“金本位”等的术语，需要你集中思想。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主题，令我读，我思。

——英国《观察家》杂志

真希望这个真实的故事（指本书中20世纪20年代击毁葡萄牙经济的伪币事件）是我的笔下之作。

——英国大师级惊悚小说作家 埃里克·安布勒

作者库勒提出了与众不同的问题，他所运用的资料来源令人印象深刻。

——美国《洛杉矶时报》

上架建议：金融、经济

ISBN 978-7-5339-2857-5



定价：32.00元